

# 德意志經濟思想史

加田哲二著

周承福譯

神州國光社出版

加田哲二著

周承福譯

# 德意志經濟思想史

神州國光社出版

## 序

學者說，經濟學是英國之學問，英國是經濟學之祖國。然而這是古典經濟學時代的話。最能使和古典經濟學相異的經濟學發展者則為德意志。在此意義上，德意志經濟學之研究，便是提出研究經濟學者不應忽略的問題的。

本書乃描寫德意志經濟學發展的大概，決不能說為詳細，但德意志經濟學重要問題許是未嘗逸失。德意志經濟學，原和其社會思想有密切關係，所以我們也須留意到社會思想上之問題。本書中，對於此點，當盡所能的注意，這只看本書之目次，便能判明。我在慶應大學經濟學部，教了幾年德意志經濟學說，此中講義（Zōō）的集積，成為這本書，從而雖要使學生們於一望之中，眺見德意志經濟學之發展和其問題，但能否成功，這祇委諸讀者諸氏賢明的判斷。我底企圖，原要寫成一本詳細的學說史——尤其是關於現代之部分的，然出我意思之外，費了這麼多紙數，僅能成為這個樣子。這一點，惟期他日之努力。

一九三〇，一二，一二。加山哲二

# 德意志經濟思想史 目次

## 第一章 官房主義之經濟思想 ····· 一

- 一，由近世初期至十八世紀之思想之記述的必要——近世初期之德意志經濟狀態與思想傾向——德意志經濟思想及政策之特異性——警察國家之經濟政策——官吏的經濟學者——官房學者——奧查，奧布列西，伯沙爾，波爾涅，克洛格——「財政的法學」
- 二，約翰·伯塞及其主著——國家，經濟與特殊關係，關於國家自然法的并神政的綜合的見解——人口論，農民階級尊重論——商業論——獨占，Polypolium, Propolium——「人口多食料多的國土」與價格之構成——繁榮荷蘭之影響——理想社會
- 三，賀寧克主著「奧國至上論」——對法蘭西優越之反對——國家間均衡之思想——由英吉利重商主義之影響——貨幣論——由事業論之出發——奧地利官房學者與其時代
- 四，德意志官房主義與奧地利官房主義之內的關係——舊德意志官房學者——石堅托夫——「德

- 意志王侯國——厚生國家觀之曙光——三十年戰爭與經濟問題——十八世紀前半之思想家——加薩爾「經濟的政治的官房學概論」——第特馬「經濟警察及官房學概論」——馬伯加
- 五，國家狀態學與統計學——實際統計的調查——小國家對立與厚生政策——德意志之二大國家——國家論的基礎——普凡托夫——伏爾夫之社會觀——功利主義之傾向
- 六，姚思地——姚思地之國家觀——「國家經濟」中之用語——貨幣之意義——受姚思地影響之思想家——琴格，菲律飛，達兒也，列茵——統計學之建設者 Süssmich，阿琴華爾，非發
- 七，後期德意志官房學者——Sonnenfels——其人口論——人口增加論——人口是一切價值及財之源泉——英法思想家，尤其是貿易平衡論之影響——斯脫露衍慈——官房主義之餘炎——拉烏

## 第二章 德意志資本主義之成立……………三三一

- 一，德意志資本主義較英法遲慢——都市中資本之集積與其支配農村——大農民戰爭——三十年戰爭——十八世紀經濟的要素——土地所有——小工業組合——商業資本——德意志小國家中之大國家布羅伊森——其絕對王制——十九世紀初葉資本主義之發達與自由主義——德意志

布爾喬亞由政治的冬眠之覺醒——與社會的解放者拿破崙第一世之鬥爭——布爾喬亞階級之地位——鬥爭後之布爾喬亞階級——封建的殘存勢力

二，武士俸祿——武士變成商品生產者，農業企業家的武士對農民階級之態度——德意志農民與法蘭西農民——農民解放之目的——封建的榨取——無產農業者之成立——易北河以東之地——農業的榨取——領主之工業——火酒及蔗糖之製造

三，布羅伊森王國之低地地方——組合的手工業之勢力——舊時之職人組合——布羅伊森王國對職人組合之態度——職人間階級意識之萌芽——德意志憲法之狀態——一八〇八年之都市制——伊埃那戰爭後之反動化——當時小市民之狀態——南德之形勢——小市民政治的理想

四，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抬頭——商業及商港都市之資本蓄積——家內工業之發展——家內工業之負擔者——家內工業用二個方法而成立——家內工業之諸地方

五，東部德意志資本主義中心地——亞麻工業——斯勒認地方之亞麻製造——地主為唯一的工業經營者——織匠稅——織匠之困窮狀態——與英吉利及愛爾蘭之競爭——領主支配之結果——腓力大王之政策——織匠之覺醒

六，薩克森資本主義——鑛山業——苦汗制度——勒不士格之定期市——其結果——薩克森為文

化之發祥地——重商主義之失敗

七、萊茵布羅伊森資本主義——大工業之發達——都市之發達——普羅列塔利亞與布爾喬亞之對立——萊茵省及威斯特發冷地方之資本主義——小手工業之鬥爭——布羅伊森政府困窮狀態之報告——Altenstein 關於困窮狀態之見解——基其要求之勞働調查——由軍事立場之考察——要求萊茵議會制定兒童勞働法——布羅伊森政府與萊茵布爾喬亞階級——總括——由中世封建的社會至近世的市民社會之成立——一八〇七年之「解放勅令」——由身分國家至階級國家——自由主義——關稅會議——南德諸國之改革

### 第三章 古典哲學之社會觀……………五七

一、馬克思關於德意志經濟學之言論——英吉利，法蘭西與德意志經濟學——法蘭西革命之影響——思想上之影響——十九世紀前半德意志思想之分野——四大分派——其代表的社會層——此類思想中德意志之特性

二、德意志受斯密斯之影響——康德——康德之國家及社會觀——國家之最高目的——人間社會之必然性——康德之自由與國家——其倫理觀——由全體觀念之出發

三，腓西特——人間社會構成之要素——生存權之要素——普遍主義的社會觀——「封鎖的商業國家」——此書之史的及理論的意義——理性國家之要求——與福祉國家之鬥爭——財產權之起源——國家契約——生存權——生產者與技術家——商人階級——其互相關係——三階級爲國民根本的要素——對非生產者之數的限制——生產之統制——生產物價值之決定——各人是國家之公僕——無貧富之別，此平衡狀態之確保——封鎖的商業國家之必要——官吏，教師，裁判官之必要——爲他們生活之勞働——爲交換手段及價值之表示者的貨幣——國內貨幣——「封鎖的商業國家」之第二篇——自由主義及重商主義之批評——第三篇封鎖的商業國家實現之方法——與外國交通之禁止——國家對外交通——爲身分國家之理想國

四，黑格兒之國家觀及社會觀——家族，市民的社會及國家——爲精神之直接的實體的家族——婚姻，財產，教育——由家族至市民的社會——爲市民的社會之原則的個人——外的國家——市民的社會的三要素——各人對各人之個人的利益的鬥爭場——市民的社會之本質——國家與社會之對立——國家之本質——爲實現自由之國家——國法——爲理念之國家與歷史的國家——未完成國家——未完成國之實現



第四章 自由主義思想與斯密斯經濟學移入德意志……………八一

一，由官房主義至自由主義——斯密斯之富國論——斯密斯之根本思想——形而上學之樂天觀——自然神教——道德情操論之一節——自然的調和論——經濟的調和論——要改善自己狀態之自然的努力——自由主義——國家之職能

二，與斯密斯思想無關係之德意志自由主義思想——芬賀爾特——人格調和的完成——自由的發展——斯力薩——歷史國家之問題——對於國家以前狀態之學說——由人間社會的從屬性為國家之成立——社會生活之要求——人間之不平等——國家之目的——自由主義之實踐與斯密斯之思想

三，哈諾威——哥敦堅大學——此大學之英吉利自由思想所養成的德意志之名士——斯密斯富國論之西拉的德譯——此翻譯最初之批評者佛達——佛達之立場——Nicholai、Iselin之批評——斯密斯對第三版之評言——嘉爾夫之富國論新譯

四，嘉爾夫——其翻譯——德靈之完成——嘉爾夫之著作——不受斯密斯影響——他對農業狀態改良的政策——他底歷史的研究方法——薩杜露絲之「國家經濟學概論」——其生涯——斯密

斯學說解說——「斯密斯富國論之諸要素并國家經濟」與「關於富國之要素并國家經濟之論文」——其對斯密斯學說之立場

五，呂達——其「亞丹·斯密斯之國民產業并國家經濟論」及其他之著作——對於地理學并統計學之言論——富國論之解說——努力樹立經濟學體系——在富國論上附註多數豐富的實例

六，克拉士——其生涯——哥尼斯堡大學中他底地位——他底著作——「國家經濟論」——他底講義——實際問題——貿易港的哥尼斯堡和他——十九世紀初葉之德意志與斯密斯經濟學

## 第五章 對正統學派經濟理論之影響……………一〇五

一，對斯密斯經濟學之經濟理論的影響——經濟理論的杜寧，黑爾曼，涅比紐斯——杜甯之「孤立國」——其嚴切抽象的研究法——經濟現象不變的要素——「孤立國」之意義——杜甯與李嘉圖——地租理論與自然工銀理論——勞働階級之命運——自然工銀之方式——正統學派學說與社會主義學說之綜合——勞働問題最初科學之處置——人口問題——生產力增進與勞働者狀態之改善

二，黑爾曼——其所著「國家經濟的研究」——到經濟的自由主義之合流——排斥根據自利之經

濟現象的說明——決定經濟學之對象——經濟理論之貢獻——價格理論——側重需要——工銀論——反對工銀基金論——影響及布靈達諾——所得本質論——黑爾曼在經濟學史上之地位

三，涅比紐斯——「英吉利狀態論」與「公的信用」——他底立場——由經濟的自由主義之背反——經濟政策的方面——德意志國內之自由通商——德意志關稅同盟之計畫——涅比紐斯之貢獻

四，拉烏——其諸著——警察學之傳承——經濟政策之獨立化——正統學派與官房主義之交響樂——理論的貢獻——斯杜西之翻譯——其他之經濟理論家——伯老——愛什靈——李德爾

## 第六章 德意志曼切斯達學派……………一二一

一，為實踐要素之自由主義運動——英吉利與德意志之差異——曼切斯達學派——其思想的淵源——農業國之德意志與工業國之英吉利——商業政策之背反——德意志之經濟政策——自由貿易之指導者佛郎士斯密斯

，樂觀的自由主義者巴思地亞——「經濟的詭辯」與「經濟的調和論」——支配經濟發展的三大勢

力——經濟的調和與自由——德意志曼切斯達學派之世界觀的基石——社會問題的解決——經濟學與倫理學之分離——社會關係為經濟的社會——社會政策之否定

三，德意志曼切斯達學派之領袖佛郎士斯密斯——其他之人們——德意志經濟學者會議——為 *JournaList* 的活動——佛郎士斯密斯之世界觀——自由貿易主義——國民經濟的關係之急進的個人主義之見解——國民經濟之私經濟觀——為中心點之市場——雇主與勞働者——自由契約與工銀——勞働問題——資本家的經營之下的勞働者和其他勞働者之差異——高的工銀和高的利潤——工銀基金之增加與利潤率——雇主與勞働者利益之調和——社會的自然法之發展——個人之社會的責任

四，德意志經濟學者會議——自然法之自由的發展——亞倫特——亞倫特與佛郎士斯密斯之差異——為道德向上之要素的自由競爭——為自然法之說明的經濟學——布蘭——什切杜列治——其「勞働者問答」——威爾特——自由貿易運動與其他思想——其經濟學史上之意義

## 第七章 浪漫主義者之社會經濟思想……………一三七

一，對資本主義諸害惡之見解——自由主義與浪漫主義——德意志浪漫主義之發展與其意義——

普遍主義社會觀之發展——Machiavelli——孟德斯鳩——梅沙——其社會觀歷史觀——農村論——黑爾達——普遍主義對合理主義之鬥爭——其社會的基礎

二，浪漫主義之本質——斯密特之學說——巴羅之學說——德意志浪漫主義——腓西特——斯勒格爾——諾華利斯——巴克——「法蘭西革命省察論」——有機的國家觀——為理念之國家

三，亞丹·繆勒——其生涯——其著作——共同社會概念與國家論——與斯密斯學說之鬥爭——社會的要素之關係統一——對競爭讚美論之攻擊——富之概念——生產力說——價值及價格

論——貨幣論——國民經濟之全成——經濟政策觀——土地問題——反對自由主義農業立法論——馬威志——反對個人主義——布羅伊森貴族之個人主義反對黨——哈拉——其貢獻——競治

五，巴達——愛之原理——社會契約說論難——社會之三階級——身分國家——機械的國憲之三大重要——個人主義與普遍主義——國家之積極的經濟政策——土地問題——工業制度之社會的害惡——國家關於外國貿易之政策——「里思特以前之里思特」——浪漫主義者之支持者

## 第八章 社會主義之萌芽……………一六一

一，德意志社會主義思想之發展——其經濟的根據——德意志產業革命——機械生產之影響——

紡績業——初期之勞働階級——其增加——社會主義思想之社會的根據與其發展

二，四十年代以前之德意志社會主義思想——法蘭西啓蒙文學之影響——漢撒——克林加——爲空想的思辨之社會主義——初期法蘭西及德意志之社會主義的影響——德意志社會主義運動之始源——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三十年代之社會主義之始源

三，嘉爾——嘉爾之防貧運動——渡航亞美利加——「怎樣才能救濟」——雜誌「人類之友」——改良人類——嘉爾的社會思想——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階級對立——勞働權和生活之保證——小資產者與勞働者之結合

四，表西拿——表西拿與牧師華依第之關係——人權協會——共和主義與革命——其社會主義——祕密結社「黑森通信」——其論調——其影響——彈壓

五，德意志國外之急進運動——出版同盟——德意志人民同盟——德意志被追放者同盟——其目的——其指導者——伯涅地——什斯達——彈壓

六，「青年德意志」之運動——「青年歐羅巴」——革命的共和思想——宣傳刺殺國王——什拉——「青年德意志俱樂部」——其勞働——「共產主義者同盟」——其目的——指導者——威脫林——四季協會——彈壓

第九章 觀念論的社會主義 …………… 一八七

- 一，初期共產主義——威脫林之生涯——威脫林之思想——現社會制度之批評——其出發點——私有制之起源——人口之增加——戰爭——奴隸——交易——富之蓄積——貨幣——貨幣之社會的作用——法律與刑罰——社會的國家——國家之目的——三種要求——生產——消費——此種規制者之知識——知識之重要性——科學之種類——為社會的管理之天才——其採用法——試驗——「脫利阿」——中央主任會——主任會——事務主任——事務總長——藝術院——保健委員會——行政官之任期——全勞働準備學校——三種勞働——「脫利阿」之任務——享樂品之生產及分配——援受時間——援受手摺——快適品之生產——子女之勞働——兒童之教育——學校隊——理想社會中無犯罪——實現社會國家之手段——王制與改造社會——威脫林思想之影響——其同志
- 二，法蘭西社會主義與德意志哲學——黑格兒哲學之支配及對其哲學之批判——黑格兒哲學與宗教問題——黑格兒左黨與右黨——到社會的并哲學的唯物論之轉向——斯特拉士——「基督傳」——無意識的創作的基督——神之世界和人之世界之對立——為社會現象之宗教的認識

- 三，費巴——「基督教本質論」——恩格斯之言論——費巴哲學研究——人間學——感覺論——哲學唯一之對象——唯物論——快樂的論理學——歷史觀社會觀
- 四，由費巴之人間學到社會批判——社會主義的擷取說——真正社會主義——黑思并其生涯——其著作——社會主義雜誌上之活動——黑思之社會思想——自利——掠奪——奴隸——自由競爭與擷取——生命之販賣——永遠之矛盾——貨幣之作用——生產與消費——共產主義之必要——共產主義者之任務——法蘭西共產主義之缺點——真正共產主義之原理——其實現方法——Semming 之評言
- 五，克淋——其活動并著作——到法蘭西比利時之旅行——「法比社會運動」——為政治家之活動——他底社會主義觀——現社會之批評——立憲主義——國家之政策——自由社會之構成——自由人之完全的自治——新的世界——列自由社會的推移
- 六，蒲魯東之無政府主義與德意志社會思想——Stirner——其生涯——「唯一者與其所有」——為出發點之費巴——費巴之修正發展——自我——自我之自由的活動——自我者之同盟

## 第十章 馬克思之社會并經濟理論……………一二七



一，德意志社會主義之完成者——馬克思之社會理論的體系——體系之發展——理論與實踐之統一——共產主義——馬克思的方法——辯證法

二，「德意志·意特沃羅幾」之唯物史觀——共產主義之必然性——「德意志·意特沃羅幾」之構成——理論鬥爭之出發點——馬克思之現實的前提——生活與意識——唯物史觀之根本的立場

三，為馬克思社會學體系之「德意志·意特沃羅幾」——人間最初之行爲——社會關係與生產力——意識——分勞——為分勞結果之矛盾——國家——財產——市民的社會——原始社會之發展——都市與農村之對立——手工工場——普羅列塔利亞運動之興隆——共產主義革命——其原理

四，經濟學理論——其地位——經濟學之對策——資本制生產——商品——價值——勞働價值論——勞働力——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資本有機的組織——可變資本之意義——剩餘價值論——產業預備軍——資本之蓄積與勞働者階級之窮乏化——生產與消費之不均衡——資本家的生產之終焉——革命時期——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獨裁——國家之本質與其死滅

第十一章 羅特比杜斯及拉薩爾之社會主義……………二五三

一，社會主義之發展——工業之發達——布爾喬亞階級勢力的增大和曼切斯達學派——社會主義運動之指導者

二，馬克思與羅特比杜斯——羅特比杜斯之生涯——「勞働階級之要求」——其他之著作

三，勞働價值論與貧窮之事業——恐慌論——貨子之意義——貨子之前提——社會問題之解決——共有制之實現——應急策——工銀制度之改良——由勞働決定價值與勞働貨幣——國家社會主義——國家觀——羅特比杜斯之意義

四，自由黨與勞働者問題——全國勞働者會議——拉薩爾——「勞働者綱領」——其內容——歷史觀——生產力與社會——為生產力之機械——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利亞——為特權階級之布爾喬亞——國家與布爾喬亞——夜警的國家——國家之本質——普羅列塔利亞之國家理念——勒不士格勞働者委員之質問——拉薩爾之「公開狀」——勞働者階級與進步黨——信用組合——消費組合——工銀之鐵則——生產組合——國家之信用補助——勞働者階級對國家之要求——「德意志一般勞働者同盟」——為總理之拉薩爾——拉薩爾底死

## 第十二章 社會主義運動之發展與其理論的批判者……………二七一

一，拉薩爾死後之德意志社會運動——拉薩爾派與馬克思派——兩派之合同——「哥達綱領」——對「哥達綱領」之批評——社會主義之政治的勞働

二，卑斯麥——帝國出版法——社會黨鎮壓法——與鎮壓戰的社會黨——馬克思主義之勝利——「埃爾佛爾綱領」之原理——馬克思主義之勝利與對此綱領之批評

三，杜林克之立場——其思想之變遷——過去，現在及將來之認識——其理論的體系——政治及經濟之二元論——社會的體系——自由社會之創造——經濟的共同體——漸次的社會的設施——集產主義之批評——「奪收者之奪收」之意義——馬克思批判——恩格斯之反批判——杜林克之影響——其理論的特徵

四，德意志社會主義與古典哲學——使康德復活的運動——郎格——倫理的理想主義之立場——哥衍——康德與社會主義之關係——對社會主義之要求

五，斯丹拉——「唯物史觀之經濟與法律」——社會哲學之根本問題——目的論的法則——自然必然論之馬克思主義批判——自然必然論與目的論的傾向之混合——馬克思主義者之立場——斯丹拉之影響

第十三章 修正主義論爭……………二九三

- 一，修正主義之起源——柏倫斯坦——社會民主黨內之問題——「社會主義之諸前提與社會民主黨之任務」——「共產黨宣言」中之馬克思恩格斯之誤謬——恩格斯之承認——柏倫斯坦之主張——暴力革命之過程——柏倫斯坦之民主主義——柏倫斯坦立場之要約
- ，考茨基之「柏倫斯坦與社會民主黨綱領」——綱領之意義——柏倫斯坦做了什麼——柏倫斯坦之發展的四階段——柏倫斯坦對唯物史觀之批判——考茨基之反批判——唯物史觀與階級鬥爭——恩格斯之言論——馬克思的方法——批評馬克思的二條路
- 三，辯證法之問題——革命綱領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與辯證法——柏倫斯坦之批判——考茨基之反批判——價值論之批評與反批評
- 四，社會民主黨綱領及戰時之批判——其與方法論之關係——魯克森堡對柏倫斯坦之批評——柏倫斯坦之英國式的見解

第十四章 馬克思經濟學之發展……………三一五

一，馬克思主義之發展——希爾佛庭之「金融資本論」——資本制生產之高度發展——帝國主義的獨占資本主義——金融資本——希爾佛庭之說明——資本主義初期之銀行貨幣——歸於產業銀行之隸屬——股份公司之發展——卡德爾化及托辣斯化——金融資本家——金融資本之地位

二，恐慌之問題——商品過剩生產——卡德爾與恐慌——卡德爾與未卡德爾化之諸產業——「金融資本論」之意義——最近馬克思經濟學出發點之「金融資本論」——魯克森堡之「資本蓄積」——戰後馬克思主義之傾向

### 第十五章 大戰後之社會主義……………三二二

一，一九一八年德意志革命——戰時計畫經濟——社會民主黨之態度——德意志社會主義中急進的要求——斯巴達古斯團——其目的——勞農獨裁——多數派社會黨，獨立社會民主黨，斯巴達古斯團之差異——社會化問題——共產黨——社會民主黨之新綱領

二，德意志共產黨——與第三國際之關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之方法——普羅列塔利亞革命之理論——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列甫與考茨基

三，考茨基對列甯之批判——獨裁與民主主義——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馬克思在社會主義國際同盟會的演說——社會革命之意義及條件——社會主義之建設與德膜克拉西——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馬克思學說中普羅列塔利亞獨裁之意義——普羅列塔利亞獨裁之政治形態——對考茨基之反批判

四，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之主張——資本主義之排斥——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德意志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其理論家——勞動運動與經濟的民主主義

## 第十六章 舊歷史學派之經濟思想(其一)……………三三九

一，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德意志資本主義二個敵人——德意志資本主義所要求的思想——新舊歷史學派——古典學派之經濟學與其批判——里思特——由康德影響之反對——歷史法學派之立場——反對古典學派之諸形態

二，反對自由主義的里思特——里思特之生涯——里思特經濟學中之問題——國民主義經濟學——國民之意義——國際主義之幻想——斯密斯之學說——經濟政策之相對性——實證主義——自然科學的歷史哲學——原子論的社會觀之批判——國民經濟與私經濟——自然因果

論與目的論之混合——理想之相對性——發展階段說——第爾之批評——斯莫拉之辯護——發展階段說與歷史學派——古典經濟學之三大誤謬——里思特之意義

三，羅西亞——其歷史的方法——「歷史的方法之國家經濟學講義要領」——羅西亞之方法論要領——哲學的方法與歷史的方法——歷史的方法與理想的方法——經濟學之本質——有機體說之立場——歷史的方法——實證的方法——國民發展之自然的法則之意義——羅西亞之意義

四，希爾德布郎——歷史的言語學之影響——他對斯密斯之批判——繆勒論——「現代經濟學任務」——經濟學研究法

### 七章 舊歷史學派之經濟思想(其二)……………三六一

，克尼士「由歷史的方法之立場的經濟學」——再版「由歷史立場之經濟學」——科學中經濟學之地位——精神科學與自然科學——為第三區域之國家學與社會學，為其一部之經濟學——國民經濟學之研究對象——有機的觀察方法——國民經濟之發展性

二，古典經濟學之世界主義與永久主義之批判——經濟學說之相對性——國民經濟生活特殊性之

要件——自然的條件——文化的條件——經濟學之任務——類似的法則——特殊性之重視

三，經濟生活之史的發展的要素——物質的要素與人格的要素——經濟學中自然法則之意義——爲發展法則之經濟法則——其意義——由歷史的實證的方法所得的發展法則——發展法則之相對性——經濟學與經濟史——倫理的色彩

## 第十八章 講壇社會主義……………二七七

一，自由主義與德意志經濟思想——一八六〇年至七〇年中德意志經濟狀態——一八七一年之債金——工業之發達——股份公司之激增——新經濟思想

二，與經濟的自由主義之鬥爭——布靈達諾——斯莫拉——遜堡之「勞働局論」——華克拿之「社會問題」——奧屏漢之「曼切斯達學派與講壇社會主義」——國家活動之限界——布列斯拉報之「大學與國民經濟」——與青年教授之論爭——布靈達諾之批判——斯密斯之意義與其一派——奧屏漢之活動

三，對抗于「德意志經濟學者會議」之會合——伊牙納圭之會合——爲社會政策原理之斯莫拉的開會辭——國家觀——社會問題之認識——勞働者問題觀——社會主義批評——社會改良——



國家文化之使命——第一回會議之內容——社會政策協會

第十九章 新歷史學派之方法論……………三九三

一，舊歷史學派與講壇社會主義者——與新歷史學派之差異——舊歷史學派之經濟學史的著作——新歷史學派之經濟史的著作

二，斯莫拉之經濟學論——反對脫勒士克之言論中的他底立場——倫理的見解之重要性——三個經濟學論——「國民經濟國民經濟學及其方法」中所表現的經濟學——國民經濟概念——經濟學——一般的并特殊的經濟學——歷史及歷史的研究之意義——演繹法——心論學的研究法——爲倫理的科學之經濟學——斯莫拉研究法之特徵——以實例爲工銀理論的研究

三，經濟現象中之法則性——比西亞與宋巴——比西亞之立場——宋巴之立場——斯莫拉之意義  
四，布靈達諾——其經濟政策的見地——「現代勞働組合」——勞働與商品——貨銀基金說批判——勞働者團結自由——高率貨銀之理論——勞働保險論——自由主義的社會改良——其影響

五，新歷史學派中對於社會問題態度之差異——保守的社會政策——自由主義的社會政策——綱

濟政策中之社會政策——商工立國與農業立國——土地所有問題——歷史學派之意義

## 第二十章 奧地利學派之經濟學……………四一五

一，理論經濟學之再建——新歷史學派與奧地利學派——奧地利學派之學的貢獻——德意志心理的價值論——葛森——享樂學——葛森法則——葛森第二法則——價值之概念

二，明嘉——其著述——對歷史學派之批評——經濟史，理論的經濟學，實際的經濟學之意義——存在之科學，當為之科學——經濟學之研究法——理論經濟學之前提

三，明嘉之價值論——限界効用說——威沙之價值論——巴伏爾克之價值論——奧地利學派者

四，價值之分類——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奧地利學派之分類——主觀的價值——客觀的價值——價值之性質——財之性質——效用與價值——評定價值之過程——第一場合——全部効用——第二場合——限界効用——價值論與價格論——決定價格之各種場合——主觀的價值論與生產費價值論之關係——生產財與消費之關係——價值之轉嫁

## 第二十一章 對歷史學派之批判……………四四三

一，歷史學派之政治化的傾向——批判此傾向之傾向——第治爾——正統學派與新經濟學之意義——社會經濟學——實際的社會經濟學與理論的社會經濟學——研究法之問題——經濟倫理學與經濟政策——個人的原則與社會的原則——經濟政策之意義——理論的經濟學——其前提——孤立的方法——第治爾與明嘉——伏爾夫對講壇社會主義之批評——埃靈傑——嚴密的研究法

二，菲巴——宋巴——鳩巴與頗列——頗列對講壇社會主義之批評——對此批評之反批評——斯莫拉——赫克挪——赫司

三，綜合的傾向——宋巴——「近代資本主義」中宋巴之傾向

## 第二十二章 最近之德意志經濟學……………四六一

一，理論經濟學之體系——辛碧達——威沙——「社會經濟原理」——特定經濟關係之說明——奧濱海馬——第爾——西班牙

二，新經濟學體系與馬克思主義之關係——馬克思批判——馬克思價值論

三，價值無用論——葛塞爾之立場——「利息之本質與必然性」中葛塞爾之立場——價值之意

義——價格之問題——價值論爲價格論之一部——稀少性之原則——李普曼之立場

四、奧濱海馬之客觀的價值說——馬克思說之擴大——其批判——第爾及西班——唯物史觀批判——西班之普通主義經濟學

五、馬克思批判與德意志階級鬥爭——一九一八年革命與德意志社會狀態——其理論的反映——社會學的傾向——向社會學之要求

## 第一章 官房主義之經濟思想

### 一

近代德意志社會及經濟思想，主要的是在十九世紀以後的發展上，才能發見其特殊。因而敘述德意志社會及經濟思想史，必須由十九世紀開始。然而十九世紀的德意志思想，乃承繼其前代的遺產，再批評綜合了由當時先進國的英法所輸入的社會及經濟思想，而形成其特徵。所以我們在執筆寫着十九世紀德意志社會及經濟思想史時，首先必須略述由近世初期至十八世紀的社會及經濟思想。

在德意志，經濟生活的發展，不如英法荷蘭的顯著。就是德意志近世初期的初期資本主義，其發展較這三國甚遲。因而其思想也採着照應于此遲遲而發展的形態。這就是由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的德意志經濟思想的傾向并經濟政策之目的和手段，乃依據于當時特殊事情的。在英吉利及法蘭西，使全國為政治的并經濟的結合之努力，很有效果，所以經濟勢力極形向上，同時政治的地位也逢着一大伸長的時期，然在德意志，其傾向則稍有不同。當時的德意志，嘗分裂為無數小國。有和繼續勃興的大

國家相併立而有獨自主權的寺院領域，多數自由市，諸侯領域。這些小獨立國，對於繼續勃興的絕對王制國家，作着爲維持其舊勢力的鬭爭。這些小國家，其人口不過數千之外者居多數。即使王侯的勢力在都市中占着勝利，然主權者之數頗多，所以要在德意志形成一完全結合的經濟領域的任何思索，也不外是一種烏托邦（Utopia）。在德意志，雖能說勃興的領域國家是繼續發生了，然其後於長期間中，經濟上祇反映着中世的都市經濟。此二百六十六的獨立地域，雖然嘗派代表出席帝國議會，然而皇帝和帝國，對於這種經濟的問題，却沒有供給反對諸王侯之特殊的努力而實行自己意志的實力。

并且德意志當時的政治分裂也很顯著，故處在經濟生活最窮乏的時代。十六世紀以後的德意志經濟生活，因多數原因，乃處在退步的時代。土耳其之進攻君士丹丁堡，東印度航路的發見，北方諸國政治的勃興，給德意志的商業和經濟生活以絕大的打擊。德意志的資本，才能漸漸地投資到外國——尤其是西班牙及葡萄牙去。這種經濟的打擊，因三十年間（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的戰爭，愈形倍加了。三十年間長期戰爭的結果，人口遂減少一千二三百萬人。像這樣多數人口的減少，對於以農業爲基礎的社會，斷來可憂的結果。

在這樣的事情之下，我們很容易看到，德意志經濟的課題及經濟的目的，因之其經濟的思想，其所採的形態，和英法完全不同。即使不顧其他的事情，而經濟規模的狹小，和施行經濟政策非爲皇帝

及帝國，乃為多數領域的主權者之課題，這已是其本質的差異了。當時的英法，其經濟之目的，乃在乎獲得殖民地以對他國經濟的獨立，商業交通的獨立及工業生產品的處分，然在德意志，喚起這些問題的注意却很少。便是對這些問題頗見關心的，擁有很大領土的奧地利和布羅伊森，也因為其經濟生活的基礎完全依存於農業，所以這個差不多也不成爲問題。像這樣有外交政策的意義的權力問題，在德意志這樣小邦分裂的狀態，則採着他種形態而表現。這就是王侯政治權力的對象，乃隣近市場的征服，在征服後，則在乎確立起一定領域中之政治的支配，在乎行着爲這種支配的經濟政策。

因之經濟政策的方向，非在乎海外商業政策，乃在乎工業政策，在乎一特殊工業的助長。然而在他們的經濟政策中，比較上有重要意義的，則爲農業的保護和獎勵。所以含有以一國生產力之增加爲目的之重商主義(Mercantilism; Mercantile System)的意義。當時德意志的經濟政策傾向于農業的保護和獎勵，這很是其當然的結果。在這樣的德意志經濟的退步之狀態，企業家和商人階級的發達甚薄弱。這事情使其他各國更加一層的強烈，使德意志之絕對主義王侯國家主義的思潮更加一層的傾倒于經濟政策方面來。其結果，當時的經濟政策，遂充滿着純粹的警察國家政策的色彩。因之經濟政策的主體和目的，便是王侯這個東西。由經濟政策所獲得的利益的歸着，也便是國家這個東西。當時整個經濟思潮本質的特徵，便是國家重大的意義和任務。這個可以說是經濟思潮中普遍主義——國家主義

的立場。這種見解，可以說爲近代初期德意志經濟思潮中最特徵的東西。

德意志經濟思潮中國家的立場，在其發達的全過程中雖可以看見，然在其初期，已有表現了。在英吉利及意大利，處置經濟問題的論客，主要的發現在商人及銀行家之間，然在德意志，則發現于對經濟問題有關係的官吏之間。這類官吏當面的工作，全在如何才得有效果的處理王侯財產的問題。在此時代，未嘗嚴密地區別王侯自己的經濟和國家的財政，而容許二者之混合。因之初期德意志官房學者(Kameralisten)的著作，很豐富於自私經濟學的色彩。而官房學(Kameralistik)的名稱，雖有管理王侯領地的起源，然在多數之點，却和今日之財政學有共通的要素。在考察有二世紀久的官房主義的廣汎的經濟思想的時候，其中當然劃分區別，當然有區別十八世紀以來的新官房主義和其以前的舊傾向的必要。這樣，則這個新官房主義，可以看做德意志重商主義的特殊形態了。然英吉利，荷蘭和意大利的重商主義論者，其所論多關於海外貿易及商業的問題，而德意志的重商主義者，其注意的中心點，却集中到國家應怎樣爲王侯及自身利益并達到所希望的經濟的結果而下干涉的問題。這樣，在當時的德意志，遂成立了關於處置此經濟問題的「行政術」(Regierungskunst)了。然而由經濟生活經驗所出發的純粹的經濟關係的研究，仍然處在很迫切重要的狀態。

在十六世紀，雖然不能算出純粹官房主義者的人數，但是可以發見接近這思想的多數著作家。例



如奧查 (Melchior von Ossa)，奧布列西 (Obrecht)，伯莎爾 (Besold)，波爾涅 (Bornitz)，克洛格 (Kasper Klock) 等等，都是此一流的法律家。這些人，主要的是站在法律的見地，而論述財政的經濟問題。其主要的功績，在波爾涅和克洛格頗有系統的租稅政策的論述中，占着超越的地位。這些著作之法律的出發點，乃關於徵收租稅的主權者之最高權。所以斯帝因 (Lorenz von Stein) 叫這些傾向做「財政的法學」(Fiskalische Jurisprudenz)。他們同時對於課稅問題，猶其是克洛格對於課稅問題，嘗基于羅馬的租稅觀念，使課稅的理論深刻化起來，要求正義的，一般的，平等的租稅。其中如奧查及奧布列西，雖然有和其他各人類似的地方，但在其出發點和問題中，却和其他各人不同。他們較其他各人接近官房學者的立場。因為他們的著述，與其說為研究的，不如說為教訓的，而包藏一定政治的目的在他們的著作之中。

## 二

在時代的并學問的重要性方面，衝出德意志官房主義頂點之上的，便是奧地利的傾向，而有此傾向的，則首推伯察 (Johann Joachim Becher 1625-1682)。伯察富於各種學問，在多數著作中，論述繁雜的科學的對象。當時自然科學非常發達，一般著作家，皆受其影響，而伯察也就此中之一人。他

在多數論文中，嘗論述物理學及化學的問題。他底經濟學的主著「都市，侯國，共和國之膨脹，衰退，真因論，理想國家論」(Politischer Discurs von den eigentlichen Ursachen, des Auf und Abnehmens der Städte, Länder und Republiken, in Specie, wie ein Land volkreich und nahrhaft zu machen, und in eine rechte Societatem civilem zu bringen)，在一六六八年出版。他不但是最初的，用最深的賢明的方法處置經濟問題的德意志的著作家，他還給後代以很顯著的影響。

在伯塞底著作中，特別明瞭地現出如新官房學者的國家和經濟的關係。他底見解，嘗混合了自然法并神政的要素。在他認為最有意義的，則爲人類社會。他嘗由人類底社會性，說明這個社會。這種見解原是和克羅杜斯(Hugo Grotius)之思想關聯的，帶有自然法學的性質。以爲神政的要素，乃在支配者和被治者之關係完全含有家庭父長的性質這一點之中。所以主權者在神所賜定的限制和法則中，負着處置人們的使命。在此一點，一切的人們，必須服從主權者。主權者因爲必須使被治者同處在神所賜生的人類的地位，所以不得不依着自然法來擔負祝福的任務。這樣，主權者便不外是類人的公僕。要使人們得到共同的安居，必要使人們遵守秩序，服從社會法則。因爲社會并非爲人而存在，乃是主權爲社會而存在。所謂祝福，不是個人的祝福，乃是公衆的祝福。如此公衆的祝福，祇在主權者公正地執行其使命的時候才能確保的。我們只據這種人類共同利益的論調，便能看見這種經濟

思潮帶有普遍主義色彩的傾向。主權者爲公衆的即社會的公僕，和社會互相結合而形成今日我們所說的國家。在此種要求中，我們發見當時向國家要求厚生的國家的形式。

伯塞的經濟思想，和一切官房學者一樣，乃由人口論出發的。此出發點的基礎，當然也不外乎官房學，但其中不過有些大同小異罷了。比如三十年間長期戰爭人口減少的結果，使德意志的任務，不得不主重于人口的增加，這一點頗和他國不同。而此種人口的要素之強調和工商業之未發展，都是使伯塞特別地給與爲營養人口的領域的農業以重要性的。要在偏重工商業的理想中求重商主義的本質，這在英法也很錯誤。重商主義的本質，寧是在乎喚醒一國睡覺的生產力。因之在當時德意志那樣經濟的機構之下，對於農業，當然加以特殊的保護。雖然在十八世紀下半期以後，對於此一點，嘗經某種轉變。伯塞在他底主著的卷頭，嘗說農民階級爲第一最大而且最必要的階級。農民階級所以爲第一階級，乃因爲提供商人所處分的原料；農民階級之所以爲最大階級，乃因爲一人的手工業者，可以加工一百名農夫所提供的原料；農民階級之所以爲最必要階級，乃因爲沒有農民的勞働，則手工業者，必沒有其加工的對象物，沒有此二階級，則商業不能買賣。但是伯塞也嘗稱贊商業和商人的重要性，因爲他認爲社會其他階級，如不靠着商業和商人，則不能生活。關於這一點，他底觀察完全是社會的，用今日所謂經濟的一語，而代表這個重要性。因爲他認爲各個階級不是孤立分離的，乃是貫通

消費而最密切地互相結合着的。在此意義上，商業也演着重大的任務。這樣在伯塞的學說中，存在關於商業使命的某一定原理。然而這場合，他并非特別論述他自己之見解，乃不過反覆地論述當時一般所共通的見解。當時一般之主張，說貿易最重大的使命，在取外國的原料，以供給國內手工場的用途；商業之所以受一般的非難，蒙着損害，其原因不外出自輸出原料，而輸入既成的商品。外國商品的輸入是應該禁止的。倘可以輸出既成的商品，則商業當為人所稱贊。一國的商業，倘依此方法而無障害地進行下去，則人們才能發見其食糧，商業才能發見其買主。這樣，在食糧領域和人口數之間，遂存着一互相的關係。

可是此種理想狀態，却被獨占所妨害了。這裏所謂獨占，乃指着社會的一員，占有其他多數者生活上所必需的東西為已有的事實而言。如像這樣的狀態，一方面含有物價騰貴的意義，他方面又含有一國中食養機會減少的意義。何以呢？因為如像這樣獨占的所有者，驅逐其他多數的人們，脫離其工業上之活動。獨占的反對現象，便是 Polypoliun 即競爭。所謂 Polypoliun，乃指着一職業存在之人數過多，結果不能得到其食養的現象而言。此獨占及 Polypoliun，同是使一國人口的抱擁力的減少。在 Polypoliun 的說明中，我們可以看見將入經濟生活之恐懼的障害底說明的萌芽。然而伯塞却不以此 Polypoliun 的現象，看做有意義的過剩人口的表徵。他以為這關係中之現象，乃是 Propoliun。

這現象既已作爲占買而表示，已依着一商品之占買而廢除競爭，形成將來的獨占了。

伯塞乃站在農民，手工業者及商人之三階級底安寧和調和的關係并他以爲理想的「多人口多食料的國土」乃依存於價格的形成之見地而給與價格的構成以很大的重要性。由此生出他底經濟的并社會政策的色彩。

荷蘭的繁榮，嘗給與重商主義的論客以很大的影響，這是人所周知的事情了。便是伯塞，也嘗受過同樣的影響。他不僅常常逗遛于荷蘭，還很研究古爾特(De La Coeffe)的著作。他嘗說，荷蘭人是很領會商業可以使國土人口稠密，使食料豐富，使社會端正起來的。所以他主張德意志也應跟着這條路走。又說荷蘭沒有這種事情，惟因德意志有某程度的國內消費，故可以容易一點。他還很明白國內市場之宏大和外國貿易之發展間的關係。他以爲像荷蘭這樣的國家，經濟到底不能發展，但可以看出適應于德意志狀態的議論。他又獎勵商品的輸入，堅持妨害輸出的論策。因爲當時奧地利尚需要多數商品的輸入。因之他主張設定輸出稅和輸入的自由。當時幼稚的奧地利的經濟狀態，使伯塞沒有認識輸出的必要。自然，輸出的必要，在英法荷蘭，則是最緊要的，在奧地利，其最迫切的事情寧是國內商業的保護和獎勵。因之勒荷頗爾時代的一切經濟政策，其焦點皆集中到國內商業這方面來。伯塞對於海外貿易，設有二方面的要求。一爲奧地利和荷蘭間設立通商關係，一爲打倒法蘭西所有一切外國貿

易的地位。對於前者，他嘗幾次逗遛荷蘭，爲奧地利奔走，請求荷蘭資本的投資。對於後者，嘗特別著成一本書，討論打倒法蘭西經濟的優越的手段。

伯塞在其他的著述中 (Psychosophie)，敘述很濃厚的共產主義色彩的思想。他說，倘如把全世界平等地分配給一切人類，則地球上可以包容較現在約多十倍的人口。倘如沒有貧富懸殊的狀態，是共有全世界之財富的狀態，則一切人們，更可以充分地所有財富。不使貨幣存在的財富之共有，耕作和交換之共同，可以使人類更加幸福。像這類言論，便是他底共產主義的議論。有一般人以爲伯塞這樣的思想乃是底理論的轉換，但我却以爲不然。他這種理想社會論，正是當時經濟組織黑暗的反映，不過是對此狀態，而敘述他底理想社會罷了。自然，他底性格的一面，雖然含有多數空想的要素，但在他面，却很有實際的實現的傾向。所以他決不是要實踐這樣理想社會的幻想家。總之，他底思想，傾向于現實者較空想者居多。並且再由其他一方面來說，他底思想，嘗反映着當時經濟組織的半面，同時也是當時思想的爭鬪之反映。這就是受着原始基督教思想之影響的中世思想和新時代之鬪爭。在此場合，也便是中世煩瑣哲學 (Scholasticism) 和新興荷蘭并英吉利哲學之抗爭。

伯塞膏給與後代以好多影響，這已如上述。現在我們只根據賀寧克（Wilhelm von Hornigk 1638-1712）底見解，便能明白此中的真確。賀寧克底主著「奧國至上論」（Osterreich über alles. wann es nur will. Des ist: Wohlmeynen der Fuerschlag, wie mittelst einer wohlbestellten Lands-Oeconomie, die KASERLICHEN ERBL ande in kurtzem über alle andere State von Europa zu erheben, und mehr als einiger derselben vodenen andern independent zu machen 1684），其初版發行于一六八四年，以後一百年間，繼續出到十五版之多，廣行於世界各國。該書一時被誤傳爲伯塞所著，但到現在，已很明白爲賀寧克所著的了。在這本書中，對於國家及政治之經濟的從屬的地位，較伯塞更爲決定些。但這種事情，也是基因于當時政治的狀態的。如前所述，伯塞對於法蘭西之優越，嘗喊出反對的意見，但在賀寧克之時代，這個問題，才成爲最重要的問題。自一六七二年至一六七八之中間，路易十四嘗進攻荷蘭，一六六一年中，爲要在接近法蘭西的各地域設立領土權而創置裁判所，同年又與兵攻打斯德拉斯堡，更進軍到亞爾的。賀寧克嘗在某一本小冊中，非難法王這種行動，同時在其他經濟的著作中，也開陳着同一的思想。這麼一來，他底主著「奧國至上論」，已含有多數政治的色彩，這是不消說了。他嘗極力主張在此好戰的時代，對於關於經濟問題的追究，不要給與何等障害。何以呢？因爲貨幣之缺乏，正是當時不幸的原因，且祇是靠着經濟政策，國家才得獨立富強。除此思想外，

外，他所抱懷的，又有國家間經濟政治均衡的思想。這種國家間政治經濟均衡的思想，在當時已被看做重要的了，但在賀寧克，却演出更大的任務。就此一點，而賀寧克底經濟行為能力和財富底政治的意義，已很顯明地表現着了。然伯塞主張國民的經濟政策，較賀寧克猶為堅決。何以呢？因為奧地利於其經濟的前提，處在充分地施行國民的經濟政策之狀態。所成為他底理想的，在使奧地利成為自立的經濟國家。因為自立的經濟，在其自體中，好像形成了一個小世界。總之，在伯塞所重要視的，便是使國內之生產能力發展起來，以便利用此生產能力。至于賀寧克，則在其「新國家經濟重要範則」(Neue landsoconomische haupt-regeln)中，發展了為達到此目的之原理。據說雖是一塊土，也不得不耕作；猶應嘗試一切栽培。在國內所獲得的原料，應在國內加工。并且為使這件事情可能起見，必要多數人口，對於這些人，必須給與正當的職業，猶應使國家所有多額金銀不斷地流通着。國民祇應使用自國的生產物，除不得已的場合外，不要購買外國製品。倘輸入外國製品的時候，則其支付，不應用貴金屬，可用國內的生產品。用原料的形態輸入外國商品，再由國內的工銀勞働者從事加工起來。又如國內商品的品質惡劣，而價錢又高的時候，那也不應代用以外國商品；如此之類的主張，都是他底國家經濟政策的要領。

至於第三的偉大的奧地利官房學者斯列達 (Wilhelm von Schröder 1640-1689)，其經濟的主著



「王侯財政論」(Fürstliche Schatz und Rent-cammer. Nebst einem Tractat vom Goldmachen)，乃發現於一六八六年。他許多重要的思想，雖有和伯塞共通之點，然其他方面，却和伯塞有些不同。比如對於王侯和國家之關係，二者間之見解，則站在絕端背趨的地位。伯塞最注重國家和人民的安寧，但斯列達因受霍布斯底影響，却傾向于絕對主義。但是他和霍布斯不同，他是自然法的國家契約說之反對者，他以為王侯靠着神之思想得到其權利和權力。所以王侯的權力是絕對的，人民沒有違反王侯之意志而為抗爭的權利。像這樣的神政的國家觀，支配了當時的法蘭西。從此立場看來，王侯的地位，在法律上很不能理解。何以呢？因為王侯完全站在國家和人民之外的緣故。在當時的德意志，我們往往看見由此種見解生出王侯并國家的世襲觀。據斯列達的見解，則有二個必要的事項。這就是常備軍和貨幣(金貨)。而他底主著的主題，也便是關於王侯怎樣保有金貨的問題。所以我們把他做為「國庫收入主義」(Fiskalismus)代表者之一，這不會是過分的事情。蓋王侯的收入，正是他底觀察的出發點。故財政論在他特別演着重要的任務。

斯列達受英吉利思想的影響，正如伯塞在其思想上和荷蘭思想發生關係一樣。霍布斯嘗說，斯列達逗留英吉利的時候，常和英吉利的重商主義者接近，而變成重商主義的論者。斯列達雖然承認一般人非難重商主義者混用了貨幣和富的事情，但是他一方面却又這樣說：「一個國家，倘如從地下或其

他的所在，得到貨幣或黃金，則這個國家便是富強的國家，倘如使貨幣或黃金流出國外，則這個國家便是貧窮的國家。」愛森哈爾(Hugo Eysenhardt)在他底「經濟學史」中，在傾向于重視外國貿易而輕視國內商業的思想中，不如斯列達一樣率直地說出這種見解。然而這種見解是很不妥當的。他之所以未嘗論述這種見解，原因他忽略了有此傾向的經濟思想家——尤其是德意志的思想家爲什麼要認一國之財富的貨幣并貴金屬之本質的重要性的根據。斯列達并其時代的多數經濟思想家，皆以爲貴金屬并非價值，乃是價值的負擔者；并非目的，乃是目的之手段。財富之獲得，不過是形成財產并資本之價格標準和手段。所以斯列達及其一派的人們，都強論貨幣流通之重要性。以國中之貨幣，作國中事業的基礎。比如斯列達把一國的王侯當爲接受一人的貨幣而再將此貨幣轉給其他之人的一大經紀業者。斯列達底貨幣必須布散民間的思想，原是受了英吉利的特馬斯·漫底影響。主張王侯的財富，不應如寶物般死藏，王侯應爲國家的利益起見，使其流通。又說：「因爲王侯倘如時常祇收入國中貨幣，沒有消費，結果必使國土荒廢，使人民變成廢者。……一國中之商業并交易，常跟着一國中之流通資本量而增減。所以流通資本愈大，則商業和交易也愈大，商業和交易愈大，則王侯的收入也愈大。」

斯列達的這種言論，也和這時代的人們無異，乃由所謂事業論出發的。這就是一國中之流通貨幣，乃對於資本和勞働，增加事業，使一國經濟生活發達的重要手段。這些思想家的多數，所以認承

希望奢侈消費者爲有利益的，正因爲和這種見解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斯列達站在這些關係上，和地金主義 (Billionismus) 并貿易平衡論結着密切的關係。

據此見解，國家便是集團的全體，和各集團互相對立。在這時候，互相比較輸出輸入商品的高率（其交換依貴金屬而行），從着其價值的關係，依着貴金屬的現交，作出貿易的平衡。這些國家，尙略在原始的狀態中對立。一方國家的利益，應考慮他方國家的損害。

在這時代的奧地利官房學者中，和這種思想及現實的經濟政策有密切關係的人不少。這些人，不僅在奧地利政府的行政上得到一定的地位，而且他們對此行政，還給與很大的影響。而置基礎于農業之上，工業又很幼稚，還被外國人所壟斷的奧地利這樣尙未發達的經濟生活狀態，正是使他們提倡國家威權和其直接干涉的最深的理由。這麼一來，他們的經濟論，不外是當時經濟狀態的反映。

#### 四

德意志官房學的奧地利派，無疑的，當有更大的重要性和影響，在德意志派和奧地利派之中間，存在着密切的內的關係。二者之前提，在許多方面，都是同一的。兩國同是在農業上設置經濟的基礎，立在類似國法的基礎上。并且二國同是爲王侯和國家利益而努力使國土和人民能力之發展，爲此目

的，依家長的方法之經濟政策而領導國民經濟生活。可是雖然有這樣的同一性，但二者間仍然存在重要的差異點。這就是在奧地利，形成一比較的統一的封鎖的大國家，在德意志，除布羅伊森之外，存在無數小國，而這些小國又是行其獨自的經濟政策的。

在這些舊德意志官房學者中，我們第一應舉出來的，便是石堅托夫（Vert Ludwig von Seckendorff 1626-1692）這一位了。石堅托夫一面奉侍於薩克森王國之哥達的愛倫司侯爵（Herzog Ernst von Gotha）官邸，一面做着和奧地利官房學者同樣的任務。他底主著「德意志王侯國」（Der teutsche Fürstenstaat），曾在仙塞底經濟學的主著未嘗發現的幾年前，即一六五六年中出版。在好多方面，和奧布列西井奧查有關係。在奧地利官房學者中，其經濟思想雖有進步的色彩，然在石堅托夫，却同普凡托夫（Pufendorf 1632-1694）及康冷克（Comring 1606-1681）一樣，有顯著的保守的色彩。在上記的著述中，國家行政和財政占着其主要部分，至于經濟學的部分，在奧地利派的官房學者，却大見其遜色。在石堅托夫，於未來的警察國家中，表現出一線最顯著的厚生國家觀的輝明的曙光。承認人民和社會之幸福，乃一切國家的行動最高目的，爲此目的起見，必要限制個人的自由。但在後來，對於商業政策的言論很少，這許是鑑於當時小國合併狀態的結果。在這樣的小國，像貿易平衡和所謂法蘭西的優越這類問題以外其他的要素含有重要性的事情，是很其當然的。因之國家及行政上之目的，其

性質這完全不同了。而這些小國家的經濟問題，也不過是耕作和財產的問題。所以他們祇熱心研究這種問題。

我們在覺察當時經濟政策的設施和經濟論的時候，所不能忘掉的，便是三十年間長期戰爭影響的結果，在薩克森地方，生出特殊的問題這件事情：人口急激地減少；多數村落和都市，因戰禍而荒廢；家畜和農產物的蓄積，大蒙着損害；通貨被鑄得很惡，偽造的貨幣也很形橫行。同時資本的缺乏，信用制度的破壞，貧窮遂成爲一般的狀態。

在這個十八世紀最初的三十年間，我們可以發見了受着奧地利官房學者之影響而處置經濟問題的一羣經濟思想家。其中如萊普（J. G. Leib 1670-1727. Erste Probe wie ein Regent Land und Leute verbessern könnte-1708），拉烏（Th. L. Lau Entwurf einer Wohleingerichteten Polizey. 1717），羅亞（J. B. Von Rohr. Einleitung zur Staatsklugheit 1718），以及布羅伊森大學最初的經濟學教授加薩爾（S. P. Gasser 1676-1745. Einleitung zu den ökonomischen, politischen und Kameralwissenschaften 1729），皆此思想家中之傑出者。

這些著作家，都是處在奧地利官房學最強烈的影響之下。這件事情，我們只研究萊普底人口政策的思想，便可以看見。便是拉烏，在他明確地指摘着對於一個財富的貨幣之意義這一點中，已很明白

地把所受的影響表示出來了。他沒有把貨幣的數量和財富看做同一的東西。他寧是依據于洛克底思想，高論貨幣的意義，乃在常常流通幫助生產的一點。因之後來反對貨幣的死藏，以為滅藏貨幣，無異對於經濟的生活，給與最惡的結果。像羅亞自己所說，他底言論，乃根據斯列達和萊普底著作。在他前記的著作中，對於經濟的關係，嘗給與有理解的說明。可是在關於一國財富的問題中，却和斯列達的所論有些差異。羅亞的立場，乃站在使貴金屬入自國之理想上的。他以為不論費用的多少，使貴金屬流入自國的事情，是不得不實行的。不消說，他之所以主張這件事情，其本質的理由，并非計較貴金屬的增加。其本來的用意，原在依此流入，使勞働機會的增加。

加薩爾原是羅西亞 (W. Rascher) 所說的「腓力·威廉一世的經濟學」之思想圈內的一人。他所著的「經濟的政治的官房學概論」，主要的是處置財政并租稅的問題，經濟學的見解，寧是很退步的。他把和租稅政策并領內行政有關係之土地耕作的問題，作為經濟問題的本質而處置之。然而這時代的官房學，其所處置的問題，主要的屢屬於通常技術，私的經濟，農學的範圍（特別是關於農學的問題）。這事情，已屢如上面所說，原是和這些地方之全經濟的機構有關係的。在這些地方，耕作乃形成一切富的基礎。在腓力王，他對於工商業，不僅特別關懷，尚視農業為最上的技術，以為如無農業，則商人，王，詩人，哲學家也都不得存在。這事情，只看腓力·威廉一世時代之穀物輸出乃形成

布羅伊森商業的中樞這件實情，便更能明白了。

第特馬(G. ch. Dithmar 1677—1727)曾在佛琅克佛爾及奧德等地担任布羅伊森第二的經濟學講座的教授，在他底「經濟警察及官房學概論」[Einleitung in die ökonomischen Polizei und Kameralwissenschaften 1731]中，嘗對這方面做組織的研究，也承認農業有特別的重要性。他分別了都市經濟和地方經濟，把地方經濟作為警察學而研究。警察學在研究要這樣才能有秩序的，嚴正的維持國家之內及外的組織。國家之內的組織，乃由人民之數，基督的并德行的生活，健康，營養，財富所成。從此看來，他之論述，完全帶有私的經濟并財政的性質，缺乏一般經濟關係的論述。這種不完全的考察，原是德意志官房學者一派的特徵，他們對於經濟問題的考察，多站在私的經濟的財政的見地上用功夫。其中最典型的，嘗發現于當時最被尊敬的馬伯加(P. J. Marperger 1659—1731)多數著作中。這些著作家，對於國民經濟考察缺乏的一點，正是他們較奧地利官房學者為劣的所在。可是他們之中，除馬伯加外，都是行政學發達的先驅，這是不能一概抹殺的。

## 五

當時對於秩序的警察并行政之要求，日復一日，愈見其增大，這個和獲得德意志大學基礎的，研

究國家狀態學(Statuzustandskunde)并國家之特徵的統計學有關係。這種學術以意大利鮑特羅(Botero)為先驅，在德意志則為康冷克(Conring 1606—1681 Examenrerum publicarum totius urbis)。他記載諸國一切勢力和補助手段，成為此種學術最初的建設者。自然，這種學術并不是今日的統計學，乃不過是對於一國的狀態，有意義的單項的報告的集成。康冷克是偉大的博覽家，德意志大學統計學之父，并且他在經濟方面，還遺下許多有價值的功績。如關於人口的記述，便是此中最優秀的一種。

要得到秩序端正的行政，必須對於國家一切生產力并補助手段有充分的知識和記述，這是不消說了。所以當時的政府，開始做着實際的統計的功夫。比如大選舉侯（古代德意志小邦之君主有選舉皇帝之權，因稱之為選舉侯，大選舉侯為選舉侯之為帥——周），他為研究農業的狀態起見，嘗設立一委員會。而且在十七世紀末葉。布羅伊森已經實行關於人口動態的統計的調查了。萊普涅治很充分地認識此調查的重要性。一六六一年，布蘭丁堡諸國，也開始行營業的調查。而這些調查的目的，同是在乎農業和國內交易的發展。同時又用着國家的手段，而發展手工業，開始手工業的販路。因此，又施行特別關稅的政策。可是這時候，在布羅伊森，却視國外貿易不如國內農業并工業的發展為重要。并且因為重商主義國家政策的最高目的，原在要求經濟的政治的，把國家形成為統一的全體，所以必



須先完成國內的交通。但一到了腓力大王的治下，關於這一點，遂施行改革，而開始模倣法蘭西亞比亞流的政策了。

但是在德意志各地，完全處于小國對立的狀態。這些小國家，所謂保護人民生活安寧的厚生警察，做着多大的任務。因之這些小國家，人民自由的勞働有許多障害。像這樣的國家，可以叫做一小厚生國家。存在國中之一切要素，皆處在其統制支配之下。而這國家的統制支配，乃把伏爾夫（Christian Wolf）所謂以哲學為基礎的國家的目的必須為人民謀幸福之命題為理由而施行。

像這樣的狀態，首先新來德意志最大的國家奧地利和布羅伊森內部的變化。奧地利在數十年間，雖然處在荷蘭資本獨占的支配之下，但至第十八世紀的三十年代，遂打破了這種勢力。於是奧地利遂在國家的指導之下，成為一經濟的獨立國了。在此國家的政策之下，工商業才見其發達。

在布羅伊森，其大選舉侯，很苦心於國家的統一。其經濟政策，在使內地交通的繁盛，企圖工業的發達。這二個政策，同是大大地盡國家的努力的。這政策的目的，原在完成國家的統一。

經濟的狀態雖然有這樣的變化，但國家政策的本質，却沒有變化。國家經濟政策的至上原理，便是國家政治的權力利害，由上而下的經濟生活之嚴密的統制。可是在此時代之一般的經濟思想，却受了一大轉變。這轉變對於德意志經濟思想有重要性。這重要性就在和當時浸入德意志的自然法有密切

關係的形態中。受着霍布斯和克羅杜斯影響的普凡托夫，使自然法成爲一科學。普凡托夫的影響，在經濟的方面，雖不如在一般的方面顯著，但也不可說爲沒有。在英吉利和法蘭西，自然法受洛克和孟德斯鳩底影響，保護自由主義思想的發達，領導一般思想到這方面來。普凡托夫原是順應于德意志當時的狀態，而傾向於絕對主義這方面的。他也如英吉利自然法的建設者一樣，雖由國家契約而出發，但却如霍布斯一樣，不能把這個已經結訂的契約，作爲不能解約的東西。可是他却很堅決地主張國家必須依着統一的意志而支配；對於個人，爲全體利益計，能否許其有若干自由，這應依其意志而決定。這樣，普凡托夫便是採納自然法之諸派即霍布斯底絕對主義的特徵，採納克羅杜斯底社會的本能論，而用其獨自之方法，綜合了斯杜克和愛比哥之對立的所說。以後這見解在杜馬蘇士（Christian Thomasius）影響之下甚形廣行，遂構成了警察國家并開明的絕對主義之原理。

伏爾夫的社會觀，乃在普凡托夫的學說上立基礎，和十八世紀德意志底實際政治有密切的關係。他以社會爲依着協力而要求其最善的人們之契約，以國家之目的爲一般的幸福和安全的保障。在此時代，經濟思想尙是和哲學思想有密切交涉的時代。關於此一點，我們現在不得不提起萊普涅治來說一說。萊普涅治也研究經濟問題，其哲學乃被伏爾夫所體系化，一般化。由自然法和國家契約的歸納，乃劃分爲易於四之絕對主義和難於力大王的絕對主義。所以把德意志警察國家的特徵叫做開明的絕對主

義，乃因為其國家的本質，以開明的，啓蒙的，文明的之事情為其本質。我們倘除開這開明的絕對主義，則不能說明當時經濟的并社會的過程。

在德意志，以萊普涅治底思想為基礎的啓蒙哲學，和合理主義最有關係。而合理主義，乃要使認識歸着于合理的思索和理性。為一般的幸福而用理性的思索的，便是啓蒙哲學之最高目的。開明的絕對主義底國家的政策，受着此哲學的思索之影響者甚多。如像腓力大王，便是其顯著的一例。

除屬于上面所述的思想傾向者外，還有一個叫做功利主義。比如洛克之說明倫理和幸福間之關係，伏爾夫之主張完全的東西和有用的東西，同是一種道德的功利主義。這種思想傾向和開明的絕對主義之間，也存有密切的關係。亞西姆 (J. D. Assmuth) 嘗在一七五一年所發行的「君主義務論」(Abhandlung von den Pflichten der Regenten) 中說，君主有保證國家的安寧，臣民的幸福，權利和安全的義務。這麼一來，當時這種思想的影響，已達到關於王侯及國家之使命的合理的見解了。然而在他們，國家則不過是追究特定物質的目的之手段。這裏我們還可以舉出未嘗說及的幾個功利主義的論者。這便是恩達林 (G. F. Enderlin, *Natürliche Kameralwissenschaft* 1774)，姚思地 (J. H. G. von Gusti 1741-1791)，斯力薩 (A. L. von Schlözer) 和斯密德 (L. B. M. Schmidt)。

## 六

在後期的官房主義的著作家中，最可記述者，便是姚思地。因為他底多數著述，內容很豐富技術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所以在那時代，響影及各方面甚大。他底主要的著作有「國家經濟」(Staatswirtschaft 1755)、「警察學原理」(Grundsätze der Polizeywissenschaft 1756)、「好政府綱領」(Grundriss einer guten Regierung 1759)、「財政制度體系」(System des Finanzwesens 1759)等書。他便是德意志國家學并財政學之最初有體統的建設者。他在後期的著作中，雖然受外國著者并自然法理論的影響，有些和官房主義相背趨的言論，但我們還可以把他列在官房主義的傾向中而論。他正是警察國家思想的徹底的代表者。他以為君主真正的偉大，本依存于臣民的幸福中。一切市民的社會目的，便是一般的幸福。而此一般的幸福，祇在人們不企圖侵犯社會一般的最善，祇服從法律的時候，才能達到的。他底國家觀，和其他各學者雖有些相異，然其出發點，却受伏爾夫底幸福論的影響。他主張擴大國家的任務，擴大國家行動的範圍。他還很明瞭地把當時的普遍主義的國家觀表現出來。他曾在其「國家經濟」中說：「最高權力，乃存在靠此權力，為達到國家目的之一般幸福，而使用國家之全財產和勢力。倘如人們以為最高權力乃由法律命令和刑罰所成，則這個見解當使最高權力狹小了。屬于

國家財產并勢力的部分，不僅限于一切種類的財富，便是動產或不動產，國內一切東西，一切人民的一切勢力并人民的自身，也包含在內。因之一切東西的理性的使用并爲使用的權限，便是最高權力。」

這種見解明白沒有表現出經濟并社會的國家底優越性。德意志官房主義之典型的特徵，由此見解中可以發見出來。而此見解的歸結，乃在支配者體現其國家；國家既能給與臣民以幸福，則國家便可以爲其所欲爲。他說：「王侯是國家的創造者。所以他們在其國家中，倘發見端正的方策，則可以任意實行其所欲的事情。」

姚思地以爲一國貨幣的意義，乃在乎不絕的流通。這就是依着流通而有使財富生產旺盛的影響。在貨幣流通不充分的地方，常現出像今日所說貨幣不足底狀態。由這一點看來，姚思地底貨幣觀，乃傾向于貨幣數量說。所以他和當時多數經濟論者對立，主張國家經濟的自立。甚至要求用一切手段來對付這種經濟的自立，不惜把外國貿易作犧牲。在此時代，新的要素既已入到經濟生活中了，信用并銀行制度也已經增大其重要性了，而姚思地對於此要素，雖也認爲有充分的意義，然他對於銀行并紙幣的本質，尚缺乏深刻的考察。

在姚思地以後的時代，還有受姚思地思想影響的多數的經濟思想家。他們共通的特徵，在認國家和經濟的密切的關係，主張由國家指導經濟生活之點。他們底活動，正在腓力大王時代。下面我們還

可以舉出二三個著名者來說一說。

琴格 (C. H. von Zincke) 是德意志有名經濟雜誌「勒不士格經濟警察官房及財政事項集錄」(Leipziger Sammlungen von wirtschaftlichen, Polizey-Cammer- und Finanz-Sachen) 的編輯。菲律飛 (T. A. Philippi 1721-1791) 在其「膨脹國家論」(der vergrößerte Staat) 中，嘗述說人口增加論。至于達兒也 (J. G. Daries 1714-1763) 則強受休姆 (David Hume) 底影響，對於經濟關係，在許多地方表出深刻的考察。列茵 (Loen) 底「國家學論稿」(Entwurf einer Staatskunst 1747)，在此經濟的並社會的統制束縛的時代，成爲國家幸福最重要的要求之一，而放出一線自由之光。他所說的自由，乃指着不要強制一切人民的營業，居住和良心，而依着警察國家一般的設施，隱靜地可得實行的秩序的警察而言。較上面諸論者更有很大意義的人，便是腓力大王底軍隊牧師 J. P. Süssmilch (1707-1767)。他很早便受着英吉利政治算術學者底影響，著述德意志最初的人口論并人口統計的教科書「由誕生死亡并生殖而證明人類變化中神底秩序」(Die göttliche Ordnung in den Veränderungen des menschlichen Geschlechtes, aus der geburten, dem Tode und der Fortpflanzung desselben erwiesen 1740) 一書。這書雖在今日，尙能發見有價值的事實和關係。阿琴華爾 (Achenwall 1719-1772) 底意義，與其說是在乎經濟學，不如說是在乎統計學。他在哥敦堅 (Göttingen) 大學當教授，於國家學之意義中，

創造「統計學」(statistik)的名稱，於是遂被稱爲此學之父。然布菲發(J. F. Pfeiffer 1718-1787)在經濟學方面，却有很大的意義。他在「今世紀有名的國家的，財政的，警察的，官房的并經濟的著作之清算」(Berichtigung berühmter Staats-, Finanz-, Polizey Kameral-, Commerg- und ökonomischer Schriften dieses Jahrhunderts.)和四大冊的「全經濟及官房學之學的概念」(Lehrbegriff sammtlicher ökonomische- und Kameralwissenschaften)中，詳述其見解很詳。他底立場，也站在絕對主義的基礎之上。而他對於全國民的利益，有很深刻的考察的這一點，較以後同時代的人更爲優秀。他把德意志比爲有多數船頭的巨船，這些船頭們，都各自依着他們所任意的方向而使之前進，追尋自己之利益。他很理解德意志經濟的弱點，放出酷評此狀態的尖銳的言論。尤其是他對於取消內地關稅的問題，對全德意志施行一般的法令并由德意志經濟的政治的分裂狀態所受的外國貿易的拘束等問題之議論，更值得我們的注意。在此一點，我們可以看見，他受着斯密斯和休姆底影響很深，成爲後代主張國民經濟的里思特(Friedrich List 1789-1846)底先驅。

然而在這時代的德意志經濟學方面，沒有存在什麼專門化或獨立化。在成爲官房主義對象的東西中所存在的，乃和我們今日在此言語之下所理解的相去很遠的東西。尤其是在官房主義之各論者中，往往發見有做着自然科學的活動和研究的人們，這是很奇怪的。

## 七

在後期的德意志官房學者間，最優秀的便是 Josef von Sonnenfels (1733-1817)，同時他也是偉大的奧地利官房學者最後的一人。他底思想，可說為經濟的并政治的絕對主義思想之終焉。他雖在佛克生 (Adam Ferguson) 和休姆影響之下，大喊其合理主義的國家契約說，然對於經濟的并社會的關係之考察，却遠不及姚思地。他底主著「警察，商業及財政之原理」 (Grundsätze der Polizey, Handlung und Finanz)，乃發行於一七六三至六七年之間。上面所述的諸思想家，除多數例外者外，其餘都很重視一國經濟發展的人口增加的意義，至于 Sonnenfels 始把此人口論組織成爲一個體系。在當時，不但由國家的并經濟的理由而希望人口的增加，便是在實際政策上，也採着對於移民的獎勵，移出民的困難化并禁止，婚姻并多產的家族，付給經濟的利益等等積極的人口政策。這類政策，不僅在德意志採用，便是在其他諸國，也一機地採用。然至十八世紀末葉，在英吉利和意大利，對於人口增加之悲觀聲浪，却日見其提高了。

人口增加之所以被一般人所歡迎的，在事實上有二個原因。第一，一般相信人口有跟着時代而減少的傾向。姚思地在他底「國家經濟」中，嘗說大洪水以前的人口，爲現在人口的二十倍。便是孟德



斯鳩，他在「波斯人之信札」中，也說着在他底時代之人口數，不過是西雅時代的五十分之一。在一七五三年，英吉利的華列士(Robert Wallace)，他底「現代及古代之人口數」(Dissertations on the Numbers of Mankind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一書，也站在同一的立場。此外如格諾威西，如法蘭西的經濟思想家，也多有此種見解。這樣，此見解的存在，遂釀成人口增加的歡迎熱了。第二的原因乃在乎政治的并經濟的論據。這就於在乎認識了一國經濟的發展之勞働力底重要性，認識了人口的增加，爲國家之政治的權力底最大要素。所以一般人便以人口增加爲生產力的增加，因之以爲人口增加便是耕作地域的增加，便是食糧的增加。比爾佛爾和姚思地便是站在這個立場之上的。

在這時代，最高唱人口增加論的，還算是 *Sornetfels* 了。他以為人口就是一切的價值及財富的源泉。他說：「人口愈大，則對於外敵的安全依靠的抵抗程度也愈大。……人口愈多，則欲望和內部食養之道也愈多。地力愈多，則爲外國貿易材料的耕作和勤勉的成果也愈饒多。十人有十種的欲望。一人之欲望對於他之職業乃營利和生活的手段。因之十人做十種的營業。而增加十人之人類，同時却得到十種之欲望，得到十種之營利。」

這類見解，乃把人口的增加，看做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可是他對於此人口的增加，却主張有一種界限。這就是他以為人口的增加，有依着一國家的性質并其政治狀態而示出的一界限。他和這時代的

總意志其他的作家一樣，雖處在英吉利并法蘭西思想家影響之下，但他們却未嘗接受這些國家的自由主義思想。他雖然受着貿易平衡論底影響，但他所採的形態，却和其他論者不同。自然，他對於貿易平衡論，雖然也依着貨幣的流出和流入底關係之統計數而表現，但他却由人口論的見地而立論。他所說的有利益的貿易的買賣，乃在乎多數人口使用生產業的方面。這種見解，雖也被其他的論者所主張，但 *Somnerfels* 却特別處在事業平衡之意義中高論貿易平衡的意義。因為他底立足點乃站在一國人口收容能力的見地上，所以他認生產問題為最重大的事情。所以說，*Somnerfels* 雖然處在英法著作家影響之下，然而在其根本之立場上，他却是主張國家經濟優越的德國官房學者，是姚思地底忠實信徒。

如上面所說，*Somnerfels* 乃奧地利官房學者最後的一人，然在北德意志，則有 *J. G. Busch* (一七二八至一八〇〇)。自然，從外表上看來，他雖然不如 *Somnerfels* 一樣，為有體系的組織，但是他底一切學說，却能夠以一個的原理即貨幣流通的原理而貫徹之。在多方面，他雖然仍然站在開明的絕對主義之舊立場，而注重于私經濟的觀察，但在其他方面，其本質上却又懷着自由主義的思想。這事情，與其說是受着當時繼續勃興的思想傾向之直接的影響，不如說是他底生活環境所造成。他底生活和活動的地方，多在漢堡。這地方因為商業隆盛的結果，在十七世紀，既已獲得不劣于英吉利并荷蘭底商港的地位。因為這個原故，又因為從前受了亞丹斯密斯底影響的原故，所以使他反對當時尚殘存

着的國家的經濟政策，而在某點，又承認內外的自由交易。他底關稅論，令人憶起後年的里思特來。他所以容許對外國商品課稅，乃因為要使自國產業能夠和外國產業相對立。然他底經濟論的本來領域，乃在貨幣流通論。貨幣流通的發展和增加，乃一國中經濟活動增加的前提。他對於貨幣，注意貨幣的流通，這雖是一層進步了，但他還未嘗認識這場合之財富生產的任務，未嘗知道喚起貨幣流通的增加，原是財富的生產。

為德意志官房主義最後的裝飾者斯脫露衍慈 (Struensee)，由一七九一年至一八〇四年之中間，曾任布羅伊森財產部長，也和上述各論者一樣，主張經濟的國家優越性，立在國家的普遍主義的見地。至十八世紀的後半期，官房主義雖仍然保持其勢力，然而官房主義底極盛期，最早已經過去了。十八世紀的後半期，可以說是一過渡期，是新經濟思想產生的前夜。我們依着下面二種事實，便能知道它底徵候。第一，經濟學現在已開始和舊來的政策論相并立而建設起一種理論的體系了。它已成爲組織的研究經濟現象底原因并關係，成爲研究財富流通的使命。第二，這種新的傾向，完全站在相異的意義并程度上，受着自然法學說底影響，因之達到完全相異的結論。

可是官房主義在十九世紀初葉，於實際政策并大學講壇上尚有相當勢力。自然，當時經濟狀態的變化，對於國家之經濟生活的干涉，給以多大的限制，因之主張絕對主義經濟政策的官房主義，才轉

換其本質，有偏重于國家行政學的傾向。可是如像拉烏（K. H. Rau 1792-1870）其人，在其經濟思想中，雖受英吉利的影響，然仍不失其為德意志官房主義最後的信徒的面目。這事情，因為南德意志小邦的諸種關係，較北德意志容易維持其舊來國家經濟的政策。在北方各地，如下面詳論一樣，在實際的政策上，在思想界中，雖然沒有存在亞丹斯密學說的餘地，然而經過十九世紀而一直到了今日，却仍受官房主義思想的影響。這事情，大概是由德意志底經濟狀態，較英吉利法蘭西諸國遲慢所發生的現象罷。

## 第二章 德意志資本主義之成立

### 一

德意志資本主義組織的發達，較英法甚遲。自然，德意志至近世初期的發明時代以後，才跟着此世界情勢的變化，跑入社會變動的時代，這是一種事實。近世初期的工業和紡績業的發達，使德意志經濟生活，漸漸脫離其中世的封建的組織。這一來，遂發現了都市中資本的集積和都市之農村的支配。都市底繁榮，便是商業資本勢力的增大和此種資本榨取農村的意味。農村的窮乏化，激成農民暴動和做出反抗的運動。我們只看一五二四年農民大戰爭(Der Gross Bauernkrieg)勃發的情景，便能知道這種運動的頂點了。這次農民暴動被鎮定後，全個的歐羅巴，適遭時疫(黑死病)，人口急激地減少，而農民底狀態，尚不得改良。農民處在農奴底狀態，成爲當時託庇於都市生活而過着高等生活的領主不知足的榨取力底對象。加之自一六一八年至一六四八年的三十年戰爭(Der dreissigjahrige Krieg)，使全個的德意志荒廢了。因爲這個緣故，德意志經濟的發展，異常被其阻害。便是德意志資本主義之所

以不如英法資本主義發展的理由，也就在乎此。因之十七十八兩世紀中的德意志，雖可說資本主義有若干的發達，然仍以土地爲其經濟的根據。全個的德意志，其基礎站在農業生產之上，是半封建的社會。但在都市方面，對於小工業組合（Zunft）的商業資本却頗見勃興。這樣，這時代的社會經濟的要素，便是土地所有，小工業組合和商業資本了。而這些榨取的對象，主要的就是農民。十七十八兩世紀中德意志的國家形態，也便是這事情的反映。所以不如英法兩國的樣子，在國民的基礎之上，形成一大國家。封建的殘存勢力，妨害大國家統一的完成，代替以諸大侯國底聯盟。在這些大侯國中，以布羅伊森爲最大。尤其是十八世紀後半期布羅伊森大王腓力（Friedrich der Grosse）的出現，便是此國家中絕對王制的完成。他依着重商主義的政策，企圖商業的發達。商業并工業資本，在此絕對王制之下，繼續地帶頓着將來發達的準備，可是布爾喬亞底勢力，當時還是非常之薄弱。

在十九世紀初葉，德意志的資本主義，才略有發展之觀，同時因爲法蘭西革命後政治自由主義和英吉利經濟自由主義底影響，遂發生了自由主義思想和政策。這時雖可說爲頒行普萊爾·鳳·斯天和哈爾庭伯西之政治自由主義的和進步主義的改革，然而資本主義的勢力，却沒有左右全德意志底實力。

一八三〇年英法的布爾喬亞把握政權後，德意志的布爾喬亞，才由政治的甘夢中醒覺回來。德意

志的布爾喬亞，從來單是行着觀念的即文學并哲學上的革命，對於政治的實權，未嘗用過強力的手段和武器來鬭爭。然而使其從此甘夢中醒覺回來，教之以政治實權鬭爭的，却是法蘭西底征服者拿破崙第一世。

德意志的布爾喬亞，他們是應該感謝破壞了他們底社會的解放和國民的存在的方法蘭西底支配者的。這就是基於一八〇三年拿破崙底主張，召集「帝國代表會議」，整理合併了各小國和領主，組織「帝國同盟」，給德意志統一以一線曙光。可是布爾喬亞却要使他們底解放者和征服祖國的人鬭爭。而他們底鬭爭，祇是依着支持他們底壓迫者才可能。戰勝外國之征服者的效果，他們却未嘗得到什麼東西。整個的德意志，仍然處在各個有主權的大小王國割據的形態。

勝利後的布爾喬亞底失望，在幾多反抗之中，已經很顯明的表現出來了。站在布爾喬亞階級方面的，受德意志古典文學影響的青年志士，由勝利的可誇的戰爭中回來，跑進各大學中，樹起革命精神。但是他們對於使此革命精神實踐化的實力的構成，却沒有多大的努力，還缺乏階級的意識。在他們底心中，交錯着要復辟中世的皇帝和帝國的精神，以及要向着不顧其口約的諸侯和其協同者復仇的憤怒。這時布爾喬亞不能得到實際的權力，政治上的傾向愈變成反動的，也因為經濟的發達尙未成熟緣故。因之德意志封建主義之最初的破壞者，并非德意志布爾喬亞獨自之實力，乃是代表的勢力

即法蘭西之支配侵害了德意志封建主義的政權。所以在萊茵的左岸，封建諸侯，失掉其特權，封建的并教會的土地所有，乃歸於農民所有，農民和法蘭西的一樣，處在自由所有土地者的地位。雖然在其他的地方，尤其是東北各部分，還存在強烈的封建的勢力。

## 二

武士傳錄 (Die ritterliche Gutsherrschaft) 成立在十六世紀以後賀爾斯坦，梅格林堡即易北河以東之布羅伊森諸州。他底起源，早已藏伏在宗教革命時代的經濟革命中了。自此以後，武士雖變成商品生產者，然而他們時時仍靠着封建的特權，以企圖其復活。他們為要得到廣大的土地，於是遂利用其封建的特權；為要農業的大經營，於是便將農民逐出其土地，奪了他們所共有的森林，河川，草地，同時在各地方，把被逐出其土地的農民底所有權，弄成有耶無耶，而且不顧他們人格的自由。何以呢？因為農民不僅沒有反抗那不知足的武士底要求，反覺得必要提供其勞働力。德意志專制的王政，在數百年之中，未嘗禁止這種掠奪。不，不僅不禁止，而且布羅伊森的專制政府，因為其軍事的并財政的必要，反常常和一般領主狼狽為奸，壓迫其農民。所謂保護農民，祇在不妨害專制政府榨取及壓迫目的之程度中，才限制武士階級對農民的榨取。而且封建的狀態，并不因解放農民而被破壞。



法蘭西的農民，嘗在他們底仇敵即貴族底城池上，揚出他們底紅旗，警醒了一般貪污媿類，於是乎法蘭西國民議會中各貴族底代表，在有名的一七八九年八月之夜，遂把其封建的特權取消了。然德意志底農民，像這樣的革命的精神却很貧乏。祇在東部布羅伊森及斯勒認，發生過二三次暴動。這樣，德意志底領主，才進一步而做着農民的解放。可是這種解放却不是為農民底利益，乃是為領主自身之利益。他們借故莊園的農民底勞働能力不充分和非能率，以便自由地處置這些能力，并把他們化為無產勞働者，以便得到充分的勞働力。

德意志底領主，素來尊重法蘭西底諸侯。他們尤尊敬拿破崙。然而他們有時却視拿破崙為執行布爾喬亞革命底遺囑的人物而憎惡之。這種憎惡，正是維持德意志封建制度最強烈的徵表。然而農民解放的目的，却未嘗使自由農民打破隸農的制度。布羅伊森農民的解放，并非救農民出自封建制度之中，祇是使他們能夠忍耐着近世的戰爭。領主們，常常把人格的自由來誘惑農民，或是和他們假訂約束，說等待着驅逐外國的侵略者後，才取消他們底所有制。可是一旦敗退外敵後，農民階級所受的榨取，較諸商人階級尤更強烈。

一隻家畜也沒所有的小農民的大多數，因農民的解放，而一難過去，一難又來。他們既不能確保其所有權，當然也不能幸免被課以封建的貢稅的。他們人格的自由，不能做為防禦領主貪得無厭的慾

望之工具。一切方面，領主皆可以任意壓迫農民。他們不顧農民的權利，收買其土地，收回其租借的土地。他們還奪一切權力和欺詐，搶奪其所有，使其成爲無產勞働者。農民底忍耐，祇限於不侵犯領主的權利，才得自由；領主底自由，乃是使農民担負一切義務的自由。

領主造成一般不會反抗農業的大經營和徹底的榨取之無產勞働者後，再用其他方法，來掠奪稍有財產的農民。這些農民，可以分爲二種。一爲被領主把其所有權置在不安的狀態的，一爲和此適成爲反比例的狀態的。屬於前者而稍有餘裕的農民，乃被領主底統制。這就是他們必須提供其所有土地的二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于領主，才能獲得從來土地的自由所有，而幸免一切封建的担負。此種稍有餘裕的農民的大部分之不能依着法律的決定而參加政治，恰如沒有餘裕的農民，祇供給領主作犧牲的一樣。便是有確實的所有權的，有餘裕的農民，結果因不得不以比地租還多二十五倍的貨幣地租，或穀物地租，來償却他們對於封建的担負。

法蘭西農民的解放，完全破壞了法蘭西的封建制度。法蘭西的封建制度，在華達羅戰爭之役以後的反動時代，一時雖復現其姿態，但沒有什麼實際的勢力。然德意志的封建勢力，却不因農民的解放而被破壞。在易北河以東各地，對於大眾的榨取和國有土地及領主所有地中資本主義的經濟之間，他們底勢力，未嘗表示什麼減退。一方面釀成榨取農業勞働者，他方面兼併獨立農民之土地的領主，在

集中資本及土地之必然的結果之下，其目的不得不傾向於近世的產業。這就是他們向着以農業為基本的近世的工業而進展。他們第一着是火酒（Schnap）的釀製，自此以後，德意志的火酒，遂至供給歐洲各國。第二着是蔗糖的造作。此二種產業，對於德意志的領主，給與多大的資本的支配權。所以德意志的布爾喬亞，對於領主，還未至于要求其政治上之權利。

### 三

布羅伊森底人口，住在低地德意志者居四分之三，德意志聯邦底人口，住在此地者也有三分之二。在都市方面，其勢力雖可說為衰微，然組合的手工業（Nützige Handwerke），尚把握着支配的勢力。這組合底勢力，自一八〇〇年至一八三〇年之間，未嘗有什麼變化。就在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〇年之間，都市底手工業，雖稍受長期戰爭慘禍所打擊，但這也不甚利害。這時的手工業，祇對其特定地方底需要，努力供給貨物，却未嘗為技術的改良，未嘗擴張產業的組織和範圍，仍靠墨守舊習，而維持其存在。這樣，手工業底主人和夥計之數甚多。為夥計者，都希望成為主人。並且營業可以自由，一般夥計，在完結一定期間的任務後，即使獨立開業，也甚容易。所以在手工業方面，完全沒有社會的競爭的憂慮。

便是夥計和主人，同樣不是陷在絕望的漩渦裏。不但舊時的夥計組合（Gesellenverband），被三十年長期間戰爭所破壞，便是僅夠維持其存在的少數組合，也因為靠着諸侯底權力而繼續勃興的資本主義底利益所破壞了。最努力破壞此夥計組合的，便是布羅伊森王國底政策。布羅伊森一七三一年之法律，很凶悍地壓迫一般有戰鬥精神的夥計組合，一七三三年布羅伊森手工業條例的規定，對於違反法律的人，處以最重的禁錮及懲役，重行犯罪者處以死刑。并且嚴重地禁止自由結社。這種嚴酷的法律，釀成職工間階級意識的尖銳化。而且對於組合制度的那種強制自修旅行的制度，給職工們對此法制以很不滿的刺激。到外國做自修旅行的德意志底職工們，在瑞士，法蘭西和英吉利等國，把其勞働階級進步的狀態，和祖國底狀態做比較的考察。他們中之大部分，多逗遛在外國，其他各人，仍回到祖國，爲自由思想奮鬥。

便是當時德意志憲法的狀態，也正和手工業之停滯不振的狀態一樣。在十八世紀，啓蒙的專制政府底資本主義的政策，既已開始攻擊組合制度的工作了。拿破崙時代的動亂，已把封建制度崩壞後的各地方底組合，掃蕩得片甲不存。此中被蹂躪最利害者尤其是萊茵布羅伊森，萊茵拜埃倫和萊茵黑森底組合制度。然在南部德意志，組合的勢力尚大，便是比較上產業進步的薩克森王國，其組合的餘勢，尚頗強厚。在舊時布羅伊森的諸州，工業底自由，不過是紙上的文章，對於布羅

伊森的手工業，未見給與何等新發展的餘地。這因為四百年以來，易北河以東之諸都市，不時受着諸侯領主的榨取，市民缺乏活潑的精神之故。

一八〇八年中的都市制，在此時代，算是一種大進步的制度。這種都市制，使都市從官僚的并軍國的支配之中解放出來，給都市自己處理其財政之權，又在救貧，教育制度并某種事情之下，給都市自己施行其警察制度之權。伊埃那戰爭後的布羅伊森底改良法制，到了華達羅戰爭以後，不僅沒有一些進步，反變為反動的東西了。這就是政府使一般極貧困的人們，離開政治的權利，屈服於都市之國家的官僚政治監督之下。而都市住民的大多數，和一般在都市近郊成長的手工業者，則同是家室所有者。因為他們慣於組合制度中極度的榨取，故很卑下，濫用都市的所有地，亂伐都市所有的森林。自由占據都市的庭園，任意分配都市的所屬的土地，盡量濫用其所謂工業的自由。

南部德意志各地方的小市民，較北部的市民，頗為活動。自然，都市的手工業，雖尚處在組合制度支配之下，但他們却要使其所屬的王國，變為立憲的國家。可是他們底立憲主義缺乏徹底，不能使南部德意志脫離封建的軍閥的支配。

如像巴敦，布發的和瓦爾敦巴等小市民之政治理想，乃依着其各自經濟狀態而決定。他們很歡迎共和的國家。但其所謂共和國，乃指着沒有歷史的并社會的生活之鬥爭，沒有極度富貴貧窮的小範圍

的，即中流階級的中庸的農民市民的共和國而言。他們不喜歡王侯，公民，貴族和常備兵，可能時也不喜歡租稅。他們尤不喜歡參加歷史的事業，外交，大產業和世界商業。他們的理想，原來不過是小市民的理想。

#### 四

在手工業占着優勢的德意志，也頗見其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抬頭。德意志的貧窮狀態，雖然是甚普遍的，然而在舊的商業都市及商港都市，其中却集積着多大的資本。因為在十八世紀，凡對於專制政治的宮庭并軍隊的巨額資金，愈愈增加的租稅之負擔及國債和供給特惠保護經濟政策費用的莫大資金等等，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最大的刺激。然而也有直接由國庫支出此巨額資本之一的時候。這一個就是奧漢爵列倫派的重商主義的政策。布羅伊森的租稅，關稅，賦役等等制度，乃是擷取手工業者并農民，而潤滋于軍隊和領主，同時在補助國家的名目之下，也多入到資本家掌握之中。這資本，靠着農民的普羅列塔利亞化而生出剩餘價值。而資本的生產方法，却依着奪取民衆假期中工作的所得，而完成資本生出剩餘價值之過程。便是德意志，也和其他各國一樣，資本原始的集積，原來也帶有貧窮屈辱流血的慘事的。

德意志的資本主義，較英法的資本主義很為遲慢。而德意志的資本主義，祇靠着施行廉賤的工銀制度和商業上的小策，才能驅逐英法資本的勢力。其基礎的生產方法，乃是家內工業（die Hausindustrie），至于用手勞働的手工工場（Manufaktur）及使用機械的工場工業（Fabriksystem），尚沒有多大的發達。

可是家內工業，原是最古的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屬於退步的形態的。這種工業成立之初，農民及手工業者，未嘗意識它是威脅他們底生活的一種危險物，所以他們都很喜歡就事。等待到這種工業被着手工工場及機械工業克服的時候，他們才感覺到對其勞働力有一種強烈的壓迫。家內工業者，對于資本的勢力，沒有什麼抵抗力，資本的壓迫，愈愈使其工銀低下，勞働時間愈被延長到能夠不息地使用肉體能力的極點。使女子和兒童陷入同大人一樣的命運，使勞働者及其家族的身體虛弱得不成樣子。然而這些事情，不僅是由勞働過度所生的現象，便是因為密集的建築物，工作場和住居等等之光線，換氣方法和健康上危險的業務，也是使此現象發生的一大原因。可是這樣絕望的家內勞働者，他們距離普羅列塔利亞的意識尤最遙遠。他們常常標榜出一種獨立的外觀，所有些少的財產。這些事情，正是誘導他們陷入窮境的，而他們却漠然無所知。他們愈拘拘于些少的土地和工作場，則他們愈受資本主義的壓迫。

德意志的家內工業，乃用二種方法，作其成立的基礎。資本的勢力，首先乘着組合制度的間隙，而爆破此腐朽的牆壁。這麼一來，各個的手工業者之一部分，便變成資本的kapitalistischer Verleger，其他之部分則變成爲家內工業的工銀勞働者。而助長此過程的，則爲國家的權力。布羅伊森的法律(Landrecht)，把組合制度完全置在地方諸侯支配之下。祇是王國，才能開設新的組合，舊有一切東西的存廢，完全由其意志而決定。把大部份的資本，投到低的地方去。在這些低地，沒有組合制度極端獨占制的制度。被領主所壓迫的無抵抗能力的隸農皆是農夫，他們僅耕作一些極小的土地。但祇靠農業，不能維持其生活，所以在遠的以前，已經以紡織，製造家具等等爲其副業了。

又如德意志的資本主義，把家內工業的勢力，蒙蔽着高地的阿靈恩特利森格比格，埃治格比格，菲德格比格，撒烏林加華爾，地列南達士奴，巴維也列斯亞爾濱，斯威華爾各地方。如前所述，資本主義不僅在高地輔殖其勢力，便是在低地，也已被此種勢力之浸潤。至于尼達萊茵及威斯特發治之家內工業，素來已有了勢力。

## 五

在東部德意志，斯勒認及薩克森爲資本主義的中心地。在德意志，亞麻工業自古以來已是輸出的



產業。十七世紀中葉以後，此種中心地已移到斯勒認了。當時英吉利和荷蘭人之需要斯勒認的亞麻，給與此產業的勃興，以很大的刺激。在十八世紀的初葉，二百八十七的部落，既已生產為商品的亞麻。而這些完全是田園的家內工業，經營無肥沃的地方，其內部關係，差不多乃立在封建的基礎上面。

在某一方面，斯勒認又是易北河以東之封建制度底典型的地方。一七九七年，Schön旅行視察這地方的時候，他非常驚異，因為這個地方完全處在應戰慄的封建的榨取狀態之中。斯勒認亞麻製造的經營者，多數是地主。舊時布羅伊森諸州，手工業雖未嘗存在農村之中，但在斯勒認，自屬於奧地利領有的時候起，在村落之中，已經存在多數手工業者了。地主便是工業經營權唯一的所有者。征服斯勒認的腓力大王，雖禁止工業及手工業稅（Gewerbe- und Handwerkerzinsen）的徵收，然他底意志，也屢被封建領主頑固的反對而柔化了。

凡屬織匠者，一律必須支付織匠稅于領主。自由織匠和隸屬匠也必須繳納這種稅金。但是自由織匠之數很少，大多數的織匠，都隸屬於領主，不但支付織匠稅，同時還須負擔封建的貢品及賦役。縱令在領主賣其紡績經營權于臣僕，而他們對於商品的販路，也沒有什麼顧慮。領主復將由實物稅所得的絲，經過商人之手，再販賣於織匠。支付租稅於領主而經營工業的人們，正是領主所剩餘的絲之確

實的販賣路。然領主對於織匠方面亞麻布生產的剩餘，却未嘗採用什麼方案。這麼一來，雖處在怎樣的市價之下，織匠也不得不賣掉其布料。這就是斯勒認織匠的困窮狀態，乃一方面被封建的領主不知足的榨取，他方面又被沒有什麼顧慮的商人底資本主義的榨取之結果。

織匠雖然處在這樣困窮的狀態，但是亞麻工業，到十八世紀中葉，仍很形隆盛。不過後來，才被繼續勃興的英國及愛爾蘭底競爭所壓服。但愛爾蘭和蘇格蘭底紡績業者，也并非什麼幸運者。縱令生產的增加，技術的進步，極度的勤勉，而他們所得的，僅是些少的報酬，這事情，較封建的強制還來得利害。在斯勒認，因為未嘗變換手押紡錘（Handspindel）為紡車（das Spinnrad），所以斯勒認的絲，其聲名遂日趨于下墜。并且，這地方之領主的支配，也是對於織匠底競爭，給以很惡的影響的原因。據一七七三年英國議會底報告，蘇格蘭和愛爾蘭的織匠，每人每天可得十片，八片，二片或六片不等。并且蘇格蘭及愛爾蘭的織匠，沒有提供織匠稅，封建的貢品和賦役的必要，所以在好市況的時候，靠工銀的昂騰，可以得到若干貯蓄，就在不好市況的時候，也還可以帶同其所有的金錢，移住于亞美利加。可是斯勒認的織匠，因為地方領主支配的結果，倘不支付贖身金（Loskaufgeld），則不能離開國境。像這樣的斯勒認的紡績并織匠制度，確是該地方各人精神的并肉體的發展的最大障礙。因為這個緣故，斯勒認的勞働能力，其發展上甚被阻害，再和英國競爭的結果，愈愈陷入不利，招來凋

落的命運。

腓力大王的重商主義的政策，雖如何維持，也不能拯救此內的事情所釀成的衰亡。此種重商主義的政策，一方面雖加以保護，以刑罰而強制之，然只要領主支配的存在，就不難使這地方生產物之品質優良起來。加之腓力大王誘導外國織匠的入國，更使國內織匠狀態的惡化。他在斯勒認所施行的紡績政策，是他底經濟政策中最退步的東西，可叫做失敗的了。

處在上面那樣的狀態中，即使是一般精神的覺醒遲慢的織匠，也不得不共鳴于那震動當時全歐的法蘭西革命。一七九二年，在織匠之間，嘗發生暴動，而一般不安于生活的農民，也支持此次的暴動，由山間的村落跑出街市來，強制絲商廉價賣絲，布商高價買布。這時候，布羅伊森底軍隊，一方面和法蘭西革命對立，一方面又逢着這次的暴動，陷入進退兩難之境地，僅靠都市的義勇隊，對暴動做持久的戰勢，等待着織匠及農民經濟的消滅。

## 六

薩克森王國資本主義的起源，乃存乎宗教革命的時代。薩克森最古的企業，便是鑛山業。山地的住民，對於初期的鑛山業，是很不喜歡的。十五世紀以來，低廉工銀的鬥爭，苦汗制度 (Trucksys-

(163)法制的存在，已被傳聞了。美國金銀鑛的發見，雖使薩克森金屬業變為衰落，然從來商業并交通的關係即德意志中部地理上有利的東西，鉛錫煤等地下財寶的存在，却不能使薩克森底鑛業永處不振的狀態。勒不士格底定期市（*mess*），便是對英法商品的東歐大市場。因為這個緣故，各種纖維工業都很發達。如薩克森底羅紗，拉日治底麻紗，福克蘭特底 *Muslin* 黑姆涅底木棉製品，挨治格比格底 *Lace*，常常輸出遠的國外。薩克森這些工業，因拿破崙封鎖大陸，益見其發達。這結果，黑姆涅遂變成薩克森的曼切斯達了。如嘉拉古這間工場，可容一千二百人的勞働者，更如染色工場及紡績工場，每一間也可容三千人的勞働者。小紡績機械，在十八世紀末，雖已輸入，然到十九世紀的中葉，仍不得一般所採用。這就是暗示着國內工業的優勢。工銀的異樣低廉，成為一般的現象。這事情，當然受着極度的非難。如像挨治格比格的家內勞働者，僅食馬鈴薯和粗劣的湯菜。在一七八〇年，福克蘭特的一醫者，已發表一種著作，敘述自國內工業發達以來，各種疾病，特別利害的事情。薩克森在十八世紀，是德意志經濟最發達的地方，所以精神方面也很進步。薩克森是當時德意志文化的發祥地，豐富於教養的所在。因為這個地方，所以德意志古典文學很發達。并且薩克森的政治組織，也不如布羅伊森一樣，不是軍國主義的政治組織。薩克森的女王 *Maria Antonia* 雖要使舊時代遺物的重商主義政策復活回來，但也終歸于失敗了。這樣，薩克森的經濟狀態，不消說是很發達

了。當時的勒不士格，差不多是德意志中自由獨立的都市（Freiestadt），是很獨立自由的，就其他多數都市，也有獨立的性質。這就是，一般上薩克森的經濟狀態，較布羅伊森更為良好。

## 七

東部德意志產業的中心，多少尚處在封建的形態，而西部產業的形態，差不多已達到近世市民社會的形態了。在萊茵布羅伊森，其規模較斯勒認及薩克森為大，存在多種的工業。其中如萊茵拜埃倫及萊茵黑森，自一七九五年以來，警效法蘭西革命之第三階級的解放政策底步調，這一點，比德意志其他各部，頗為進步。并且這個地方的產業，迨歸法蘭西底支配而同時也興隆起來。原來這個地方，有有利的水運之便。地下藏着諸種礦物，具備着產業發達的諸條件。這諸種天然之利益，跟着第三階級的發達，同時也就被其利用。在亞衍，Köln、Düsseldorf等地，存在一切種類的工業如木棉，羊毛，絹工業以及和這些相關連的漂白，染色，印刷，其他的鍊鐵，機械工場，鑛業，武器的製造，并其他金屬工業。因之這地方的人口很形稠密，確是德意志其他地方未嘗見的現象。

在萊茵普魯士的德法國境的地方，很富於鐵鑛和煤鑛。這些地方地下的寶庫，正給這地方的工業以很大的利益，所以工業方面，遂得和大規模的世界各地底工業互相貿易，直接和有數的世界市場的

都市互相交通。這工商業的繁榮，必然的促進資本的集積。而都市中的舊階級，同時也減少，從新萌芽了布爾喬亞和普羅列塔利亞二個絕端不能相容的獨立的階級。在民間，土地所有權之自由，既被確立，幸免封建的負擔的小農占着優勢，但是他們無久也就被處在資本主義勢力支配之下。他們受此支配的原因，乃始于向布爾喬亞借款。而布爾喬亞的支配，則乃利用對於一切經濟生活之法制。這樣，這個地方便是德意志中經濟最進步的地方。

因萊茵省并威斯特發冷大工業漸次的發展，遂確立了資本主義的經營方法。在歷塞特行政區，雖可以維持手工業，資本家對於各種製品，雖甘于輸出遞送業的地位，但因爲這個緣故，歷塞特底手工業，已決不是幸運的了。在素林堅地方，資本的勢力破壞了組合制度，祇維持其博得世界聲譽的優良的刀物小工業，然而這已足表現出家內工業的貧窮狀態了。在亞衍，資本的勢力，不僅侵略紡織業，還利用該地低廉的勞働力。又如 *Crefeld* 的絹工業，始終雖是商人所組織的，該地的織物業者，雖然始終爲織物業主人之名目而戰，努力把織機作爲自己的財產，然而他們還未嘗覺悟到他們尙是資本勢力支配下的隸屬化。至于萊茵地方的工業，自來已經依着手工工場并機械的經營法而經營，這一點，較其他地方爲優。在德意志，一七八三年的時候，*Elberfeld* 的工場主人，已經開始用水力來運轉紡織機。一八二六年的時候，素林堅的文具製造師，嘗一次反對那可驚的苦汗制度，到了一八二八年，

克勒佛的組織物業者，也作着反抗減少工銀的運動，這時候，企業家反變本加厲的輸入近世的機械，使兒童從事勞役，以之遊離這種暴動的攻勢。

便是由布羅伊森政治底消極的活動中，也能發見這些悲慘的狀態。一八一八年的時候。布羅伊森政府接到萊茵地方工場主人設立一工場學校 (Fabrikschule) 的報告後，便開閣議，議決對於建設者，作公式的表彰。但後來因一般無賴漢壓迫此工場的主人，引起政府調查學校。那時教育部長 Von Altenstein，曾要求 Düsseldorf 政府對這學校作詳細的報告。據此報告說，受表彰的工場主，所有二間紡績工場，晝夜同樣地開工，使六歲以上的兒童從事于勞役。第一間工場，晝間工作者有九十六人，夜間有六十五人，第二間晝間有九十五人，夜間有八十人。勞働時間晝間為十三小時，夜間為十一小時，屢屢日曬日也使其勞働。兒童中年少者每天工銀為二十分尼，年長者為三十分尼。而雇傭成人勞働者的時候，則必須支付十克羅生。而這間受表彰的學校，對於晝間勞働的兒童，給以二小時的教育，夜工者則為一小時。據某官吏寄往柏林的報告中說，夜間勞働的兒童，其有力的血色好的面顏，和色白的有元氣的柏林的兒童完全沒有多大區別，夜間的勤務，影響于兒童者甚少，因為他們自工場歸家時，在途中大家可以且走且遊玩。他們的睡眠，雖在晝間，但其健康，和普通一般兒童者無異。

Von Altenstein 對於這狀態很不滿足。他是黑格兒底友人，他不贊成布羅伊森教育部長對於一般

毫無目的之教育負義務的事情。他對於學校的行政，乃代表當時布羅伊森政府無秩序的行政中比較上優良的方面。他雖然使他底友人即當時的內務部長 Von Schuckmann 認識了他底勞働政策，但 Von Schuckmann 對於工場中關於兒童的問題，始終未嘗發出什麼命令。于是他又要求萊茵普魯士的地方政府并威斯特發冷，斯勒認，布蘭丁堡，薩克森底政府，調查工場中兒童勞働的狀態和種類。這種調查，乃依着德意志式官吏那種不敏捷的方法而使其實現了。他們未嘗直接調查勞働者和兒童，祇據工場主，醫者，牧師及教師們之談話，而作成調查的報告書。可是只據這種報告，已足使一般人驚異了。

在各種纖維工業和針，青銅，扣子，甲鐵，壁紙，紙和陶器等工業方面，使用不知凡幾的四歲以上的兒童。這些兒童，每天必須從事十小時至十四小時的過度的勞働，而所得的工銀，却為數克羅生。在產業尙未進步的地方，例如布蘭丁堡，乃處在非常可悲的狀態之中。留肯威爾德的市吏，嘗說被織布工業所使用的兒童，多數皆陷在道德的墜落之中。而梅爾塞堡的製針工場之兒童，其工作時間，則由早上四點至晚間六點。

除開 Alenstein 外，布羅伊森的閣員，對此問題，皆甚不熱心。一八二六年賀倫中將 (Generali-  
eutenant Von Horn) 奏諫國王不應在工場地帶募集新兵的時候，斯克曼雖很關心于 Alenstein 底督



告，然他對於布羅伊森軍國的組織，已具有很深刻的觀察，所以後來雖然置此警告而不顧，也未嘗見有什麼事情發生。他以為工場使用兒童，與其他事務使用兒童一樣，是沒有害處的。萊茵普魯士底人道的工場主，在一八三九年的報紙上，對此問題，雖作一般的警告；萊茵地方議會（Rheinische Provinziallandtag），雖要求關於兒童勞働的法制，然政府對於兒童工場勞働，祇發出一二次訓令，此外未嘗採着什麼方策。此後經過十年之久（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一般才注意到萊茵省地方勞働者苦汗制度的担負。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後。才開始實行禁止用實物來支付工銀的制度。這時候，布羅伊森政府不僅排斥勞働者的要求，萊茵省和威斯特發冷地方議會所議決的要求和人道的熱心的工場主之運動，以及沒有取締榨取當時無實力的普羅列塔利亞的高利貸制度之意志，他們還常常用武器來彈壓勞働階級的運動。

而當時柏林政府對於萊茵地方布爾喬亞之榨取的理解，唯一的祇是結合了西部德意志和東部德意志。如不然，則柏林政府，當是承認萊茵為叛逆者，或是抑壓其進步的法制。然而當時繼續勃興的萊茵的資本家階級底地位，倘不能得到柏林政府之承認，則他們對此，當然有叛逆的教養和自覺的，并且這種叛逆，必須普羅列塔利亞的參加，這也是很明白的事情。

上面所說，乃十八世紀後半期及十九世紀初葉德意志經濟的狀態。這中間，正如腓力大王底絕對

王制所表示的一樣，是中世的封建的制度漸次崩壞，近世的市民社會成立的要素繼續地在社會的母胎裏發展的時代。在英國，這種市民的社會之成立，乃依着一七六〇年至一八三〇年產業技術上革命的發明齋來機械生產之大工場的成立才確實起來，但在德意志，由產業革命齋來的東西，却不如英國般早早便實現了。可是產業革命的空氣，并非沒有飄颺着。關於這事情，在前面經濟狀態的說明中，已經很明瞭了。而且這事實的反映，也已經表現於政治上了。

跟着此新空氣而起的政治的改革，乃發現於和拿破崙在伊埃那及阿華爾斯達戰爭後的布羅伊森。此種政治改革的主要傾向，乃要在一切公的生活中，實現自由主義。一八〇七年十月九日，布羅伊森政府嘗發布一種「解放勅令」(Emanzipationsedikt)。此勅令亦叫做「關於所有制的簡易，土地所有自由的使用并國民人格的關係的勅令。」其中第十二條的規定是：「從一八一〇年十一月十一日起，廢止全國的隸農，一八一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以後，祇存有自由民。」

這麼一來，不僅許可人們在法律之前得享自由的權利，便是妨害經濟上個人活動的一切障礙，也被撤去了。舊的身分制度也被廢除了，這時國家便由身分國家(Standesstaat)變為階級國家(Klassenstaat)了。市民和農民，皆可以自由所有土地，貴族也可以經營如商人百姓一樣的事業。在經濟上，一切國民，皆有同一的權利。這就是一八一〇年十月二日的之法律，規定了營業的自由(Gewerbefr-

einheit)。自此以後，實業的經營，只要領到支付一定租稅的營業許可證（Gewerkschein），不論何人，就可以自由處置。但在請求營業許可證時，必須附交正常履歷為證明。於是組合制度之強制，遂被廢除了，而受種種法律保護的營業特權，也就宣告終結了。

在德意志，小邦分立的結果，不僅各國的通商是很不自由，而且國中也因設立了關稅，妨害了通商的自由。然資本主義生產的發達，因之必要廢除此種制度了。在一八一七年芬賀爾特（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議長支持之下，管經開催由布羅伊森官吏所組織的改革關稅會議。這結果，翌年（一八一八）遂制定了關稅法。這關稅法實施之時，便是從來的保護關稅并財政關稅（Schutz und Finanzzöllen）消滅的時候。這種關稅法很受經濟的自由主義的影響，偏重于自由貿易。如此，經濟的自由主義，在一切經濟生活即農業，工業，商業上，遂增加其勢力。

這時候。在政治方面，也大行改革。這便是設立都市自治制的基礎，實行都市制（Städteordnung 10. Nov. 1808）。廢止從組合及身分而區別市民的制度，而代之以由地區而區別市民的制度。至于由門閥及信仰而區別市民的設施，不消說，此時已經不復再見了。

至于德意志其他各邦，這時也接踵而制定了同一性質的法制。但在布羅伊森，却未嘗實行此政治所必要的改革案。行此改革的，主要的多是南德諸邦。就制定適合于自由主義之憲法和代議制的，也

是南德諸邦。可是德意志這種改革政治，也決不能徹底的。這已如上述，因為德意志的資本主義，要達到充分的發達階級，尚有相當的距離，并且封建的殘存勢力，尚抑制資本主義，所以尚存有轉化于維持封建的形態之資本主義的傾向。而這裏也就是存在德意志勞働階級的窮乏化和德意志思想複雜性的所在。

## 第三章 古典哲學之社會觀

### 一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的序文中，嘗這樣的說：「經濟學這個東西，在今日之德意志，尚是一個外來的科學。谷雨利西（Gustav von Gailich）在其「農工商業史的敘述」中，特別是在一八三〇年發行的那本書第一第二兩卷中，嘗大概地說明那種妨害德意志資本制生產方法的發達，因而妨害近世布爾喬亞社會的成立之歷史的事情了。總之，德意志原是缺乏活的經濟學的地盤的。經濟學是作為既成的商品，由英法輸入的。德意志的經濟學教授們，還不過是學習經濟學的學生。這樣，學理上表現外國事實的經濟學，遂被他們翻譯成爲包圍着他們之小布爾喬亞的世界底意義了，成爲錯誤的說明了，再轉化而成爲獨斷的集成了。他們要把那種不可制止的，於科學無能力的感覺，和實際上敷衍面子的那種不安的意識，隱蔽在學說史之博學的虛飾之下。或是依着混合了由他方竊得來的材料——由所謂代表那前途有望的德意志官僚候補者所不能不作爲淨罪火去受鍛練的諸智識之混合物的官房學借

來材料而隱藏牠們。」

馬克思這段言論，正是指示十九世紀前半期德意志經濟學史大體的傾向。如我們後面所說，德意志經濟學的發展，其大體的傾向，乃追隨英法二先進國之驥尾。這事情，其原因已如上述，乃因德意志之經濟的并社會的事情，較英法甚為遲慢。并且德意志這種情形，還生出照應於這情形的經濟思想。德意志經濟學者并經濟思想家，不僅輸入先進國進步的經濟思想，同時還依着照應於自國狀態之社會，經濟，哲學等思想，而內省的批評這進步的思想，形成德意志式之經濟思想。因而十九世紀前半的德意志經濟思想之分野，在此意義上，是很複雜的。

關於德意志經濟的及政治的發展，較英法為遲慢，以及實際上深受此二國影響等事情，上面已屢說過，所以現在只能對於法國革命（因為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對於十九世紀前半的德意志經濟思想發展所負的任務很大）略為敘述。

開始於一七八九年的法蘭西革命，當然給與德意志以很大的影響。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旗幟的此種革命之進行，正無異于告示人類界以理想的黎明。最先受此影響的為接近于法蘭西的萊茵省。於是這個地方，人人皆談起革命，而組織了「噴哥班黨」。可是革命的風潮，不僅在萊茵一帶，便是全德意志之注意，也都集中在此大革命的成敗上來。這時候，支配階級雖異樣恐怖，然下層民衆，却很感

着無限痛快。這樣，不消說政治的思想是很受此革命的影響了。當時的德意志，乃為大陸中最受法蘭西底影響的一國。德意志進步的人們，素來皆極歡迎法蘭西的啓蒙思想。如像腓力大王，他雖是開明的絕對主義者，然也嘗召請啓蒙思想家伏爾德爾（Voltaire）到宮中演講。且其書齋所藏的書，以法蘭西者居多。便是康德，也很喜歡盧梭的著作。這樣，法蘭西之影響，及于德意志者極深的事情，這是不消說了。給與十九世紀前半期的德意志經濟思想以極大影響的法蘭西之思想，最先祇限于進步的自由的思想，其次便是社會主義的思想。這樣，在一方面受着法蘭西思想影響的，在他方面又受英吉利思想影響的德意志，最後遂使自己特有的思想發展起來了。

十九世紀前半期的德意志思想之分野，乃被國內狀態并外國思想影響所形成。此中思想的派別，可約分為四種。（一）一方面受法蘭西革命當時之自由主義的影響，一方面而又加上批評選擇的工夫的古典哲學思想。（二）充分地攝取法蘭西政治的自由主義和英吉利經濟的自由主義思想，而形成純粹的自由主義思想的一派。（三）反對法蘭西政治的革命，反對把英吉利資本主義之說明和辯護為其使命的經濟的自由主義，認資本主義為最惡，要依過去的中世紀的社會組織而建設安定的社會之浪漫主義。（四）指摘法蘭西革命為不徹底，認恢復中世的組織為反動的思想，要依全社會的改造，而救濟資本主義之害惡的社會主義派。茲簡括如次：

(一) 古典哲學

(二) 個人主義

(三) 浪漫主義

(四) 社會主義

這四種思想，除社會主義思想外，餘者皆可說為同時存在的。這三種思想的本質，大概已如上述，其中各有其代表和根據的社會基礎。古典哲學，雖有一脈個人主義的傾向，但不是純然的個人主義。浪漫主義的性質原是保守和反動的，是德意志封建的貴族的思想。個人主義及社會主義之所以勃興在萊茵省，巴諸維亞和薩克森，正是很其當然的。因為這些地方，原是德意志資本主義的發祥地，這二種思想，原是代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而個人主義，後來因為主張自由貿易論的人頗多，所以取得布羅伊森支配階級之支持，這是值得注意的現象。自由貿易者之所以主張輸出自己生產的穀物，輸入自己生產上并消費上所必需的廉價的機械所生產的物品，這為的不外是當時農業國的德意志，尤其是布羅伊森之經濟的利益計。德意志工業的發達，同時在關係方面，也發生了變化。

然而這些思想中，最具備德意志的特性的，便是受着古典哲學影響最深的浪漫主義之思想。這思想底普遍主義的社會觀 (Universalismus)，曾給後代德意志思想以最大的影響。這類思想，成為德意



志的特徵的，祇是浪漫主義之普遍主義的社會觀，接受古典哲學之社會主義思想進步的社會觀（辯證法），和關於國家和社會之區別的理論等等而已。

## 二

十九世紀初葉德意志經濟思想，如下面所述，受着斯密斯及西依（Jean Bahstiste Say）思想之影響甚大，我們爲敘述此影響計，已打算編成「斯密斯思想向德意志移入」的一章了，但是，倘把這些論者都作爲純粹的斯密斯主義者而觀察，以爲和德意志當時思想界沒有什麼關係的時候，則在他們的思想中，必逢着難于了解的地方。我們爲要理解這件事情，首先不要以爲當時德意志思想界中，存在和斯密斯之思想沒有關係的思想，同樣地，我們尤須認識在經濟思想中，受其影響者甚大的事情。在德意志，介紹斯密斯思想的人們，和信奉斯密斯的人們，在許多方面，都根據斯密斯底學說，例如在社會觀并國家觀方面，都和當時德意志哲學有密切關係的。這種事情，不但斯密斯主義者以爲然，便是和他們站在反對立場的浪漫主義者，也都承認受着古典哲學的影響。這就是說，我們在敘述德意志經濟思想史的時候，必不能忽略了德意志古典哲學三大家如康德，腓西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黑格兒對德意志經濟思想之大影響這一點。

康德和腓西特底思想，最初尚有啓蒙哲學的傾向。尤其是康德，他底思想，乃由啓蒙哲學最大的代表者休姆之哲學才能達到完成的領域。康德之國家觀，充滿着自由主義的色彩，其社會觀，則有世界主義的特徵。康德也如斯密斯一樣，認理性和自由是對於人類進步的原動力。康德雖然不固執那關於以契約爲基礎的國家底成立之合理主義的說明，但他却認此種契約國家思想爲批評一切公的并法的組織之理性的原理。因而他對於英法兩國所行之自然法中有其基礎的自由民主主義的傾向表示着無限同情。康德很受盧梭之著作所感動，對於北亞美利加合衆國之獨立和法蘭西之大革命，覺得有莫大的興味。像這樣傾向於民主主義的他，當然承認人民之意志爲對於立法之最高最後的標準。一般民衆底意志，便是一切立法唯一的源泉。所以更進一步主張國家不僅爲限制個人自由而組織，還是爲限制其他一切個人自由而組織。因而他以爲國家最高的目的，乃在乎法之擁護。他說：「市民立法之本質的原理，在實現人類自然的權利。這就是在於有適當強制之公的規定之下，得到人類自然的權利。他在某種場合，雖又主張擴大國家活動之界限，把設施國民經濟一定的使命交給國家，但這不是原則，在原則上，他却不認國民經濟的設施爲國家之使命。這一點，他底言論雖然缺乏一貫的精神，然而他始終能夠尊重國家立法之要素。他解釋國家爲「法律規定下多數者之結合」，但是這種國家觀，却不是他單純的原子的國家論。他嘗由人類底本性，論人類中社會的生活和國家的必然性。他在「世界公

民的見地之一般歷史考】(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 1784) 中說：「人類中，以其理性之使用爲目的之自然的要素，祇是在種族方面，才能完全地發展，在個人方面是不可能的。所謂被造物的理性，便是擴張了使用他底所有力之規則和企圖超過自然本能的能力，在理性這樣的活動中是沒有限制的。」又說：「自然爲成就其一切素質的發展所利用之手段，便是社會中這些素質底敵對關係。這敵對關係，結局成爲社會合法秩序的原因。我這裏所謂敵對關係，乃指人類非社交的社交性而言。這就是，此敵對關係雖是將要踏進社會中之人類性質的趨向，然此趨向常是廣泛地結合着用分離來威嚇社會的抵抗。這樣，素質這個東西，明白地是存在人類本性之中的。人類本有一種希望聯合的傾向。因爲他們處在這樣的狀態中，才能更徹底地感到爲人類的意義，即感到他們自然素質的發展的緣故。」

所以在康德，對於國家，如對於英法的自由主義一樣，認爲不是一種「必要的害惡」。康德雖也主張自由主義的民主主義，但康德之所謂自由，明白地是和強力的國家觀念相結合的。因而康德之國家觀中的個人，如自由主義者的觀點一樣，不是國家活動之出發點并中心點。國家之目的，不是國民之幸福，乃是正義觀念的實現。在康德，人民的自由，不是脫離國家強制的自由，乃是參加國家強制的自由。因之康德的個人主義，在其根底中，和英法之個人主義不同。因爲個人底行爲，必須依從道

德律；即使康德底國家觀和自然法之個人主義的基礎有密接關係，而康德底倫理學說之根底，也和此相異。

自然法學說之倫理的根本觀念為功利主義，個人底功利為一切行為之目的。而康德底倫理學，則以人類為自己之目的。所謂「你決不應視人為對於目的之手段，應視為自己目的而行動」，這是他底道德律。這種倫理的基礎，完全是超個人主義的性質的。何以呢？因為康德以為一切思維，在一般結合概念的 APRIORI 中，可以動作的緣故。這樣，個人之一切思維和意識，便是達乎純粹的個人的存在以上的。因之意識不但是由一個人所生，且不是由他之個人所生。這個正如麥克士·阿特拉（Max Adler）所說的一樣，是被「社會化」的。這樣，康德底倫理學，完全含有新的由全體觀念所出發的思想。這個由純外形的方面看來，他底倫理的規範，有最嚴格的義務之觀念，有所謂「汝為爾」之命令的性質。由此一點，生出對實踐倫理學之重要的歸結。這就是說，擁護你底人權，不可無顧他人之人權，僅要求于你所應得的，各人有各人要求確保其權利之正義。這個便是和自然法之倫理學最不相同的所在。這麼一來，我們在評議人格道德的時候，當看出康德要從個人主義移到社會主義的出發點，發見康德對德意志思想之本質的特徵。

依據康德底哲學，使康德底哲學發展起來，在社會思想方面，示出顯著的進境者，便是約翰·郭特利夫·腓西特。腓西特底思想，在其初期和經過發展以後，其立場雖顯然不同，但他總算已經克服了康德時代的個人主義的傾向，容許國家以廣大範圍的行動了。他底哲學，以理性為中心，有認人為有理性者之人格的觀念。以為人類社會之構成，非由社會成員之服從，乃由社會成員之平等權。他說：「一切的個人，在其原有的狀態則不同。然而一切的人們，都有理性的萌芽。所以其目的即其先驗的本分，便是同一的。」因而社會最高之先驗的目的，便是社會成員完全平等之保存。不過社會各成員，正如其他成員之外的自由一樣，祇在限制其各自之外的自由之時候，才能并存這樣的自由人格。而這事情，正如各人能保衛其生活一樣，祇在能分配財產的時候才可能。這個便是生存權的主張。所謂生存權，便是各人對社會要求豐富而且快適的生活之一種權利。為確保此生存權起見，必須在國家監督之下，做一切財產之生產，讓國家獨占和外國的通商。這個便是他底理想主義的社會觀之歸結。我們據此，已夠知道他怎樣地脫離自由主義之合理的個人主義底思想，而達到普遍主義社會的事情了。他底社會觀，最初并非作為一個統一體而表現。在其初期，已經克服了個人主義，而達到普遍主

義的社會觀了。以下我們僅就他那本以此種普遍主義的社會觀為基礎的「封鎖的商業國家」(Der geschlossene Handelsstaat 1800)而說一說。

許多社會主義史家，對於腓西特這本書，都極其評議的能事。然而他們之間，許多人却認此書為空想的產物。他們不承認這書及他底哲學的體系有和他底時代之精神相關聯的。這本書，并非這樣早生的畸形兒，乃是依據於深刻地把握着社會問題的當時之普遍主義的社會思索方法的著作。它底目的，不外是腓西特關於一切實在統一之學說。此學說不過是被封鎖的商業國家所應用的學說。這本書，不僅提供怎樣才能解決社會問題的方策，而且提供多數有生命價值的證明和實例。人們雖只滿足自由主義，然在被自由主義引起社會的貧困使國家基礎搖動的時候，則不得不如腓西特底指教，回想他們對於社會所負的義務。以下我們可以在腓西特底學說中，求出現在社會政策之淵源。

腓西特底哲學的計畫，不如柏拉圖及其他之理想國一樣，附加以他種東西的。在他不主張直接實行這種計畫的這一點，誠是一個賢明的政治家。可是他也并非相信絕對不能實行他底理想的。然正因為這個緣故，他便被時代的潮流所浸沒了。腓西特底理想為理性國家，在現實的世界上，當然沒有存在的餘地。要使歷史的國家突然地變為理性國家，這是不可能的。祇能慢慢地使歷史的國家發展起來，漸漸地接近于理性的國家。

腓西特首先很力攻擊福祉國家的要求，和那將國家底機能限定為擁護財產并人權的自由主義底要求奮爭。他反對洛克，盧梭及其他之自然法學者，主張不應有國家和財產。認定國家底使命，乃在乎給與一般人們以他們自身之東西，在乎保護他們之利益。財產是怎樣成立的呢？未嘗有法律以前，人們祇知爭奪自己之利益，不顧他人的損害。這種自由力底鬥爭，祇靠着各人能互相訂立契約才能廢除的。各人訂立不損害各自利益的契約，這便是一切財產的起源。「本來一切人類對一切東西有同樣的權利。這即是不論什麼人，對於他人，本來沒有優先的權利。比如一切的他人拋棄了某種東西，而我却喜歡這個東西，結果為我自身而保有這個東西，所以這個東西便成為我底財產。一切的他人底拋棄，這便是我底法律的根據。國家原來就是使一不定數的人類結合在一封鎖的全體即一普遍 (Stilheit) 之中的東西。祇是國家才能夠保護全部人民底權利。祇是國家才能夠適當地做着有效的財產基礎。」

再據腓西特，財產權乃是對行為之絕對權，不是物權。凡物所以必要依契約所決定，其目的并非在乎限定物質的世界，乃是在乎限定自由行動的範圍。而財產也便是這樣成立的。這場合，腓西特也如自然法學者一樣，乃由個人之擬制的契約而出發。然而個人并非有固有權的財產而組織國家。國家契約這個東西，便是最初創制法律的行為。

在分配財產的時候，首先要依着怎樣的原理而實行呢？一切人類，他們首先所要求的權利便是生

存權 (des Recht auf Existenz)。「一切人類行為的目的，便是在能夠活着。凡屬被自然給與生命的人們，都有平等的請求權。」

凡是人類，同樣地必須愉快地生活。所以必須獲得略同一量的生活資料。自然，個人有時也有因自己之過失而失去其所應得之部分的。在理性國家中，一切人類，應得同一的部分。但在現實上，因偶然和權力決定其應得的部分，所以有時也非同一般的。所以現實國家的事態，在使一切人類慢慢地確保他們的東西。

下面我們要敘述腓西特應用他底財產理論到一般交易上去的事情。

他把人類的行為分爲二大部分。卽就是取得自然物和加工於自然物。據此，自由行為便可以分爲生產者(Produzenten)和技術家(Künstler)兩階級。這二階級互相約束不作其他階級的行動。因爲屬於各部分的人們，對於其部門，有絕對權利的緣故。在此場合，技術家便站在不利益的權利上了。什麼呢？因爲生產者有支配生活資料的權利，而技術家祇不過有勞働的義務，有要靠勞働而生活的目的，于是在消極的契約之外，不得不結着積極的契約了。這就是，在此種積極的契約中，生產者不但也爲技術家而生產，且負着提供原料的義務。而技術家對於生產者，也應負着加工於生產物的義務。二者即互相負担生產上之義務。



爲達到理性國家底目的，除開以上二階級外，還必須存在第三階級即商人階級。商人階級也和此二階級締結着二個契約。一種是消極的契約，一種是積極的契約。前者爲對於二者各自之事業而約束不互相干涉，後者爲約束把剩餘生產品給與于商人，提供商人以其快適生活所必需的生產品。

這三個階級，爲國民根本的要素。國家嚴重地規定屬於各階級之人數。對於非生產者，行着數的限制(Numerus Clausus)。以國家生產物而生活的非生產者，不能存在國中。非生產者乃由生產者之數而決定。「生產物的獲得爲國家的基礎，也爲規制人們從事生產的最高標本。」所以這裏首先應顧慮的爲原生產(Urproduktion)，其次爲工業(die Künste oder Gewerbe)。「國家不僅規定一般工業階級之數，尤必須規定從事一特定部門之人數。而使一般從事于最緊急的東西之生產。」所以首先必須生產必需品，其後才生產奢侈品，在農業尙未進步缺乏必要的工業國家，則不許生產奢侈品。

國中希望從事什麼業務的人們，必要向政府申告。政府據着上面所說之消極的契約和積極的契約而和他們約束。倘如某種事業已經滿員，則政府必須阻止其採用。假設一勞働部門，雖然宣告缺乏勞働力的時候，但在此部門還不提高其生產物的價格，則國家必須保留占有此工業的特權，至再行充實勞働者之數爲止。總之，一切工業家，在實行其技術以前，必須受國家試驗。

一物之價值，乃依着能維持人們生命時間之長短而決定。一物在較他物更能長時間中維持人們生

命的時候，則牠比他物當有更大的價值。而價值的標準，乃用小麥爲之。據此標準而首先評量食料，其次至于他種生產品并製造品。「勞働者在其勞働時間中必須能夠生活。倘如他們必要學習時間的時候，則從其勞働生活中扣算此學習時間。并且勞働者也必須享受他們所應得的小麥粉（倘如他們祇靠小麥粉而生活的話）。除小麥粉外，他們如再必要其他食料時，他們可以依着上述之標準，把剩餘的小麥粉和他物相交換。」

政府雖得用法律規定商業物品的價格，但在規定此價格時，必須顧及商人所享的快適生活，應較他人增加一點的事情。所以商業物品的價值，應依商人生活之程度而決定。

「在此國家中，一切人們乃全體的從僕，所以他們對於全體的財產，應享受一部分的權利。不論什麼人，不得較他人爲富裕；不論什麼人，也不得較他人爲貧窮。對於一切人們，應保證其生活狀態的永續。所以對於全體，也必須使其安靜地在某一程度中永續其生活。」於是乎纔沒有貧者惰者的存在。

國家本來便有確保着國民這樣平衡狀態的義務，不論什麼人，也不得破壞這種狀態。「應禁止國民和諸外國底交通，因爲和外國交通是萬萬不可能。」因爲理性國家便是一封鎖的商業國。這個恰如封鎖的法律國一樣。「如覺得國家有和外國交通之必要時，則應由政府施行之。正如一切戰爭以及和

平同盟祇由國家宣行的樣子。」

這樣，人類于其自然的生活，必須愉悅地勞働，這是他們的權利。人類之勞働，不僅是權利，同時還是義務。可是人類不要如家畜般勞働。而且勞働必須為國民全體。為國民全體之勞働，由其能率上說來，必要分勞和特殊化之過程。國家必須監督此分勞和特殊化之過程。

為實行上述國家的過程起見，也必要官吏階級。腓西特也如斯密斯一樣，不但不把官吏軍人看為不生產的階級，而且承認教師，裁判官，行政官等為必要不可缺的階級。生產者及技術者必須為供給他們以生產物而勞働。他們之政治，教育，國防等工作，正無異于生產者生產之勞務。國家為填補他們這類工作的費用起見，可以向國民徵收租稅。這種事情，決不是破壞國民間各階級間之均衡的。

在腓西特底封鎖的商業國家中，因為承認各人之生存權，所以必須設施關於供給國民生存上所必要的資料之制度。所以國家對於各人生存上所必要的生產物之剩餘，尤其是穀物的剩餘，必須為之保存管理。

在封鎖的商業國家中，也存在為交換手段及價值之指示者的貨幣。而貨幣的價值，和其他商品的價值沒有差異。因為在封鎖的商業國，人民不能和外國直接交通，所以貨幣能在外國通用與否，固不成為問題，所以可把無用之物來製造貨幣。這種國家之貨幣，乃名之為國內貨幣 (Landesgeld)。因

而此貨幣乃依着國家之意志才是貨幣，并非依着其價值才是貨幣。

腓西特在他底「封鎖的商業國家」第一篇中，嘗敘述他底社會經濟及國家觀之根本概念，在第二篇中，又批評當時思想所傾向的自由主義及重商主義，但此中的論述，尤以關於支配當時商業的無政府狀態爲更詳。在腓西特，正如他底著作名稱所表示的一樣，商業成爲他底興味的中心。他以自由競爭的作用爲一切人類對一切人類之鬥爭。這種狀態如繼續下去，則任何的個人，也不能得到其繼續勤勞的保證。因爲在此場合，各人爲自己勝利計，必然地喜歡自由行動的。又如各國倘如施行其重商主義的政策，則其結果，必然地釀成他們間流血的商業戰。

在第三篇，腓西特才論及實現他底封鎖的商業國家的方法。他主張首先禁止國內市民和外國的通商。其理由是：

凡是一個國家，自必有其出產的「自然境界」，沒有依賴于外國供給國民生活上所必需的一切生產品之必要。國家必須具有生產上并消費上的獨立性。此種境界，可以依着和平的或戰鬥的手段而獲得之。然爲着獲得此境界計，國家須先決定其手段，排除世界貨幣之金銀流入國內，使國內紙流通國內貨幣。便是和外國貿易，也應依着國家的設施而行。國家對於外國的收支，可用世界貨幣爲之，對於國民收支，則用國內貨幣行之。最初應慢慢地縮小外國貿易，以後漸次才能達到完全廢絕的地步。

凡是一個國家，達到可能生產國中所有應生產的一切東西時，這國家才告完成。政府在奪取自然的國境後，必須從快發出宣言，聲明此種鬥爭的目的，并非是什麼合併。在此諸關係之下，國家完成的時候，于是才能建起和平的世界。這時既無戰爭，因而也沒有講和同盟的必要，祇存有科學的進步，人類幸福的增進等事情。

如以上之封鎖的商業國家，往往被思想史家做爲社會主義的國家論之典型。然而腓西特之此種國家，乃是建築在勞働身分制度上之一個身分國家。所以他把所有權這個東西置在此國家之根本的基礎之上。在這樣的關係中，腓西特之封鎖的商業國家底內容，和近世的意義即以廢除階級爲目標的意義的社會主義稍有不同。可是他底著作，給與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想之影響是很大的。

#### 四

由康德及腓西特所產生的德意志的社會觀及國家觀，至黑格兒才達其大成。我們這裏對於他底哲學體系的重要性，沒有記述的必要，而且這種記述也不是我們這裏的任務。至于他底思想，影響及一般社會思想并經濟思想最大的，便是他底社會觀及國家觀。他也如腓西特一般，始終沒有具體的表現出他底社會的并經濟的思想。然而他底立場雖然是抽象的，高踏的，但他給與後世的影響却是很大

的。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社會的并經濟的思想，不問其為左傾或右傾，在某種狀態中，都是由他底思想中汲取源泉的。我們現在祇抽出和他底社會觀并國家觀有關係的部分來介紹一番。

黑爾巴特社會學的概念為家族 市 的社會及國家，而形成這些概念之基礎的則為人倫。「人倫是自由之理念。牠是一種有生命的善，在自意識中，存有牠底知覺和意欲，而且靠其行為又有其實現性，同時在人倫的存在中，還有牠自身存在之基礎和運動之目的。這就是，牠是所存在的世界并成為自意識之自由的概念。」而此概念，在其種種的形態中，乃被家族，市民社會和國家所表現的。這種理念的概念，祇靠其自己之客觀化和其契機形態所生之運動，才是精神的即知覺自己的東西，才是現實的東西。所以此種精神在下而的形態中被表現出來。即（一）直接或自然的人倫的精神即家族。這一個實體性，喪失其統一性，分裂其統一性而移到相對的立足地。（二）這樣，這個便是市民的社會。市民的社會便是由成員的欲望，由為確保人格及財產之手段的法制（*Rechtsverfassung*），由為其特殊的并共同利益之外的秩序而成為成員間獨立個人底結合，這樣，再形成了形式的總體。（三）而這個總體便是總括着外的國家為實體的總體及其總體所趨向的公的生存之目的和現實性換言之即國憲（*Staatsverfassung*）的。

為精神之直接的實體底家族，其本分有自覺的統一即愛這種性質。故其志向，乃為絕對的本質

性，并非爲其中之個人，但在此統一中，必須爲成員而有其個性底自意識。可是家族則由下面之三方面而完成：（一）在家族直接概念中做爲婚姻的形態。（二）如家族底財產及對此財產所費心之外的存在。（三）子女之教育及家族之解體。像這樣的家族，雖是自然地出現的，然而本質上却因人格的原則而生出多樣性。這種多樣性，一般作爲獨立具體的個人，而其結果，在外表上，成爲相對的對立的形勢。這個就是差別的階段。轉向到家族其他原則的家族的擴大，在一方面是進化爲民族之家族的擴大。所以民族有共同的自然的起源。在他方面乃依着支配的權力，或自由地爲着散在的家族的共同體相關聯的欲望和其充足的作用而擴大。市民的社會便是這樣地成立的。在家族，一般性雖是其出發點，但在市民的社會成立時，便由此一般性達到獨立的特殊性。在以這種獨立的特殊性爲其本質的社會，人倫這個東西，已如失掉了的樣子。何以呢？因爲在意識上，家族同一性這個東西，本來便是最初的東西，神聖的東西，而且是義務命令的東西。然而現在因爲發生了特殊的，最初之自己決定者的關係，所以不得不拋棄了人倫的決定者。

爲自己的特殊目的之具體的個人，爲欲望并自然的必然性及意欲混合之全體之具體的個人，便是市民的社會之原則。然而即使說是特殊的個人，但在本質上，也和其他之特殊性相關聯。這樣，被實現了的利己的目的，乃依着一般性而附與條件，形成互相依存的組織。所以個人生存之幸福和其生存中

法的存在之幸福底組合也就告成立了。在此關係中，個人之幸福和法，便成爲現實的被確保的東西。這樣組織之名稱，可以叫做「外的國家即必要及悟性國家」(ausserer Staat. Not-und Verstandstaat)。而市民的社會，則包含着三個要素：(一)由個人勞働并一切他人勞働及欲望之充足所生的個人欲望的媒介和充足即欲望之組織；(二)包含在這裏面的自由之一般性和現實性即法制所生之保護財產的現實性；(三)對警察并團體之欲望之組織中所殘存的偶然性之用意并以特殊利益爲共同利益之費心等便是。

總之，據黑格兒所說，社會便是爲欲望和其充足所使用勞働活動之組織。欲望這個東西，便是個人的，特殊性的表現，而這特殊性便是指導分勞因而指導「抽象的勞働」，而此抽象的勞働，在一方面則增加生產，在他方面則從着一熟練的限制而使其無條件的隸屬於社會的關聯中。黑格兒便是理解這樣的個人特殊性之結果的欲望底充足和生產一般生活資料的各過程爲社會活動之領域。因而他以爲市民的社會便是「一切人們對於一切人們之個人的利益底鬥爭場」。

然而市民的社會在人類共同生活中占着怎樣的地位呢？黑格兒說：

「市民社會之構成，雖較國家之構成爲遲慢，然其差異，祇在市民社會乃發生于家族和國家間之一點。因爲市民社會乃以國家爲前提，市民社會爲其存在計，必須先有獨立的國家的存在。市民社會



之創成，還是在近代的事情。祇是近代世界才能對於理念之一切設定給與其權利。我們倘把國家看做種種個人之統一即單是共同的統一時，則這個意義便不外是市民社會的設定。近代國法學者，多以為不能使這個達到關於國家其他之見解。在市民的社會，一切人們，他們自己便是目的，一切的他人，對於他們不成爲什麼對象，而且和他人沒有關係，其大部分的目的不能容易達到。所以他人是對於特殊者目的之手段。然而這特殊的目的，靠和他人之關係而採着一般性的形態，同時靠充足他人之幸福而充足自己。特殊性和一般性之條件結合後，全體才成爲媒介的基礎。在此基礎上，一切個別性，一切才能，生誕并幸運之一切偶然性才是自由，一切情欲之流才能湧出來。而這個祇是被洞察的理性所統制的。祇是被一般性所限制的特殊性才是能要求一切特殊性之唯一的標準。」

如上面所說，在黑格兒，國家和市民社會完全不同。國家和社會完全是對立的概念。這意義的國家和社會之區別，在德意志，到黑格兒才開始明瞭起來。

可是國家又是什麼呢？「國家爲人倫的理念之實現，爲實行其自身之思維，知覺，理解，并所能理解的啓示的，自己明瞭的實體的意志之人倫的精神。」形成國家之實體的意志，便是提高國家之一般性之特殊的自意識，是自己合理的東西。在此實體的統一中，自由爲最高底法的絕對的自己的目的，同時此目的對於負着最高義務之國家成員，則是最高底法。所以黑格兒對於國家之理念說：

「國家這個東西，便是人倫的全體，自由的實現。而所謂自由爲實現的事情，乃是理性之絕對的目的。國家是存在世界上的，是在世界上以意識而實現的精神。可是國家在自然界中，祇不過是作爲他種東西，作爲睡覺的精神而實現。這個祇限于意識中，把自己作爲繼續存在的對象而知覺時才是國家。自由不是我們由個別性即個別的自意識中出發的，乃是由自意識之本質中出發的。何以呢？因爲在此本質中，人們才能知道個別的個人祇不過是作爲一要素之獨立權力而實施自己的事情。國家之存在，便是世界中神底進行。國家之基礎，便是意識的繼續實現自由之理性的權力。我們當論述國家之理念時，不但不必要考察特殊的國家，而且不必要考察特殊的制度。我們寧應考察理念即真實的神這個東西。——國家不是人類的作品。他因存在于世界而存在于意慾，偶然，誤謬的國土之中。惡劣的行爲可以由多方面變換國家底形態的。可是最醜的人，犯罪者，病人及不具者之流，尙是一個有生命的人類。肯定的東西即生命這個東西，他雖然有其缺點，然而尙可存在。關於生命既這樣，關於國家也這樣。」

這種國家底目的，乃在乎保持一般的利益并其中爲實體之特殊的利益。這就是在乎保障個人特殊利益之特殊性（總括在一般利益之中的）。而此目的必須靠着自由地必然地實施那統一在自己內部之法律的諸制度才能達到的。而這個也必須受着統治所領導。「有生命的全體即國家一般及其國憲之維

持，繼續的生產物，便是統治。自然的必然的組織，便是國家之成立，市民社會之階級。統治爲國憲一般的部分。它如把那一部分（家族及市民社會之階級）做爲其意識的目的，同時必包含着家族及市民社會之設施上所存在的全體一般的目的，爲此而活動。」因而此統治便是國家和國家秩序之基礎，國家權力之編成。比如其中「內部的國法」或本來之憲法乃決定內的形式，「外部的國法」乃決定國家人格在和其他國家及其市民之關係中所處的地位的。

黑格兒之國家爲理念的國家，和現實的歷史的國家完全不同，這在上而所引用的論說中，已經很顯然地表現着了。黑格兒在別個地方又說：「然而今日一般國家，尤其是各個特殊的國家，其法律及一切規定之歷史的起源是什麼呢？這個起源，最初乃由家長的諸關係，恐怖，信賴和團體等等所出現，……但這樣所說，足見在國家之理念中，沒有什麼關係了。」

現實的歷史的國家不成爲黑格兒底理念國家之理論的考察之對象，這雖是事實，然黑格兒却未嘗把此現實的歷史的國家置在認識之外。借着古諾夫（Heinrich Cunow）的話來說，它不過是一種「未完成的國家」或「不完全的國家」。而黑格兒則對此現實的歷史的國家之歷史說：「市民社會及國家之所存在，乃表現階級之差異。何以呢？因爲有生命的東西之一般的實體，祇限于有機的特殊化，始得存在的緣故。國憲之歷史便是這些階級之構成史，便是對此階級的個人底法的關係，對於個人互相

間并其中心點之關係的歷史。」（因之我們認識了由此階級的分歧所生的必然性并其結果必釀成政治的社會的不平等）這種見解，甚類似後來馬克思底見解，這是一般學者所公認的。可惜黑格爾終不能使此現實的見解理論化起來。我們不得不在未來的思想中等待着其大成。而他始終祇是國家理念的提唱者。

## 第四章 自由主義思想與斯密斯經濟學移入德意志

### 一

由近世初期至十八世紀，經濟思想之中樞觀念，爲對於國家經濟優越性之主張，而此狀態，便是以初期資本主義爲基礎之絕對王制底反映，這已如第一章所說了。然至十八世紀中葉，資本主義之中心，却變爲工場手工業，故其生產力之發展，不能滿足于從來國家干涉的經濟政策的狹小的範圍。以工場手工業爲基礎的資本主義，遂以其增大的生產力，而爲自主之要求。於是乎遂發現出要避免經濟生活受國家干涉之自由的要求。我們在英吉利，便能看見這樣情勢的典型。自十八世紀前半期以來，英吉利經濟思想，雖反映着此自由之要求，但到了亞丹·斯密斯，才把此要求組織爲理論的經濟學的根本體系。我們當敘述德意志經濟思想之自由主義底發展時，必須先略述斯密斯底理論的根據。

如 Henry Thomas Buckle 所說，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富國論」，與其說是結合政治學者并立法者之全才能，不如說是爲人類幸福貢獻的著作；但這是別個問題。然如巴思地亞 (Claude Frédéric

Bastiat) 所說，它是數世紀長期間中關於經濟學的考察，是一切著作中最完全的大集成，這是人人所不容懷疑的。這著作之根本思想是什麼呢？也如人人所知道，斯密斯在一七五九年嘗著過一本「道德情操論」，故我們敢斷言，他底根本思想，當和此二者有共通的地方。

形成斯密斯底根本思想的，便是他底形而上學的樂天觀。他便是 Lord Shaftesbury 及 Francis Hutcheson 所主張的樂天的自然神教之最徹底的代表者之一。Shaftesbury 雖然擬設由全智全能之神所生的調和的世界，但所謂調和，祇是他底標語。他底自然神教的調和論，在杜來丁底詩中，已經表現着了，他不過是把這個論調為哲學化而已。

斯密斯底自然神教論，也不出一般神教論的範圍之外，以神為世界以外之物，世界乃從着神所給與的法則。他相信「偉大的仁愛全智之實在」，以為神是永遠地領導這世界達到「最大可能量的幸福」的。神可比時鐘的製造者。因為神巧妙地構成世界的齒車，而齒車固不知道什麼，又沒欲望，祇造出優良的秩序，調和，美和祝福。世界中調和的東西和自然的東西便是其結果。關於人性的研究者，正如研究自然的人要努力發見天界并地上那不可動的力學的法則一樣，最深刻的研究人類精神，要由此認識找出人類行為永遠不變的自然法則，而負着認識本能及感情之機械的組織之任務。這個便是關於人類科學的目的。而倫理學則為建設于心理學基礎上面的經驗科學。至于政治學，因為也屬於人性的

科學，所以哲學的政治學課題，乃為神所給與，乃為指出人類精神中所表示的自然的秩序。斯密斯為達到這個目的，所以由分析人類自然的本質并自然的衝動而出發，以為神賦與自利和仁愛之本能于人類，給與使此本能得到適宜的同情的情感。所以他又以為人類祇是依其性情而行動，才能增進自己的利益，同時于不知不覺間也增進了其他社會一般利益。他在「道德情操論」中嘗說：

「這樣，自己之安全和種之繁殖，正無異於自然造生物時，其目的是非常之大的。凡是人類，都一樣地被賦與對這些結果的欲望，對其反對的嫌忌即愛生之情和怖死之念，希望種之永續不滅的心，以及對於其死亡之想像的嫌惡等等：可是我們雖然被賦與對於這些結果的很強烈的欲求，但實現這結果之適當方法的發見，并非我們這不確實的緩慢的理性所能決定的，乃是自然使我們依着本源直接的本能而向着此目的之大部分的。比如使二性結合的情慾，飢渴，愛，快樂及痛苦之恐怖等等，驅使我們利用那種種方法，而自然的支配者對於因此而實現的，企圖的仁慈的目的之傾向，是沒有什麼考慮的。」

上面所說的天界并地上自然的調和，就在經濟現象中，也可以看見。經濟生活中自然的調和，構成他所說的「為明白自然的自由之單純制度」。所謂自然的自由之制度，乃指着構成社會的各個人，從着自然所給與的性向（要改良他底生活之努力和自利心）而活動，倘不妨害其他同樣的自由的活動，

他還增進全社會的利益者而言。斯密斯對於所投下的資本之保護和抑制政策的論說如下。

「一般以爲靠着顯著的獎勵或限制，則特殊產業部門，自然必吸引投到產業方面的社會資本之大部分，不然時必定妨害了把此中資本之某部分投到特殊產業的事情，試不知事實上這種政策正是違反其自身所希望助長產業之目的的。這樣不僅沒有促進對於真富和偉大的社會之進步，反而妨害社會之進步；不僅沒有增加其土地并勞働生產之真價值，反而減少其價值。所以這種獎勵或限制的制度，倘被廢除了，則爲明白自然的自由之簡單制度，自能樹立起來。一切人類，只要他不破壞正義的法則，就可以完全自由地放任地利用他底方法而追求他自身之利益，以及把他底資本并勤勉來和他人底資本并勤勉相競爭。這樣，才能完全避免君主常常遭遇着無數錯誤的見解（因爲他底指導不充分人類知識），才能解放他監督私人之產業和指導社會利益中最有利益的事業到誤謬的方向之義務。」

其理由是：

「各人要改良自己狀態之自然的努力，在允許自由地完全地行使時，這是很有力的原理，祇是這一個，即使沒有什麼助力，也就可以領導社會到豐富繁榮的地步，才能戰勝那靠着愚劣的人爲的法律而妨害人們底作用之一切狡猾的障礙。」

上面所述，乃爲經濟生活中自然的調和之根據，因而也便是斯密斯經濟政策論之根據。主張完全



自由追逐自利的斯密斯，以妨害自由限制自由為不正無禮，甚至視為「人類最神聖的權利的顯著的侵略」。然而斯密斯所說的自然，並不是個人完全絕對的自由即如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者 Max Stirner 所說的個人的自由。斯密斯底個人的自由，乃「限於從着正義的法則」即不妨害他人自由之個人自由。因為在此範圍中才得自由，所以為抑制個人之機關的國家，才有其存立的餘地。

然有存立餘地的國家底任務又是怎麼樣呢？

站在自由主義立場上面的斯密斯，又對此國家的職能說：

「據自然的自由的制度，君主所應為者祇有三個義務。然這三個重大的義務，在有普通悟性這一點上，是很簡明而且令人首肯的。第一是負着防衛他獨立的社會之暴力和侵略的義務；第二是負着保護社會各員對社會其他各員之不正義和壓迫的義務，換言之即有樹立嚴密的正義的行政之義務；第三是負着設立維持此行政之義務，但這種設立維持不能單為個人或少數者之利益，應為某種公共事業及某種公共的設施，因為個人或少數者事業之利潤雖不能償其費用，但事業這個東西，已足使大社會得到償其費用以上之利益了。」

這種國家的職能，簡括來說，前者便是對外敵軍事的禦防（國防），其次是國中法律的保護（司法），最後一種則為可能的最小範圍中警察的厚生的行政（警察行政）。而此三職能，正如 August

Ocken 所說，乃形成法治國家綱領的。

## 二

自由主義，在英吉利和法蘭西，既已急激地勃興了。英吉利經濟的發展和示出法蘭西第三階級（布爾喬亞）實際勢力增大的法蘭西大革命之思想的反映有自由主義的模樣。這種事情是對於這二國自由主義之理論和實踐附與有利的條件的。德意志自由主義，在斯密斯底「富國論」發行後三十年之長期距離中才開始生長起來。

然而在德意志，却有和斯密斯底思想沒關係而使自由主義的思想發展的他種科學。自然的，這種自由主義的出發點便是哲學的而不是經濟的。這就是康德哲學直接的歸結。上面已經說過，康德不是德意志自由主義的創設者，他底思想祇不過接近于此主義，給與後來此主義的影響甚大。德意志最初主張自由主義哲學的人，便是受着康德影響的芬賀爾特。他在「國家活動之界限」(Ideen zu einer Versuch. die Grenzen der Wirksamkeit des Staates zu bestimmen. Breslau 1851)中，才形成了自由主義哲學的體系。

芬賀爾特的出發點，乃由於有理性基礎的人類底本分。他底思想，差不多也同其同一時代的西拉

(J. F. Schiller) 并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一樣，乃在完成人格的調和，發展人類所有的能力。他承認人類爲其發展計，必要有外界的刺激。而由外界所受的僅不過是種子。人類底活動，即使是最美滿的，然在最初，也必須是祝福的。人類於其自身，於其能動的程度，都能適意地活動。在芬賀爾特，人類共同生活之最高理想乃在乎各人自己爲自身而發展。以人類最高幸福爲人格。人格是「創造」。卽就是自由的，沒有妨礙的自己的發展。他相信可以使一切農民工匠都成爲藝術家；并且以爲依着外部的作用而養成藝術家的事情是什麼也不能阻止的。可是有時外部的作用也可以阻害人類的發展，使人類的發展縮爲狹小的。這個外部的作用，有時也得爲國家。但國家對於積極的厚生的國民之費心，結果雖得到統一性，但同時却使勢力衰弱，妨害了對於身體活動，對於外的關係一般人類的精神并性格之反作用。從這點看來，芬賀爾特底國家目的，祇在乎剷除害惡卽自然并人類的害惡。所以對外敵并內的鬥爭之安寧的保持，便是國家之目的。卽就是國家之行動，祇是單純的消極的禦防。

芬賀爾特底立場爲純粹美學的哲學的，其目的在乎說理想，未嘗觸及歷史的現實的國家的問題。在德意志，最先認識國家爲人類共同生活中歷史的形態而使之和社會對立的人，則是斯力薩 (August Ludwig Schlözer, *Staatsgelahrtheit nach ihren Hauptteilen im Auszug und Zusammenhang* 1793)。關於國家的問題，到了斯力薩，才現出一轉換的方向。在斯力薩，對於國家的問題，却不如一般厚生

國家論者一樣，以國家為招來一般的幸福起見，必須有某種動作。他以為成為問題的，祇是國家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事情，而研究的對象，則在國家怎樣地成立的問題。

關於國家以前的狀態和國家成立的問題，自克羅杜斯以來，常成為自然法說所討論的問題。但對此問題的解說却很不一致。關於這個問題，乃依着各思想家對於自然狀態和關於人類性質之心理的特徵的態度而差異。比如克羅杜斯之社交性，霍布斯之自己保存性，杜馬蘇士之幸福追究性，這一類心理的解釋，都是各各證明國家之成立的。關於國家以前自然狀態之學說，雖有種種雜多的色彩，然大體可以約分為二種：第一為原子說，第二為人類社會的從屬性說。前者謂自主的個人即自己支配者雖然處在互相鬥爭的狀態中，然而為使此種鬥爭狀態歸於消滅起見，必要互相結合而形成國家。霍布斯并其一派的國家成立論者皆屬之。後者說結合在國家內部的人，并不是個人，乃是家族。克羅杜斯及伏爾夫等屬之。但此二說，皆承認無強制力的社會先存在，其後才進達國家契約。斯力薩便是屬於第二說而明瞭地劃分國家和社會之關係的一人。

他說，人類在沒有國家以前，他們的生活，便是過着婚姻者，父，家長，市民，友人的生活。而這種共同的生活，才是人類的要求。這樣，而一切社會形態中最自然的家族才告成立。至於市民的社會，則為社會的結合第二層階段，也同家族一樣，乃由人類動物的本能而成立的。反之社會的結合之

第三階段即國家，其結合乃依理性的經驗而行。人類在市民的社會中，已經享着安全的快樂了，已經行着剩餘勞働生產品的交換了。但名譽心及愛國心這種社會的感情之成立，却已存乎市民的社會之國家以前的時代。

據一般人說，人類原是自然自由地造作的。至少人類在自然的狀態中是不平等的。然而自然却把人類造作得很不平等。在市民社會中，富者和貧者，貴族和平民，他們間之差異，愈見其各趨極端了。可是在此差異中却未嘗存在造作這種特權者的什麼根據。所以斯力薩才極力排擊一般要求由國家強制爲他人服務的厚生國家論。他嘗舉出由國家以前的階段的人類心中所作用的社會勢力來做此排擊的根據。此種心理的社會勢力，不僅在國家以前的時代有作用，便是在國家中，對於個人也有作用。因而個人對於他自己之幸福負有考慮的責任。像這樣的個人底願望，是不受什麼阻礙的，是可以實施的，他底行爲是不能受外界的妨害的。因而國家第一的目的和義務，祇在乎保護而已。爲增進個人幸福之積極的手段，乃屬於市民之私的事業，決不是由國家行之。可是斯力薩也有超越國家之保護及安全之目的以外之場合。所以他對於國家目的之概念說：『市民的幸福，祇靠國家的結合，才能維持，才能要求，才能向上，而國家一般最高目的便是市民的幸福。』這意義就是說，在以國家對市民的厚生底可能性爲前提的場合，則於一定界限內，乃以市民的厚生爲國家之目的。而在普通國家，祇靠消極的

維持其安全便夠了。

由此看來，在德意志，自由主義的見地，雖和斯密斯底思想沒有關係，然在德意志思想界中，自由主義能夠占着優越的地位，能夠使德意志之理論和實踐搖動起來的，確是在乎斯密斯底思想移入德意志以後的事情。然而上面屢次說過，德意志之思想，雖然受着斯密斯思想的影響，但是未嘗採用過純粹的斯密斯學派之自由主義。至少直接介紹斯密斯思想的學者，反多受德意志哲學的影響。然在德意志，自由主義被極端地主張的，正如在英吉利斯密斯底樂觀論喚起漫切斯遠學派一樣，乃在乎受巴思地亞影響的樂觀論發展之後。現在我們打算先來說明斯密斯思想向德意志移入的過程。

### 三

在易北河和威悉河之中間，占着布羅伊森領土二分之一的小國哈諾威，在一七九五年，其人口有百萬之多。這個哈諾威，原是德意志中英王的領土，處在北德意志的中央，介在商工業進步的萊茵地方和以農業爲主的東布羅伊森之間，占着支配漢堡，盧卑格和不來梅等商港的地位。在一七三七年，哈諾威的哥敦堅開始設立了一間大學。在十八世紀的後半期，這間哥敦堅大學遂同哈勒大學，勒不士格大學成爲德意志中最有勢力的大學。當時哥敦堅大學，乃德意志中最新的大學，且因爲在英王領土

中，所以極有自由主義的色彩。這間大學最初的校長Gerlach Von Münchhausen特別獎勵政治和歷史等科學，招聘多數有名的教授。這間大學不僅收容德意志的學生，還收容多數英國學生。所以這間大學受英國的影響是很大的。對於各學生的教導，多根據英國式的自由思想。如後來成爲德意志中有名的自由主義政治家的哈爾廷伯西，普萊爾鳳斯丹和很力鼓吹亞丹斯密斯學說的薩杜露絲(Gottfried Sartorius)，克拉士(Christian Jacob Kraus)，胡佛蘭，呂達等等，都是此校出身的學生。這間大學，因爲養出多數政治家，所以貢獻德意志社會以實際政治之處很多。又因爲這些學生中，多數從事於教育和過着筆墨的生涯，所以在思想方面的影響也很大。并且當時布羅伊森政府所採的自由主義的政策，正和此大學所注重的自由主義相同，所以也很歡迎此大學的出身者。

亞丹斯密斯的「富國論」(Wealth of Nations 1776)，在一七七六年的時候，由住在倫敦的德人西拉翻譯爲「Untersuchungen der Natur und Ursachen von Nationalreichthümern」(I. Bd. 1776. II. Bd. 1778 Leipzig)而出版。翌年即一七七七年的三月十日，哥敦堅大學哲學教授佛達(G. H. Fetter)嘗在「哥敦堅學報」(Göttingische Gelehrte Anzeigen)上做很同情的批評。佛達教授認此書爲一本古典的名著，雖特別稱獎其透澈的政治哲學和多數歷史的事實，但尤特別舉示出斯密斯對James Denham Steuart之反對和對非約克拉特之同情的態度。然而斯密斯之自然的自由制度學說雖給與他

以這麼多的印象，但是他却毫無採用此制度的決心。他是反對自由競爭的一人。換句話說，這種批評不外是表示出他對斯密這本書的充分知識和其同情心而已，至對於斯密的主義，在關於普遍性這一點上，却抱着無限懷疑。此種批評，因為乃由哥敦堅大學發表，所以很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對當時官房學者底經濟學以一種衝動。當時社會一般對於「富國論」的批評，總括起來，約分為二：一為「一般德意志文獻」(Allgemeine deutsche Bibliothek herausgegeben von Nicholai 1777: 1779)上之批評，一為「人類誌」(Ephemeride der Menschheit von Isaak Iselin)上之批評。這些批評家，同是具有非約克拉特的意見的，要把斯密的意見和他們的意見結合為一致。

「一般德意志文獻」中之批評家，雖始終未嘗一次使用過非約克拉特的述語，然他們之言論，頗有和非約克拉特一致之傾向。反之伊沙林(Isaak Iselin)却用熟練的方法而引用斯密底學說，主張把此學說來擴大非約克拉特底學說。但到了一七九四年之二十年間，斯密底著作，很被德意志一般人所輕視。這因為當時的布羅伊森，完全被官房主義經濟思想所支配，至於法蘭西革命和開始發生的經濟的變化，還未喚起一般經濟學者的注意。因而在此時期，官房學者對於非約克拉特和斯密底學說，差不多沒有提及，沒有理解他們的地位。可是一七九二年，薩杜露絲嘗在「哥敦堅學報」上，關於斯密這本「富國論」的第三版，僅做過一次的批評。如後面所說，薩杜露絲不但是很能理解斯密學



說的一人，還很能理解斯密斯的地位。他認定「富國論」決不如一般書買僅據銷路不展而判斷其將來的地位，他以為該書對於經濟界的思想，終必有占着決定地位的一天。這就是說，這本書在最初所以極少被購讀的原因，乃因為這本書不如一般普通教科書中所敘述的舊的理論容易使人理解，它是一本用新的非常的努力和思索來建設的大著，所以不易理解，要完全理解，必須費長久的時間，無久這種新學說自必戰勝世間一般舊的東西。這本書，在一七九四年夏由嘉爾夫（Christian Garve）從新着手翻譯公表，并在「哥敦堅學報」上發表新譯的批判。這次的譯本，自一七九四年發行第一版以後，於十餘年之中間（一八一〇）竟達到三版之多。

#### 四

嘉爾夫雖然不是哥敦堅大學的教授，然而他對於斯密斯學說的普及，其貢獻很大。他是通俗的哲學者，在德意志，以介紹蘇格蘭之哲學為主要工作。他在還未介紹「富國論」以前，已陸續介紹了蘇格蘭諸哲人的著作——尤其是佛克生（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1772）和卜克（Edmund Burke），麥克佛靈等之著作，他靠西拉底翻譯，才開始認識斯密斯。因感覺西拉底譯本不甚妥當，才使他從新着手翻譯。他在一七九一年開始着手翻譯，同年末譯完第一卷的前半，所殘餘的部分，乃由勒不士格一官

史德靈 (Oberpost Commissär Dürrien) 翻譯。他最初的企圖，雖擬附加一篇附錄，說明對於斯密斯經濟學的新且真實的貢獻之思想并原理的概要，可是這種企圖終不成事實而中止了。但他在此譯本中却附加詳細的註解。

要知道嘉爾夫底思想，應參考下面之著作：

「論文集」(Vermischte Aufsätze 1796)

「關於農民之性質并地主政府之關係」(Über der Charakter der Bauern und ihr Verhältnis gegen die Gutsherrn und gegen die Regierung 1786)

「小都市衰亡研究斷片——其原因并救濟手段」(Brückstücke zu der Untersuchung über der Verfall der kleinen Städte, dessen Ursachen und die Mittel ihn zu abhelfen)

我們在這些論文中，是極不易找出嘉爾夫受斯密斯影響的事情的。他本來便是通俗的哲學者，批評家和翻譯家，所以他底興味，多屬於哲學及文學方面。因而他對於斯密斯的興味，當然也不外是被蘇格蘭之哲學者喚起的。并且他之翻譯「富國論」，乃屬他餘暇中的工作，是他希望得到旅行費用的手段。他底經濟思想，不過稍較腓力二世時代的官房主義思想進步一點，較為自由主義化一點罷了。

他在那本國王的傳記中，祇是自己贊美自己的經濟政策而已。

他對於改良農業狀態的政策，祇訴諸地主底溫情。他說，倘使地主階級受更善之教育，不委任其所有地的管理權于其代理者，乃直接為之管理，則土地所有權當沒有意外的危險，漸次可以改良農業的狀態。又說，一般農民，因其知能的幼稚和貧困，所以必須避免急激的改良。他底研究法，顯然是歷史的研究法。所以他關於德意志中小都市之勃興并滅亡的法則，也可說為依着歷史的研究法而研究德意志社會制度的變化。可能時他都極力避免基于一個原理的法則化。他對於一般的問題不生興味，對於特殊的問題才生興味，尤其是在研究實際問題的時候，非常努力避免一般論。而他對於斯密之態度也不出此態度之外，這是一種特徵。

在德意志，把斯密底學說作為獨立的著作而解說的為薩杜露絲。他底「國家經濟學概論」(Handbuch der Staatswirtschaft, zum Gebrauche bey akademischen Vorlesungen, nach Adam Smiths Grundsätzen ausgearbeitet, Berlin 1796)，便是這種解說的代表著作。薩杜露絲一七六五年生于角沙爾，一八二八年歿于哥敦堅。他純粹是哥敦堅大學所養成的人才，所以他終身的生涯，都奉公于此大學。由一七八三年至一七八八年，在此大學中研究，由一七八六年至一七九四年之中間，在此大學圖書館中担任各種職務，一七九六年為家庭講師，一七九七年當大學助教，一八〇二年才任為正式教授。他一生著作很多，尤以「漢薩同盟史」(Die Geschichte des Hanseatischen Bundes, 1802—1808)

這本書爲歷史上最著名的著作。嘗任過哥敦堅大學教授而且有名的評論斯密斯底著作佛達底弟子薩杜露絲，他之研究斯密斯的刺激，恐怕就是由佛達得來的罷。本來他是歷史的教授，但在一七九二年的時候，却轉任經濟學原理科講師（自然，他所編述的講義，是以斯密斯底學說爲基本的）。因爲他自己相信他對於斯密斯之經濟生活的分析是最正確而且真實，所以他感覺得爲廣使此真理普及全德意志起見，必須作成斯密斯學說要領一書。并且在德意志，舊時代的制度急激地破壞於始，必須以斯密斯學說爲社會建設的指南針，這便是預作此要領書的根據。據他說，那本「國家經濟學概論」，乃對於學生講演的結果，完全依斯密斯學說而編成的。此書分爲二部。第一部乃論國民繁榮的諸要素，相當於「富國論」之第一篇及第二篇。第二部乃論國家經濟，相當於「富國論」之第四篇及第五篇。這種分類方法，對於德意志經濟學文獻，開始提供出經濟學原理和經濟政策的區別。自然，薩杜露絲在寫着此書的時候，並不是個別地詳細地完全解說斯密斯的學說的，他在某方面，還對於斯密斯關於大陸歷史事實的誤解加以訂正，對其中矛盾的地方也加以訂正，可是他對於斯密斯學說中重要的部分，皆無條件地承認之。此後經過了十年之久，薩杜露絲重行解說斯密斯的學說。其所著如左：

「斯密斯之富國諸要素并國家經濟」（Von den Elementen des National-reichtums, und von der Staatswirtschaft nach Adam Smith zum Gebrauche bey akademischen Vorlesungen und beym

Privat-studio ausgearbeitet Göttingen 1806)

「關於富國的要素并國家經濟的論文」(Abhandlungen, die Elemente des Nationalreichthums und die Staatswirtschaft belleffend. Th. I. 1806)

此二本書，皆很充分地解說斯密斯底著作。而後者却在解說斯密斯經濟學說中再加上表白出他自身之思想。這本書乃四篇論文所組成的，個別地處置斯密斯之勞働價值說。比如勞働價值和國富之增加之關係，國富和私人富之間之差異和勞働價值之關係等等皆屬之。在第一篇論文中，很明白地表示他受了拉德達爾(Earle Lauderdale,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Public Wealth and into the Means and Causes of its Increase. 1804)之影響。斯密斯底勞働價值說，一部分是不明瞭的，一部分又是不完全的。據斯密斯，價值第一的根源為其使用。價值乃依生產費及和他物相交換之比率而決定的。至于價格，因為不能確保着為貨幣價值標準之不變性，故很受多種勢力之支配。同樣地，勞働價值之決定也因為受着勞働的有用性，生產費以及和他物交換比率所支配，故貨幣及穀物，皆不是價值不變的標準，而薩杜露絲之所以認此種勞働價值說為不充分者，其原因也就在乎此。在薩杜露絲第二篇論文中，他論述為國富增進策之節約，為斯密斯做辯護。因為拉德達爾不贊成節約論，以為祇靠土地勞働和資本之生產力已足增進國家的財富，而反對斯密斯之個人節約為使生產力增

進可能的主張。第四篇論文，乃採着斯密斯之個人利益爲增進公之利益的命題，并給與一種嚴密的批評。他以爲自由競爭的結果，大經營雖可得增加與繁榮，但在中小經營方面，所得的僅不過是一種害惡。并以爲土地之自由處分，也決不是可喜的政策；至于國際間自由的貿易，也有大國抑壓小國之傾向。所以他對於斯密斯之自由主義，畢竟懷着多少疑問。可是他却毫無投降到反對斯密斯學說的重商主義之存心。他底立場，原是處在此極端保護制度和自由制度之中間的。

## 五

爲解說亞丹斯密斯學說之第三種著作的，便是呂達（August Ferdinand Lüdér）底「亞丹斯密斯之國民產業并國家經濟論」[Über Nationalindustrie und Staatswirtschaft nach Adam Smith bearbeitet 2 Bde, Berlin 1800]。呂達底研究，最初是統計學——地理學的統計學。他在這方面的著作，有「歷史集錄」(Historische Portefeuille 1787—1805)和「歷史，國家學及政治學粹」(Repositoryum für Geschichte, Staatskunde und Politik 1802—1805)這二本傑作。在寫着這二本傑作的時候，因爲必須參考外國文獻，所以遂開始和斯密斯底著作相接近。第三本著作爲「國民的產業與其作用——講義用綱領」(Über Nationalindustrie und ihre Wirkung, ein Grundriss zur Vorlesungen 1808)，和上揭二書

內容略同。其次如一八一二年的「統計學批判」(Kritik der Statistik, eine Begründung einer Pöf-ischen Philosophie)和一八一七年的「統計學批判史」(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Statistik 1817)這二本著作。可是在這二書中，却示出他對於國民行動的統計的分析之無益的事情。他底著作，其中一部分是「富國論」的解釋，他部分是建設廣大的經濟學的體系，他在序文中嘗對於斯密斯表示非常的敬意，并指摘出德意志雖有無數關於斯密斯經濟學的翻譯，但受其影響却很稀少的事情。不消說，斯密斯著作之不易了解，當然也是妨害他底思想普及的一大原因。并且他自身底辭句，記述和議論，也很模糊多歧，令人難于了解他之思想。他在該書第一篇中乃論述分業，第二篇論述資本，第三篇論述自然。前二篇的構成材料，多屬引用斯密斯的述語，在他自己祇附加若干地理學統計學上的實例而已。至于第三篇，才是完全屬於他自己的材料的。這一篇關於資本集積之自然條件的效果和內外市場發達的自然條件這二者的論述，確是示出他底地理學知識的豐富。他嘗舉出歐羅巴諸國中少有如布羅伊森這樣富于河川和多瑙河航行不便的事情。最後之三篇，對於國家及國家經濟之目的，其論述較斯密斯尤為詳細。在此三篇中，他特別說及保護國家唯一職分之社會安寧的方法，舉出社會之安寧被支配者并國民自身之行動所妨害的事情。他也是熱心于自由思想的一人，他不僅主張經濟生活的自由，還主張社會生活各方面的自由，因而他以爲國家的目的祇是保護國民之安全和權利。他還由此自由見地的

立場痛烈地喊出奴隸制度的害惡。所以這本著作，不僅具有經濟的自由之色彩，還暗示着國家并個人的自由之獲得。在此書中，他未嘗說出反對斯密斯的意見，他祇對於斯密斯的言論，附加上新的實例。但這類實例，皆多根據于地理學，極少根據于經濟學者之述語。他所舉出的經濟學者。祇是Busch和J. D. Stewart二者。斯密斯思想之對於他的影響，在他論說國家的政策的時候，拋掉了統計學這事情上，已很充分地表示着了。他以爲斯密斯的信徒對於一民族現象的研究用着統計的方法的事，情決沒有和斯密斯之根本思想的個人的由自相一致的餘地。

呂達底著作，不僅有很豐富的知識，而且有如薩杜露絲對於美國狀態深刻的了解。如上而所說，他又依着歷史地理的知識，以很豐富的實例，來說明斯密斯的學說。他雖受了法蘭西革命的影響，是熱心的斯密斯的學究，然却不是如像斯密斯一樣的樂觀主義者。

## 六

在德意志，最初介紹斯密斯學說的人，除上述各名家之外，此中還有一重要的經濟學者克拉士其人。克拉士一七五三年生于Ostfode，一八〇七年歿於哥尼斯堡，其時年五十四。他自一七七七年至一七七九年之中間，嘗肄業於哥尼斯堡大學。無久他一面當任家庭教師，一面來往於哥敦大學。



他在哥尼斯堡大學時，常常出席康德的講壇，這後來任該大學教職的時候，他們的見解雖然懸殊，然而却結着魚水的交情。在一七八〇年，他得到哈勒大學的博士學位，接着被母校哥尼斯堡招聘爲實踐哲學并官房學的教授，一直到他和世永辭的時候止，仍舊維持此教授的地位。他底著作，雖然被社會一般所佩服，然他底講演對於聽講者之深入的影響，尤增大了他在社會上的聲望。後來普萊爾鳳斯丹第二次內閣的時代，能實施解放農奴的重要政策，全靠他一手養成的 Von Schön、von Schröter 和 Auerwald 等學生底努力，這尤其是令人驚異而且尊敬的事情。哥尼斯堡大學學生時代，即一七七六年的時候，他開始研究英文，於很短的時期中，不僅通曉英語，而且能背唸比利的辭典。無久他開始翻譯 Arthur Young 的「政治算術」(Political Arithmetick)，經過非常的困難了後，於一七七七年才譯完這本書。正因爲感得翻譯的困難，譯後又不能了解，所以他便着手研究經濟學，於是乎漸漸地從此方面得到一種興趣了。他之所以轉學於哥敦堅大學，因爲他覺得這個地方爲觀察英國民衆及其狀態最適當的場所。

當他行將畢業大學的時候，他尤深於統計學和國家經濟學的興味。任哥尼斯堡大學教授的最初，他所演講的課目，不僅限於國家經濟學，希臘古典，歷史，教育和實殘哲學等，有時還詳細地介紹英國詩劇大家 William Shakespear 底作品。但到後來，他底興味，却集中在經濟學方面，於一七九四

年，他底講義，遂以財政政策，經濟政策和商工業論這三科爲主了。這時候他很熱心研究「富國論」，還把其理論編入他底講義中去。後來他接到薩杜露絲所寄贈的「國家經濟學概論」的時候，他嘗對人說，他在六年前，已把斯密斯底真實，偉大，正當和有益的體系編述於其講義中了。他底著作雖不少，然無甚獨創的見解，多係對於斯密斯著作的熱心的讚賞。他對於斯密斯的熱情，同日共加，給各學生以很大的感化，貢獻於布羅伊森的改革甚大。在德意志大學教授中，他底著作分量最少。他很替讀書界擔憂，對其立場也很感不安，而且他覺得有興味的計劃，多數不能完成。他最初的著述，多屬於哲學論文，到後來才發表「運送業論」Über der Frachthandel和「海鹽獨占論」Über das Seesalzmonopol 1786)等書。迨他死後，他底「國家經濟論」Die Staatswirtschaft von christian Jakob Kraus nach dessen Tode, herausgegeben von Hans Auerwald in 5 Bde. 1808-1811)和「論文集」Vermischte Schriften Über Staatswirtschaftliche Philosophische und andere wissenschaftliche Gegenstände 8 Bde. 1808-1819)才能出版。他雖甚少有書出版，但出版的書，其影響則很大。他在哥尼斯堡大學的時候，每當講演，輒逢滿座，除康德外，他是此大學最重要的教授。最有意義的他底著作，祇是前揭之四種，其中解說斯密斯之「富國論」，把英吉利的實例爲布羅伊森底例示，并且從着布羅伊森國家時代的需要，而論述經濟政策的形態。他在這書中，以尊重個人自由意志的斯密斯底意

見爲其基礎。他站在此自由主義的基礎上，解剖當時布羅伊森國家經濟政策，揭出保護獨占政策的害惡，他以爲如排斥此種獨占政策而實施自由企業的時候，一定得到很大的利益。他還由此種立場，敘述封建的農業組織及農奴制度之害惡和損失，更攻擊組合制度的弊端，主張廢除此類制度。但以爲在廢除此類制度的時候，必須賠償既得權的損失。至於他對於斯密斯底理論，例如對於其價值論，雖有多少議論，然大體上皆承認斯密斯底學說。他對於斯密斯的懷疑，較薩呂兩氏尠少。他底興味中心點爲當時的實際問題，要由斯密斯自由貿易的立場而解決此實際問題。當時哥尼斯堡的繁榮，全靠於成爲貿易港而實施自由貿易，所以愈使他無條件地肯定了斯密斯的自由貿易論了。德意志初期之經濟學者中，祇是他一人，才得說爲處在如像斯密斯之於格拉斯哥的地位。

這麼一來，自一八〇八年以後，在德意志，斯密斯的經濟學，遂成爲一般普及的事情了。但其普及化的進行却頗遲慢。自德意志的學者開始注意於斯密斯底著作以來，此中嘗經過了二十五年的日月。比如自薩杜露絲，呂達并克拉士時代起一直至於胡佛蘭，蘇丁，洛切 (Herbann Lohse)，克魯格 (Wilhelm Traugott Krug)，雅古夫 (Ludwig Heinrich Von Jakob)，皆一面承受斯密斯底思想，一面加以若干的變化。在一八〇五年至一八〇八年之間，關於這方面的著作家所發表的文章，皆異口同音的論述被德意志當時的政治上經濟上之急激的變化所惹起的經濟問題。在這時候的短期間中，關於

經濟學上的著作雖然不甚多，然而斯密的學說，已靠着普萊爾爾鳳斯丹，哈爾庭伯西和 Von Schön 等等之活動而適用到政治上了。

## 第五章 對正統學派經濟理論之影響

### 一

德意志經濟思想所受斯密的影響，祇在當時德意志經濟思想界最缺乏的經濟理論方面。這時候，斯密之實踐的要求的自由主義，不但被布羅伊森國家之改革採用其一部分，而且其自由貿易主義，正如後面所述，也很被社會一般學者當爲實踐的要求而聚論。到十九世紀的初葉，斯密思想被介紹輸入後，一般經濟學者，皆向斯密求其經濟理論，且依據於斯密的經濟政策。至於一部分的人，其研究方法雖和他不同，然而結論却未嘗差異。他們的立場有時雖和斯密相背趨，但這場合，也不過是一般的批評而已。他們對於建設獨自理論的能力原來是很缺乏的。例如下面所論述的杜雷（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黑耳曼（Friedrich Benedikt Von Hermeu）和較此二者更甚的涅比紐斯（Karl Friedrich Nebenius）等，皆屬此中之人物。

一八二六年，杜雷才開始公表他底名著「孤立國」（Der Isolierte Staat in Beziehung auf Land。

wirtschaft und Nationalökonomie)。這書之第一篇，乃論述穀價，土地之肥瘠及費用對農業的影響，第二篇講說適當的工銀和其利率并地租之自然關係，第三篇乃研究決定地租的原理。杜甯對於科學的貢獻，特別是工銀并地租理論的構成。歷史學派經濟學者領袖的羅西亞，他曾說過，杜甯爲德意志經濟學者中使用最嚴密的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一人。他底研究法，在「孤立國」中已很顯明地表現着了，純粹是一種抽象的研究法。并且在此種抽象的方法中，我們可以發見和現實的最深的關係。然而他雖然可以把孤立的方法來研究事業家底經驗的事實，但這決不能說爲歸納的研究法。事實上，他雖然同時使用抽象的演繹的方法并歸納的方法，但他對於經濟現象的本質，却擬以假定的抽象的方法來確定之。他嘗區別經濟的現象爲變動的和不變的二要素，擬用數學的方式來決定此不變的要素。所以例如他在說明價格現象的時候，把需要供給的作用，爲現實事實的描寫，這雖屬成功了，可是把價格現象的原理作爲說明的對象，結果其關係必急激地發生變化，因而在其原理中，反不得發見其本質。於是乎便不得不努力除掉那容易變化的要素，保存那恆久不變的要素。這個便是他底經濟學的基礎方法。

採此研究法的杜甯，乃在其所謂「孤立國」中求其研究。然孤立國這個東西，究竟是什麼呢？杜甯嘗假定了一種經濟的領域即可能航行的河川和沒有航路的平野中心的大都市。這個平野，和都市隔離很遠，原是未經開墾的荒地，但其土地的性質，却處處一律，處處適宜於耕作。這個平野，祇有一

個都市。這個都市爲唯一的大都市，供給工業品於各地方，同時各地方也供給生活必需品於這個都市。然處在這樣的假定之下，農業的狀態又是怎樣呢？這乃由於農業所受各地和都市二者間距離之程度而斷定的問題。在被這種單純化的基礎之下，杜甯的結論是：無論怎樣的經濟組織，對於其他，沒有什麼絕對的利益，祇有相對的利益。什麼呢？因爲處在此假定之下，對於經營組織的選擇，所成爲問題的唯一之要素，不外是交通費的緣故。中心地的都市，雖是一種集中的領域，然和中心地的都市之距離愈遠，則愈需要經營方法的擴大。和都市之距離如增加，則交通的費用也必增加，因之距離的增加，便是穀價增加的意義。

在此一點，杜甯底言論，使我們想起李嘉圖的偉大。自然，在這時候，杜甯雖未嘗知道李嘉圖，然由地位之優劣而述說地租發生的原理這一點，確是理論經濟學的貢獻。這場合，他又承認土地收穫遞減的法則。其次如自然工銀及利率的問題，也屬他研究的範圍。此場合，他把普通一般勞働者所領得的僅少的工銀是否屬於自然的抑搾取的問題爲研究的中心。因爲這些少的工銀，在資本家及地主所取得勞働生產物中之大部分的事情裏面，自有其最大的原因在。這樣，這個問題，便成爲勞働者資本家和地主間自然地分配勞働生產物之方法如何的問題。於是乎他對於當時繼續發生的勞働者階級底命運，費盡一生的思慮。

關於此種道德的重大問題之他底意見，我們只看「孤立國」中「勞働者之命運」的第一章，便很能明白了。

在杜甯，他不但不能滿足斯密斯之關於工銀高低的說明，而且不能滿足以此說明為基礎而立論的李嘉圖和西依之議論，因為他不僅限於事實的敘述，他還要做公正的說明。他嘗用一種方式來解說自然工銀。這個方式是：

勞働者欲求X生產物價值——(2/A)

他非常尊重這個方式，迨他將死時，還要求把此方式刻在墓石上面。他底真正目的原是處在正統派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經濟學之中間，是正統社會兩派學說之綜合。這場合，他原是處在要究明事實真相之認識的努力和要改良現狀之倫理的感情之下而作用的。這一點，便是他不能滿足正統派之現實說明的原因。他說，倘此勞働者對於現實的事實感覺不平不滿的時候，那麼這種現實的法則，當然沒有什麼安慰這種不平不滿的能力了。所以他便樹立起以理性為基礎的合理的法則而反對正統派之對於現實的法則。他又說，倘如沒有此種用意，則關於勞動生產物分配的鬥爭，必波及於全個歐羅巴，全個歐羅巴必變為野蠻流血之巷。可惜到了今日，這個問題仍不受一般人所歡迎，這真是一種遺憾的事。可是杜甯底學說，在經濟學中，却引起多方面的反響，後世的學史家，仍承認其為德意志中用科



學方法來處置勞働問題的最初的學者。

然而杜甯也不是樂觀主義者，他乃站在馬爾薩斯人口法則的基礎上。他嘗說：「平和生安甯，安甯生過剩人口，過剩人口生貧困。」并且他主張在勞働者生產力的增加時，應該實施勞働狀態的改良。據他，在勞働之價值，勞働者之需要和其生活手段之間，存有鐵鎖般的連絡。然在正統派經濟學者，却僅認此中其後二者之關係，而不認有三者之連絡。所以正統派經濟學者對於勞働階級，祇放任其命運。這一點，杜甯認為是一種認識的不足。在勞働生產力增進時，應該確實地改善勞働者的狀態。

上面之所論，乃是杜甯根本的立場和其研究的中點。可惜像討論這樣重要問題的一本名著「孤立國」，在其出版的當時，還未嘗喚起多大的注意。然而他底真價值，到了二十世紀的今日，已被德意志理論的經濟學之需要所明證了。他底嚴密實驗的方法，已被一般所採用，尤其是埃靈堡 (Richard Ehrenberg)，他嘗發行一種「杜甯年報」，以需研究這種方法。

## 二

黑耳曼可說為德意志的李嘉圖。他雖也深受斯密斯學派的影響，然却用自己獨創的方法，增築斯密斯的學說而完成之。黑耳曼不僅是經濟學者中優秀的思想家，并且是拜埃倫統計局的局長，對人口

統計的貢獻極其顯著。他底經濟學的見解，已表現在一八三二年所發行的「國家經濟的研究」(Statistisch-wirtschaftliche Untersuchungen)中了。這本書的第二次增訂改版，乃在著者死後的一八七〇年，復由買亞及佛爾費列西出版。可是黑耳曼底經濟學說最完滿的不是這種改訂版，乃是其初版。因為這改訂增補版，祇是第一篇的印刷，才是在著者生前完成的。

黑耳曼底根本觀念，多數雖和經濟的自由主義相一致，然在他方面，其根本原理，却受反自由主義的思想之影響。他素來已經極力反對一般學者把經濟的根本動力解說為自私自利。他反對此種誤解的言論，在其主著第二版中尤為明確。這場合，他極力主張各種經濟現象中所表現的道德要素之重要性。這就是主張用經濟生活中之愛，宗教，公共心，科學，以及藝術範圍中之自由生產力來抑制自私自利的心理，使此心理從屬於更高尚的目的，據着道德的要素，使其令人信賴，使容易為經濟的共同作用，并使之強固起來。倘不這樣，則全經濟永久的繁榮是不可能的。并且他在其主著第一版中，已經區別了為理論的部分之經濟學和經濟的設施——經濟的警察學。而後者乃指着全經濟之目的即對於人民一切欲望最大量的製出上所必要的作用之全體而言。為全體幸福之原動力之自利的排斥，在當時德意志的經濟學界，這決不是什麼新的傾向。像這樣的見解，本是當時多數經濟思想家共同的見解。不過黑耳曼底態度却有點不同，因為他對於斯密斯并其追從者之學說，并非斷片地批判，乃是超出批

評之外，據體系的并獨創的方法而從事此學說之擴大。他對於經濟學對象的決定，雖不是站在什麼新的立場，然他却很詳細地周密地處置經濟技術的問題。

黑耳曼在多數地方，嘗擴大了經濟的理論。在生產論方面，猶很嚴密地分別了由技術方面出發或由經濟方面出發的事情。經濟這個東西，可以由個人之見地而觀察，也可以由全體之見地而觀察。由個人之立場看來，倘可以償還生產物所消費的費用，則一行爲便是生產的。由全體之立場看來，一切行爲，如對於全體有需要，則這種行爲也便是生產的。并且他還主張一切生產物，皆應應於需要而生產；凡是能夠償還生產費用之勞務，皆是經濟的生產的，這都是和斯密斯各趨極端的立論。就對於資本及利息的學說，在許多地方，他也有獨創的見解。尤其是他底利息說，影響於後代者非常之大。自然，他雖也是主張效用說者之一，然如利息學的歷史家 Eugen Von Böhm-Bawerk 所說，他對其學說的研究是很周到而詳細的。同樣地，他對其利潤論，也是無細不穿的。便是對於資本論，也主張不必要有物質的性質，例如主張精練的才能即非物質的資本的存在。

上面所述，雖屬於黑耳曼獨創的見解，然此中之最特殊者尤其是他底價格的理論。他反對各先輩的言論，排斥一般把價格歸於費用或需要供給這樣單一的原因的論者。他把價格的要素分析得很有秩序，用這樣的經驗的方法，來舉出決定價格的各種原因。所謂決定價值之諸原因，便是在賣者方面爲

財之生產費，財之其他方法的購買價值，價格所表現的諸財之交換價值；反之在需要者方面爲欲望對象之財之使用價值，需要者之支付能力，被欲望所驅使而獲得財之其他方法的費用等等便是。黑耳曼在決定價格的時候，很說費用做着根本的任務。并且以爲即使是正當地或任意地由市場所得來的財，而價格也決不如李嘉圖派所說一樣，祇受費用所決定的。價格第一最重要的要素，當是一切場合的需要。需要的主要淵源，便是財之使用價值和買主之支付能力。他這樣批評一般人用二三標語不能說明價格現象的見解，完全是一種新的獨自的途徑。他說：「欲望增加，則照從來的價格不能充足，所以價格當然昂騰。這樣，生產費也不得不增加。這時候，倘從市場方面得到必要以上的多數財帛，倘如費用決定價格，則費用就能抑制價格之跌落。然而此種整個的運動，明白地乃由費用而起的。無論欲望減退不減退，最早已不能維持從來之價格了。在市場上，能維持從來之價格的，僅不過是少量的商品。尤其是高價的東西，這時已非一般的需要。因而不得不減少被費用所決定的價格。這場合，我們能說費用支配價格的話嗎？」

至於黑耳曼底勞働工銀論，同樣地，也是影響於後代很大的。在他還在繼續研究勞働工銀論的時候，正是以英吉利爲發祥地的勞銀基金論全盛的時代。他是反對此學說最初的一人。他排斥一般主張由資本支付勞銀的見解。這裏我們雖不考究他底排斥的理由，但企業家有時即不消費全勞働，而在其

生產物的價格中，也計算全勞働的費用而販賣，這件事實，已足證明這種學說之不正確了。在企業家方面，他們支給勞働者的工銀，原來便是使消費者負擔的。企業者僅不過是靠運用其資本而介在消費者與勞働者之中間的。這種見解，不僅給與布靈達諾（Lujo Brentano）底勞銀學說以相當的影響，還在某種意義上，給自由主義社會政策的傾向以理論的基礎。并且他在勞働組合之行動方面，還打破一般發見改良勞働者生活狀態適當手段的人們底理論的障害，克服英吉利學派悲觀的見解之根本的基礎。

黑耳曼底所得本質論也很重要。他底所得論，影響後世者也極大。他底所得論和其生產并生產力論有密切關係。他在此種學說中，也反對斯密斯，排斥技術的要素而主張經濟的并社會的要素。斯密斯對於一般所得并國民所得的見地便是純私經濟的見地。據此種所得觀的概念，這所得便是一國家中每年對於勞働收益費用以上的剩餘；純物質的富尚演着重大的任務。反之黑耳曼對於此問題却主重人格。他以一切所需要而能償還費用的勤勞爲經濟財。這場合，決定的東西便是欲望之充足。他靠此見解而形成所得之概念。他認所得并不是減少一個人之財產，乃是欲望充足上所能用的經濟財之總額。據此，則企業可以得到純收益。可是他却未嘗區別了總所得和純所得這二種事情。何以故呢，因爲由人格的見地方面看來，祇存有純所得。對於此種事實的論說，在黑耳曼以前雖已經存在了，但明確地指出所得不是純收益，所得的本質和欲望之充足有關係的學者，恐怕祇始於黑耳曼吧。

這麼一來，黑耳曼的見解，其重要性還超過斯密斯，西依，李嘉圖等之上。這雖然不是指着他底經濟理論而言，祇是指着他底倫理的基礎，國家及社會之一般的見解而言的，所以處在經濟的自由主義反對地位的里思特說：「恐怕他在經濟生活中最初已充分地意識此倫理的要素而受理此要素了。因而後來每當研究時，輒顧慮及此種要素。」可是黑耳曼在經濟學史上所處的特殊地位，并非存乎這一點。像這樣的事情，在黑耳曼以前，已有多數經濟思想家做過了。他底意義，實是在於把尖銳的解剖來說明重要的經濟的現實。在此一點，他可比李嘉圖，其觀點既受正統派的影響，而其出發點復自乎個人主義，這是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事情。

## 三

黑耳曼底業績，雖在乎其概念的構成和體系的組織，而黑耳曼同時代的涅比紐斯之所以有意義，却在乎經濟問題的詳論。涅比紐斯之著作，如一八一八年出版的「英吉利狀態論」(Bemerkungen über den Zustand Grossbritanniens in staatswissenschaftlicher Hinsicht)、「公的信用論」(Der öffentliche Kredit, dargestellt in der Geschichte und in den Folgen der Finanzoperationen der grossen europäischen Staaten seit Herstellung des allgemeinen Land- und Seefriedens, ihrer Massregeln

zur Begründung und Befestigung öffentlicher Kreditanstalten und der Begebenheiten der Handelswelt, deren Wirkung damit Gussammengetroffen. 1820) 和「德意志關稅同盟」(der deutsche Zollverein. Sein System und sein Zukunft. 1835) 等皆爲名書。尤其是「公的信用論」，可說爲德意志經濟學中最優良的傑作(Monograph)。涅比紐斯是當時巴敦政治經濟財政改革局的高級官吏，他雖然主唱和德意志結着關稅同盟，然而他底經濟學理論，却完全立在自由主義基礎之上。自然，他雖也往往對於斯密及西依的學說採着批評的態度，但遠不如黑耳曼之深刻。他在政治上所處的立場，正和一般政治家一樣，乃以爲影響於一國經濟的要素屬多數的相對主義之立場。所以他很熱心研究國憲，立法和行政的組織對於國家狀態的影響。可是像這樣的研究，要根本究明原因結果的關係是很困難的。不過在黑耳曼各名著還未出版以前，他已經從生產費和需要方面說明價格，指出經濟現象有多數原因和其互相間之作用了。

涅比紐斯之違反經濟的自由主義，在經濟政策方面較理論方面爲甚。這一點，他底意見很和里思特接近。自然，兩者間對於關稅同盟說固然懸殊，這已是里思特所承認。涅比紐斯在「英吉利狀態論」中說，經濟的自由主義已顛覆了重商主義的根底，廣大的國民間之交通，通商的自由，已確保了一切國民間各勢力之自然的發展，領導其達到幸福的最高層。同時他覺得對外國之競爭，必使工業的

存立陷入危險的狀態，所以又主張在此競爭中設立一定的界限。關於這一點，他還指摘出英德二國間完全相異的事情。其中他尤害怕在拿破崙封鎖大陸時所成立的德意志工業冒險和資本勢力巨大的，技術優秀的英吉利工業的競爭。他說：『這裏不能說自由貿易的話。要使事物恢復自然的狀態，必須破壞多數工業的設施。』總之，他在這本書中的敘述，完全主張德意志國內的自由通商以及全德意志市場組織之利益。這樣，我們便不難看出涅比紐斯接近于里思特的意見了。

在一八一八年的時候，涅比紐斯嘗將形成德意志關稅同盟的詳細計劃，發送于德意志之代表的人物和各團體，然這件事情，遂惹起後代學界中的爭論。這就是當時一部份的人，認此計劃為涅比紐斯所設定，而他一部份的人，則認為里思特所設定。然而羅西亞却以為此事情之真理乃在乎二者之間。他說：『關於這樣的事項，如能說有其發明者的話，那麼我可以相信，德意志關稅同盟的真發明者則為巴敦政治家涅比紐斯，而使德意志全國民衆表同情于此種計劃的則為里思特。』

涅比紐斯之新貢獻，適與黑耳曼相反，經濟政策方面較理論方面為多，這也是其環境所使然。因為他本身是官吏，是政治家，所以必須和實踐方面有密切的關係。我們只一讀他底「公的信用論」便能明白了。

杜雷，黑耳曼和涅比紐斯這三個人，其學說中雖有反對經濟的自由主義的地方，但畢竟不失其為



當時德意志三大經濟的自由主義者之資格。總而說之，他們底意義皆不外乎用自家獨創的方法，而增築改造那由英吉利傳來的經濟思想。在此意義上，便可以說，他們皆是德意志中介紹斯密斯學說者之最有意義的承繼者。他們不僅只批評斯密斯底學說，還了解有加上新的理論的必要。

#### 四

和上面所述諸家處在稍異的地位者為拉烏。拉烏在一方面雖也是經濟的自由主義之支持者，然在他方面却很有十八世紀官房主義的色彩。他不僅處在大學教授的地位，而且他底著述，還給與當時南部德意志以顯著的影響。他底「經濟學教科書」(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和「經濟學原理」(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pflege 1826)，在他生前，已重印到八版之多，而其「經濟政策原理」(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pflege 1828)和「財政學原理」(Grundsätze der Finanzwissenschaft 1832 U. 1837)，也有五版的生命。

上面已經說過，德意志的經濟學，嘗浸潤國家的觀念，換句話說，便是多在「警察學」(Polizei-wissenschaft)名義之下，承受官房主義時代的遺產，而名之為社會的并經濟的生活過程中國家權力干涉下之一切設施。而拉烏便是從舊警察學中抽出此經濟的設施，從國民經濟狀態之國家目的和經濟法

則之結合中抽出此經濟的設施而包括在經濟政策名稱之下，使此問題成爲德意志經濟學獨立的範圍。

拉烏對於經濟學的貢獻，其一部分，乃在杜甯及黑耳曼以前。在他關於組合制度的著作（Über das Zuftwesen und die Folgen seiner Aufhebung Zuerst veroffent icht im Hanoverschen Magazin Jahrgang 1815 和關於 Kameralwissenschaft 的著作（Grundriss der Kameralwissenschaft und Wirtschaftslehre für enzyklopädische Vorlesungen. 1823）中，受斯密斯底影響尙少，迨後半期的著作，才顯然地現出斯密斯影響的地方。總之，拉烏之立場，可說爲處在官房主義和古典經濟學二者影響之中間的。拉烏所以處在這種立場，因爲要和被他所影響的南部德意志之狀態相一致。上面曾經說過，南部德意志比較北德意志少傾于自由主義的趨向。如羅西亞所說，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四八年之間，拉烏既是南部德意志中產階級之代表的經濟學者，那麼他受着自由主義和官房主義兩者的影響，這是人人所不容疑義的事情了。

拉烏底理論的貢獻。乃在他闡明國民經濟的資本概念和私經濟的資本概念之區別。自然，關於此種資本概念的區別，拉烏必不是最初的一人。最初闡明此區別者却爲羅特比杜斯（Johann Karl Rodbertus 1805-1875）由經濟政策方面說，他完全脫離經濟的自由主義的思想。這事情，表現在他一八四七年的演講中（Über Beschränkungen der Freiheit in der Volkswirtschaftspflege）。

拉烏在一八一九年的時候，已經翻譯俄國經濟學者斯杜西（H. Storch. Handbuch der Nationalwirtschaftslehre）在四年前所著的那本書了。斯杜西雖然由斯密斯經濟學底影響而出發，然而他對於斯密斯經濟學的態度，却完全是獨立的批評的。這事情，既已表現在一八二五年他所著的「國民所得本質論」（Betrachtung über die Natur des Nationaleinkommens）中了。在此書中，他對於國民所得的概念，非常攻擊西依。這場合，斯杜西極力主張非物質的成果，勤勞和國民所得之構成部分。并且力說能任意的，受支付的，對全體不給與損害的各種勞働皆屬於生產的事情。而且他還嚴密地分別了私的所得和國民所得。

在德意志中，古典經濟學的代表者，其數固然極多，但對於重要的問題，却多採着批評的態度。所以我們這裏不必要詳細地記述其貢獻，祇舉出幾個被視為代表者如左：

愛什靈（F. G. Eiselen, Grundzüge der Staatswirtschaft oder der freien Volkswirtschaft. 1818.

Die Lehre von der Volkswirtschaft. 1843）在一八四三年發行的著作中，論着德意志國民經濟之發展的諸階段，但多受里恩特之影響。

伯老（A. F. Bülow. Handbuch der Staatswirtschaftslehre. 1835. Der Staat und die Industrie.

1834）對於國家，乃採着經濟的自由主義之拒否的態度。

較上述二者更爲獨創的者便是 J. Schön (Neue Untersuchungen der Nationalökonomie oder der natürlichen Volkswirtschaftsordnung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r Statistik und Zivilisation 1833)。  
Schön 素來已代表史的有機的觀察。區別了孤立的經濟，集合經濟，國家社會的經濟，而站在純粹集合經濟方面，主張自利爲經濟行爲之絕對的原動力。在國家方面，則實行爲共同利害即共同精神之法律及權力，於一方爲私的行動之要求，於他方爲其限制之要求。這樣，一般的最善和純私的幸福之區別便告成立了，國家之富和私人之富的區別也告成立了。在他方面，他又屬於斯密斯及李嘉圖所代表的思想範圍中。這就是他以爲經濟學乃關於市民的行動并政府的行動之自然的法則，國家的經濟設施爲調停個人間鬥爭上所必要的。Schön 也和此時代多數經濟學者一樣，乃屬過渡期的。

李德爾(A. F. Riedel, Nationalökonomie oder Volkswirtschaft. 1838-1842) 在這時代雖把最有秩序的經濟學的文獻附在其著作的第三卷中，但這個祇是其外形的貢獻。至他關於和經濟并國民經濟之本質及其互相間之關係的敘述，在他不是經濟的自由主義者這一點上，已經明白地表現出來了。

## 第六章 德意志曼切斯達學派

### 一

亞丹斯密斯底經濟的自由主義和其理論經濟學被輸入德意志的經緯，已經詳細地說過了。立在這樣的根本思想上的德意志經濟思想，現在遂轉化為實踐的要求之思想運動了。這種運動，便是自由貿易論之主張。

英吉利為自由貿易的祖國，而德意志則產生保護關稅之最大理論家。此思想上對立的關係，便是記敘英吉利并德意志經濟狀態本質的差異的。廢除穀物關稅運動當時的英吉利，已占着優勢的工業國家的地位，以工業為其存在的利益，要求自由貿易，對少數地主階級頑強的抵抗，行着露骨的鬥爭。

這就是在英吉利，在一八三六年的時候，嘗第一次形成了「反對穀物法同盟」，三年後，又在哥布甸 (Richard Cobden 1804—1865) 和布萊特 (John Bright 1811—1889) 領導之下，從新形成了同樣的同盟會，開始其偉大的鬥爭。結果得到一般為自身利益所驅使的工商業家的參加組織。但此種運動的中

心勢力却在曼切斯達 (Manchester)。所以這種運動的思想，一般稱之為曼切斯達學派。曼切斯達學派原來沒有其特有之思想。它從斯密斯，西依，李嘉圖之思想發展起來，而站在和這些思想密接關係的地位。這種運動，在其淵源中，不是理論的要求，乃是實踐的要求，不注重於經濟現象理論的研究。

然而當時德意志的經濟關係，却完全處在別種狀態。當時的德意志，尚是一個農業的國家，到了一八四六年，即就是英吉利撤廢穀物關稅的那年，德意志的東北部，才覺得他們最好的穀倉為英吉利。這個事實，便是德意志自由貿易主義者領袖佛郎士斯密斯 (John Prince-Smith 1809—1874) 也承認之。這就是說，高價發售農業生產物而購入廉價的工業生產品的事情，原是為德意志全體的利益。因為這個緣故，道時的德意志，遂充滿普遍了以自由貿易為基礎的國際的分業之利益的主張。

在此情形之下，英吉利和德意志商業政策的鬥爭，遂各有其反對的現象。在英吉利，地主為自由通商最激烈的反對者，因為這個乃使他們之地租減少的最大原因。然在德意志，最高唱自由通商者却屬北部并東北部之農業界，因為他們靠着這個，可以得到廉價的鐵製品和紡織品。這種農業界利益的對立，對於英吉利和德意志自由貿易的運動，給與各自不同的特色。

各個經濟集團利益的鬥爭，自一八二〇年起，促進了政黨的組織。而政黨的組織底目的，便是設定關稅的同盟。到了一八四八年，因為布羅伊森也傾向於自由貿易，所以保護關稅的主張，在德意志

關稅同盟中，遂成爲其指導的原理了。所以在這一年，德意志商業政策思想的發展，也遂發生了一大變化。在工業方面，對於關稅政策，大體表示飽滿的態度。使德意志成爲工業國的里思特底綱領，這時完全被實行了。這時決定商業政策狀態目標的要素有二：其一，一八四八年以來，商業的政策，便是高等政策的道具。到了一八六六年，立在公的關心之前景底問題，卽就是表演出德意志政治的指導者底任務的，便是解決布羅伊森或奧地利問題最有力的手段。其二，成爲後代歷史的決定力之要素，便是強力的自由貿易運動的勃興。

這種自由貿易運動，差不多是以一人爲中心的事業。這個人物便是佛郎士斯密斯。佛郎士斯密斯爲英國人，受過學校教育後，嘗工作于倫敦某一大商店及銀行，更歷任議會通信員和記者。其後一八二八年間，他才來到漢堡，任雜誌“Hamburg Reporter”的編輯，從事于經濟的論著之研究。德意志這個商港，這時關於英吉利穀物關稅問題的議論特別繁盛，所以他也便是投在此渦中之一人。他原來是獨學之士。對於他底精神的發展給與決定的影響的爲Jeremy Bentham。他底功利主義，成爲他終身信仰之的了。這樣，無久他便由漢堡來到柏林，以自由貿易的宣傳爲任務。

## 二

德意志自由貿易運動之經濟的根據，已如上述，但其理論的根據，乃以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繼續增大其勢力的亞丹斯密斯底經濟學并爲其發展之古典經濟學爲其基礎的，這是不消說了。然對於自由貿易運動直接提供其理論的人，却是英吉利和佛蘭西之樂觀的自由主義者（曼切斯達學派）——尤其是法蘭西樂觀主義的鼻祖巴思地亞。

樂觀的自由主義者巴思地亞在開始研究經濟學的時候，極熱心參攷西依，康德和杜諾亞（Charles Dunoyer 1786—1862）底著作，而建築起自己的立場。他受着英吉利反對穀物法運動的刺激，始躍進於經濟的論壇。他是這種運動的聲援者，預言自由貿易論，必受世論之支持。所以他一生的工作，也便是對於干涉主義的筆攻。他最偉大的功績，便是和國家保護政策并社會主義的鬥爭，而他之所以主張市民經濟學的權化，其原因也就在乎此。他底著作如「經濟的詭辯」（*Sophismes économiqne* 1845—1848，這書乃集錄和干涉主義論爭時之論文而成的）和「經濟的調和論」（*Les Harmonie économiqne* 1850，這書乃他自己理論基礎的建設）這二本書，皆被譯爲德文。前者乃由佛郎士斯密斯直接全譯，後者乃由 Karl Julius Bergius（1804—1871）選譯爲「巴思地亞經濟及政治選集」而發行。巴思地亞嘗同亞美利加樂觀主義經濟學者加利（Henry Charles Carey 1796—1879）一樣，用很尖銳的方法（并且其一部分的議論，也同加利一樣），反對馬爾薩斯及李嘉圖的學說。這就是他很力反對馬



李二氏悲觀主義的論調，而堅持樂觀主義的主張。

巴思地亞之根本思想如下：

支配經濟的發展的有二個勢力。這二個勢力，便是私利和競爭。這二個勢力，雖然被一般視為有害而非難之，然在其互相共同的作用中，却構成了社會的調和。調和原是不受此二個自然力所妨害的偉大的結果。私利是不能抑制的自然力，一面追求自己之利益，一面產生一般之幸福。能實行自由組織中私利之調和的作用，祇限於私利和自由不受什麼妨害的場合。我們如發見以不調和代調和，那麼這不外是因缺乏了自由，才生出這種現象。

我們底世界中，原來便存在許多害惡的事情。比如社會問題，救貧問題，以及同胞大部分之可悲的狀態，都是存在這個世界裏面的。可是這些現象，決不是由自然必然性所生的。而其存在，也決不是自然法的結果。何以呢？因為這些現象不僅得調和地作用，而且會招來均衡和改善。這就是說，因為這樣，人類才得不斷地向上發展。所以害惡原來便是要妨害社會自然法則之自由作用的人為的國家的組織即國家權力永久的努力之結果。這個無用而且有害的國家權力之干涉在被廢除的時候，必須限定那對於正義顧慮的政府本來之作用。

這固是巴思地亞的根本思想，但同時也是德意志·曼切斯達學派世界觀之基礎。總之，他底內容

便是充滿着沒有證明的教義之調和信仰論；以私利爲人類社會最大的原動力和競爭爲對於祝福進步的貢獻；認此二者即私利和自由競爭爲不能妨害的自然力，不超越這不受妨害的作用和正常的界限時，才能克服社會的害惡等等的議論。所以國家必須爲擁護正義而限定其自身行動之範圍。倘不這樣，則國家不外是破壞調和的罪魁。

然而就在個個的場合，也可以應用這一般的原則的。比如社會問題之解決也存乎自由便是一例。我們固然可以從着資本自身之性質和其所有者之傾向，而成立資本，且使其增加起來。雖然可以增加對全生產力的資本之絕對的分額，但同時必定減少其相對的分額。可是對於勞働者之全生產物的分額，不論是相對的或絕對的，却皆能增加，所以這裏便示出資本家和勞働者利益的一致。

沒有自由，則調和是不可能的。然自由這個東西，不是程度的問題，乃是一個原理。自由便是社會的自然法則之支配。祇出自私利的行爲，即含有經濟行爲自由的意義。而這裏所謂私利，就是由人類組織所發生的不能一般論難的事實。不能如對利己主義一樣下批評的判斷。批評的判斷不是屬於經濟學領域中的東西。在此一點，巴思地亞嘗擬嚴密地分別經濟學和倫理論。所以他由他種動機把被抽象了的人類行動之觀察爲其經濟學方法之原理。經濟學雖然可以視人類爲追求一特定的立場即私利的東西，但不消說，在人類之行動中，也存在他種動機的。比如宗教心，血統愛和性愛，友誼和其他之

同情等等，都是屬於此種動機的。而巴思地亞之說明而要求的這些一切同情的情感，與其說屬於經濟學的領域，不如說屬於道德學的領域。經濟學原來便是處置這自私自利的冷酷的世界之現象的。這就是經濟學有觀察人類組織之法則和由此法則所生的社會關係之唯一的使命。

所謂社會關係，在巴思地亞自己所說的「全國民經濟就是交換一語」的這句話中，已經充分地表自着了。在他，社會關係不是經濟的社會。規定此社會關係的為不可動的自然法。這就是自然的要素決定社會組織。因而否定那對於社會發展之意識的行爲即社會政策之可能性。

### 三

巴思地亞底見解，影響於德意志很大。德意志之曼切斯達學派，便是屬於這一派的。但已如上述，德意志·曼切斯達學派的領袖，却是佛郎士斯密斯。除佛郎士斯密斯外，如像布蘭（K. Braun），密塞利斯（O. Michnelis），V. Bohmert，J. Faucher，威爾特（Max Wirth），愛羅克好斯（A. Emminghaus），蘇塔比亞（A. Soetbeer），靈塞（H. Rentsch）和什切杜列治（F. Schulze-Delitzsch）等，皆也是此學派的分子。這些人，在一八五七年的時候，和其他多數同志，開催「德意志經濟學者會議」，發行其機關雜誌（Vierteljahr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Politik und Kulturgeschichte）。

一八六六年，由靈塞所編纂的經濟學辭典，已簡單地表現出這派人們的見解了。又如自一八六八至一八六九年之中間，由愛拉士 (M. Ellis) 所發行的「國民經濟年報」，也同樣地表現出他們的見解。這些人的論著，皆帶有時事問題的性質，為記者 (Journalist) 的活動者居多數。因而要在他們之間求得體系的論著是很不易的，其多數皆是零碎的出版物。祇是麥克思·威爾特，才能說為佛郎士斯密斯這一派的理論家，有體系的著作出版。

佛郎士斯密斯至其死亡為止，始終為德意志自由主義派領袖而活動。他也和巴思地亞一樣，為原理的利益之調和，自然法，完全的自由等形成他底世界觀之中心。據此世界觀，則自由貿易之要求便不過是自由行動原理的一結果。他又說，祇是堅持此原則的人，才配叫做自由貿易主義者，因為他們依着為自由貿易的鬥爭，才得實踐其學說。而自由的組織，其結果必先釐來滿足的經濟的效果即勞働生產的增加（飽滿的生產），其次實現那使道德要求滿足的社會組織即立脚於正義的社會組織。然而這樣的目的是否達到了，則這場合，個人的行動又是怎麼樣呢？他說：「自由貿易主義者，對於國民經濟幸福的要求，祇曉得一條大道。這條大道，即就是努力要求自己幸福之一切個人底自由。」對於這個要求的手段，各人也很知道。在經濟完全自由支配的場合，各人從着其最善的洞察和力，努力獲得最有利益的東西。

不受拘束的私利的追求，決不是損害他人的意義。這種追求不靠暴力是不可能的。他說：「在自由交易的市場，不論何人，在要求自己利益的時候，同時倘不要求他人之利益，則決沒有要求自己利益的可能。」因而自由貿易理論的特徵，正如他自己所說，不外是「國民經濟的關係之急進的個人主義的見解」。

自由貿易主義者把國民的生計（這種表現乃由他們之私經濟的觀點所出的，普通在經濟學中稱爲國民經濟）看做個別的經濟之併存體。而個別的經濟，乃各自獨立的，各自對其經濟的結果負有責任，對其他個別的經濟，要求同一的自由，同一的不受妨害。國民經濟的組織雖屬多種多樣，然自由貿易論者在其組織中祇看見唯一的機關即市場。國民經濟間互相的關係也是很錯綜的，但自由貿易主義者却專在市場中求其唯一的結合點。倘如了解市場的本質是交換的關係，則當能了解國民經濟生活的本質即社會生活乃由經濟關係而成。例如地域團體是人類的集團，在此集團中，祇是做著分担勞動的多數人共同的生活才有利益。

據他們底見解，經濟關係的成立於一方面又在雇主和勞働者之間。他們對於其他的人們，正如認市場爲唯一的結合點一樣，認這些人爲勞働市場中之契約者即勞働之買主和勞働之賣主。認工銀爲勞働之準備價格，和一切價格相同，乃依存於直接需要供給的關係。

締結契約倘可自由，則一切契約，必定生出正當的價值。便是勞働工銀契約的場合也這樣。倘如有人說，資本家對於缺乏那一天的麵包的勞働者，可以獨裁的決定其勞働的價格，那麼這種見解，是根本的誤謬。事實上，資本家本來是極餘裕的。然而資本家之資本却必須給勞働替他活動的。倘不這樣，資本這個東西，久而久之，必自歸於消滅。所以資本及勞働的兩當事者，皆同一歡迎勞働契約的成立。而決定其價格，也同決定其他價格一樣的原理。因而雇主和勞働者之間，祇不過存在經濟交換的關係。因而佛郎士斯密斯對於社會問題，於是也告了一段落。因而此問題的解決，乃歸於「務須勞働且勤儉」。祇是知此事實而且實行此事實的人，才能夠「經濟的前進」。

佛郎士斯密斯認勞働問題的存在是不能證明的。并且他也承認獲得滿足其欲望的充分的條件的人尚是屬於很少數。可是他也未嘗忘掉勞働者階級應該得到從前所不允許於無產階級生活的享樂費的事實。自然，勞働者階級之貧困，在他是不以為然的。他嘗分別勞働者為有知識的勞働者和無知識的勞働者即參加資本主義的經營之勞働者和屬於此領域之外的勞働者。參加資本主義的經濟的勞働者，既得資本勢力充分的保護，則他們的生活，當然沒有貧困的道理。什麼呢？因為養活他們原是資本家自身之利益。一貧如洗的人們，不得資本家的保護，因而其生產力仍然微弱，仍然處在資本家以前的經濟階段，沒有餘裕參加資本家的經營。可是增加資本和擴大事業決不是難事。這個只要撤廢國家之干

涉，確保經濟運動的自由時就可以實現的。

所以他以為資本主義的生產，其結果并非齋來人類勞働價值的減少或勞働者狀態之惡化。由調和論的教義看來，資本主義的生產，結果寧是齋來高率的利潤和高率的勞働所得。所以低率的工銀，不僅不是不適應於一般目的所得分配之結果，而且不是由資本家利己的一方的決定的結果，寧是缺乏資本的結果。何以呢？因為工銀的平均額便是用勞働者之數來比率勞働基金的。這個比率，倘不顧勞働者數目的減少，則可以因勞働基金的增大而增大。這就是勞働基金的增大可以使勞働工銀平均額增加起來。所以要要求工人之幸福，首先必須考慮急速的資本的增加。可是資本的增大，必須等待企業利潤的增大才可能。因而資本化便是工銀的增加。高率的資本的利潤便是急激地提高工銀的原動力。何以呢？因為它可以使資本增加起來。這樣，勞働工銀的「鐵則」遂變為勞働工銀的「黃金律」了。這樣，在雇主和勞働者之間，便成立了一種利益的調和。

然而如像這樣的狀態，祇依據社會的自然法才能實現出來。這個便是發展的作用。發展不能容許人為的干涉的。所以國家的政策，對於不受妨害的「經濟自動秩序之自然法」的發展必須有所顧慮。發展可以達到調和的目的，所以不必要什麼改良。國民經濟祇知道一個治療的方法。這個方法，便是經濟的文化之太擴張。而文化祇是遲遲地發展的。何以呢？因為它是人類教育的作用。

站在此見地上面的佛郎士斯密斯，又很力主張個人之社會的責任。他否定國家之補助，肯定個人之自助。這個正是個人主義理論當然的歸結。所謂社會連帶責任這樣的東西，在他們的觀念中，是不能發見的。他們以為人類絕對不必要實行社會是互相扶助，因為一切的人們，祇靠自助已夠達到他們所欲的社會的地位了。

#### 四

佛郎士斯密斯的自由貿易論，頗喚起德意志國內的注意。贊成自由貿易論的人，在一八五八年的時候，組織了「德意志經濟學者會議」(Kongress deutscher Volkswirte)。自然，這個會議當然不是鞏固的團體，祇是一個漠然的中心點。這個會議的目的，乃在乎實現各領域中之自由。自由和調和，在他們是同一的概念。他們由這個立場，非難國家對於一切經濟生活的干涉。借故縮小私人企業的競爭和私的行為之範圍為理由，不僅非難公共經濟本來之行動（運河，交通等），甚至於國家一般經濟政策，也在其排斥之列。他們以為自然法乃發現於自由競爭的內部，自由競爭是作用的生命的主要因素。

對於不受妨害的自然法之自由發展有效果作用的信仰，是六十年代德意志自由貿易主義者之主要特徵，但此中猶以亞倫特(Karl Arnd)為其最適切的一例。亞倫特底主著「在不變的自然法上造基礎



的國民經濟——國民經濟協會及進步黨黨員教科書】(Die Volkswirtschaft, begründet auf unwandeltbare Naturgesetze. Ein Handbuch für die Mitglieder der Volkswirtschaftlichen Vereine und der Fortschrittsparteien 1863)這本書，正如其表題所表示的一樣，其基礎乃置在自然法之上。他底理論，多數和佛郎士斯密斯不同。他尤不雷同於一般對於巴思地亞的讚禮。他認社會之價值，否定倫理學和經濟學分離的要求。他底目的，便是在使人類社會道德的向上。所以他以為最有效果的作用便是自由競爭。由精神力之競爭才生文化，有經濟生活中的競爭，才有價格的調節者并市民社會之事業及職業的分配者之作用。自由競爭乃要求社會對於自然的資性之發展，給與全生產者急速地完成其事業的刺激。這樣，自由競爭便是促進人類精神的并道德的進步的。所以各人必須排除違反進步的一切障害。

卡爾·布蘭(Karl Braun)也處在同一的立場。他後來於長期間中擔任國民經濟會議的議長，他以爲國民經濟要求國家克服一切經濟的障害。在此種價障害被克服後，調和才能從着其內的法則而自行發展。這種見解，完全和巴思地亞及佛郎士斯密斯相一致。像這樣的自由，在自由貿易主義者則爲一統制的社會原理。同樣地，個人的利益之追求，同時便是含有社會行動的意義。所以他們認定對於這一類的事情沒有證明之必要。

自由貿易者祇觀察人類中經濟的關係。祇由此觀察而認識人類社會的生活。據他們的所見，經濟

關係乃依着自然的關係及自然的原因而決定，并非如個人及階級之社會的地位由社會全體決定一樣。在交換即市場中，存有全國民經濟之本質。原來便是處在如像所謂社會的權利及義務云云的什切杜列治這樣的立場。

有名的主張信用組合論的什切杜列治，雖然屬於德意志自由貿易主義者非難範圍中之一，然而他既然也堅持德意志自由貿易黨之世界觀之中樞點，那麼無疑的，他當然也是此黨中之一員。這就是說，他對於調和的世界秩序并其最初之經濟政策的要求為自助之實行既有相當的信仰，那麼他當然也不外是自由貿易的論客。他在「勞働者問答」(Arbeiterkatechismus 1863)的「對勞働者階級向上之手段方法」中嘗說明人類自然的本能和勢力為保證人們即勞働者充分的生活(他所謂勞働者，乃指定勞働中的手工業者及小規模的主人而言)。因而由勞働者問題之見地方面所出發的對於國家之合理的要求，便是法律的保護，安全，和平和教育的確保。這就是這種要求乃形成有個人的勞働效果的準備。在此前提之下，個人得靠其自助而圖生活之向上，所以國家不得對於工銀額(因為這個乃由需要和供給之關係所定)加以干涉。

自由貿易學派之體系學者麥克思·威爾特也存有同一的見解。他也排斥國家之干涉，以為國家倘能除去自由勞働之活動中之一切障害，則國家自身便是一大貢獻。所以他把勞働問題作為一種增進勞

働生產力的問題。而這種事情，必須依着自由才能達到最確實的地位。勞働需要才得增加。至於資本，也可得依着機械的形態而增加起來，於是人人得而參加此增加率的分配。因而實質的勞働工銀并名目的勞働工銀同時也得增加。所以社會問題便是一種生產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期待生產的增加。這樣，他們遂專在勞働者自身之勤勉和節約中求其解決點。

這麼一來，我們可以說，自一八四〇年至一八七〇年之中間，自由貿易主義爲德意志最有勢力的思想。社會主義的運動，在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〇年之中間，雖然開始其活潑的運動，到了一八六〇年，雖然成爲一般大衆的運動，然而它沒有鼓動廣大社會的勢力。便是在德意志的政治行將統一的這時候，一方面再來研究一般主張社會問題者之見解，他方面又反對社會主義，要矯正自由主義的惡果的社會政策學派，其勢力也不見有什麼增大。在此中間，自由主義雖然逢着一般有社會的傾向之思想的反抗，然而它仍然能堅持其支配的權力。在實際政治上，自由貿易主義便是當時進步黨的根本思想。這種思想，處在社會政策學派并社會主義底嚴酷的批評之下，雖不能仍舊維持其日昔之優勢，但在今日，在德意志思想界中，實際上尙有受它影響的痕跡。自然，到了今日，這種思想已經喪失其生命了。它一時雖然在德意志產業界中有一種特殊性，因而處在支配者的地位，但是其特殊性已消滅的今日，同時不得不將其王座讓與其他的思想了。可是如前面所說，這種自由貿易主義思想的淵源，

乃含有亞丹斯密斯之經濟學。這一派的經濟的自由主義之發達，實是德意志近代經濟學之發達史。我們要知道德意志近代經濟學的發達，當然不能不顧此種經濟的自由主義之貢獻。本來德意志經濟思想的特色乃在乎反自由主義，可是自由主義之發達，對於德意志經濟思想，却殘下最大的痕跡。

## 第七章 浪漫主義者之社會經濟思想

### 一

不論是悲觀地理解由亞丹斯密斯所完成的個人主義的經濟學，并其學統中之自由主義的社會觀爲在資本家經濟組織中生產顯著的發展上建築其理論的基礎，而認此組織中諸害惡爲不可避的自然的現象；或是樂觀地理解此社會觀爲充分的自由不能實現時暫時的現象即實現此充分的自由時才能除去此害惡的等等傾向，都是對於資本主義這種害惡主張非干涉的態度的。至於反對此傾向的學說，自然的有我們下面所詳細地敘述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適和此相反，乃立在不依着國家漸進的計畫的干涉而救濟此社會的害惡的傾向。這事情，我們在浪漫主義者中便能看見。這傾向，乃由原子的機械的社會觀轉向於普遍的有機的社會觀。這轉向，已在德意志古典哲學——尤其是腓西特之「自然法基礎」中很明確地表現着了。而康德及其後德意志哲學之破壞舊時自然法的個人主義而代之以普遍的有機的國家觀這事情，雖是近代社會思想史上之偉大的貢獻，但浪漫主義者才是其最堂皇的完成者。我們在

敘述浪漫主義之傾向以前，首先略說普遍的社會觀即國家中心論的社會觀，這或者不是無益之舉罷。

自然法的個人主義之社會觀，雖然是近代社會觀之主要潮流，但同時還有他種社會觀歷史觀的存在。這個就是有的是和自然法的個人主義的前提完全不同的社會觀，有的是處在極端自由的立場的社會觀，而這種傾向的發明者，便是十五世紀的意大利的 Niccolò Machiavelli (1496—1527)。Machiavelli 在其「佛羅稜薩歷史」(Proence)中，以國民史為其研究的對象，而其態度則為現實的敘述。自然，Machiavelli 雖然把歷史解為「自然史，但在他所成為重要的問題的却不是個人，乃是國家。

Machiavelli 是實際家而不是理論家。較他更為重要而且更深刻地認識目的之所在的則為「新科學原理」之著者威哥 (Vico 1663—1744) 底歷史哲學的敘述并史觀。威哥之歷史觀，已經萌芽於被自然法并合理主義顯著影響的時代了。像這樣的歷史觀，已經很明瞭地現於威爾德爾之歷史的著作中了。自然科學的進步已演出多種的任務了。威哥在他底「新科學原理」中，對於自然主義的史觀，闡明歷史的觀察方法。他對於德斯卡爾特 (René Descartes 1596—1650) 之非歷史的非傳統的察觀方法很力主張歷史中自由意志較人類本能強大和依自由意志決定歷史發展的行程。他不認自然為歷史發展的原因，認人類精神之作用為歷史發展的原因。

我們就在孟德斯鳩 (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 1689—1775) 底著作中，也能看見

此種歷史觀之片鱗。孟德斯鳩全體思想傾向，極受英吉利自然法之影響。這種自然法思想，經過孟德斯鳩之著作，才很普及地貢獻於法蘭西。然他底歷史觀，在許多方面，却脫離此思想。這個恐怕是受了泡旦 (Jean Bodin 1530—1596) 和威哥之影響罷。他在「法之精神」中，嘗說一民族在政治的，道德的，社會的狀態之間有密切的關係，并把各民族法律及組織歸於其民族各種性質及各種歷史的條件。他雖以為如土地氣候這種自然要素對於決定一民族之命運演出重大的任務，但他對此又力說必須等待人類之行爲，其意志并其精神的資性征服土地後，歷史的發展才能成爲強大的力量。

所以這裏我們發見這思想在自然主義時代對於其他見解之強大刺激，看出克服後來個人主義并自然主義的見解之萌芽。

在這個時代，我們也可以發見德意志中反個人主義之社會觀并歷史觀之一二。這裏首先應舉出的爲梅沙 (Justus Muser 1720—1794)。梅沙嘗承奉奧士那布路格的幼主，二十年間掌握該國的國政，其主著有「奧士那布路格史」(Osnabrückische Geschichte) 和「愛國幻想」(Patriotische Phantastien) 二書。所以我們這裏發見了當時一般對於德意志社會的并經濟的生活現象的新的見解。梅沙底意義，不是在乎處置各個的問題，乃是在乎排斥現實的歷史的觀察和個人主義的出發點，力說一般社會并道德的關係。他整個的歷史觀，其立場完全和啓蒙思想相對立。因爲這不僅使他對於一切社會的并經濟

的制度之成立和發展發生興味，而且使他對於不愉快的現在看出過去的更高一級的狀態。他雖認近世的產業促進商工業的發達，但一方面對於當時產業關係的破壞又發出一種悲哀。在當時的製造工業，商人就是主人，替他們勞働的爲職工，職工祇爲其工銀而勞働。像這樣的制度，不消說了，是沒有什麼幸福可說了，較舊時的制度還藏有多數的誤謬點。這便是梅沙底見解。

梅沙對田園狀態的態度，也類似上述的見解。因爲他主張在田園方面使舊時的狀態理想化起來。他承認多數隸屬的方面，攻擊行政強度的集權化，指示出中世國家和個人間存在的社會團體嘗齋來怎樣的効果。在他，民族爲有機的構成體，爲全體不至於困窮起計，必須觀察其歷史的特徵。他把國家（謂之社會亦可）比爲金字塔（Pyramid）。即金字塔向下看時，乃立在鞏固的基礎上，向上看時，最下的部分能夠完全地并無何等困難地支持着在上的部分。

和梅沙底著作同一時代出版的，便是黑爾達底「人類史哲學」（Herder, Ein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黑爾達雖也是啓蒙思想家的哲學者，然他所採的方法頗新，力說歷史發展中之不合理的要素，很影響於後來的浪漫主義之思想——尤其是諾華利斯（Novalis-Friedrich von Hardenbrg）受其影響很深。在此書中，他已表現出很顯著的普遍的傾向了。

上面各家的著作，雖然是一種短篇的記述，但在啓蒙思想的時代，這已足表示出漸次地成立其反



對啓蒙思想的新戰線了，已毅然地準備着向着啓蒙思想作激烈的鬥爭的時代了。這時代，也就是浪漫主義的時代。這個漸次準備的時代，因為進攻支配當時的合理主義，所以也可以說爲一種精神的反革命。何故說爲精神的反革命呢？已如上述，近代個人主義即啓蒙思想乃是近代資產級的思想。而這種個人主義，其政治的并經濟的革命成功的結果，已登了思想的王位。在此革命中處在指導者地位的，不消說便是資產階級。這時候，支配舊時產業的地主和組合的主人，有的雖剛開始沒落，但有的已經完全沒落了。這些繼續沒落的階級，對於布爾喬亞階級，尤繼續其鬥爭的奮鬥。然而這個不外是很不滿意於近代的社會，憧憬中世的社會，再夢想舊時支配的體制。這種狀態的思想體系，也就是浪漫主義的思想。而浪漫主義之反動性，便是布爾喬亞階級或繼續布爾喬亞化的支配階級所說的精神的反革命。

## 二

然而浪漫主義的本質是什麼呢？對於這個本質的論爭，也是多種多樣，不能一致的。有的在反抗十八世紀合理主義的非合理的論述中求其本質，有的——比如斯密特（Karl Abolf Schmidt）却在其「主觀的偶因論」（Subjektiver Occasionalismus）中求其中樞要素。浪漫主義否定因果概念，否定

能考量的原因性之強制和特定規範的結合。然而我們要在這幾句話中求得浪漫主義之本質是極難的。浪漫主義雖然從某種特定之內的淵源生出一個的世界觀，其本質雖然是主觀的，但是此外却存有多方面的支流。於是有人以為不能用一種簡單的標語來表現浪漫主義之本質，祇據內容而敘述它的性質。

比如格荷爾·鳳·巴羅便是一例。他說：「浪漫主義的典型大約如下：熱狂地崇拜過去——尤其是崇拜其特定部分；努力更初舊時制度和關係；靠國民的援助反抗外國之支配；復活舊時教會的理想和宗教的態度；力說一切權力之隸屬；估量一切歷史勢力之特殊價值；對於人工所造成的東西，意識所構成的東西，由外部翻譯或強制的東西，而主張自然的東西，生成的東西，自國的東西之價值；高唱全體和部分，內容和形式的調和，以及歷史現象全體性之價值；有時作為稀奇的自主獨立的浪漫主義種種的生活樣式，有時又作為牧歌的靜寂的浪漫主義種種的生活樣式。」

這些諸種性質，雖然是浪漫主義內的精神的統一中構成部分，然而要把此統一性概括在包括的形式之下却是很困難的。可是我們祇看見這些特質，已夠知道在此統一性之中怎樣地包藏着多樣性的事情了。浪漫主義的思想，是西歐各國同時發生的運動，是藝術及社會科學方面精神的傾向，所發展的方面和其傾向原是多種多樣的。可是浪漫主義猶其是在文學運動方面得到最大的效果，影響於文學方面較其他方面為顯著。我們這裏所說的雖只限於德意志的浪漫主義，然而我們也應知道，德意志原是

西歐各國浪漫主義之祖邦。何以呢？因為德意志布爾喬亞的社會勢力之成立較英法非常遲慢，以致反抗布爾喬亞社會的勢力容易興旺，所以德意志的浪漫主義才較他國繁盛。

德意志浪漫主義思想之發生，乃始於威廉·斯勒格爾 (Wilhelm Schlegel)，而威廉·斯勒格爾却極受腓西特底影響。腓西特最初雖站在個人主義的立場，在一七九六年出版的「自然法基礎」的國家論中，雖離開啓蒙主義之國家觀并社會觀，但在上述「封鎖的商業國家」中，尙趨於此傾向。威廉·斯勒格爾是德意志浪漫主義的鼻祖，其主著「浪漫主義斷片」和「歷史哲學講義」，給與當時社會的影響極大。於是一般遂稱之爲浪漫主義的理想家。他最初雖處在啓蒙思想最深的影響之下，但後來却完全信仰浪漫主義的思想。我們在他底著作中，可以看見他強烈地排擊法蘭西革命，贊美美國并對於一切經濟的方面之猛然的非難和侮蔑。他說：「有政治的所在和有經濟的所在，決沒有道德可言的。」浪漫主義的傾向，其重點乃在乎社會的方面，至於經濟政治方面，却完全置諸不顧。像他這樣反對利息反對商業的態度，其經濟觀，完全是站在亞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和教會法學者的立場。

諾華利斯 (Novalis-Friedrich von Hardenburg) 是浪漫主義者中最富於同情心的人，深受不律利·斯勒格爾 (Friedrich Schlegel) 之影響。在浪漫主義者中，恐怕再沒有誰如他這樣深刻的內省和表現出此派之普遍的世界觀吧，他底「Hanrich von Ofterdingen」，「信仰與愛」 (Glaube und Liebe)

和「基督教并歐羅巴」(Die Christenheit oder Europa. 1799)這三本書，皆反映着此思想。於是我們不僅看出他對於浪漫主義思想特有的主觀和普遍的考察，而且看出他用很甘美的言語唱着歷史，過去和國家之重要性。然而他雖然有這樣的一般的同一性，但却不如不律利·斯勒格爾一樣，不是商業及貨幣的反對者。他非常贊美商業。

浪漫主義的思想，主要雖是在德意志發展的思想，但在英吉利，也頗見其成長。在浪漫主義之國法的并政治的方面，則以英吉利的巴克(Edmund Burke)為最優秀的理論家。在一七九〇年的時候，即就是他底「法蘭西革命之省察」(Reflexion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出版的時候，他已是立在理論的反對法蘭西革命的第一線了。這本書，一個星期中在英國賣了七千部，無久被譯為德文，於一七九三年重印第二版。他主要的論點為反對洛克和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所代表的民權學說。在他，國家不是依着人民的意志而人工的所造。國家是出自神之意志的制度。因而國家不是必然的害惡之制度，乃是有價值之善的制度。國家是歷史的產物，不是依人類自由意志而移動的。因而我們不應任意變更國家的根底。國家是有價值的我們相續的組織。倘如要改革國家，必須在嚴密地維持確保歷史所生成的東西了後才可能。決不應依着人民一時之恣意之類而加以變更。這個便是巴克之根本的立場。

我們在浪漫主義的思想中，可以看見非合理的并感情的要素之強調和有機的國家觀之主張。在社會經濟思想之浪漫主義，其最重要的東西便是這種有機的國家觀。這個國家觀乃由有機體的觀念方面出發的。浪漫主義的哲學者什林克（Schelling）最早已經力說這個觀念了。有機體為統一性和多樣性之綜合的存在。把這樣的自然的有機體的觀念移植在人類精神的并文化生活中，于是才發見出多樣性和統一性之綜合的國家。這個才是有機的國家觀。而這個有機的國家觀，却和後面所說的國家有機體說有很大的差異。國家有機體說主張國家和自然的有機體之同一性，以為國家之生成，存在和機構，乃採着和自然的有機體同一過程和形態。然有機體的國家觀却不是這樣的自然科學的見地。據浪漫主義者，國家在成為多樣性和統一性之綜合時，這國家便是理念的國家。國家是有生命的。國家底生命，便是精神的統一體的生命。所以這時有機體的國家觀，並非以為個人互相的作用可以使國家全體之成立，乃以為全體的國家之成立可以使個人之生存。在此一點，浪漫主義之有機的國家觀便是站在和自由主義之原子的國家觀正反對的立場。自由主義乃高唱着對於國家之理性要素，而浪漫主義則高唱着宗教要素。在自由主義，個人之幸福是目的，國家是對此目的之手段，然在浪漫主義，則個人必須贊美國家，國家之目的乃存在其自身之中。這就是理解國家為一種理念的東西。這個立場，是整個的浪漫主義之社會思想最重要的觀念。

然而把此國家觀為基礎，對於其社會經濟學說之建設，給與最大貢獻的却是亞丹·繆勒（Adam Müller）。

### 三

亞丹·繆勒一七七九年生于柏林，最初在柏林學神學，後來在哥敦學法律及國家學。一八〇五年他在維也納的時候，才由新教改奉舊教。自一八〇六年至一八〇九年的三年間，他在德勒斯登和克萊斯特同辦“*Phöbus*”雜誌。自一八〇九年至一八一一年住柏林，一八一一年末又轉居維也納。在這個地方，他和不律利·斯勒格爾，威爾那，賀佛華等人很深交。一八一三年任的羅爾之官吏（*Landeskommissar und Schutzemajor*），一八一五年轉任勒不士格的奧地利領事，一八二九年充維也納宮中顧問官，于是同年便死在這裏。他是競淨的至友，是密德尼（*Clemens Lothar Wenzel Metternich*）最信用的人。他底著作以下而幾種為最重要：

「對立論」（*Die Lehre vom Gegensatz*, Berlin 1804）是他底處女作，但此書已表出他底根本的思想了。

「國家學概論」（*Elemente der Staatskunst*, 3 Teile Berlin 1809）。

「貨幣新論」(Versuch einer neuen Theorie des Geldes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Grossbritannien. 1816)。

「論文集」(Vermischte Schriften. Wien. 1812)。

穆勒後期的著作，和初期的著作不同，初期者多富于浪漫的汎神論的色彩，後期者却採着教會學的立場。其主要的有二種：

「全國家學神學的基礎之必要性」(Von der Notwendigkeit einer theologischen Grundlage der Gesammten Staatswissenschaften, Leipzig 1813)。

「內的國家經濟」(Die innere Staatshaushaltung. 1820)。

穆勒把新哲學所喚起的共同社會概念(Gemeinschaftsbegriff)移植于經濟學及國家學。在他，國家「是人事之總體，是人類對於一個有生命的全體的結合。」是絕對的生命和精神。「是一切理念永久活動的領域。」國家是對其構成者世界的犧牲，即對人類愛方面，是成立統一的倫理的共同的社會(ethische Gemeinschaft)。國家依着對於此世界(神)之直接關係而獲得一普遍的及宗教的特徵和普遍的妥當性。何以呢？因為嚴格的說來，個人本無幸福的存在，祇有犧牲的幸福之存在的緣故。這樣，人類祇在普遍的關係中才得向上的。就此國家概念之應用和實際的內容看來，則封建法和社會之各員

的理想便是人格的并靈的結合的德意志中世社會的組織。據繆勒說，未嘗採用合理主義的羅馬法的美國國家制度，便是在其當時，它底精神還很瞭然的顯現着。

繆勒也非常崇拜巴克。他盡全力和反對規定絕對的私有財產的羅馬法，自然法說并亞丹斯密斯底學說戰。同樣地，他猶猛烈地攻擊分離國家生活的孟德斯鳩的學說（三權分立——立法司法行政）。他認土地財產不是自由的私有財產，乃是一公務。

總之，繆勒乃反對由個人主義之自利心出發的經濟生活之孤立的觀念而主張一切社會要素之關係和統一，并且很顧慮到社會歷史的條件，對於一切生活關係之互相關連的祕密之論述尤詳。他認社會各方面之交流即經濟、國家、宗教、道德等等的關係為一切社會科學的思索的前提。在此一點，和上述哲學的見地之特殊的浪漫主義理論相一致。他主張不應依國法及私法（*Staats und Privatrecht*）之分離而破壞國家之統一。同樣地不應使生活，哲學和藝術相對立起來。生活不僅在哲學，藝術及宗教方面必須統一，就在經濟，國家及社會方面也必須統一。這裏便是結合着歷史的普遍主義的見解和社會學的見解即總括着社會生活全部的見解。

關於種種問題方面，繆勒又攻擊一般贊美競爭的論者。他不承認競爭為國民經濟的原動力即使社會各員人格結合的力量。他猶猛烈地非難由新個人主義（資本主義）之發展所生的資本和勞働底分離并



勞働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

他把工業的自由看做一般的無規律的行動。他以為一勤勉不但不能生出持續的勞働，反而有絕滅其他勞働的可能。可是他在一方面又承認商工農業方面之資本主義的要素，而限定此要素為他要素外之一要素，認為協同的封建的財產即組合之類的國民公共的勞働之一補充形態。

他尤排斥一般關於富底機械的概念及斯密斯底財富的學說。因為他以為財富并非存在物質中，乃是存在使用和効用中。財富不僅是物質財。有效用的市民的性質及力也是財富。所以大的財富不僅存在於外的財產所存在的地方，便是維持此外的財產及尊重此外的財產的重要感情所存在的地方，也在此大的財富。

在繆勒的學說中，含有和上述相一致的生產力說 (Produktivitätslehre)。他不如斯密斯一樣，祇認物質財所利用之勞働才是生產的，他還認政治家及藝術家之活動也是一精神的生產 (die idealische Produktion)。他說：

「據斯密斯，一國民最巧妙的精神的生活，也是不足以列在國富表中的。因為他對於不生產物質財之唯一的理由，乃是有數百萬貨幣的政治家之言語，使國民之心和發明之工夫高尚起來的僧侶及藝術家之言語，都不足以言富的緣故。」

接着他又說：「全體國民的存在，便是一國國民真正的財富。」他又進而論國家活動的效果說：「各個的生產力，祇在國家再依着高度的生產力而生產的時候才能夠生產。」倘如國家停止其自身的生產時，則一切小生產也自行停止其生產。「一切生產物之生產物」(Produkt aller Produkte)和生產物之緊密接觸便是經濟的共同體即國民經濟。

因為他不滿意于斯密斯之機械的價值論及價格論，所以他從新樹立自己特有的學說。他區別了個人的使用價值——尤其是財之公共的社會的價值(Geselligkeitswert)。這個便是個人的使用價值之一致。這種社會效用說，對於他底貨幣學說，也給與一個標準。一切經濟財即一切商品及勞働，只要互相地評價，就有貨幣的性質。「貨幣有附帶于市民社會各個人的特性。因之貨幣可以和其他個人結合，也可以和結合之個人分離。」貨幣的特性是個人的及物質的普遍妥當性，交換性，公共價值。貨幣不論在什麼地方，或作為紙幣，或作為金屬而怎樣地發現，牠也不是私有財產，乃是多數者——一切人們的共有財產。祇限于是共有的財產，牠才算是貨幣。何以呢？因為祇有貨幣實體的交換和流通的本質牠才是真正的貨幣。在此性質上，貨幣不是自由私有的財產，乃是公的財產。我們所說的金屬貨幣，最完全地有結合及分離之性質即公共價值的性質。並且金屬貨幣雖然是國民的價值即國民力之最完全的表現，但却不是唯一的東西。金屬貨幣和紙幣經濟之互相作用生出最完全的貨幣制度。這樣

的廣義的貨幣，不是依着單純的機械的市場及交換而發生，乃是由于繆勒之根本的並天才的認識所發見的「原生的慾望」(Urbaurfnissen)所生的。貨幣也如國家是多數者之內的，精神的統一之生命的表現和法律是法的生活的表現一樣，原是多數者內的精神的統一之經濟的表現。而此表現，一切皆和人性相一致。

商業祇在國家輸出真的剩餘而不是輸出本質的生產力的內的結合時才能自由。

據繆勒，國民經濟之全構成如左：

生產有四個要素即土地，勞働，物質的資本和精神的資本。土地代表繼續的要素，勞働代表發展。而過去集積的資本便是代表後二者的。此種生產之要素正和家族之四要素對比。這四要素便是青年(努力前進)，老年(阻止)，男性(生產)和女性(保守)。而國民的國家之四個根本的業務則是學者，軍人，勞働者和商人。由此四者的對立而生出全體的調和。

繆勒把以上之根本思想適用到經濟政策之問題。他不但反對農業國和工業國之對立，他猶反對農業國發展爲工業國的事情。他根據當時英吉利物價的昂貴，論證一國內部必須存在經濟的均衡。他說，凡是政治家，必須努力限制破壞調和的經濟層即剩餘貨幣——尤其是旺盛的都市產業，使其他脆弱的經濟層即農村經濟進步起來。產業中同一形態的，徐徐的增加和擴張便是一國健全的表徵。經濟

中所生的均衡，也必須不受障礙地發展起來。他尚在他關於農業經濟的論文中反對Engel所代表的農業合理的基礎。Thaer對於農業問題，主張首先必須增加純益年金——尤其是貨幣的收益。然在繆勒，他以為如果採用這個方法的時候，則人民和土地神聖的結合必被解體，一社會中各種勞働層之錯綜和其獨立體之構成必被解體。而農業的營利化，必使德意志國民之存在，因而德意志中特殊存在之全體喪失其唯一的保證。這樣，一切特有的價值也都喪失無遺，所得而殘存者祇是物質的價格。物質價格無限的昂貴，祇示出我們在忘掉物質以上之人格，所有以上之存在，必要之動物的衝激以上之自由精神的時候，不但沒所有什麼物質，而且不能得而欲求的事情而已。繆勒關於土地并土地所有的見解，便是依存于此種農民政策觀的。他說，所有權不是死的概念，乃是生的理念，是人類和物之間之相關的所有，是所渴望的關係。比如土地自身必須為其本來之性質而考慮不滅的全國家之永久不變的相續物，在一切經濟的并法律的關係上，必須如此處置。土地不是個人所有，乃是家族所有的。

繆勒依據他這樣的根本思想，對於當時哈爾庭伯西底自由主義的農業的立法，作着最有效果的鬥爭。猶其是對於一八一一年之立法——「關於地方文化向上之勅令」的鬥爭，其效果甚大。這種勅令原是要打破當時所行的土地之束縛，舊時之權利和共同耕作的強制的。所以繆勒對此之鬥爭，在其理論和實踐上，本是當然的結果。此實踐之態度，便是表現着他所代表之社會的階級的。總之，繆勒之

意義，便是存乎理論的實踐的反對自由主義這一點的。

#### 四

站在貴族方面而實踐的反對自由主義的立法者則爲馬威志 (F. A. L. v. d. Marwitz)。馬威志因爲和繆勒有個人的交涉，所以在思想方面，也和繆勒有若干關係。他底思想傾向的背景，則爲保守主義的思想。他極端反對個人主義關於國家之合理的見解。他說：「不論在什麼地方，王侯的存在，都比人民爲早。王侯正如家長創造家庭一樣地創造人民，這事情決不是反比例的。」在一八一一年的時候，他又對於普萊爾 鳳斯丹底遺囑批評說：「把世襲隸農制看作農民從屬於一家長的結合即在那種最下層的階級感情中用某種方法來培植高尚的法律和對於高尚的道義之理念并有教養之生命的顧慮之團結。然而這種團結的廢除，其結果祇不過是給與一般反宗教者以極端的可能性。」這樣，馬威志便是因執舊時家長的狀態即舊時的拘束和身分制度，而站在此基礎上，和布羅伊森農業改革之自由主義的傾向鬥爭。當時繆勒草成關於布羅伊森反對哈爾庭 伯西之設施的呈文，由馬威志轉呈國王。因而布羅伊森的貴族黨，才得達到其所願望的一部分。於是布羅伊森的保守黨，便跟着此思想的傾向，而達到成長的地位了。其後堅持此思想的主要的代表者則爲表羅孔梅羅 (Bülow-Cunmerow)，克列斯勒時

(V. Kleist-Retzow)、拉威爾伯鳩讓 (Lavergne-Peguilhen)、格爾拉 (L. von Gerlach) 和 拉杜威 (J. V. Radowitz) 等。

哈拉 (Karl Ludwig von Haller. 1768—1834. *Restauration der Staatswissenschaft oder Theorie des Natürlichen-geselligen Zustandes*. 6Bde 1816—1819) 雖也屬於浪漫主義思想家之一，然他底立場却不是純粹的浪漫主義。他底學問的貢獻，乃在社會學及國家學方面，不是在純粹的經濟學方面。他排斥關於國家成立的契約說，代表世襲國家說，極力主張王侯的權力為私法的性質。他說最強而最有權力的人便是支配者。立在王侯無限制的權利之上的祇是神之力。因而國家不是自由的個人的社會，乃是自由人和臣僕之自然的，結合的關係。而此場合，王侯完全為自身之權利而支配之。如此見解，頗類似浪漫主義之思想。可是其他的浪漫主義者和哈拉的出發點却完全不同。比如繆勒，他底出發點便是共同社會，其見地便是普遍主義的。然而哈拉底出發點則很有個人主義的色彩。在他，國法是私法之集積。他的集合關係之所以和國家相異，乃因為國家有其主張的獨立性。在此一點，他處在和繆勒所說的「國家全體」之觀念對立的立場。哈拉完全缺乏普遍主義的理解和把國家看作實行者之共同社會理念之論調。在他，國家不是社會的經濟的并政治的諸條件之內容和理念，乃是由私的目的并利益所發生的單純的支配關係。所以說，他雖然處在類似於浪漫主義者的立場，然而不能稱之為此派之

正統的思想家。

和哈拉處在同一地位的爲不律利·鳳·競治 (Friedrich von Gentz. 1764—1832)。他是亞丹·繆勒底至友，在思想方面，乃處在啓蒙思想和浪漫主義之中間。我們在於他之關於政治及國家觀之著作和信札中，雖然發見多數浪漫主義的要素，但在其他之點，却又是合理主義之論調者居多。他底態度，亦不外是過渡期中一般思想家之常態，其頭腦中，錯雜着新舊二者之思想。他最初雖由翻譯巴克之「法蘭西革命省察論」而獲得巴克底思想，立在反對法蘭西革命和國家主義者的第一線，有和初期浪漫主義派的指導者接觸的機會，然而在一方面，他和繆勒一派的普遍的有機的理解的距離却很遙遠。

## 五

除開亞丹·繆勒之外，還有佛蘭治·鳳·巴達 (Franz von Bader)，也是浪漫主義真正的代表者。他是神祕的哲學者，同時也是浪漫主義派的人。在一八三七年，他底「法·國家·社會及教會論」 (Udecn über Recht Staat, Gesellschaft und Kirche) 被其門生佛蘭治·霍普曼題爲「社會哲學原理」 (Grundzüge der Sozietphilosophie) 而出版。這本書的第二版，乃在德意志唯物論橫行的時代即一八六五年發行，給德意志人之精神，得到理想主義的哲學的涵養。

巴達乃在愛之方面看出社會的原理。他以為愛便是形成以神為中心的共同生活體之各階段的。使一切人類都愛神。宗教根本的要求，便是所謂「愛隣人如愛你自己」的事情，這個才是形成一切真實的自由的社會之原理。至關於社會本質的認識，他和亞丹·繆勒則互相一致。他說：「結合以結合者間之不平等為前提，因為在平等者之間，祇有集積或集合。而為行為之結合，祇得理解為外的不平等之不絕的內的均衡。」包含一切的愛之原理，乃存在於共同社會之內部。這樣，社會可以分解為專制者和奴隸二個各趨極端的階段。

巴達也如亞丹·繆勒一樣，很嘲笑非難社會契約說和人為的憲法。他嘗使這種自然法原子觀和憲法學說底機械論并統一性和全體性之哲學的要求對立起來。為社會的結合能夠存在起見，必須在全體關係上，統制一切部分。而此統制，因為不是下層部分所給與的，所以此統制關係的方法或法制，必須是上層部分所給與的。因而社會沒有社會的即有機的關係，權力（主權）和隸屬則不能成立，正如獨立有機體沒有頭和體則不能存在一樣。因而人類集合便是權力的社會（民族，國家，）祇是成為權力的社會，這集合才可以存在。

這樣，巴達遂區別社會為三階段。（一）自然的社會。在此社會中，愛支配一切（狹義的神政主義）。（二）市民的社會。在此社會中，純粹的愛的支配已代替以法律的支配了（猶太人裁判者之統



治)。(三)政治的社會。在此社會中，爲判然決定權力的主權乃由社會發生(猶太人之王的統治)。然而巴達底理想本來便是自然的社會，其他二個形態的社會，不過是實現自然的社會最終目的之手段。

巴達也和斯勒格爾，諾華利斯，亞丹·繆勒等浪漫主義者一樣，很力堅持身分國家論。但他不認國家主權對個人直接活動有利益的事情。他說，國家之最高權力，倘直接及於個人的時候，則在個人方面，必感到壓迫和專制。所以他主張這裏必要有國家最高權和個人中間點的存在。這個中間點，便是受身分及教會領導的團體。這個團體及身分，乃處在國家和個人之中間，使二者之勢力均衡起來。何以呢？因爲國家最高權對個人之活動，在經過身分或團體而行的時候，在個人方面，必不以這爲一種壓迫和專制。而身分國家制之所長，也就在這裏。所以他認有機的組織之近代國家底機械的國憲有三種重大的害處。(一)政府職能之增大化；(因爲這個緣故，政府沒有和身分交涉之必要，可直接和個人交涉。)(二)身分的及團體的信用之喪失；(三)身分的名譽觀念之喪失。

此外他又區別個人主義及普遍主義之社會觀。他說：「在事實上，我們可以看見一切社會中有二種構成動力的作用。首先一種要在和共同社會之關係上規制個人，維持舊社會信仰的權威。其後一種爲沒有此威權的社會。後者和前者完全不同，靠社會和個人之交涉，打破個人存在的共同性。所以我們對於前者，可名之爲有機的社會(愛的社會)，叫後者做無機的社會(憎惡的社會)。……利己哲學底

目的，原在使個人之絕對獨立，但絕對獨立的結果，個人遂一變而成爲處在絕對孤立的地位。這樣，爲要中止一切交易和授受，必然的否定了爲生活共同體的社會。」然而社會性，權威，服從和信仰的根本要素，必須受着教會的涵養和防禦。教會是「公共的世界制度」，它使國家「神政的」地遊弋其中；不然，則它在國家之中，也不會「新教的」地沒落，而與國家相并立，自由地，獨立地存在。

巴達由上述根本的立場，又論及經濟問題。而這個問題，和他底職業有關係的。他嘗從事於拜埃倫的礦山行政，由國家經濟的利益之見地，嘗到美吉利作研究的旅行。他底結論，乃在乎必須實施國家極積的經濟政策。他嘗極力和一般主張自由競爭爲經濟生活中唯一渴望的原動力之理論戰。因爲他以爲在利己之上建築的經濟，常是以利益鬥爭而充當的。他又反對商工業之一方的發展和農業的合理化。因爲依着這種發展和合理化，以前鞏固的，類似結婚的家族和相續的土地之關係，必墮落於動的一時的投機的利用肥沃之土地的狀態。關於此家族和其所有地之關係的原理，他和繆勒一樣。他之所以特別注意於這一點的，不外是他承認工業制度爲社會的害蟲之結果。一八三五年他所發表的那本小冊「無產者對有產者現狀之不均」(über das Missverhältnis der Vermögenslosen oder des Proletaires zu den Vermögen besitzenden Klassen der Sozialität)，主張對此困窮狀態必須施行改革。但是他又附言這種改革不是根據於慈善事業，乃是根據於法律之設施。他以爲工場組織雖能增加生產能力，然勞

働者由那裏所得的利益却是極少量的。因爲「勞働者增加，其生產力也增大，同時其所得也減少，其生存的不安也愈愈增大，而增加的生產之實質的利益和享樂，愈愈被少數人所分配和集積」。這裏我們便可以看見後來發展到精緻的形態的羅特比杜斯之工銀減少論和馬克斯之資本蓄積論之萌芽。此種困窮狀態之主要原因，乃在乎勞働者孤立的狀態，而勞働者之所以陷入此孤立狀態的，則因爲經濟的自由主義理論之錯誤和主張自由勞働契約所釀成，這是巴達最能認識的。他說：「各人必須明確地認識個人同時在社會中倘沒有什麼身分或團體的自由，則其他之個人之自由決不是完全的自由；並且在那種被稱贊的法律之前的自由，結果不外是人人均被此新的奴隸制所統制。」

這樣，巴達之經濟觀，較繆勒之經濟觀尤爲明確。這裏我們祇能敘述其中關於商工政策之部分。比如他尖銳地批評亞丹斯密斯之學說，攻擊自由貿易，擁護組合制度，積極地要求國家的厚生政策等等，這是不消說了。在他底論說中，比較上重要的，除上舉諸批評之外，便是關於國家對外國貿易政策之新組織。他說，關於外國貿易的施行，倘放任於一般和外國利益有密切關係的商人之自私自利而不顧，則必使國家變爲他國的殖民地，使自國處在他國的下層。所以各個國家，在可能的時候，必須圖其生產上的獨立。巴達這種主張，已是一八〇一年當時的主張了。可是在此一點，倘以巴達爲「里思特以前之里思特」，則這很是不妥當的。不過我們可以說，在此一點，里思特頗受他底影響罷了。

在巴達由國家的見地而高唱外國貿易政策這一點，確是腓西特之「封鎖的商業國家」以後的偉大的主張。并且他在此一點上受着腓西特之影響也是很顯明的事情。

上述政治的浪漫主義者之思想傾向，得到後代德意志多數學者的支持。例如上舉之 *Lavergne-Peguilhen* (*Grundzüge der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 1838—1841) 及 *Bodz-Raymond* (*Staatswesen und Menschenbildung*. 1837) 便是此派之一員。至於經濟思想的浪漫主義，對於後來經濟的發展，雖不能說有很大的貢獻，然而其社會觀及國家觀，對於德意志經濟思想的影響却很不小，我們在觀察十九世紀中葉至今日的德意志經濟思想時，便能感到這種芬芳的空氣。

## 第八章 社會主義之萌芽

### 一

德意志社會主義思想，自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〇年之中間，纔略見其發展。一八三〇年以前，祇存在社會主義之主張，一八三〇年以後，社會主義才成爲人所周知的，成爲解決近代資產階級社會中貧富之懸隔即貧富二階級間之榨取和被榨取的，成爲普羅列塔利亞階級運動之理論之一種形態。但在這時代，德意志社會主義的勢力，還不如英法兩國社會主義勢力之強大。這時代，德意志的主要產業尚處在農業的狀態。農業中之自由主義的立法，雖受若干反對，然自十九世紀以來，仍然施行此種立法。所以德意志的農業，才漸漸地現出資本主義的色彩。

便是工業的狀態，也是這樣的。德意志工業經營的狀態，在十九世紀前半期以前爲農家之副業，都市之手工業及都市手工工場制。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因爲從事於一工業之勞働者漸漸地增加起來。所以才開始採用工業機械。這就是說，德意志因採用近世的機械所生的產業狀態之變革，正如英吉利

自一七七〇年至一八三〇年間所完成的產業革命一樣，其開始乃在於一八四五年至一八五〇年之中間的（這就是法蘭西產業革命遲二十年——始於一八二五年——，在英吉利產業革命成就後十五年至二十年之中間。）汗普買亞說：「德意志的資本主義，在一八四〇年的時候，不得不使用蒸氣機械。自這一年起，該國運轉的蒸氣機，共有六百三十四架，馬力總數為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八。這些機械可做二十五萬七千八百三十八人的勞働。」

這樣，我們可以說，在一八五〇年以前，德意志工業差不多沒有使用機械，採用機械的時期，一般皆認為始於一八五〇年。此時代，正值拿破崙沒落後，全個的歐羅巴，得到和平的保障，而德意志的富力，也日趨於增進；同時在斯勒認和薩克森等工業地方，逐漸購入英吉利的新機械，招聘英吉利的熟練的職工；並且國內關稅的取消，鐵道的開通……等等，這都是激成德意志產業革命的最大原因。

產業革命的結果，最先受其影響的為紡織業。此時候，新式的機械遂代替了從來所用的手織器具了。在一八四九年中，八萬四千二百八十六名的手織工，到了一八六一年，遂激減為一萬四千五百五十七名。這事實，便是示出機械對於紡織業的征服和工場工業的確立，這是不消說了。並且這些機械，都必須由蒸氣運轉，所以對於煤的需要，遂激增起來，因而煤礦業也被革命了。這裏我們可以把

產業革命前後採煤的噸數列舉出來：

一八二四年（革命前） 一二〇噸

一八四八年（革命中） 四四〇噸

一八八八（革命後） 六，五四〇噸

自然，這種採煤量不僅供給紡織工業的使用的。德意志這次的革命，可說是第一次的產業革命，也和外國之例相同，乃開始於紡織業，但這一次革命完成後，無久又接着發生了第二次的產業革命。而這一次的革命，乃是以鐵工業為中心的產業革命。在第一次產業革命和第二次產業革命之中間，這是德意志產業革命一特色的時期。第一次產業革命的影響，給與勞働者階級以一大變化。

在十八世紀中葉，工銀勞働者，不過被少數小工場所雇傭。例如薩克森的基亞拉哥染色工場，所雇傭的勞働者，其數也寥寥無幾。在大陸封鎖時代，工場勞働者之數雖頗見增加，但到了一八三〇年却未嘗有顯著的增進。所以說，在一八二〇年的時候，有很顯然的階級意識的工業勞働者，差不多沒有存在。稍有此階級意識的祇是都市的職工，他們靠着救濟組合，對抗其主人。礦山勞働者，雖組織礦夫組合，但其主力，却不過是集中於請求礦主對於疾病及傷害的處置。不參加組合的工場勞働者，皆散在各都市各地方之家內工業及少數工場，這些工場，自一八一一年至一八二〇年之中間，在薩克

森，不過有七十間之少數，此中七分之五，皆屬於小經營者。其所使用之工人，也不過有數人之多。

自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〇年後，此中間之事情，遂發生了一大變化。例如一八四一年至一八五〇年，在薩克森這個地方，使用五十人至百人的工場為六十四間，百人至五百人者為七十四間，五百人以上者為十一間。據一八六〇年柏林統計局的報告，一八一六年至一八四七年中，布羅伊森的工場勞働者，手工業職人及婢僕之增加率為六·八八 *Procent*。較人口的增加率還高。在柏林，手工業職人的增加率則為五〇·六 *Per centum*，工場勞働者則為一七〇·四 *Per centum*。在未嘗發表此報告以前的數年間，被工業使用的勞働者中，八歲至十四歲的兒童為全人口千分之十三，在柏林則為三十二。

上述之事實，便是敘述德意志社會主義思想根據之最有力的事實。德意志社會主義思想及和此思想站在反對立場的自由主義思想，自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五〇年之中間，才頗見其發達。然此種發達，正是產業革命的反映。關於自由主義，我們在上面已說過了，現在祇對於社會主義作一番的敘述。在一八四〇年，這是德意志社會主義成立的時代，一八五〇年，是反動的時代，可說為社會主義冬眠的時期。到了一八六〇年，社會主義才成爲一大衆的運動，而波及於德意志的政治界。所以德意志社會主義也是一外來的思想，經過自國再生產的過程，才成爲一盛大的思想。而這個思想，便是德意志產



業革命第一次和第二次發展的結果。

## 二

如上所說，德意志社會主義的進行，和其產業革命的進行是平行的。因為德意志社會主義的成立和其產業革命同時都是在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五〇年之中間發生的。可是德意志社會主義的思想，已存在於很遠的以前了。如下面所說，此種社會主義，雖然因為馬克思和拉薩爾等運動後才被社會一般視爲一重要的思想及運動，然在馬克思和拉薩爾未出現之前，此種思想已有相當的萌芽了。所以我們這裏必要把它作爲德意志社會主義的序曲而觀察之。

一七七四年的時候，漢撒（Johann Jacob Wilhelm Heinse 1749—1803）曾在他的「Laidion」中，表明對於私有財產的反對，又在「阿爾庭也羅和其幸福島」（Ardinghello und die glückseligen Inseln. 1787）中，描寫共產共妻的理想鄉。

一七九五年的時候，克林加（Klinger）在他的「大洪水以前的旅」（Reisen vor der Sündflut）中，曾很猛烈地批評貨幣的支配。同年又有一匿名著者，在其「道德政策」（Moralpolitik）中以共產主義爲文化之目的。

并且上面已經說過，哲學者腓西特曾建設一種改良社會的體系。

漢撒，克林加和腓西特等之社會主義思想，都不是直接由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之缺陷的觀察而發達的。已經說過，當時的德意志，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尚不大發達，布爾喬亞及普羅列塔利亞間之對抗，尚未顯然，社會上私利和公利的衝突的悲慘尚少，所以他們之社會意識的對象，不是以社會的悲慘爲基礎的階級對立的社會意識。

普通的社會主義思想，常是由社會中擷取所生的貧富懸隔之事實的觀察而出發的，但是這些社會主義思想家，却未嘗從這裏求其思想的出發點。他們認貧富的懸隔不是盲目的現象。他們不如後面所述的社會主義思想家，能理解擷取者和被擷取者間關係之意義。他們底社會原理，不是由經濟生活之運動法則的洞察而出發，乃是由抽象的原理之理論的結果，或是空想的結果而成立的。

我們不要忽略了在社會主義思想發達的初期，德意志和法蘭西兩國中存在比較上類似的事情。并且德意志受社會主義思想之影響，所以較諸法蘭西爲遲的，乃因爲照應於他種精神運動的緣故。

在法蘭西自由思想的著作中，常存在社會改良的傾向。這裏我們祇介紹一位極端信仰共產主義的，法蘭西自由思想家的牧師美斯利埃(Jean Meslier)。

十八世紀法蘭西之社會主義，對於當時的社會，未嘗給與什麼實際的影響，這個正如德意志幼稚

時代的社會主義一樣，同樣地未嘗給與什麼影響。因為在資本主義經濟組織還未充分發達的所在，原來沒有支持社會主義的人們，缺乏擁護社會主義的大眾。

十九世紀德意志社會主義運動之開源，乃求之於外國。這就是說，德意志社會主義，在其發生之初，原是一種舶來品。在大工業國家的英法，社會主義的聲浪，早已浸潤了全社會。在一八三〇年，關於社會改良的文獻，已為社會一般人士所歡迎。在法蘭西，於聖西門和傅利葉之周圍，已發現多數的社會運動家；在英吉利，除歐文之外，也還有多數同樣的人物。在此時代，影響於德意志最大的思想便是法國傅利葉的社會主義思想。

這時代，同時代表二個階級的即市民階級和被壓迫階級的德意志民主主義，其裏面包藏着多數社會主義的分子。他們所信奉的，便是羅伯斯比埃爾，姚士特和馬拉等之急進主義。又如海涅（Heinrich Heine），也很表同情於社會主義；最代表民主主義精神的，偉大的著作家博恩，在他底「巴黎通信」（Briefe aus Paris）和社會民主主義新聞（Le Reformateur）中，也未嘗反對社會主義。

自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六〇年，在法蘭西社會主義運動愈形發達之中間；在布塞（Bucher），葛羅（Leroux），壁加（Pecqueur），康西德蘭（Considerant），嘉壁（Cabet），露易·布朗（Louis Blanc），普魯東（Proudhon）等思想家承繼其第一流社會主義思想家底事業之中間；在巴黎民衆正在努力實現

此種新思想之中間，德意志才開始發生其最初的勞働運動，編成其理論的社會的政治的文獻。

### 三

德意志社會主義宣傳的萌芽，乃在十九世紀的初葉，其誕生的年代（一八一八）和地方（Trier）正和社會主義最大的思想家卡爾·馬克斯者相同。

德意志工業最發達的萊茵的Trier的青年官吏（der Regierungsssekretär）魯特威·嘉爾（Heinrich Ludwig Lampert Gall 1790—1863），嘗對於撲滅大眾的貧困的事情作過深刻的考慮。他爲着使他底結論被一般所公認起見，所以他在一八一八年的時候，嘗組織一個結社。據其所公布的宣言，這個結社，乃對於那繼續地窮乏的德意志人給與勞働和收益，充分的住宅和所有，并且還極力保護海外的移住（註一）。

這結社的組織，因爲未嘗得到政府的允准，所以終歸於失敗了（註二）。於是嘉爾在一八一九年初，遂渡亞美利加（註三）。但此次渡美的目的，乃企圖在規則上德意志人得到移住美國的方便。但是無久即一八二〇年他又回來祖國了。

嘉爾在亞美利加這一年中的活動，已詳記在他底「我之渡美」（Meine Auswanderung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in Nord-Amerika im Frühjahr 1819 und Meine Rückkehr nach der Heimat im Winter 1820—1822)中了。并且他在美國的時候，也嘗發表「德人亞美利加指南」(Gutgemeinter Rat an meine deutschen Landsleute bei ihrer Ankunft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回來祖國的嘉爾，不再過官吏的生活。然而他未嘗停止他爲貧困階級謀幸福的活動。

他猶熱心研究救濟鄉村困窮的方策。嘗將他深思熟慮的結果，發表在「怎樣才能救濟呢」(Was könnte helfen? Immerwährende Getreidelagerung, um jeder not des Mangels und des Überflusses auf immer zu begegnen, und Kreditscheine, durch die Getreidevorräte verbürgt, um der Alleinherrschaft des Geldes ein Ende zu machen.)這本書之中。發表此書的結果，他所得到的唯一的影響，便是在埃爾佛爾「對於由缺乏及過剩所生的困難之協會」(Verein gegen jede not des mangels und der Überflusses)的建設。

他在一八二八年的時候，又發行一本「人類之友」(Menschenfreundliche Blätter)的雜誌。據這本雜誌編輯者所擬定的綱領看來，則這雜誌的目的，乃在乎用怎樣的手段，來吸收沒有財產的勞働者階級并爲要救濟由貨幣的支配(這種支配有繼續侵犯一切人們所有的永久性)所惹起的財產之少數者的集中和以勞働爲衣食的階級之壓迫起見，必須怎樣地吸收沒有財產的貧者，或是不吸收等等事情。但

是當時社會客觀的條件，不利於社會主義的運動，所以這個雜誌，無久也就停止出版了。

因為這個緣故，他又另下了決心，要利用他種方法，以達到改良人類的目的。於是他決心自己貯蓄巨大的財產。計劃把這些財產，建設一個新村，實施共產的制度（例如設立製造麵包工場和洗濯所之類），以喚起居住者對於一般社會化的觀念及結合為全體生產之資本和勞働的觀念。因為這個緣故，他又埋頭於機械的發明，希望得到相當的款子。在實際上，他已製造了一種用蒸氣連轉的蒸溜機了，當能得到二萬元的款子了，可是此種機械的特許權，又得不到政府的許可。

於是他又再和祖國告別來到溫嘉倫了。他希望在這裏得到一個較好的地方。

在他還未到來這個地方以前，他曾發表一本著作（*Beleuchtung der Försterschen Kritik der geringsten Destilliergeräte* 1835）。在這本書中，很充分地表現出他對於人類解放的思想。

他這一類社會思想，差不多都是由法國社會主義者傅利葉得來的。

他認勞働為一切財富的根源。勞働者便是生產國民財富全體的人們。可是他們却處在最貧困的狀態。而且這種貧困又不是缺乏物質者之貧困，却是生產物質者之貧困。此種貧困的原因，不是生產額太少的緣故，乃是數百萬的人們，除其勞働能力以外，沒有什麼東西，並且他們之勞働能力這個東西，在和支配萬物的貨幣之關係上，本是很無價值的緣故。因此，在連帶關係上，農業家和工匠，也

不得不處在同一的苦境。何以呢？因為勞働者貧困的結果，農業家和工匠的生產物，却不能找到一般的主顧。

而且他還很力說出有產者對無產者之階級對立的事情。他說，社會和征服戰爭（Untertochungskrieg）時代相同，乃由生產階級和消費階級（Nähr- und zehrstand）成立。這就是一者則為完成生產的人們，一者則為有貨幣特權的人們（Geldprivilegierten），即以利息，地租，屋租，津貼，薪金……等一定收入而生活的人們。他又說：「貨幣的特權之所有者和勞働者階級，因互相間利益的衝突，遂分立而處在敵對的地位。後者愈形貧窮，而前者則愈形富裕。這正是一種反比例的狀態。」

他主張由小資產者和勞働者之結合而對抗大資本家。他說，倘如組織有五百人勞働能力的二百個家族為一個共同體而集中生產的時候，則每年常能節約四萬日的勞働。這樣，這個共同團體當能對抗大資本的影響，使大資本家死滅。

他在一八四九年中，又由溫嘉倫回到德意志。其後以多數的發明，得到社會一般的稱譽。這時候，他已完全退出社會主義活動的舞台，停止這方面一切的努力，遂於一八六三年中，歿於Hilber。

〔註一〕這個總社為 Freiherr von Gagern 主唱，叫做 Gagerische Gesellschaft。

〔註二〕為實現此種思想起計，他傾全力，把一切的財產換為金錢。而且他又辭退官吏不作。這是一八一九年的事情。他為

該Gagernsche Gesellschaft，雖未布羅伊政府批准，但獲得該政府的同意是……

“Auf Ihr Schreiben von 4. d. m. berichtet an unseren Chefpräsidenten, erwidern wir Ihnen, dass wir eine sogenannte“ Gagernsche Gesellschaft “nicht als hier existierend ansehen können, da nach bekannten gesetzlichen Bestimmungen ohne besondere königliche Bestätigung keine Gesellschaften für öffentliche Zwecke statutarisch gebildet werden dürfen. Sie insbesondere haben gar kein Recht, hier dergleichen Gesellschaften zu errichten und sonstige öffentliche Handlungen derart vorzunehmen. Sie werden vielmehr ganz nach den Gesetzen als Fremder anzusehen und haben sich darnach zu achten. (Stegmann, Handbuch des Sozialismus S. 245——6)

〔註三〕嘉爾素來已有意于北美西部殖民地的建設了。他嘗和柏林一個協會互相連絡。而這個協會也即為他所支配了。在三月十八日的總會，他被選為三委員中之一。其副會長為建築家Kupfer，秘書為Mesmer。曾決定移民所乘之船四月末由Antwerpen出發。這時候，嘉爾非常得意，在四月六日，他已提前同一十九歲的妻子離開Antwerpen了。但在他從萊茵河來到乘船的地方時，他才感到組織移民國的困難。（當時的日記 Stegmann, S. 276）

嘉爾在 Antwerpen 非常活動，他和船主及食料商人訂結契約，很願慮到航海快適的事情。但其他那二個委員，來到Antwerpen却極遲。他看見這樣的情景，益感到此次移民之不容易成功。在幾多的困難後，這船於五月二十五日才能出帆了。他五月二十八日的日記說：“Was für ein Vorkahn meine Gefahrt sind!” 這時他已知道這些移民多數是



密輸業者，盜賊，欺詐家和公娼之類的人物。多數都是出發前才由監獄中出來的。因為他們鄉里的官吏，禁止他們的歸來，支給旅費，假他們作長途的漂泊（見 *Seemann. Handb. S. 27478*）。嘉爾察知此種事情後，同時感到自己生命的危險（因為移民們企圖把他投到海中去），遂邀同幹部及水手們，公然的和移民做鬥爭，結果嘉爾方面得到勝利了。

他們到了亞美利加後，同時這個協會也被解散了。這時候，移民協會的委員，對於嘉爾應得的多額的交代費，僅賠償其一部分，並且這還是在裁判後的事情，然而他對於這樣的事情，却未嘗有絲毫的失意。他在亞美利加的時候，很熱心援助一般德意志系的美國人。這時他決定 *Pennsylvania Harrisburg* 爲其滯在地，一方面又希望找到地質豐富氣候優良而且地位適中的地方。他滯在 *Pennsylvania Harrisburg* 雖只十個月久，但已得到相當的經驗，據此經驗寫成 *„Gemeinlicher Rat an meine deutschen Landsleute bei ihrer Ankunft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這一本書。

他在這本書中的論述，和在德意志時的主張一樣，乃是大規模組合的利益。他說，在德意志，倘如組織大規模的經營，則可以減少一般民衆對於渡美費的負擔，並且容易實現移民的計劃。又說，倘不組織大規模的團體，則也必須結合着十家族至百家族的團體而移住亞美利加。

他說：「你們如依着結合和互相扶助，則你們可以用僅少的勞苦，戰勝一切的困難，而且在數年之間，你們當成爲富者，成爲獨立的人，團聚在幸福的家庭之中，和平地，享樂你們動移的成果。那麼你們當然喜歡祝福移住亞美利

加之時的降臨吧。」

一八二〇年八月七日，嘉爾又在Harrisburg設立一個Deutsche Gesellschaft。其會長為Georg Lohmann，副會長為Jakob Bucher。其目的在使Gall-Friedrich W. Leopold和R. Schunk組織Landkomitee，連結一般大地主和品行端正的德國移民，解答一般對土地狀態性質的疑問，研究所有權的正當與否，給新來者以必要的注意。這個Harrisburger Gesellschaft的性質，却不如New York, Baltimore, Philadelphia, Lancaster等處之慈善協會的性質。

Harrisburger Gesellschaft 成立後，無久他也離開美國歸來德意志了。

#### 四

在嘉爾底社會的政治的活動終末之時代，為貧困階級謀利益的運動，更發現出一種新的傾向。這次的運動，和嘉爾當時之第一次運動不同，和極端的政治的急進主義相結合，因而頗帶有燥急的性質。

這一次的運動，乃開始於基森一般青年。在這些年青者中，猶以表西拿 (Georg Büchner) 最為努力。表西拿在德意志文學史上，有相當的名譽，雖然他死得很早。

表西拿是基森的學生，在一八四三年，才開始和華依第 (Weidig) 所領導的黑森革命運動有關

係。華依第本是教會的牧師，在革命精神上，當然不如他之急進。他主張用革命的手段，達到建設共和國家的目的。然而華依第却很熱心主張德意志帝政的統一。無久他在基森創設「人權協會」(Gesellschaft der Menschenrechte)的時候，於兩者間政治主張的差異，愈見其顯然了。因爲在此協會創設之初，有人提議對於入會的會員必須宣誓尊奉革命及共和主義，因而牧師華依第遂宣言不參加這個協會。

據表西拿之革命計劃，不僅止於共和國的建設。革命不僅達到政治的目的，同時必須達到社會的目的。他認定純粹的政治的革命，在德意志是不能幸免的。他說：「貧富兩者之關係，是此世唯一革命的要素。祇是饑饉，才能爲自由之女神。農民在成爲肥大的時候，革命一定中途失敗。」

這位年青的社會主義者表西拿，他對於現代的制度的批評，猶爲銳利。他說：「現代的法律狀態，爲使少數頹廢者不自然的欲望達到非常滿足的地步起見，所以才使國民大眾成爲他們頹廢者之家畜。這種法律，是蒙着正義和健全的理性之假面具的野蠻卑劣的暴力。」

表西拿不僅在政治方面主張急進主義，同時他還力說當時壓迫德意志的物質的缺乏。在他，政治的問題，遠遠不如經濟問題的迫切。他以爲不論是政治的自由主義，或是保守主義，這都不足成爲問題。所成爲問題的，祇是多數家族餓麵包的狀態。

在表西拿的社會主義方面，以爲自由主義還遠不如王政的專制主義。以爲自由黨倘如顛覆了德意志政府而建設君主立憲的國體或是共和的國家時，則必釀成如法蘭西一樣的貨幣貴族主義（Geldparisokratie）的橫行。所以他們以爲在那時候的狀態，還不如現存的狀態。

表西拿底思想，得到當時社會一般的同情，所以祕密結社的會員們，頗得到集會的方便。并且一般人都很恭敬他們。

這些年青的社會主義者，他們雖因爲政府的壓迫，不得不組織祕密的結社，但在一方面，他們未曾拋棄了社會的共和的革命之準備。他們嘗樹立發行 Pamphlet 的計畫，向大眾作宣傳的運動。

表西拿爲此目的起見，嘗草成「黑森通信」（Hessische Landbote）一本小冊。但是當時奧凡巴哈的祕密出版所，皆屬華依第之勢力範圍，祇印刷華依第派的刊物。所以表西拿爲此緣故，遂不得不把他底「黑森通信」加上若干訂正。這就是他在「黑森通信」中，插入許多聖書的文句，檢出攻擊由自黨的文句，取「上流」（die Vornehmen）一語代替「富者」（Reichen）之一語。

牠雖然加上這樣的訂正，然這本「黑森通信」的整個的論說，還帶有很過激的社會主義的口調。比如這本書的卷頭說：

「我們應提供和平於草棚的平民，給與戰爭於宮殿的貴族！在一八三四年的時候，我們已發見聖

經犯着虛偽的罪惡了。據聖經所說，神在第五天造農夫和手工業者，在第六天造王侯和上流者。神又命令這些人支配地上一切的獸類。於是農夫和市民，便如蟲蛆一般，不可勝數了。上流者的生活，便是長期間的休息。他們居美屋，衣華服。他們有的是肥滿的顏容，巨大的財富。他們一舉一動，一言一語，皆爲他們自身之利益的。然而一般民衆呢？民衆祇不過是像耕田的肥料一樣擺在他們上流者的跟前！農民跟在犁的後面跑，而貴族却又是跟在他們和犁的後面的。貴族所收穫的是穀物，農民所收穫的是草莠。農民的生活是永遠的勞働。他們祇看着他人張大了喉頭狂吞了他們所耕作的田地。他們的身體是胼胝，他們的汗珠是貴族食桌上的食鹽。」

表西拿這本書，在一八三四年中，嘗配布於黑森的全土。可是這本書的影響，說來很是可憐。什麼呢？因爲當時接到這本書的農家，都爭先驚後地呈交於警察，警察所沒收的爲其大部分。

因爲這個緣故，警察遂命他離開基森，而他遂不得不逃到他底雙親所居住的達爾摩斯達了。他在這裏，又從新組織「人權協會」，於是又遭當局的逐放。喪家之狗的他，於是又離開達爾摩斯達，來到斯德拉斯堡。一八三六年末，他又由斯德拉斯堡過蘇黎世，一直到他底死，皆過着私人講師的生活。這本「黑森通信」是他唯一的政治的小冊。此外如「旦丁底死」(Danton's Tod)，也是他站在社會主義方面討論社會問題的傑作。

表西拿一派的社會的共和的宣傳，因為受着當道深刻的壓迫，「人權協會」既被解散，一般同志復被監禁，所以這次的運動，遂得不到充分的効果而告一段落了。然而表西拿底思想，頗影響於下期基森的社會主義運動家。這次的運動雖然得不到多大的効果而中絕了，然不能說為社會主義思想永久的死滅。被政府勢力所壓迫破壞了的社會主義運動，在資本家和勞働者之對抗衝突中，自必有其活動的機會。

## 五

在德意志國內，急進的運動雖被彈壓，多數思想家，雖被驅逐到歐洲思想運動中心地的巴黎，然這些亡命客，却未嘗中止了他們的活動。他們在巴黎，尚不斷地積極地進行他們的工作。德意志初期的社會主義運動，主要的是在外國進行。至少是一八三〇年的運動，含有這種傾向。當時的巴黎，不僅是歐洲思想的中心，還是物質文化的中心，德意志勞働者在此修業和求職者甚衆，他們正是急進思想家社會主義宣傳的對象。

七月革命後，德意志勞働者才開始參加政治的運動。一八三二年，住在巴黎的德人，才從着「West boten」(Siebenpfeiler 編輯)及「Tribune」(Wirth 編輯)二社的要求，而成立了「出版同盟」

(Fessverein)。這個同盟的目的，在依着合法的手段，使德意志成爲一統一國家，成爲民主主義的立憲國。這個同盟，後來改用「德國人民同盟」(Deutscher Volksverein)的名稱，得到一百名的會員的參加。此中以遊歷諸國滯在巴黎的勞働者居多數。這個同盟的集會，不論什麼時候，其所討論的，皆不外是關於德意志的統一和自由的立憲組織的問題。這時候尙沒有存在直接鼓吹共和主義的分子。

「德國人民同盟」，因法蘭西政府的干涉，在一八三三年末，遂行解散了。至于一般富于革命精神的人們，又從新秘密地組織「德國被逐放者同盟」(Deutsches Bund der Geschäteten)。這個團體，完全是共產主義者的結合。其綱領則爲德意志之解放及再生，民權之保障。

此外又對於入會的會員，特別提供一種特定的原理。其中有一段這樣說：

「被追放者同盟之目的，在解放德意志脫出侮辱的隸屬的羈絆，除非人類能夠有先見之明，不然，必須阻礙它復歸隸屬的狀態。這主要目的之達到，祇是首先依着完成及維持屬於德語和德國風習的各國之社會的政治的平等，自由，市民的道德，民族的統一，其次完成及維持世界各民族之社會的政治的平等，自由，市民的道德，民族的統一才可能。」

并且在加入同盟的時候，還必要宣誓嚴守同盟的祕密。

在會員的規約中，有對於反叛同盟者處以死刑的規定。

這個同盟成立後，於最短的期間中，在巴黎的德國勞働者，參加者有二百名之多。這些加盟的勞働者，在歸國的時候，各人又在其鄉里的急進手工勞働者間設立支部（同盟內則稱之爲「小屋」Hütten 或「細胞」Zelle）。可是其指導者却不是勞働階級分子，乃是當時逃亡于巴黎的著述家伯涅地（Jakob Benedey），學者格爾曼·梅拉（Dr. German Meier）和哥敦堅大學講師什斯達（Dr. Wilhelm Schuster）。他們都是月刊「被追放者」（Die Geächteten）的編輯。這個月刊祇維持到三十年代的一半。這個月刊的言論，完全是徹底的民主主義的原理；在社會的要求方面，則爲取消民衆所擔負的重稅和施行累進所得說。

伯涅地在一八四二年十一月的「萊茵報」上，曾主張把此同盟由祕密結社改組爲公開的宣傳團體，但因爲得不到多數會員的容認，于是遂退出此同盟了。伯涅地退出此同盟後，便代替以什斯達爲該同盟的指導者。

在什斯達指導之下，這個同盟，遂漸漸地趨於社會主義的方向了。已主張財產平均分配論了。什斯達對於德意志的宣傳，非常努力。他常爲此書成三本小冊：

「被追放者檄文」（Aufruf eines Geächteten）

「被追放者信仰告白」（Glaubensbekenntnis eines Geächteten）



「人權及市民權之說明」(Erklärung der Menschen U. Bürgerrechte)

此外又派遣多數宣傳委員到德國內地，努力設置新支部，設法使本部和支部間之連絡。

德意志的警察，在一八四〇年，開始從事搜查不來梅的「被追放者」，其後漸次擴大到柏林，納騷，佛琅克佛爾，梅尼士的支部。經過二年餘的裁判後，在判定之被告者中，以小市民及勞働者居多數。該同盟爲達到其目的起計，所採的手段，不僅限于武裝的暴力，并且採着智識的暴力 (intellektuelle Gewalt)。至對於民衆的宣傳，主張依着漸進的教育，以使其達到自由的享樂。在各地地方所被起訴的會員，除梅尼士三十名宣言無罪外，其餘皆被處以長期禁錮之刑罰。

## 六

三十年代中斯威治勞働者間將發生共和主義的運動。斯威治當時的祕密結社，以「青年德意志」(Der junge Deutschland)爲最有勢力。「青年德意志」爲「青年歐羅巴」(Das junge Europa)的一部，其中中央委員會設在巴黎，是國際的祕密結社，「青年歐羅巴」之目的在使歐洲全體各成爲共和國。他們打算逃回各自之祖國，同時發生革命，以達到其目的。

在一八三四年的時候，由麥志尼 (Mazzini) 所領導的「青年意大利」(Giovine Italia)，雖卒先

地執行此主義的實際工作，但不能達到其目的，而終歸失敗了。何以呢？因為意大利的民衆，對於他們這次的嘗試，毫沒關心，革命軍得不到一般民衆的擁護。

然而這一次的攻擊的失敗，却未嘗使「青年歐羅巴」的黨員拋棄其空想。

「青年德意志」除尊奉這種國際的革命的共和主義思想之外，它還有它自己特有的思想。這種特有的思想，便是對於暗殺國王的稱贊和獎勵。「青年德意志」的指導者如菲茵（Georg Fein），盧山不拉特（Rauschenplatt），斯脫羅米亞（Stromeyer），哈林克（Harro Harring）等，都是很忠實地繼承一八一八年以暗殺國王為神命，道德的正義的學生聯盟的傳統的人物。這些人，都是被逐出德意志的學生聯盟的團員。這聯盟中的詩人頗靈斯（Carl Follen）嘗歌頌此思想說：

在復仇的祭壇上

有用「紫衣」「王冠」「美絹」

美裝起來的犧牲品，

站在壇上。

像這樣鑽美暗殺國王的歌詞詩賦，在「青年德意志」的領袖中，人人都能題作的。當時「青年德意志」宣傳的方法，乃借着基督教義的名目，要在斯威治的勞働者間開拓其根基。這種急進的陰險的

企圖，最先乃由丹斯達的基姆那沈的教師埃崙士·什拉 (Ernst Schuler) 傳達于一般普羅列塔利亞。埃崙士·什拉很相信傳達此種急進思想後，一般手工職人，當然歡喜回到故鄉，增加反對黨的勢力。他根據此種私見，於一八三三年，在培茵所設立的讀書會中，召集德意志的勞働者，結果得到四〇——五〇人加入「青年德意志俱樂部」(der jung deutsche Klub)。

一八三四年，埃崙士·什拉任此團體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長，同時他又發出一種通牒，命令各地方支部公開設立勞働者讀書會并勞働者疾病扶助會，其指導權仍歸于「青年德意志」的領袖。并且他一面又非常努力使這種思想擴大到各方面的勞働者之間。這個團體，是對於秘密結社的一種準備的學校，從這個團體，募集秘密結社的團員。

這種勞働者讀書會，無久遂在伯爾尼，蘇黎世，魯色內，羅塞內及其他各地設立起來了。

伯爾尼的團體，嘗使多數勞働者參加一八三四年六月有名的斯丹賀挨爾治利的民主主義的示威運動。從此後，正如人人所期待的一樣，結果遂得到多數勞働者參加秘密結社。這些參加者，完全是擁護「青年德意志」思想的印刷工人。從此後，秘密結社的會員，遂變成純粹的普羅列塔利亞了。這些會員總數有三百名之多，散在瑞士各地方。并且本部（在培茵地方）的中央委員會，在一八三六年，於五名的委員中，勞働者占四名，這四名中三名為排字工人，一名為刷毛工人。

跟着會員的增加，而「青年德意志」的文獻也增加起來了。在一八三五年的時候，散文并詩歌的小冊，至少也有八本，都是代表此傾向的思想的。而其內容，也都是向着勞働者宣傳的。

一八三六年，這個團體，嘗發行一本主張共和主義革命的月刊。這個月刊，就叫做「青年德意志」(Das junge Deutschland)。

一八三五年一月，德意志諸政府，禁止手工工人遊歷瑞士。但是這樣，猶不能滿足德意志聯邦的慾望，因為他們感到極端宣傳的利害，所以復請瑞士政府驅逐「青年德意志」的運動家出境。

這樣，「青年德意志」遂被打破了。於是他們遂逃避于烏黎的工人中，一面嘗受極度的痛苦，一面收拾殘存的勢力，經過數年間惡戰苦鬥，又形成了一個新運動的地盤。

在這中間，巴黎的德國勞働者，已發生了一大轉向。這個轉向，便是傾趨于社會主義的轉向。在巴黎，於一八三六年間，設立了一個祕密結社的「共產主義者同盟」(Bund der Kommunisten)。其組織爲一定數的會員，組成一個 Gemeinde，由一地方的數 Gemeinde 組成一個 der Kreis，復由數 der Kreis 組成一個 Letender Kreis。這結社之最高權力機關則爲 Zentralbehörde，由其任命各 Kreis 的代表。

這個新團體之目的，乃在破壞德意志的組織，建設一共產主義的共和國。其構成員，完全爲勞働

者。其創設者并主動的指導者則爲 Dr Herman Ewerbeck 和 卡爾·塞巴 (Karl Schapper)。此二者皆受過德意志的高等教育。猶其是塞巴，他是基森的學生，嘗參加比西那的運動，未經逮捕，因而得逍遙法外。

這團體成立後，無久得到一個知識豐富的青年參加。這個青年，便是裁縫職工的威脫林 (Wihelm Weiting)。威脫林非常聰明，表現明確，且富于情感，可稱爲普羅列塔利亞的典型，放出最初的光輝。因爲他自身具有這樣的特徵，所以加入此團體後，于很短的期間中，已占着確固的地位。一八三八年，他嘗編述一本關於共產主義的小冊「人類論」(Die Menschheit Wie Sie ist und Sein Soll)。在這本書中，他說明貨幣的廢除并勞働之共同分担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主張共產主義爲解決社會問題的唯一方法。這本小冊雖只印刷二千部，然對於這二千部的印刷費，一般貧窮的同志，其負擔已夠辛苦了。此中有的充當夜間排字工人，有的將其衣物典當，有的提供其全部的工銀以充當此書的印刷費。

這個共產主義者同盟，好像和巴布夫主義者布琅基 (Blanqui) 及巴爾巴 (Barbes) 所領導的極左傾的「四季協會」(Société des Saisons) 有多少關係。因爲這個同盟，嘗參加「四季協會」所領導的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二日的暴動。因此次暴動而被捕的人，多帶有武器，此中有一個是東橋基的靴工奧

斯庭 (Austen)。這次暴動被鎮壓後，因巴黎警察的搜索，才爆露出這個共產主義者同盟和德意志勞働者團體的關係。此中如有名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指導塞巴也在被逮捕之列，但不能發見他有可罰的行為，無久遂被釋放，但他此後已不能再逗留于法蘭西了，不得不再跑上他被逐之途了。于是乎他便來到倫敦，進入德意志勞働者間繼續其宣傳工作，一八四〇年，又組織一個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支部，和一個公開的勞働團體。這個團體存續頗久，後來發行一本刊物，由約翰·墨詩特 (Johann Most) 編輯，其名稱爲「自由」(Freiheit)。這個「自由」有由極端的共產主義進趨于極端的無政府主義之新傾向。

## 第九章 觀念論的社會主義

### 一

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〇年的初期，共產主義祇有很少數之信奉者。雖然這些信奉者的存在，不僅限定於倫敦和巴黎。就在德意志內地，常常也有由倫敦，巴黎歸來潛住的共產主義者。例如佛琅克佛爾警察調查的結果，發見當時在巴黎所發行的共產主義小冊「人類論」。

然而一般的宣傳德意志共產主義，在此主義之下，聚集着不少同志的則爲此小冊作者威廉·威脫林。

威脫林一八一〇年生於瑪德堡。他是普羅列塔利亞的私生兒，自少年時代起，嘗盡世間一切的辛酸。并且他還不得不經過嚴酷的徒弟的時代。他底勞働時間，常常是由早上五點至深夜的。在他升任裁縫的時候，而他也就離開瑪德堡了。他也嘗經過好幾次的戀愛。其中一次，這位美貌而且精神愉快的裁縫，竟公然和哈普士堡家之王子爭愛，結果雖得到勝利，然因王子的壓迫，遂不得不離開祖邦。

來到巴黎的他，無久就加入共產主義者同盟，熱心研究巴布夫，聖西門，傅利葉和嘉璧之思想。在研究的時侯，他一方面又着手著作，寫成上揭之「人類論」。他底天才，早被一般同志所公認。于是一般同志，都希望他到瑞士從事宣傳工作，因為當時瑞士宣傳共產主義比較上自由些。

這裏必須記述他底思想學說的大要。他底思想，可以分爲三段來觀察：

- 一 現在社會制度的批評
- 二 將來國家制度的記述
- 三 由現社會推移到理想狀態的計畫

威脫林乃用思辯的方法說明現社會組織之成立。他底言論，乃直接由 Bible (即 Holy Bible 之略——譯者) 的，樂園的原始狀態而出發。他把這狀態作爲人類應祝福的幸福的時代而描寫。他說，這時代的幸福，雖不能說爲得到文明的保證之快樂生活，然這時代的人們，都是處在自由獨立享樂的地位的。一切人們，都很能得到滿足他們自己的欲望。如狩獵，飲食，戀，遊戲等等，都是人類日常最爽快的生活。其次漸漸認識動物之奶乳爲人類的飲料。并且這種奶乳，又是用不到多大的勞力而收穫的。所以人類便選擇其中最溫和者而馴養之。從而社會遂分歧爲牧畜生活和職業階級了。牧畜者則計算其牲口的個數，狩獵者則計算其獸皮的張數。于是乎人們之間，於不知不覺間遂成立了私有財產



的概念。

再經過若干時日，人們漸漸成立了自己財產的所有權。這個財產權，便是當時最合時宜的制度。何以呢？因為當時未嘗缺乏家畜和野獸。

其後農業也被發見了。可是這時候，每有發生一人播種他人收穫的惡習，農業者為防禦此種爭端，確保其勞働享樂起見，遂為團體的結合。這麼一來，此中間便發生了一種所謂熟練的農業家了。他們開墾土地，土地當然屬於他們所耕作。「我飲着額上滴下的汗珠，開墾這土地。然而你要在此土地上播種嗎？這土地為我所有了——」彼說。他驚異彼底主張，臉紅起來了，一面盤踞，一面叱說：「這土地是我所有。這時谷音猶噙噙地響着。他們兩之間，你一句，我一句，鬧得傍者不寧。于是傍的人也都插嘴說：這土地是我們的。」「你的」「我的」「我們的」鬧的不休。」

經過這樣的爭端後，土地私有權遂被確立了。土地私有權確立後，未嘗有什麼矛盾的現象發生。因為當時的空地很多。土地私有的法則甚適合于當時的狀態。

然而日復一日，人口遂漸漸增加起來，而土地的面積，又是不變的東西，一切土地，已被分割占據，凡是土地，皆有其所有者。這樣，財產權也就告成立了。但是當時沒有財產的人甚多。這種現象，正是對於現在社會所犯的不法，為不可容許的害惡的盜賊。同時這個也是歷來一切害惡，一切缺

乏，一切困難之原因。

財產制度爲防止財產所有者死亡後關於財產繼承的爭端，而設立財產相續的制度。這樣，一般人，即使沒有什麼勞働，也可以享有生產物。因而懶惰便成爲財產的產物了。

一般的利害，此中尤其是對於掠奪的恐怖，使財產所有者發生動搖，因而結合，在危險的時候，使超越其個人的利害。這種危險，威脅於各民族愈大，則各民族之互相團結也愈堅固。并且頻繁的交通和由交通所生的言語習慣之共通，使他們踴躍於特殊社會的組織。從而成立了民族。在他們之間，因諸民族不斷的敵對，而發生界限。人們爲要清楚地劃分界限，遂借着自然之補助而發見界限。在此境界中之土地，乃爲一民族的財產。這樣，財產制度便是使戰爭發生的最大原因，是可恐中最可恐的東西。

因戰爭又發生了奴隸。人類底勞働固是很辛苦的了，而一方面又受武人的輕蔑。一般武人，從前很喜歡殺戮戰爭所得的俘虜，但後來却改爲強制他們勞働了。因爲這個緣故，他們便變成奴隸，被主人如家畜般飼養。他們祇得服從他們主人的意志

這中間，農業愈益完備，人間之享樂，愈益增進。各人有各人優秀的特有的勞働，所以各人便完成各人的生產物，以和他人的生產物相交換。當時的勞働不受什麼規制，各人可以貯藏生產上最良的

材料，使他人提供利益。貯藏者將所有的材料和他人的利益相交換。多數企業者，因這種交易得到極多的財富。從而對於財產少的人之影響也極大。這樣，對於富者的敬意愈高，對於貧者的蔑視愈烈。所以富便尋解決個人問題唯一的原因。從而自利心遂一般的擴張起來。

生產物交易時之不便，遂使貨幣制度的發生。這就是利用金屬片來決定所交易的商品之價值。所以這個金屬片，自身本來沒有什麼價值，因所有者欲求之如何，而得到一增減的價值。這樣，奴隸的制度便很不適合于時代的需要了。何以呢？因為富者可以靠貨幣而維持其舊時的狀態（其實却使此狀態惡化了）；并且他們利用貨幣的力量，可以減省對於奴隸過勞時不能多量生產的費心，他們在盡其所能掠奪得勞働者之身體虛弱的時候，可以把其解雇，代替以其他強而有力的勞働者。自貨幣制度成立後，貧困現象遂極端普遍化了，使人們之自利心愈奔放起來，忘掉了一切的羞恥。在舊時代，婦女則如家畜般被掠奪和交換；且用暴力使弱者之雙親，兄弟和夫婦之間分離。然在貨幣制成立後，貧者則把他底身體賣給貨幣的所有者，把她底美和優雅，德和處女性向富者交換貨幣。

低廉地評判勞働其價的事情，在以前，不如貨幣制度下之容易，因為一切場合交易生產物的比較，常常很妨害低廉地評判的。

特權階級到底不能靠着貨幣而增加充足他們底欲望和享樂，同時下層勞働階級，因其勞働負擔的

惡化，生活資料的減少，愈使他們感着不安。

便是社會中一切腐敗，欺詐，盜竊……等等，也是由貨幣所生的。并且貨幣之所有者，對於沒有貨幣的人，設立法律和刑罰。於是強者竟公然掠奪弱者了——即在進貢，租稅，利息，沒收，訟費，減少工銀，高利貸等等所謂合法的，法律保護的名稱之下，盡其所能而掠奪他們。從而勞働者階級，愈益陷入悲慘的生活中。

我們以下再觀察威脫林之社會的國家。

據威脫林，國家的目的是萬人的幸福。國家祇在人們有同一的享樂的場合，在人們能夠同樣地發展其才能的場合才能實現。所以真正佳良的社會制度，不得不是確實地保護各個人欲望之自由和各種人間欲望之調和。但這個保護，正如對於社會不絕的完成的保護一樣，祇是社會的國家，才能夠提供的。這樣，社會的國家，才能得到真正的實現。

威脫林的言論乃由欲求出發的。他嘗分要求為三個主要部類：

- 一 營利之欲求。這充足就是營利，工銀，所有等等。
- 二 享樂之欲求。這充足就是健康，幸福，名譽等等。
- 三 知識之欲求。這充足就是理解，博識，才能等等。

這三種欲求，乃發生於和他種關連之中。何以呢？因為人們對於其無所有的東西，不能得而享樂之；并且他們對於某種東西，既不知怎樣變成自己之所有，當然無所有什麼東西的。從而知識的欲求，便是社會組織的主要動力。并且又須依此知識之欲求而指導他種欲求。但在充分的程度中却不發生這種事情。

為滿足營利欲求之行爲形成生產。而為滿足享樂欲求之行爲却是消費。為認識，完成，高尚欲求及行爲所用之東西便是知識。而為充足此知識所行的欲求之行爲及交換勤勞之行爲則為管理。實際上行管理者，則是科學，不是個人。所以威脫林把個人的利益離開科學，復把這個人和科學的分離，作為最高的原則。據此理由，故不能把管理權讓給王侯，獨裁官或共和的多數黨。何以呢？因為這類政治形態，乃為個人的利益而行管理。

從着以上之法則，管理之任務，便是勞働及享樂之平等分配，人間虛弱及疾病之根絕和療治。故管理者不必要有較他之個人更高的特權。為達到管理之目的，管理者須是最有用的科學的天才。這諸種科學如次。

一 哲學的療治法 (die philosophische Heilkunde) 為最重要的科學，了解人間全肉體的并精神的性質，包括着根絕其肉體的并精神的虛弱和疾病之知識。這種科學，是集中今日之神學者，

法學者，哲學者之學問的科學。

二 物理學乃對於自然之諸力并人類之幸福的知識。

三 力學乃關於種種手工并機械作用之學理和實際的完全的知識。

我們現在爲要委任於社會的管理，所以首先必須發見最大的天才。威脫林很不滿意於當時現存的，所計劃的選舉制度之採用。因爲這個制度，都是擁護個人的利益的。他主張用筆記的試驗，測定天才的力量。在此場合，可以收容多數參加試驗的人才。我們用此方法，在選擇時，可以區別個人和其能力。爲審議社會幸福之問題計，必要召集多數專門家，開一個會議。希望被選任行政官的人，必要將他對於此問題的思想，作成一篇文章，呈出給這個會議。對此問題給與最良的解決方法的人，就任該行政部門的官職。至於裁判官之職能，則爲行政官廳之一員行之。處在官吏中最高位者爲「脫利阿」(Trio, Dreimännerrat)。而「脫利阿」則由哲學，物理，力學之天才組織之。處在第二位者爲「中央主任會」(Zentralmeisterkompagnie)。由「中央主任會」選出「脫利阿」。重要的行政部門，皆由「中央主任會」管理之。其次者爲「主任會」(Meisterkompagnie)，任地方的行政。爲使簡易執行行政計，「主任會」必須由同事中選出事務主任 (Werkvorstand) 一名。「中央主任會」又選出事務總長 (Grosser Werkvorstand) 一名。而事務總長則爲行政執行者而補助「脫利阿」。這類官

員，皆應作必要而且有用的勞働。

此外對於還未一般化的「愉快的」勞働之執行，又必須在主任會之外，設立「藝術院」(Akademien)。這個藝術院，與主任會相同，設立一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就叫做「藝術委員會」(der akademische Rat)。這個委員會乃受「保健委員會」(Gesundheitskommission) 底指揮。而保健委員則同事務總長幫助「脫利阿」處理全體的政務。

同時需要才能，而委員之數又不充足的行政部門，必須選擇當時最有才能者充任之。不需要才能的部門，則祇須依當時和事業方面有關係的勞働者隨意之方法而選舉之。

關於前任委員會之委員所提出之問題，必須任命上揭行政委員會之一員為最善之解答。

行政官之任期不定。行政委員對於候補委員之能力并知識，若認為優秀時，可讓渡其地位與該候補委員。

行政之執行，雖以此方法而由最高才能者為之，但其勞働之組織則如次：

一切人們，首先必須受過全勞働準備學校之教育。祇是經過某種有用的機構的勞働的實際試驗，才能進入社會。

威脫林又區別社會之勞働為三種：

一 必要勞働。就是對於有用科學之擴張，進步之勞働，治療所之維持及完成，青年一般教育，衣食住及生產物之互相交換，社會成員之休養等等之必要的勞働。

二 有用勞働。就是對於機械及鐵道之建設之類的勞働。

三 愉快的勞働。就以感覺的享樂之洗練爲目的的勞働，如劇場，酒店，菜館之類便是。

這樣，「脫利阿」必須決定全國民所需要的生產數量。至於此生產所必要的勞働時間，則使各有勞働能力者平均負擔。這些人，必須爲行政官，病者，老人，小兒等勞働。至於勞働的選擇。則屬於個人之自由。個人必須常常顧慮到能夠轉換其勞働的事情。

對於必要并有用的勞働之義務，在一方面，乃和對於勞働生產物之要求權相連結。而實行這事宜者則爲事務主任之任務。

因快適勞働之財底生產及消費，與其規律相異。享樂這件事情，不論何人，必不受強制；爲勞働，或爲享樂，皆屬各人之自由。一切人們，可以靠取得享樂生產物之目的，而從事必要生產品之生產。爲使此勞働和對此勞働報酬的平均計，享樂品必須和爲得到享樂而生產的必要品同等價值。威脫林便是要依着下面之方法而樹立這事情的。就是（一）各人必須通知欲得怎樣的享樂品。這個須依着需要和供給相一致而行之。（二）授受時間（Kommerzstunden）的設定。第一用這種授受時間，依着生產



必需品之勞働時間而決定享樂生產品之交換。各人必須將這種時間記入其授受手摺 (Kommerzbuch) 中。各人可以向各家授受所提出其授受手摺，領取授受手摺中所列記的，被許可的享樂品。享樂品的價值，必須嚴密地依其生產所費的必要勞働時間而計算。并且這個必須常常和授受時間之相當數相等。這樣，生產必需品所用的勞働時間，才能和製造享樂品所用的勞働時間均衡。然享樂品，因為其稀少性的緣故，使其價值高漲的場合，當生出必要品的剩餘。倘如故意把高價的洋酒，寶石等商品貯藏起來，使一般需要者不得充足的時候，那麼這類商品的價值，必能達到需要供給完全均衡的狀態而高升。又如，便是對於受過能力試驗當選的人們，給與一定的授受時間，而享樂財之價值，也自必高升起來。這個便是社會對於提供新思想的功績的一種報酬。

授受手摺有效期間以一年為限。在這個期間後，即使是在各種授受時間中未嘗領取的享樂品，也已失其領取的時間性了。這個原是禦防貯蓄財富的一種手段。這裏威脫林更以同一的目的而主張相續的廢止。這場合，凡是一切生產物，必須交給保健委員會管理。而此委員會，則照應於其物之狀態，使一般所利用，或拋棄之。

為禦防贈與，賭博和盜難起見，一切授受手摺，必須附加其所有者之照像和履歷書。祇是本人才能領取享樂品。

在授受時間中，雖可以隨意工作，但是有這種自由意志的勞働者，在過剩的時候，才能中止其工作。這就是在工作中不得領取享樂品。依着這種方法，就在愉快或不愉快勞働之自由選擇中，也有一方面業務宣告缺乏勞働者的時候。即使一勞働部門，勞働志望者非常多數的時候，則對於參加業務的試驗，也須嚴重，而取錄之人數，也應如平常。

快適品之生產，在執行上，有好多地方和必需品及有用品之生產不同。關於快適品之生產物的設計及試驗品，經過藝術院之檢查後，陳列在美術館，以供希望者之欲求。迨希望者提出定造的時候，藝術院才整備此種美術品的製造。便是在委員會中不當選的文藝作品，也須陳列在一定的室內，以供一般之觀覽。這種作品在有一定數的希望者時，才着手印刷。對於此種作品的作家，以一定量勞働時間為報酬的標準。但這種報酬不得超越普通勞働者一年間勞働時間以上。

女子的勞働，也必須如男子的勞働一樣組織起來。其組織狀態，和男子之場合完全同一。惟女子不能參加「脫利阿」，不能任中央主任會委員。可是女子倘有同男子一樣的熟練，則對其職業之選擇，也有一優先權。有小兒的母性也有特權。對她們婦女，為着給與最容易的勞働起見，必須開放各種職業部門。并且必須使她們選擇那能夠在家裏小孩身邊實行的勞働。

自三歲至六歲的兒童，必須入學校隊（Schularmee）。一直到用試驗證明認為具有必要出社會謀

生之熟練的勞働并科學知識的時候，他們皆在此學校中生活。此中能力超衆的人們，可以更進而受高等的教育。大學中之教育，應作爲勞働時間而計算。

在此種社會的國家中，既無犯罪，自也沒有設立對於犯罪之法律并刑罰之必要。我們今日所謂犯罪，這不過是社會的不秩序之結果。這類惡果在被掃除後，所殘存的，祇是人間自然的疾病和虛弱。而這些東西，不是靠刑罰而療治，乃是靠醫藥而療治的。一切的病者，在其臥病中，應作爲未成年者而處在醫者保護之下。病者不應遺棄，在其痊愈後，仍是社會之一員。這時所說病者，不僅指臥病的人而言，比方如違反爲萬人幸福所規定的法律而妨害全體之調和的人，也被看做精神病者。

屬於威脫林思想一派的社會改良家，皆認爲實現此社會的國家，必須掌握政權。而掌握政權的手段則有二種：

(一)民衆的啓發。爲此起見，不僅必要一般信仰主義的分子，而且必要得到言論的自由和裁判的公開。這樣，才能給與民衆以相當知識。

(二)必須盡所能使現存之不秩序達到其極點。這樣，才能得到民衆毅然地割開他們保守的紐帶，瞭然他們的狀態，信用一般要改良他們困窮者的權力。

這樣，社會才用如次之方法而由現狀態移到社會的國家。

(一) 毀拆貧者污臭崩壞的家屋，使其暫時住在公共的建築物或富者之家屋。

(二) 宣告一切借據，相續及貴族之特權爲無效。

(三) 組織勞働組合，實行事務的選舉。

(四) 凡是國家人民，尤其是屬於行政及軍隊的人們，皆營共同生活，他們間無階級之差異，受同一生活資料。

(五) 租稅用實物繳納。官吏則靠此租稅而生活。官吏不支薪金。

(六) 沒收移住外國者之財產并其所利用之土地。

(七) 國家并教會一切財產，須爲社會最善事業而使用。

(八) 凡是人類，喜歡時就加入共同生活，得和他人同一條件而生活，就沒有勞働能力者，也得以同樣的條件而加入共同生活。

(九) 行政的能力，首先必須改良土地和學校。

(十) 在區，縣，省，全住民的四分之三，若已決定其財產爲共有的時候，則所殘有之四分之一，必須服從此決定。

社會的國家，便是據此種方策而出現的。倘如威脫林主義者得不到政權的時候，他們一定依着激

烈的鬥爭手段，向着所有者進擊。

且據威脫林，就依着王政，也可以達到現狀的破壞。一般共產主義者，都相信這是很妥當的卓見。他說，若果爲王者能毅然地拋棄其王冠，寶劍和自利心，則在社會的組織中，他可以處在獨裁者之地位。他底主著「調和與自由之確保」(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iheit 1842)的結論，便是要求王者解決人類問題的。

在瑞士的思想家及勞働者間，受威脫林思想的影響最多。一八四〇年，他在瑞士的宣傳，最有重要性。信仰他底主義的社會主義雜誌和勞働者讀書俱樂部，皆受瑞士各地「青年德意志」之思想所感化。并且瑞士這個國家，又是發行威脫林各著作的地方。不但他底「自由與調和之確保」，乃在蘇黎世出版，便是「貧困罪人之福音」(Evangeliu eines armen Sünders 1845)，也是在伯爾尼出版的。我們只據此一事，便能知道他在瑞士宣傳活動的旺盛了。茲舉出他底同志如次：

伯加 (August Becker) 爲基森的學生，嘗受過表西拿底影響，在京府宣傳共產主義，有名著「現今民衆哲學」(Volkphilosophie unserer Tage 1843)和「共產主義者喜歡什麼」(Was wollen die Kommunisten? 1844)二書。什拉 (Sebastian Seiler) 也是他底至友，嘗著「危險中的財產」(Das Eigentum in Gefahr! Oder was haben Deutschland und die Schweiz vom Kommunismus und

Vernunftglauben zu fürchten?），「一八三八年法瑞戰爭」（Krieg zwischen der Schweiz und Frankreich im Jahre 1838, Verursacht durch eine Schütze, einen Spion und die bernische Aristokratie）：一書。此外又如亞布列西（Albrecht aus Altenburg），也有多幾本小冊的著作。

至表同情於威脫林之立場的人，則如夫勒伯爾（Dr. Julius Frobel）。受威脫林底影響而代表無政府主義的傾向的則有威廉·馬爾（Wilhelm Marr）。威脫林在瑞士宣傳中，經驗其思想上之變化，主張用暴力的行動，因此遂被當局所捕，處以數日的監禁，復追放其出境。在威脫林被追後，瑞士的運動，乃受馬爾之領導。

## 二

初期德意志社會主義，嘗受法蘭西社會主義尤其是傅利葉和聖西門之影響，已如上述。在此意義上，德意志社會主義，其最初乃由法蘭西得到近代社會主義之概念，這非過言者。因而我們不得否定：德意志社會主義，不僅限於初期，便是在其成立的時候（一八四〇），尙寄託於法蘭西社會主義，然而在德意志社會主義成立的時代，法蘭西社會主義，却被德意志之哲學所調味了。

一八三一年黑格兒底死，毫不減少德意志觀念論哲學之勢力。在黑格兒死後，理想主義哲學之勢

力，反而握着當時支配德意志思想界的權力，處在國家哲學的王位。而石林克（Schelling）便是這方面之代表，浪漫主義者之一。石林克由神妙哲學的立場，要使黑格兒之思辯的哲學，和其經驗并宗教互相調和。他要跟着德意志古典哲學傳統的理性，走向體驗及直覺，基於經驗和直覺，樹立一種新哲學，完成黑格兒之哲學。由此看來，我們便能窺見當時社會一般對於黑格兒哲學全盛之反感的一般了。當時柏林大學，便應此社會一般的需要，招聘石林克為哲學的講演。此外處在黑格兒哲學反對立場的人則如華士（C. H. Weisse），克蘭·皮世德（Klein Fichte），卡爾·克老比（Karl Christian Friedrich Kraube）等等。

在黑格兒學派中，由宗教的問題，分出二個不同的立場。其一為主張黑格兒哲學和教會之信條相一致，其一則說黑格兒哲學在理論上和教會之信條相矛盾。斯特拉士（David Friedrich Strauss 1808—1874）則把此二個對立看做教會的右黨和左黨之對立。黑格兒學派之所以分為左黨和右黨，其原因就是關於此問題立場的不同。屬於黑格兒右黨者為哥塞爾（Göschel），羅森克蘭士（Rosenkranz），愛特曼（Erdmann），屬於左黨者則為斯特拉士，費巴（Ludwig Feuerbach 1804—1872），露格（Arnold Ruge），保亞（Bruno Bauer），黑思（Moses Hess），卡爾·克林（Karl Grün），塞拉爾，Max Stirner，以及青年時代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黑格兒左黨理論的運動，在其轉向於哲學的社會的唯物論

上，可以窺見其大概。此種唯物論的傾向，在脫靈德曼堡（Trendelenburg）底著作「論理的研究」（Logische Untersuchungen）和「倫理學基礎之自然法」（Naturrecht auf dem Boden der Ethik）中，已很明瞭地表現着了。

斯特拉士是批評宗教問題的第一人，他最初由急進的立場考察宗教問題。由急進的立場而批評宗教的時代，乃在斯特拉士底「基督傳」（Leben Jesu 1835）和費巴底「基督教本質論」（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 1841）發行後的數年之中間。這樣，我們可以認斯特拉士為批評宗教之第一人，費巴則為其完成者。所以馬克思在其「黑格兒法律哲學批評」中說：「現在之德意志，關於宗教的批評，已告完成了。」在宗教之批評後，接着又有馬克思等之實現國家和社會之批評。在此意義上，德意志中宗教之批評，在形成社會思想發展之一契機這一點上，是很重要的。

斯特拉士底「基督傳」中所成為問題者為福音書之歷史的要素的問題。即就是福音書所記述的事柄，究竟是不是一客觀的歷史要素的問題。斯特拉士對於此個問題，認為不是一客觀的歷史，不是意識的虛構，乃是一種神話。可是為什麼緣故發生這種神話呢？這個原因，一方面則在感動基督時代及其人民之宗教的理念的梅西亞底思想，他方面則在以基督給與其使徒們之印象為動機的無意識的創作。所以福音書上所現的基督，決不是客觀的歷史中之人物，他祇不過是現在人們信仰上之基督。這



就是福音書中說基督是神人的話，原來便是他們的基督觀。

據斯特拉士說，黑格兒底使命，爲基督教和哲學之統一。黑格兒認基督教爲一種神學，爲統一的原理。然據斯特拉士，基督教却不是一元的，乃是二元的。基督教祇實現一人之神性和人間性之統一，至於一人以外之個人，却被置在神性和人間性之外。而這一人之基督，祇是嘗過十字架的痛苦，才能實現此統一性的。像這樣的基督，便是行着神之世界和人之世界之對立的。然而原始之基督教，却不喜歡使神之世界浸滲於人之世界，却期待將來神之世界用超自然的方法破壞人之世界。像這樣解釋的斯特拉士底結論，便不外視基督教爲信者和不信者之對立，因而是一切融和物之對立物。他之所以這樣的觀察，原因他不由個人之孤立的意識說明宗教這個東西，乃視宗教爲一社會現象。他認宗教爲社會現象，雖是他偉大的貢獻，但是他對於宗教成立的原因，却不能給與社會學的解答。這種缺陷之充滿，必須期待於後來費巴和馬克思。斯特拉士之急進的批評宗教之目的，決不是宗教道個東西之否定，寧是自由的批評的神學之建設。

### 三

上面已經說過，露特維·費巴是完成宗教批評的工作的使者。同時他建設德意志唯物論哲學，尤

爲哲學史上有數的人物，惟在社會思想并經濟思想史上的他底地位，祇有代表由黑格兒至馬克思之過渡期的意義。在此意義上，他底主著「基督教本質論」，誠是可尊重的作品。恩格斯嘗說：

「：這裏我們暫時停止不說黑格兒學說這方面之崩壞過程罷。在我們，較此更爲重要的，寧是最毅然的「青年黑格兒派」的一團，實際上必須和既成宗教戰，逆轉爲英法之唯物論的事情。并且這裏他們必須作成他們自身學派之體系和衝突之機會。這就是唯物論者必須認自然爲唯一的實在，反之黑格兒之體系則認自然爲絕對觀念之「外化」即觀念之低落。可是姑且不論其如何，在此場合，思維和其思想產物之觀念，不外是本原的東西，自然不外是祇依着觀念一般之低下才能存在的一個派生的東西。他們便是左右縱橫於這樣的矛盾之中間的。

「而費巴底「基督教本質論」，便是在此時候出現的。這本書，正因爲用唯物論的辭句而組成，所以居在王座的地位，一舉而粉碎上面的矛盾。自然和一切哲學沒有交涉。自然不過是我們人類間所發育的基礎，而人類自身則是自然的產物。在自然和人類之外沒有什麼存在。我們空想的宗教所產的，處在人類以上之實體的，不外是我們自身之實體反映於空想的東西。這麼一來，一般人之偏見，遂被矯正了。所謂「體系」也被粉碎了，被拋棄了。而上面之矛盾，祇存在構想之中了。這本書所齎來的救力，是怎樣的東西呢？不是自身體念它的人，到底是不能想像的。我們須同來感激它，同來作

## 費巴的信徒。」

嘗給奧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很大影響的費巴底思想，是當時德意志社會主義思想之淵源。這事情，在下面論述真正的社會主義底學說的時候，我們才詳細地闡明它。

費巴研究哲學，乃從黑格兒着手。這就是他在其初期，受黑格兒之影響者非常之大。後來才脫離此影響，成爲唯物論者。他對於自己哲學思想發展的敘述，分爲三時期，說最初的思想中心點爲神，第二爲理性，最後爲人間。他曾在柏林大學聽過黑格兒之講演，最能理解黑格兒之學說。他在一八二八年就任埃蘭堅的私講師時，嘗提出一篇論文，在這篇論文中，已將受黑格兒之影響，整個的表現着了。至於他表現出他在哲學上之新見解的，便是他匿名的著書「神和不滅之考察」(Gedanken über Gott und Unsterblichkeit 1830)，顯然是站在一自然主義的汎神論之立場的。但是到了著述「自培根至斯賓諾莎之近世哲學史」(Geschichte der neuen Philosophie von Bacon bis Spinoza 1833)的時候，他已一變而攻擊神學了。然最明瞭地表現出這個立場的，則爲前紀的「基督教本質論」。

據費巴，哲學是思維之產物，宗教是感情之產物，兩者不能結合。我們倘要求宗教之本質，必先研究人間學(Anthropologie)。因爲人間原是應其必要而作出神之概念的緣故。所以神便不外是以人間自身本質爲模型的即人間之擴大。人間不過是把其映象的原形作成神的。所以要知道宗教之本質，

必須知道人間之本質，有感情的人間之本質。這樣的哲學，其結果當然必至于主張感覺論（Sensualismus）。

最明白地闡明這一點者則為「將來哲學之原理」（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 1843）。「最明白的東西便是感覺的東西。在感覺開始的所在。必沒有一切的爭論。直接的知識，不可疑的知識之本質乃存於感覺的。」這裏所謂感覺，乃指有教養的感覺，哲學者的感覺而言。而哲學唯一的對象，便是造成人間和其基礎的自然。所以普遍的科學，便是含着生理學之人間學。這一點，也就是使他研究生理學最大的動機。他在批評介紹唯物論者 Jakob Moleschot 的一文中，嘗說出「人間是其所食的東西」這樣一句名言。營養手段之學說，自有它偉大的倫理及政治的意義，因為食物便是血，血是心臟及腦髓，是思想及精神的要素。人間的食物是人類教育及感情的基礎。關於國民的改善，與其說是發出罪惡的警告，不如給與國民以最良的食物。人間底本質，原是依着食物之如何而決定的。像站在這樣的唯物論者立場的他，并非由純粹物質方面出發，乃是由容變物質的感性方面而出發的。

這種感性論的哲學，便是快樂論的倫理學。人間根本的衝動，乃在幸福的追究。因而不以追究幸福為基礎的倫理，便是很無意味的。而這種幸福，便是自他之幸福的意義。所以費巴以為至上的命令

便是感性之聲音。他在重要視幸福的場合，因理解此幸福爲自他之幸福而重要視帶有社會的性質的享樂。在此一點，費巴之哲學，很接近于十八世紀英法的唯物論。至于十九世紀法蘭西之社會思想，却完全和他沒有接觸。他底社會觀和歷史觀，所以不出乎舊態依然的觀念論之範圍者，正是很其當然的事情。他底功績，到底不外乎宗教的批評。然而他却以爲宗教不是當世所應逃避的東西，寧是須以宗教而戰勝當世之鬥爭。所以在認我們舊的文化之批評乃始于宗教之批評的馬克思底立論中，却存在費巴底意義。我們下面的論述，便是由費巴底哲學轉向于社會主義之過程。

#### 四

德意志急進思想家，爲達到社會主義起見，都異口同聲地說，只要把費巴底人間學，應用于社會生活，便最滿足了。據此種見解，以爲倘能站在費巴之立場，而對付于理論上之神和實際上之神之貨幣，這是很好的。并且以爲倘如像費巴把握着完成宗教的基督教之本質一樣，而把握着完成政治的法治國之本質，解剖市民的社會，則更妙。所以他們也如蒲魯東一樣，說財產就是竊盜。何以故呢？因爲財產這個東西，原來便是和人間密接地發達了的社會的所有，對於人間社會的行動，是很有裨益的，不能用來買賣他們之身體和知識。然而現在之財產，即貨幣財產，因爲完全是可以讓渡，買賣的

財產，所以人間這個東西，在實際上，便成爲可以讓渡的東西。所以在實際的世界，貨幣之於可以讓渡的人間，便是普遍的，全能的，同時又如精神界之神一樣，是一切祝福和幸福之淵源。

這麼一來，哲學便達到社會主義之榨取說了。

在上述之基礎上，所建設的社會的思想，便叫做哲學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der philosophische Sozialismus oder Wahere Sozialismus*）。其代表者則爲黑思和卡爾·克林。

摩塞斯·黑思是富裕商人之子，一八一二年一月二十一日生于 Bonn。少年黑思底精神，嘗受其祖父底影響。他底祖父，常常對他講說同情并憐人之愛。在一八三〇年的時候，他才進入大學。在大學的時候，他嘗參加當時之民主主義的運動。像他底朋友卡爾·比爾斯所說，在這時候，他已充分地樹立起社會主義之理論了。但因為這個緣故，遂被其父親停止接濟其學費。於是他便放浪于外國，但無久又和家庭和解，回國參加父親的商業。然而他正是當時德意志一般青年的典型，既飲了社會主義的美酒，到底不能忘掉此甘味的。這時候，因為他底生活已不成爲問題，所以他又開始着手構造他所熱望的社會主義的理論。于是乎他又和他底父親發生惡感，再過着貧困的生活了。在他和基督教徒細比拉·伯絲（Sibylla Pesch）結婚後，更完全和信奉猶太教的他底父親隔絕了。此後父親至死也未嘗會過他底兒子。

在這時候，黑思曾匿名著作「人類神聖史」(Heilige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及「歐洲三個支配」(Europäische Triarchie)這二本社會主義的作品，後來遂到來巴黎。黑思在巴黎的時候，擔任「萊茵新聞報」(Rheinische Zeitung Köln)的通信員，得到生活的資金。一八四三年，參加最有力的急進主義團體，曾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Sozialismus und Kommunismus)及「行為的哲學」(Philosophie der Tat)這二篇共產主義的論文於黑爾威(Georg Herwegh)所編輯的「Ein und Zwanzig Bogen aus der Schweiz」上發表。

黑思很熱心參加當時所創辦的德意志社會主義的各種雜誌。比如巴黎發行的「德法年報」，Weyler的 Sprecher、Bielefelder 等等，都是他參加活動的雜誌。後來他從巴黎過不律塞，無久又到威爾伯，最後又來 Elberfeld。在這裏，他嘗發行「社會之鏡」(Gesellschaftsspiegel)。這本雜誌明白是形成當時萊茵省社會主義運動之中心的。正因為這本雜誌所受的壓迫很深，所以愈博得世間同情。當時布羅伊森政府，當然不能許可為確固普羅列塔利亞立場的新聞之存在的，所以這本雜誌也逢着猛烈的干涉，遂在發行後的一年，不得不宣告停辦了。

其後(一八四九年)他又參加南德意志的暴動，受死刑的宣告，但無久却得逃亡于瑞士，又由瑞士過巴黎，一直到他和世長辭為止。他在巴黎著述許多社會主義的文獻，援助拉薩爾之活動，參加國際

社會主義者同盟。死于一八七五年。

黑思底社會思想如次：

給與社會之成立以很大的力量的便是自利。使人間結合的這個自利心，有時又使人間分離。何以呢？因為一切私之營利（Privaterwerb），原是由于人間共有財產這方面展開的。所以從來社會之形成，祇不過是一利己心各種的表現。

無疑的，人類在很古的時候，已經互相交通了。所以人類從其周圍學習自然的產物和技術的結果，人類之欲望，當然愈益發達，而達到交換生產物的地步。何以呢？因為各個國家和各國的人民，自己不能獨產其必要的物品。這種生產物的交換，在其開始的時候，乃是強者和弱者鬥爭，奪取弱者的物品。所以生產物的交換，其最初之形態便是掠奪。而生產和勞動最初之形態，正如生產物最初之形態是掠奪一樣，乃是奴隸。但戰爭的勝利者，祇靠掠奪被征服者之生產物，是不能滿足其欲望的。他還靠着戰勝的威武，以圖其生產之安全。他們把殘存的戰敗者做爲他們的奴隸，而榨取其勞働。

在這樣歷史基礎之下，生產和交換，遂發展到自由競爭的程度了。因而榨取的方法，也愈達到精緻的極點。可是榨取不但不能用這種方法使自身人間化的，反而愈益非人間化了。我們正是被強制互相買賣自身之身體。這種互相買賣的現象，我們不但不能幸免，反而使其更加一層擴大起來。我們爲



要獲得他人之勞働力，必須提供自己之行爲能力。然而不得不賣的我們行爲能力之全體並成爲我們之東西的他人行爲能力之全體又是什麼呢？形成我們之生命者不是依着我們之感覺而得知道的五體，乃是其真的能力。我們原是不得不賣此能力的人類。所以我們便是賣我們之生命的人類。貨幣原是我們奴隸的標示。因爲貨幣原是被數量表示的人間之價值。互相買賣的人間便不過是奴隸。可是假如我們不得不作個別的生活，各人必須用自己之手獲得其生活資料，則要排除這種人間買賣的制度，是到底不可能的。

于是我們便不得不處在永遠的矛盾中，處在永遠的鬥爭中。這個就是由個人之間交通愈益密接所釀成的矛盾。我們原是互相分離的，各人祇爲自己而生活，祇爲自身而活動。雖在一瞬間，沒有互相間不必要的事情。一切的個人，爲着人間的生活和活動起見，必要全人類之生產物。爲充足這些欲望起見，必須單靠自己之能力。于是決定人間之命運者，并非有益的行爲，真的體力和精神力，祇是所冇貨幣——盲目而且不道德的權力的貨幣之偶然決定人間之命運。

如此矛盾的一結果的今日之窮乏，并非因財之缺乏所生，乃是由財之剩餘所生的。英國因追求其生產物之消費者，其足跡嘗達到世界之邊境。全個的世界，竟變成無數消費英國生產的小市場。生產可比幾何級數的增加，消費却是算術級數的增加。

自由競爭是利己的經濟秩序之古典的形態。工銀勞働和營利行爲，而今已沒有什麼例外了，已擴大到各方面，排除生產力之一切限制了。在近代數十年中的生產，還較數千年以來者爲多。而今已得到最高的營利能力了。所以營利能力之改造的進步，只要依存于利己主義之原則，必然地就是經濟的退步之意義。利己主義的基礎的改革，最早已不可能了。

然在一方面，現在的社會，則向着共產主義的意義之改造。共產主義不如哲學的體系一樣可以使我們容易理解的學說。共產主義學是被社會發展史所決定的一個的必然。在打破此利己的社會後，倘不成立了用生產力的剩餘的共同形態來組織的近代產業，則我們不但不能達到共產主義之理想，而且不能相信共產主義的可能性。所以改造世界的事情，並非共產主義者之任務；又在生活不生學說的場合，則學說不能改造世界的。共產主義者之任務，在使一般有教養的人們研究歷史，使人們生出此共產主義如不能救濟我們則我們隨時可以破滅的這樣的認識。

負解放世界使命的共產主義，和從來法蘭西之共產主義不同。自聖西門，傅利葉而至于蒲魯東，嘉噠之學說，據黑思所批評，這都是誤謬的論調。因爲他們底要求原不過是小商人的國家之理想。他們要求一切不安定的自由即東洋的專制主義。據他們，人們正如以前奴隸時代一樣決定其勞働和勞働時間。所以這種狀態，還遠不如現在的狀態。

真正共產主義 (Wahrer Kommunismus) 的原理，乃在其行爲中求一切行爲之報酬。何以呢？因爲這樣才是「德」的緣故。一行爲之所以發生，並非爲的內的衝動，乃是爲的外的衝動。這個外的衝動，不問爲的是奴隸所有者之應當，抑普羅列塔利亞之饑饉，商人或銀行家之貪慾，專制君主之意志，或抽象的幸福之追求，只要行爲之衝動乃由外的原因而生，則這個行爲，就是一種負擔，一種罪惡。

一言以蔽之，就是各人勞働之種類和時間，必須屬於各人之隨意。並且社會必須爲各人之發達和其欲望之充足計，而供給他們以合理的必要的東西。

然而要達到這理想的狀態，決不是以一次的攻擊就能成功的。一般上，必要以無償的教育而教導小青年人，使他們能夠運營自由的社會。而且人們要實現運營這理想社會，必須選出其代表者。祇是這會議中之決議案，才是合法的東西。倘如不採這樣的急進的方策，放置事態而不顧，那末民衆之激怒，必釀成社會革命的。

以上所述，便是黑思底根本思想。而在當時之知識階級中，看出此思想多數的反映者。便是社會主義的定期刊物，其鳴于他底思想者也頗多，因而給與勞働運動之影響也非常之大。

象這樣的社會主義理論家的黑思，受一般稱贊爲劃期的人物，正是很其當然的事情。比如 *Dr.*

*Herman Semming* 在其 "Kommunismus, Sozialismus, Humanismus Rheinische Jahrbücher II." 中，

批評黑格兒和費巴爲本能的無意識的，批評黑思爲意識的，正是此中之一例。他說：「人類祇依黑思的著作，才能解放出人類以外之最後的諸勢力，才能給與能力于道德的行爲，爾再獲得人類之尊嚴。……」

## 五

和黑思同一傾向而且成爲一獨立存在的思想家者則爲卡爾·克林。克林在理論方面的貢獻雖少，其所論雖不是獨創的，然其流暢簡潔的文章，談諧滑稽的口調，和商尙可算的氣節，使他底立場，較黑思更爲有利。在當時之社會主義文獻中，他底著作，最被視爲一種有趣的作品。

克林一八一三年生于威斯特發冷。他最初擬專修神學，但到了Bonn，轉又過巴黎，研究哲學和言語學。後來在哥爾瑪任德語和英語的教員。一八四二年，他發起「曼哈姆晚報」(Mannheimer Abendzeitung)。這個晚報，在一八四八年以前，最有急進主義的傾向。他被巴登政府追放到格倫後，就担任週刊“Sprecher”(Der Sprecher oder Rheinisch-Westfälischer Anzeiger)的編輯。

一八四四年下半季以後，克林遂成爲哲學的社會主義的人本主義者了。表明此新的立場的第一本著作爲「寄奧斯那布留格友人書」(Sendeschreiben an die Osnabrücker Freunde)。此後又將以前曾

經發表過的自由主義論文，編成一集(Bausteinen)而出版。同年又發行社會主義的小冊「真教育論」(Über Wahre Bildung)。

同時他又擬領導他所編輯的“*Sprecher*”，傾向于社會主義，另組成一社會民主主義的月刊。

翌年，即一八四五年，他又著作「猶太人問題」(Judenfrage, gegen Bruno Bauer)及「新奇譚」(New Anecdota)。「新奇譚」乃蒐集“*Sprecher*”和「卑爾佛爾特」兩月刊中有趣的記事和被檢查創除的論文所成的。此中他關於社會主義的論文又有下邊幾篇：

「生產的運動」(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

「現在法蘭西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Der Sozialismus und Kommunismus des heutigen Frankreichs)

「對猶太人問題之態度」(Die Stellung Judenfrage)

一八四四年末，到比利時和法蘭西的旅行，使他和當時有名的社會主義者接觸。此中尤其是和傅利葉派巨子康西德郎(Prosper Victor Considérant)，嘉壁，蒲魯東等最為親密。由這次旅行所得的印象並對於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研究的結果，便著成「比利時及法蘭西社會運動」(Die Soziale Bewegung in Frankreich und Belgien, Briefe und Studien. 1845)一書。這本書，在德意志雖大博到

一般所稱贊，但不是他思想考察的獨創，祇不過是一種的描寫。其次他站在共產主義的立場的著作又有下邊幾種：

「歌德論」(Über Goethe von Menschlichen Standpunkte 1846)

「費巴與社會主義者」(Feuerbach und die Sozialisten. Deutsches Bürgerbuch. Bd. I. 1845)

「列寶君」(Herr Louis Reybaud oder: der Philister wie er soll. Deutsches Bürgerbuch., Bd. II. 1846)

「神學與社會主義」(Theologie und Sozialismus. Rheinische Jahrbücher. Bd. II. 1846)

一八四八年，克淋在德意志活動。他最初在「Frier」發行社會主義的無定期雜誌(Die Revolution im Jahre 1848)。這雜誌發行第一本後，無久便發生了革命。在「Frier」的候補選舉時，他被選為布羅伊森議會的議員，參加極左的政黨。在他列入議員的時候，議員中注重社會主義的言論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于是他便站在急進的民主主義方面活動。

克淋始終未嘗參加當時之勞働運動。當時他雖運動設立一種獨立的德意志大學并科學自由研究所，但皆沒有效果而終止了。一八四九年，他由「Frier」被選為布羅伊森下院議員，有參加普留姆監獄暴行的嫌疑，遂被逮捕，一八五〇年才宣告無罪，同時也就來到不律塞了。

據克淋，社會主義是哲學的一結果。特別是費巴的哲學，已發展列成熟的社會主義，包藏一切的萌芽。克淋這種思想，已在他底「費巴與社會主義者」中詳細地敘述了。

克淋對於現存社會之批評，不過是擴張了所謂只要人間不依着其自由意志而勞働，他們就便是奴隸的黑思底思想。並且以為現在社會狀態最重要的根本缺陷，全在個人享樂的差異不依據享樂能力的差異，乃依據貧者之隸屬，貧者之奴隸性，富者之專橫。

然而立憲主義（Konstitutionalismus）對於此種害惡却沒有什麼設施。立憲主義不但不能維持真正的思想，而且其自身到底不是保護真正的自由即對於人間社會事實上之參加的。所以孟德斯鳩之國家，祇是被確立了的隸屬，盧梭之國家，祇是外觀的自由之隸屬。

凡所謂政治的自由，在其窮極，不外是有產者對無產者之聯合，少數狡猾者對無智的大眾的給合。為要制御大眾，所以才先給與信仰和享樂。其後一旦不能結束的時候，便以警察和裁判的法律來對付之。這個就是全部憲法的祕密。

在一般上，國家的改革，本來沒有利益可言的。因為國家自身便是一抑壓的原理。所以在廢除國家後，必須代替以自由社會的建設。在自由社會中，各人乃從其自由意志而勞働，可以從其欲望而享樂。倘如此，則不必如今日一般，對一生產物，必須支付他之生產物。各人乃靠着全國民勞働的成果

而生活。這樣，則成爲今日一切苦惱之根源的一切形態如貨幣，工銀勞働，利潤，交換價值之類，便被驅逐出這世界之外了。並且相續權最早也不得存在，什麼法律也被廢除。因爲法律即使是最善的場合，也不過是少數者對多數者專制的意義。此時候，人們既否定了法律，則一切司法和警察，當然自歸於無用。並且國家所定的教職和其包辦的大學，也自必減少了。

從來一切制度既被消滅，則同時必須成立自由人的完全的自治。無政府，無統治，就是其目的。關於此一點，蒲魯東雖以一貫之精神，冀達最終之歸結，然在克淋，却只止於理論的方面而已。

但在取消統治而建設自治這一點，蒲魯東也犯着誤謬的。因爲他一方面雖主張廢除不平等，而一方面却又擬保持工根勞働和交換價值。倘如這樣，則人們還須受着舊時奴隸制度的束縛。所以這種論調，決不是由一般人所謂消費須是生產的標準的正當見解而出發的。然據克淋，生產之於將來，無疑的，當能和消費同一步調而進行。

基此原則而形成空前的新的世界和新的生活。他說：「成立了新的詩，新的畫，新的彫刻和建築。新的社交和社會的技術便是生活。其存在就是詩，其各種光景就是畫，其人們就是彫刻的像，其全部構成就是宏偉的建築物。一切的人力，存在且活動。老者爲秩序而活動，壯者爲偉大的和美滿的東西而活動。全體是一個調和。到了這時候，一切矛盾的鬥爭，已移到彼岸的世界，祇存在完全而且



無窮的現世。這時候，有思想的人間之意識，不但藏着天堂和地獄，並且人間的生活力，在其生活中，多種多樣地發展着，有韻律的運動着。這時候，宗教才在此地球上之現實中得到彼岸的極樂，哲學的概念，才被實現。這時候，一切的希望才能達到。生活才能成爲完全地滿足希望的東西。」

克淋對於不容易達到實現自由社會目的之事情，沒有絲毫失望的態度。他已很深刻的認識了，由資本的集中，普羅列塔利亞大眾的發達而至于革命爆發的過程，必須布爾喬亞行着完全的支配。布爾喬亞的支配愈利害，則革命的爆發必愈迅速。這種支配就是釀成廢止從來全歷史的政治的意義，即切斷將來和過去之關係的意義，然而爲要在某適當時期行革命起見，必先做着極度的宣傳運動 (Propaganda)。

這個便是卡爾·克淋之立場。

## 六

費巴哲學之社會思想的發展，乃作爲黑格兒哲學和法蘭西社會思想尤其是蒲魯東思想之綜合而表現。故德意志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在一方面受着黑格兒國家觀的影響，在他方面又受着蒲魯東無政府主義的影響。所以說，他們之社會觀，在一方面雖存在無政府主義的傾向，但這種傾向却未嘗進展到

其極點。然而依着自我哲學而給與蒲魯東的無政府主義以理論的基礎者則爲 Max Stirner。原來無政府主義也分爲二種。一是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一是共產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無政府共產主義。

Max Stirner 是個人主義的——哲學的無政府主義之父。Max Stirner 是假名，約翰·加士巴·斯密脫 (Johann Kasper Schmidt) 才是他底真名。一八〇六年他在當時普魯士一都市的拜羅依出生。他底父親是製笛的商人，在他出生後，無久就死了。他底母親在三年後也再嫁了，他便移住于布羅伊森的克爾姆。他在克爾姆受了小學的教育後，在十二歲的時候又回到拜羅依來，肄業于那裏有名的 Gymnasium，後來更入柏林大學，自一八二六年至一八二八年的二年間，專修言語學和神學。後來又轉學于埃蘭堅大學，聽講僅一學期，便作全國的旅行，費了一年的光陰。後來又因爲家事的緣故，在克爾姆和格尼西堡各住一年。但自離開學校生活的他，未嘗擱置了他對於言語學和哲學的研究。一八三三年，他再回到柏林，一時雖因病不能聽講，但也能合格於「脫淨特」的試驗。

關於 Max Stirner 少時的歷史，除開他自己記述的自敘傳外，別無所傳。他在畢業大學後，就在柏林執高等學校和女子學校的教鞭。一八四四年，他底著作「唯一者和其財產」 (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hum)，由萊府的奧托依甘社出版。他底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在這本書中，說得很出力。這本書，一時雖成爲批評之的，但無久遂蒙着發賣的禁止，并且因爲一八四八年革命騷動的緣

故，批評它的人，遂漸漸減少了。他爲出版這本書，曾失掉了他底生活的糧食的教職，僅得依甘社的好意，靠翻譯得到生活的資料。亞丹·斯密斯的「富國論」，便是由他翻譯爲德文出版的。所以被社會忘掉了的他，於一八五六年卽四十九歲的這一年，遂和這個世界永遠訣別了。

Max Stirner 底無政府主義學說，在費巴底宗教哲學中，可以看出其源泉。費巴是唯物論者，他以爲題「神」之一名者，便是人間之幻想卽心理錯亂的產物。造人間者不是神，人間在其心中造神。人間之信神，祇不過是崇拜他自己之姿態，神是一個的擬制。基督教的神原是被想像爲「愛」的。神對於一切煩惱的人間賜給憐憫。然而人們在神的想像中可以看見自己之姿貌。神不是真的實在。人類的愛不能超越人類以上的。「在人間，人類是最高的實在。」

Max Stirner 底唯物論，不僅和費巴相一致，而且他還修正之，使其發展起來。據他說，在事實上，神不過是幻想的產物，費巴所說的人類的愛，沒有獨自之獨立的存在。所以我們的出發點，不得不是我們的自我。「棄掉一切以爲完全和自己自身沒有關係的心理吧！你們不承認我之此舉至少是「善舉」嗎？對於此舉，不要說善，也不要說惡吧！我便是我。我非善也非惡。那一舉，於我沒有什麼意義。神的事便是神的事。人類的事便是人類的事。我那一舉既不是神的事，也不是人類的事。不是真理，不是善，不是自由，不是正義。那祇是我自身。那不是普遍。那是個人的事。我自身就是個人，

因為我以外沒有什麼。」

Stinner 因為處在這樣的立場，所以他視一切宗教，良心，道德，法律，家族，國家為對於單純的自由的自我之活動底障害而排斥之。個人必須努力和自身事柄以外之這些抽象的觀念鬥爭。各人之道德，不過是布爾喬亞庸俗的道德。便是天賦于各人之「權利」和心得，也祇是單純的幻想。倘尊敬這種幻想，那你們一定以為古代的武士是戰爭中神的出現。權利就是力。「凡是有權力的人都有權利。你們如無權力，你們就不能有權利。」自己是自己所生者。自己不是其他的東西。你們崇拜國家嗎？我是對國家挑戰的主將。「凡是國家，便是一個專制。是一人或多數人的專制。就是在共和國的場合，正如一切人們所想像者一樣，一切人們都是主人。這就是一人對於他人行專制。法律的場合也然。人民之某種集合底意志的表示，就是對於個人的法律。他不得不服從這種法律他不得不負擔服從這種法律之義務。人民之中，一切的個人，假使能表示同一的意志，能達到萬人完全的意志，而事態也完全無異。倘如我懷疑現在并將來必受自己過去之意志所束縛時，那我底意志便是麻痺的，可恐的停滯。明白的意志，就是自己的主人。我被我底意志所拘束。創造意志者的我，得阻止自己之發展。我因為過去太庸俗了，所以我底全生涯，便不得不庸俗。在我底國家生活中，我可說是（或不可說）自己自身之奴隸。我因為昨日有意志，今日沒有意志，所以昨日是自由，今日受拘束。」

Stirner 底自我論，雖排斥一切外的干涉，但他主張「自我者的同盟」。自然，各個人是有參加退出此同盟的自由。他把個人看做利己的東西，以發展個人為得到個人之幸福。同斯密斯一樣，承認利己心的存在，主張撤去阻害利己心活動的一切特惠和限制的制度。然而斯密斯却主張各人應遵守正義的法則，反之 Stirner 則主張自我之權威，說這種權威是絕對的東西。在他，所謂正義的法則，單不過是個人發達的障礙物。



## 第十章 馬克思之社會并經濟理論

### 一

德意志社會主義，受法蘭西社會主義底影響，復在此影響之下，繼續形成起來。像這樣探着法蘭西社會主義，英吉利經濟主義，自國之古典哲學的，秩序地創造了自己體系的組織的德意志社會主義，而今將登近代社會主義底王座了。社會主義中發達最遲的德意志，而今將領導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歐羅巴社會主義了。不論在理論上，或在實踐上，德意志社會主義，正就是在近代社會中占着一大勢力的普羅列塔利亞階級的基礎之上活動的。而指導德意志這個新社會主義的人，便是卡爾·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 和不律利·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1820—1896)。

馬克思和恩格斯底社會理論的體系即馬克思主義，據通常一般所分類，乃由四種互相關連的部分而成立的。就是由(一)哲學即辯證法的唯物論，(二)社會學即史的唯物論或唯物史觀，(三)經濟學，(四)革命的實踐而成立的。由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看來，馬克思和恩格斯，既同是「青年黑格兒派」

的人，而其出發，當然不外乎其思想的生涯。他們最初很醉心於黑格兒底辯證法的哲學，後受費巴底影響，才轉向于唯物論。同時法蘭西之社會主義，也是捉着馬克思底心靈的。而恩格斯也很受英吉利之社會運動和經濟學的感動。這麼說來，馬克思底社會理論的唯物史觀，便是靠着德意志古典哲學尤其是黑格兒之思想和法蘭西社會主義尤其是聖西門，蒲魯東之思想的力量才能完成。據馬克思，在一八四五年的時候，他才完成了唯物史觀之形式。其後馬克思底發展，皆在乎經濟學方面。他靠着研究所得的哲學方法和社會理論而批評經濟學。而此中還以「資本論」為其最高峯。馬克思一生，其中最特徵者為他常常接近革命實踐的工作，利用實踐的經驗，形成其理論。理論和實踐的統一，便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之使命。

馬克思底立場，完全是實踐的。他曾批評費巴說：「一般哲學者，都種種色色地解釋世界，可是哲學者最重要的任務，却在改造世界。」他曾標出為學問之學問的標語，并非要閉居于象牙之塔中的人物。他底目的，乃在從共產主義求到解放人類之最終的原理而實現這個原理。并且他底立場，也不是理想主義者之立場。他說：「共產主義不是我們必須作出的一個狀態，也不是必須以現實為標準的理想。共產主義便是打破現狀態之實現的運動。這運動之諸條件，乃由於現存之前提所生的。」

馬克思因為認定「打破現狀態之現實的運動底諸條件乃由現存之前提所生」，所以在他成為最必



要的工作的便是研究此現存的前提。而對於此現存前提之研究，在他底各種著作中，已經很充分了。這裏我們認為最特色的，在關於社會學的著作方面，則為「德意志·意特沃羅維」，在關於經濟學的著作方面，則為「資本論」。「資本論」底最後的目的，在闡明近世社會經濟的運動律。就是「資本論」之研究對象為近世的市民社會。但是他不僅理解這個市民社會祇是市民社會的自體。他說：

「市民社會是生產最發展的，最多樣的歷史的組織體，表現其諸關係的諸範疇，其編制的理解，同時給與那種向着市民社會而沒落的一切社會形態之編制和生產關係以最深刻的洞察。市民社會便是在這些社會形態廢墟和要素上面建築起來的。這些社會形態的一部分，還未被克服，還在市民社會中保存其餘命，而一部分則嘗不過是暗示的，在市民社會中發展到完全的意義。人間的解剖，正是對於猿的解剖之一個關鍵。反之低級的動物對更高級動物的暗示，祇是在高級動物自體被知悉的時候才能理解的。」

這個觀點便是所謂辯證法的觀點。馬克思嘗在「資本論」第二版序文中，引出彼得堡的「歐羅巴通信」中批評「資本論」第一卷之方法論的部分，以為說明他底辯證法的研究方法。——

「在馬克思，祇是所謂發見為研究對象的諸現象法則這一點為重要，而且在他視為重要的，不只是此類現象有一完成的形態，并保着一種像在被給與的歷史的期間範圍內所見的那樣的互相聯絡，才

受支配的法則，便是如像此類現象之變化，此類現象發達的法則，即由一形態至他形態的，由一組之互相聯絡關係至他一組之互相聯絡關係的經過，在他也是較什麼還首先第一重要的問題。他一旦發見了這個法則，他就把那法則出現于社會生活中之結果，仔細地研究起來。……隨而馬克思祇對於次之一事而努力。就是他用嚴密的科學的研究，去論證社會的事情之特定的秩序底必然性，盡所能公平地確定了他研究之出發點并基點的事實。這個我們只論證現秩序之必然性和現秩序之不可避免的變化爲他秩序之必然性便夠了，又何必顧及人類能否信仰，能否意識這樣的必然性呢？馬克思認社會的運動不是由人類之意志，意識，意向而獨立，倒是被決定人類之欲求，意識及意向之法則所支配的自然史的一行程。……倘如意識的要素在文化史上祇是演出這樣從屬的任務，那麼在以文化自身爲對象之批評的研究中，尤不能以意識某種形態或結果爲研究之基礎，這是自明的事了。這就是，能充此批評的研究之起點的，不是觀念，祇是外部的現象。這種批評的研究之任務，不是把一事實對於觀念作對照比較，祇是對於他事實作對照比較。在這個研究認爲重要的，乃在盡所能嚴密地檢驗甲乙二個事實，發見甲對乙於事實上爲同一進化相異的要素。此外又如同樣地嚴密地究明各秩序之順序（各進化階段所依而表現的那種繼起及聯絡）的一事，也是此研究最重大的任務。不過，或者有人說，經濟生活上普遍這東西，無論被現在所應用，或被過去所應用，都是同一的東西。這件事，正是馬克思所否認的。

據馬克思，像這樣抽象的法則，是沒有存在的。……從他看來，反而歷史的各時代有其自身之法則。……人類生活這個東西，一旦超越了一定的發達期，即由一階段進入他階段後，必開始被和從來相異的法則所支配。……古時的經濟學者，把經濟上之法則，比擬于物理化學上之法則，無疑的，這完全是誤謬了經濟法則的性質。……依着更深刻的分析現象，當能知道社會的各有機體（動植物機體也一樣），在根本上是互不相同的。……加之，因為各有機體的全構造不同，個個的器官也不相一致，此種器官所作用的條件也異，所以同一之現象，也受完全相異的法則的支配。」

馬克思對此文說：「批評者雖然這樣割切地，用這樣的好意來描述他所稱為馬克思底真正研究方法這個東西，但那裏所描述的，除開辯證法的研究方法以外，又是個什麼東西呢？」這個辯證法的研究方法，在馬克思各種著作中，都可以看見，這個正是他處置社會現象之最特徵的事情。

這個就是馬克思底辯證法的輪廓。

## 二

其次我們把「德意志·意特沃羅幾」作為中心而概觀其唯物史觀。上面已經說過，馬克思也是德意志思想家，由黑格兒出發，傾向于法蘭西社會思想，跟着與真正社會主義同一之過程。然而馬克思

却不理解共產主義爲一抽象的理想。他認共產主義不過是以現實的諸條件爲前提的一現實的運動。可是在什麼時候才抱懷此種理論呢？關於這個問題，已有諸學者的說明了，這個大約開始于一八四五年。一八四五年春季，恩格斯訪馬克思于不律塞的時候，馬克思已經達到後年偉大的唯物史觀之社會觀的形態和已經編成「共產黨宣言」的序文了。關於這一點，於近年略莎諾夫（Rjebanov）所發表的馬克思恩格斯底遺稿「德意志·意特沃羅幾」中，已說明得極其顯著了。

「德意志·意特沃羅幾」這本書，乃是打算論證共產主義之必然性的著作。比如「共產主義不是我們必須作出的一個狀態，也不是必須以現實爲標準的理想。共產主義便是打破現狀態之實現的運動。這運動之諸條件，乃由於現存之前提所生的」云云，便是它底目的。並且，馬克思和恩格斯之論證這件事，不僅只依着闡明社會現象之歷史性和其社會的關連而立證共產主義之必然性，還要樹立社會學的體系。

自然，略莎諾夫在「馬克思，恩格斯集」第一卷中所發表的「德意志·意特沃羅幾」，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德意志·意特沃羅幾」的全部，這是不消說了。然而我們在此部分——「德意志·意特沃羅幾」中，除經濟學的部分外，已夠看出馬克思底學說即現於「哲學之貧困」和「共產黨宣言」中的思想了。并且這本書中所現出的馬克思底社會學說，恐怕已包含着後來被發展和整理的一切了。從來一般

學者，認馬克思對於社會學的論述中最有權威的祇是「哲學之貧困」，「經濟學批判序文」，「共產黨宣言」，但這本「德意志·意特沃羅幾」，較這些著作，還有社會學的興味和價值。我之所以認這本書為馬克思社會學的經典的理由，乃因為它底社會學的見地是極包括地敘述形成社會學體系的形式之緣故。

「德意志·意特沃羅幾」是一種理論的鬥爭。所以他首先闡明他自身之態度：「舊黑格兒主義者，理解一切東西皆應還元于黑格兒理論的範疇。青年黑格兒主義者，却把一切東西都比為宗教的表現，宣言這個為神學而批評之。青年黑格兒主義者在相信現存世界中宗教概念及普遍的東西之支配這一點上，雖和舊黑格兒主義者相一致，然一者乃認此支配為一種強奪而和之鬥爭，一者則以之為正統而祝福。並且在青年黑格兒主義者，以為表象，思想，概念等，在一般上，乃是獨立的意識之產物，是人間真實的桎梏，這個恰如舊黑格兒主義者視為人間社會真實的紐帶而說明不大差異，所以青年黑格兒主義者都以為祇須對於意識的這個幻想而鬥爭。……青年黑格兒的觀念論者，他們外面上雖榜出「使世界震動」的言辭，然而實際却不外是保守主義者。這些哲學者，不論什麼人，都絲毫沒有對於德意志哲學和德意志現實之關係，對於他們之批評和其自身之物質的環境之關係的心算。」青年黑格兒主義者，不由現實說明人間之意識，乃由人間之意識說明現實，要找出指導現實的原理。他們之所說乃抽象的原理，愛之說法，感傷主義（Sentimentalism）的論調。——馬克思痛擊這個態度。

馬克思乃由一前提出發。這不是恣意的獨斷的前提，乃是他所說的現實的前提。他說：「這個前提乃被現實的個人和其行動，傳來的并自己行動所作的，是其物質的生存條件。從而這個前提祇是依據于純粹的經驗的方法，才能得到一般所公認。所以一切人類史第一前提，自然是活着的個人之生存。而最初能被確認的部分，祇是對於個人之身體組織和被這個所給與的他之自然底關係。……一切史的記述，必須由這自然的基礎及人間行為所生的歷史經過中之變革而出發。」然而人間為生存計，衣食住乃是其第一的要素。倘如求之不得，則人間什麼也不能「作歷史」。所以馬克思於人間生活資料之生產中求其社會學之出發點，正是這個緣故。人間最初之行為并依此行為而區別自己為動物之行為，這不是他們思索的事情，乃是開始于生產其生活資料的事情。所以「關於現實的事實之經驗的觀察，祇是指着經驗的觀察生產的，社會的并政治的組織而言，至對於一切神祕化和思辨，却不在此限。一旦把握着這人間活動的生活過程時，歷史便停止死的事實的蒐集。在現實的生活中，打破思辨的時候，纔開始敘記現實的，實證的科學即人間實踐的行動并實際的發展過程。這時候，必須終熄意識之詞句，代替以現實的知識。獨立的哲學乃是現實性之敘述，同時失掉其生活媒介的性質。這一來，纔可以由人類史的發展之觀察，而敘述被抽象了的最普遍的結論之概念。至于離開現實歷史之抽象，其本身完全沒有什麼價值。」站在如此見地的道德，宗教，形而上學及其他意特沃羅幾（Ideologie），并

照應于這個意特沃羅幾之意識形態，已失掉其獨立的外觀了。意識祇是被意識的存在，此外沒有什麼；人間的存在，便是其現實的生活過程。「意識不是決定生活，乃是生活決定意識。」費巴因為站在唯物論的見地，所以才把人間看做感性的對象，不理解其為感性的行為，從而他對於處在現實的條件之下而活動的人間不加以考察，被論抽象意義的人間。從而他底歷史觀，沒有辯證法的意義，在歷史上，不能是唯物論者。

由現實的前提出發的馬克思，嘗達到這樣的歷史觀。——

「這個史觀的基礎是：由直接生活物質的生產出發，而使現實的生產過程發展起來，理解和這個生產方法相關聯而依其所作的交易形態，即其種種階段的市民的社會，為全歷史的基礎；并且不但必須在國家之行為中敘述此市民的社會，不但必須說明種種理論的產物，意識的諸形態，宗教，道德和哲學等之全部，而且還須追究由這些東西所生的，其成立的過程。自然，在這場合，當然也必須敘述事象的全體（所以又必須敘述這種種方面之互相作用）。這個歷史觀，不必要在一切時代中，像觀念史觀一樣，求得一個範疇，反而必須由物質的實踐方面說明理念之形成。且照應于這個而達到如次的結論：意識的諸形態及產物，不是依着精神的批評，依着到「自意識」的解消和「妖怪」「幽靈」「狂作」之類的轉形而被解消，乃是依着由這觀念論的饒舌所生的現實社會的關係之實踐的革命而被解

消。這就是歷史的，宗教哲學及其他之理論的推進力，不是批評的，乃是革命的。」這個就是「德意志·意特沃羅幾」的根本立場。

### 三

確立了社會學的方法的馬克思，復據此方法，論說共產主義革命的必然性和誘導此革命的社會的必然性，因而又考察「爲全歷史基礎的市民社會」和其中所現的社會現象即和社會現象全體的關聯。我之所以把「德意志·意特沃羅幾」看做馬克思底社會學體系，原是根據于這個理由的。

在人類史的開始，活着的個人，爲維持其生命計，實生產生活的手段。這個便是人間最初的行爲。這種個人的生存欲望之充足及爲其結果的新欲望之發生，使他由獲得生產手段的生產增大起來。在這樣的關係中，人間不過有和自然之關係。然人間因爲有性的區別，生命之發展，同時在和自然之關係外，還發生和他人之關係。這個就是男女的關係。由這個男女之關係，擴大到夫婦關係，親子關係即家族關係。家族在歷史之開始的時候是唯一的社會關係（關於這一點是錯誤的，後來由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的脚註并其「家族之起源」中訂正爲「家族爲最初的社會關係」。恩格斯底訂正較爲妥當）。這家族，因欲望之增加，遂喪失了爲新社會關係之重要性。故從一般來說，特定的生產方



法和產業的階級，乃和特定的共同作用之方法并社會的階段相連結。而這共同作用的方法，因為其自體是一個「生產力」，所以人間所得而行使的生產力之量，必制約社會狀態，從而「人類史」必須常是同時研究產業及交換之歷史。

設使人間之歷史，常是社會的歷史，則被這歷史所制約的人間意識，也須常有社會的性質。而人間的意識，最初雖然不過是對於感性的環境和對於他人之感性的意識，然而只要是對於自然感力的人間，則就是自然之動物的意識。在他方面，關於社會生活之必然性的意識，常使羣衆意識之發生。這羣衆意識——種族意識，祇由生產力之增加，欲望之增加及躺在兩者間之根底的人口之增加，才能發展。因而同時分勞才能發達。分勞有二種，一是性的分勞，二是精神的并物質的分勞。由後者之分勞現出「純粹理論」即神學，哲學，道德之抽象的獨立的形態。分勞的發達，同時家族中之分勞也抬頭起來，使個個對立的家族和社會分立的分勞也抬起頭來了。同時不論是質的或量的方面，也行着生產物的分配。從而妻孥及其子女，均為男子之奴隸。在家族裏，財產既已萌芽，形成最初的形態了。家族中之自由的，純樸潛在的奴隸，是最初的財產。這就是分勞和私有財產，其語義相同。并且在分勞之下，各個人或各家族之利益和一切個人之共同的利益之間，遂發生了矛盾。所謂共同的利益，不是作為「普遍的東西」而存於觀念之中，乃是作為他們間被分割的勞動的各個人之互相依存底現實而

表現。

因此特殊的并共同的利益之矛盾，共同的利益雖作爲國家而探着由現實之個別的并全體的利益所區別的獨立的形態，和取得幻想的共同性，但其真實之基礎，常常因爲充分地行着繼續活動的分勞，被那個有特殊利益的家族及種族底結合尤其是這個分勞所規定，分割人間之大羣，釀成一者支配其他之階級。所以國家中一切的鬥爭，比如民主主義，貴族主義，王制主義間之鬥爭，并選舉權之關係等，在普遍的時候，這個便成爲共同性之幻想的形態，此中便做着各種階級間現實的鬥爭了。這個道理，就在今日之國家，也適合的。私有財產——階級和國家之關係原是不可分離的。古代并中世財產的形態，是種族財產。然而本來之私有財產，不論古代抑近代，也以動產爲始。中世以後才形成的諸民族間，種族財產已經經過種種的階段（封建的共有財產，組合的動產，手工工場，工業資本）而達到被近代的大工業和自由競爭所制約的資本，純粹的私有財產了。這種私有財產，已脫却了一切共同社會的外觀，排除國家對財產發展的一切干涉。近代國家原是照應于這種私有財產的。國家因受納人民所繳納的租稅，所以遂被私有財產的所有者收買，因國債的制度，遂完全歸屬於他們，其存在遂完全依存於國債票市價的騰落而給與布爾喬亞國家在商業上之信用如何而決定了。「因爲由共同社會底私有財產之解放，國家遂成爲一外的特殊的存在，恰和市民的社會并立。國家原來便是布爾喬亞爲對內

對外互相地保證其財產和利益計必然的所形成的組織形態。」

然而「德意志特沃羅幾」對於市民社會之解釋怎麼樣呢？它定義市民社會如次之意義。——具備從來歷史的階段中所存在的生產之條件并具備此條件的交易形態，便是市民的社會。市民的社會，其前提及基礎為單純的家族，聯合的家族即所謂種族制度。這個市民社會便是一切歷史的發生地和舞臺。所以從來的歷史，其歷史的觀察祇限於國家的行動，這很是無意義的。這樣，市民的社會，便是各時代的歷史即社會現象之基礎。

馬克思和恩格斯又說，市民的社會，包含特定生產力發展階段中之個人底全物質的交易。這就是說，市民的社會乃包括着一階段之全商業的并工業的生存。正因為這個緣故，它便是超越國家和民族以上的東西。自然，在一方面，因為對外的關係，它必須使自己成為民族以被公認；在他方面，因為對內的關係，必須把自己編成國家的，這是不消說了。但是「市民的社會」這句話，祇是指着由古代并中世之共同的生活體所形成的財產關係而言，是十八世紀發生的東西。像這樣的市民的社會，在布爾喬亞階級之下，才開始發達的。然而在各時代中，形成國家并其他觀念的上層構造之基礎的生產并交換所發展的社會組織，常是被指示為同一之名稱的。

并且馬克思和恩格斯，還論及由原始社會狀態至農業的發達，由農業至小工業的分離和伴此而生

的農村都市的分離。都市的發達，當然不外是因爲人口的增加和伴此而生的生產力發展的結果，但都市的成立，却形成了行政，警察，租稅等即都市制度及在此制度下之一般政治。於是便喚起以分勞和生產手段爲基礎的人們間二大階級的分裂。這時候，都市則表示出人口，生產手段，資本，享樂和欲望集中的事實，反之農村則表示出反對的事實即孤立化和個別化的事實。都市和農村之對立，祇在私有財產的内部才可能。并且馬克思又指摘出都市中勞働性質并自然的資本之發生和其内部因分勞的結果所生的商人階級的成立，并由其成立的結果所生的都市間分勞的事實；論及由其地方的限制徐徐地擴大民族的範圍并由擴大結果所生的手工工場的成立。手工工場的成立，是近代社會的曉鐘，是破壞中世社會的主力，雖然它底過程是很簡單的。手工工場成立後，跟着各民族遂陷入競爭的關係，行着商業的鬥爭，結果這個鬥爭遂採着保護關稅和禁止政策，商業才含有政治的意義。接着而發生變化，便是企業家和勞働者之關係，舊時的家長關係遂被破壞，而代替以貨幣關係了。這個就是初期資本主義社會的樣相，資本家的生產之發展，即大工業的成立，使工業都市發生起來，遂由保護政策行着自由主義的政策。從而普羅列塔利亞階級的運動，也日趨於隆盛了。

馬克思對於普羅列塔利亞世界的意識和運動的構成，與以若干馬克思主義的考察，而論證國際的普羅列塔利亞運動的構成和共產主義革命的必然性。

馬克思和恩格斯，嘗對於這個革命說：

一，生產的發展，一旦入到某階段，在此階段中，被喚起的生產力并交換手段，在現在諸關係之下，祇是釀成各種害惡而已。這時候，這個已不是生產力了，祇是破壞力（機械及貨幣）了。——并且和此關聯的，不是享受社會利益的階級之形成，乃是負擔社會義務的階級之形成，他們被社會所擯棄，被強制處在和其他階級最決定的對立之地位。這個階級，形成一切社會成員的多數，而且是有關於根本的革命之必然性底意識即有共產主義的意識之階級。此共產主義的意識，就在他階級之間，也得依着關於此階級地位之見解而被構成。

二，能適用一定生產力的諸條件，就是社會特定階級支配的諸條件。由其所有而形成的支配階級之社會的權力，在其各時代的國家形態中，有其實際的理想的表現。所以一切革命的鬥爭，必須向着從來支配的階級。

三，從來一切革命，都不和勞作方法相接觸，祇不過注意到此勞作之分配，新的勞働的分配。然而共產主義革命之方向則在從事勞作之方法，排除勞働分配的不均。廢止一切階級的支配和階級自身。何以呢？因為共產主義革命，不承認社會有階級的存在，即此革命乃是不承認為階級的一階級——在現社會內部為一切階級解體的一階級的任務的緣故。

四，爲着吸收有共產主義意識的大衆并使此意識貫徹起見，必要使人間都變成大衆。這目的，必須靠實際的運動，靠革命才能達到。倘如不能用他種方法來打破支配階級，則革命當然不是必要的東西；倘如用革命可以打破支配階級，建設新的社會，排除一切舊的污物，則革命當然是必要的東西。

這樣，在馬克思，共產主義當然不是一個理想，當然是一個必然的現實。這種必然的認識，就是構成他底社會學的。

#### 四

上面已經說過，一八四五年的「德意志特沃羅幾」乃構成馬克思唯物史觀底雛形，其後馬克思思想的發展，乃在革命實踐的戰術方面及經濟理論方面。如一般所知道，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意義，在其理論體系中，有最重要的性質，因爲其論證現實問題的資本家社會中社會革命的可能性。至於其方法論及社會學的前提，則已如上述辯證法及唯物史觀，這裏不必贅述了，這些前提是可以適用於資本家的社會的。

馬克思經濟學攻究的對象物，乃是「資本制生產方法及適應於此方法的生產并交換的事情」。所以他底研究對象是資本制生產，不是經濟生活的一般。這一點，他和正統學派的立場不同。正統學派的

經濟學者，雖也以資本制生產爲其研究對象，但却認資本制生產爲恆久不變的經濟。反之馬克思則站在辯證法的立場，認一切現象乃在其運動的流水之中。從而他以資本制生產爲一歷史的生成物，科學的論證其暫時的存在。他整個的精神，全在論證共產主義革命的必然性。解剖資本制生產的他底經濟學，在遂行這任務上，處在最重要的他位。

資本制生產的特徵，在商品生產這一點。「資本制生產所行的社會之財富，乃作爲龐大的商品之集積而表現」，個個的商品，乃作爲其「成素形態」而表現。所以馬克思底經濟學，乃以「商品之研究」爲始。商品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商品用某種方法而充足人間底欲求。這一點，所以牠有使用價值。使用價值乃由物之有用性所發生，不問富底社會的形態如何，皆形成其實材的內容。然而交換價值則乃「作爲分量關係卽一種類之使用價值和他種類之使用價值相交換之比例而表現」。在二個的使用價值互相交換的時候才生出交換價值。二個的商品例如小麥和鉄被交換的場合，此兩者皆各包含着互相均等的分量。其性質「不會是商品之幾何學的，物理學的，化學的，及其他之自然的性質」。順次地除去不會有的這種性質後，商品才殘存一勞働生產物的性質。二個的商品，便是均等的勞働的生產物。所謂均等的勞働生產物，其意義就是指着投到商品生產的勞働分量均等者而言。這勞働，形成商品價值之本質。勞働之多少，決定價值之大小。這場合，決定價值之大小者，便是商品生產上「社

會的必要的勞働量」。這個就是馬克思勞働價值論之大要。

這種勞働價值論，現在也能適用到對於爲一商品的勞働者勞働力。這就是勞働者之工銀，也受勞働力之生產上社會的必要的勞働分量所決定。這勞働量，便是「勞働者爲維持自己，教育自己所必要之費用。」這就是說，在一定的國家，在一定的時期，乃依着維持勞働者并其子女底生活所必要的生活資料之生產上所必要的勞働時間而決定。而資本家便是依此價格而購買勞働力的。這就是資本家祇須據此價格，才能雇傭勞働者而使用之。資本家雇傭勞働者之目的在獲得利潤。資本家使用勞働者之目的在設施敷地，工場，機械，原料以及動力等。爲此所投之資本，乃是結合其價值之各部分成爲生產物之價值而表現，這個便叫做不變資本。爲雇傭勞働者所用的資本，便叫做可變資本。這個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組合，便叫做「資本之有機的組成」。

爲什麼叫購買勞働力所費的資本做可變資本呢？因爲資本家祇靠購買勞働力才能增加其資本的緣故。價值之本質便是勞働，所以價值之增加，便不外是投用勞働量之增加。資本家在雇傭勞働者的時候，必和勞働者約束每天工銀的定額。這樣，勞働者在一定時間中，本只應生產該當于這一定的工銀額的價值，可是資本家是不滿足這價值量的，還必要使勞働者超過此二倍勞働時間的勞働。這剩餘勞働時間所作出的價值，便是剩餘價值，屬于資本家之所得，而他們之利潤，也是由此剩餘價值之一部



分所成的。這個正是資本家榨取勞働的所以然。這個就是馬克思之剩餘價值論。

資本家之所以購買勞働力，爲的便是剩餘價值之獲得。而資本家爲獲得此剩餘價值計，在他方面，又必須和他資本家相競爭。但因此，遂使生產費低落起來。因生產費之低落，結果不得不改良勞働的組織和採用機械。資本家對其所獲得之利潤的全部，不但不消費，反投到生產上去。這樣，資本愈益行着蓄積，同時又不得不變更投用資本的方法。資本家因爲勞働生產力增進的結果，所以愈益把資本的大部分，投到機械方面。這麼一來，資本有機的組織遂發生了變化了。資本的增加，同時對於勞働力之可變資本的投用，也增大，而不變資本，則相對的減少起來。勞働者有時還不得不逢着被自己所作出之資本拒絕其參加勞働的命運。被拒絕參加勞働的勞働者，遂被編爲產業預備軍，因爲有這種產業預備軍，所以現役勞働者，常常被其威脅，陷在被縮少工銀之危險中。并且，勞働者之所以不得不甘于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之榨取者，正因爲有此產業預備軍存在的緣故。「勞働人口的過剩，本來就是蓄積和資本主義基礎上富底發達必然的產物，同時又是資本主義蓄積的槓桿，資本制生產方法存在條件之一。這種過剩的人口，恰如資本用自己之費用所養成者一樣，完全使其絕對的隸屬，是構成可得自由利用的產業預備軍，是爲資本轉變無常的價值增殖慾的緣故，所以由現實人口增殖之限制而獨立地造出隨時可得榨取的，被準備的人間材料。」

這樣，一方行着資本的蓄積，同時他方招來勞働階級的窮乏化。馬克思說：「資本之蓄積愈進，比方勞働者地位必愈惡。最後使此產業預備軍的相對的過剩人口和蓄積之範圍及精力互相均衡的法則，便是資本打擊勞働者，較火神黑佛司之楔嚴重地打擊巨神普羅梅斯尤爲利害，產生照應于資本蓄積的窮乏蓄積。極端的富底蓄積，同時便是把自己之生產物作爲資本而造出的階級方面之極端窮乏勞働苦，奴隸狀態，無知，野獸化，道德的墜落等等之蓄積。」

一方富底集積和他方貧底集積，便是資本家的生產中一個矛盾。因爲生產力的增進，所以勞働者遂被編入產業預備軍而化爲貧困了。資本家因爲要蓄積資本，運用資本，所以對於其利潤，絲毫沒有消費之。愈大規模的生產商品，則消費商品的大衆，也愈窮乏化。這二種事實，也是經濟生活中的矛盾和恐慌。恐慌不是飢饉。恐慌是因商品過多所生，是資本主義生產之特徵。這就是社會中生產力、消費力和購買力失了均衡的現象。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嘗說明這件事說：

「商品總量，換言之即代表不變資本及可變資本之生產物部分和代表剩餘價值之生產部分的一切，必要完全賣掉。倘如不能賣掉，或僅賣掉其一部，或是降低其價格而販賣，則此場合，勞働者一定受着榨取。雖然這種榨取在資本家不是作爲榨取而實現。這樣，不但厘毫不能實現所榨取的剩餘價值，或不能實現其一部，甚至連資本家之一部分資本，也被喪失了。直接上榨取的諸條件和實現上榨

取的諸條件不同。……前者祇受社會生產力所限制，後者則受相異的生產諸部門間之互相比例和社會消費力所限制。然社會消費力這個東西，倘不受絕對的生產力所決定，則也不是受着絕對的消費力所決定，寧是受着，以縮小社會大眾之消費，祇在狹隘的界限內得變化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對抗的分配事情，為基礎的消費力，所決定。并且這個消費力又受蓄積之衝動（求資本之增大和被擴大的規模中剩餘價值之生產的衝動）所限制。這個就是被生產上諸方法上所生的不斷的革命，被不絕地伴此而生的既存資本價值之減少，被一般的競爭戰，被為保存自己，避免破滅起見，不得已的必然地改良生產，擴大生產的規模所給與的，資本制生產的法則。因此，市場遂不斷地擴大起來，市場之諸關係和規制此關係之諸條件也愈益探着生產者獨立的一自然律之姿態，愈益難于制御。內部的矛盾，雖然要擴大生產外部的範圍以保着均衡，但因生產力的發達，消費範圍的狹隘，二者間的矛盾也愈甚。但既站在以充調和這樣的矛盾的基礎上，則資本的過多和人口增進過多的兩立，不是什麼矛盾的。什麼呢？因為依着兩者之結合，產出剩餘價值之量雖可說為增大，但是生產此剩餘的諸條件和實現的諸條件間之矛盾同時也愈甚的緣故。」

這個便是馬克思底恐慌說。并且在一方面，成此為說的要素的，還有由資本蓄積所生的生產力之增大，起因于此可變資本之增大的相對的過剩的勞働者之存在和勞働階級消費的過少。這事實，便是

形成資本家的生產崩壞之經濟的基礎的。馬克思又對於此個全過程說：

「勞働者轉化為普羅列塔利亞和他們之勞働條件轉化為資本時，則資本制生產方法之基礎也就鞏固起來。這時候，勞働更進為社會化；土地及其他生產機關的，被社會所利用的，隨而所共同的，更進于生產機關的轉化；隨而私有者之更進的奪收，便採着這個新的形態。——而今受奪收者，已不是自家經營的勞働者，乃是榨取多數勞働者之資本家了。

「這奪收，乃依着資本制生產自身之內在的法則底作用的資本集中而被完成。一個的資本家，常常撲滅多數資本家。這集中，換言之即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之奪收，同時勞働行程愈益大規模化的協業的形態，科學意識的技術的應用，土地計畫的利用，靠共有勞働要具才得利用勞働要具之轉化，以一切生產機關為結合的社會的勞働生產機關而使用的節約，各國民被世界市場之網連絡的事實，以及資本制度之國際的性質等等——此等一切的事象遂發達起來。這樣，橫奪獨占了跟着此轉化行程之一切利益的大資本家之數愈益減少，同時窮乏，壓迫，隸從，頹壞，榨取等之量却愈益增大。這樣，則受資本制生產行程自身之機構所訓練，綜合，組織的不斷地膨脹的勞働階級之反抗也愈形增大。資本的獨占，同時便成為在此獨占之下開化繁榮了的生產方法底桎梏。生產機關之集中和勞働社會化，遂達到和其資本制外殼難于兩立之點。于是資本制外殼便破裂了。于是警告資本制的私有之終

焉的晨鐘便鳴響起來了。于是奪收者遂被奪收了。」

「奪收者被奪收」的時候，便是革命的時期。論證這事情的必然性，便是馬克思全學問的使命，如像「共產黨宣言」，極明瞭地論證這個過程。奪收者被奪收的時候，便是資本制之終焉，到新的社會組織的第一步。這時候，便是普羅列塔利亞掌握國家支配權而處在支配階級地位的時候。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評」中嘗說：「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中間，存在由一個至他個之革命的變革的一時期。這個就是相當于一政治的過渡期，其國家不外是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獨裁。」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獨裁，便是由普羅列塔利亞所生的一個新形式國家，其目的在計畫的經濟的實施那抑壓着布爾喬亞之反革命的全社會生產及分配的過程。并且普羅列塔利亞因為是最後的社會階級，所以此外沒有抑壓此階級之階級的存在。廢止資本的國家的普羅列塔利亞國家，喪失其國家本來目的之階級支配的對象，「在社會名稱之下，移生產手段歸于國有，國家最後獨立行爲」的終結，同時普羅列塔利亞國家遂死滅，進入共產主義之第一階段。

我們這裏引用恩格斯在其「科學的并空想的社會主義」中對於此過程的論述：

「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愈益完全，人口的大部分遂化為普羅列塔利亞，并且這個又破壞了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作出完成此革命的一勢力。這時候，被社會化的廣大的生產手段便歸于國有，同時又示出

成就此革命之道。普羅列塔利亞既掌握政治的權力，則生產手段便是國家所有的財產。

「然而普羅列塔利亞作着這樣的事情的時候，必要廢止爲普羅列塔利亞的事情。又者普羅列塔利亞不但必須廢止一切階級的差別和階級的背反，還須廢止爲國家之國家。可是對於以階級的背反爲基礎的從來的社會，必要有一過渡期的國家。就是國家原是當時榨取階級的特殊階級之機關。換句話說，即必要在各時代榨取階級爲維持自己外部的生產條件的即依現存生產方法所給與的抑壓之條件（奴隸制度，農奴制度及賦役制度，工銀制度）之下暴力的使被榨取階級屈服的組織。國家爲全社會公之代表，是因眼可能看見的一物體的社會的概括。然而所謂全社會之代表，其意義乃指着時代的代表全社會之階級國家而言。在古代，這個便是所有奴隸的自由民的國家。在中世，便是封建諸侯的國家。在現代，便是布爾喬亞的國家。可是在最後，國家在成爲真正的全社會之代表時，便歸于不必要了。在沒有受抑壓的什麼社會的階級，消滅以階級的支配和現在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爲基礎的個人之生存競爭并由此等事情所生的衝突和暴行時，已沒有什麼應被抑壓的東西了，而特殊的抑壓的權力的國家，早已不必要了。國家真實地作爲全社會之代表者，而行最初的行爲（即在國家名稱之下移生產段歸于國有），同時便是國家最後獨立的行爲。國家對社會關係的干涉，由漸次地不必要而歸于死滅。這時候，人的支配遂代替以物的行政和生產過程的遂行。所以國家不是被「廢止」，乃是其死滅。

這事情，就在一般煽動家於理論上採用所謂「自由國家」一語的場合，和其窮極上不十分的科學的證明，也成爲標準。而且對於無政府主義者要馬上廢止國家的要求，也成爲一相當的標準。」

以上所述，乃是馬克思學說的輪廓。至于這類學說影響于現代的程度如何，這在這裏沒有敘述的必要。我們祇跟着德意志經濟思想史的敘述，便能充分明瞭。





## 第十一章 羅特比杜斯及拉薩爾之社會主義

### 一

德意志初期社會主義運動，乃始於一八四〇年代，至一八四八年民主的運動發生時，纔達到其頂點。這時候，馬克思及其他多數社會主義者，雖爲勞働者階級解放而戰；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其目標雖望着國民工場之設置而進，但在德意志，皆始終于諸地方之斷片的鬥爭，所以社會主義運動，却不見有什麼效果。於是接着便是一八五〇年的反動時代。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失敗，使五十年代反動勢力的增大。于是各社會運動家，社會思想家，便不得不受此反動勢力的壓迫，而亡命于外國了。而四十年代所播種的共產主義思想，也因之而根絕了。

然而上面已經說過，五十年代是德意志產業革命發展的時代。勞働運動之物質的基礎，繼續在此反動時代構成。在布羅伊森，拜埃倫，薩克森，巴敦，於一八四六年至一八六一年之間，木棉紡績的紡錘數，由五二四、五一七升至九五七、九八四，羊毛工業由八五〇、五九六升至九二四、二一九，

用動力的織機由七、七五〇升至三〇、七五七，其所需要的蒸氣機關的馬力，由四、六〇五達到二六、六九六。布羅伊森的鐵工業，也有同樣的發展。熔鐵爐的數，由二二九增加到三二六，製鋼爐由三二七增加到八一五，鍛鐵爐也由一六八達三〇八之多。工業之所以如此發展的，完全因為當時保護關稅的施行。農業雖仍處在封建的制約之中，然跟着農業化學之發達，也繼續發展起來。這樣，適應于這些產業需要之銀行和鐵道，也遂其躍進的發達。

如此產業的發達，乃增進布爾喬亞物質的利益。五十年代的反動，在政治上，雖抑壓市民階級，然此政治上之抑壓，跟着物質的富底集積，遂處在被排除的命運。布羅伊森反動政府之更迭，使政治的自由主義之希望增大，同時又使獲得了結社和言論的自由。這結果，遂使「進步黨」的出現。進步黨的勢力，無久得到參加憲法的運動，從而愈益增大起來。這個進步黨，乃站在上述德意志·曼切斯達學派思想基礎之上，對於勞働者之態度，其唯一的對策，乃以自助為手段的信用組合之組織。被稱為進步黨「社會運動之王」的什切杜烈治，便是站在這個立場的。德意志勞働者之一部，在政治上參加進步黨，以圖其生活狀態之改善。可是勞働階級，因四十年代以來之社會主義的宣傳，已了解社會主義之意義，且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了。所以他們當然不滿足于進步黨之自由放任主義的勞働問題觀。于是勞働者階級，他們便彷徨於歧路，既不服從進步黨，也不另興獨自政治的運動。其實從來德意志

勞働者階級，他們自身原來沒有獨自的大衆的政治運動之經驗的。在這種初期的狀態，當然必要一優秀的運動的指導者。但當時德意志勞働者之一部，却處在拉薩爾指導之下。自然，馬克思底影響，雖較他爲大；當時亡命于倫敦的他，雖不能直接領導德意志勞働運動，然到他參加組織後，受馬克思影響的勞働者，遂不時發生運動，到了一八七五年，兩派遂實行妥協了。

我們這裏必須敘述拉薩爾思想的傾向。但未敘述以前，我們尤應敘述他底先驅者羅特比杜斯的思想。

## 二

德意志社會主義者，對於經濟理論的構成，給與最大的貢獻者，這自然是卡爾·馬克思了。然而我們在講談德意志社會主義大綱的時候，倘祇舉馬克思，這是失其當的。這時候，我們至少必須舉出二位社會主義者。這二人，除羅特比杜斯之外，還有他底後輩拉薩爾。羅特比杜斯，在年齡及著作上，都是馬克斯之先輩。在社會主義者中，比較上，他構成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最早。我們據此一點，說他是馬克思之先輩，決不是過言的。然而這個祇是年齡上的問題。在後來，羅特比杜斯對於馬克思底經濟學的著作，還有抗議「剽竊」他底理論的事情。可是在經濟學上的理論，除其出發點的勞働

價值說之外，羅特比杜斯和馬克思之意義，完全是各趨極端的。就對於勞働價值說而言，恩格斯也嘗在「哲學之貧乏」第二版序文中，舉出非剽竊的證據。他說，價值理論之社會主義的應用，決不是始于羅特比杜斯的，十九世紀前半的英吉利，僅主張類似羅特比杜斯底價值論的思想家之名字，已足填滿了幾頁紙數了。恩格斯這種見解是很正常的。原來馬克思和恩格斯，乃依着英吉利經濟學而構成其經濟學，他們完全不顧及德意志的經濟學。從而馬克思，在其經濟學研究的初期，未嘗知道羅特比杜斯的事情，也是其當然的。

羅特比杜斯底生涯，完全是靜默的讀書人的一生。他最初學法律，任裁判官，後感覺法律乾燥無味，便退職不就，而遊覽外國，到一八三四年才歸來，在豐梅崙的亞格荷收買騎士的領土，一面經營土地，一面研究社會科學和歷史。一八三四年革命的時候，被選為布羅伊森國民議會的議員，處在左傾中央黨的領袖的地位。而這一年，漢塞滿組織內閣的時候，他遂被任為宗務大臣。可是他執務僅十天之久，其後遂堅辭不就。政治家的羅特比杜斯，雖很熱心于德意志的統一和為佛琅克佛爾帝國議會主權問題而奔走，但因爲對於辭職的動機和主權在民主主義和其他閣僚意見不能相容。其後他又被選為布羅伊森議會議員，但堅辭不就，和政界完全隔絕，專從事于社會的研究。當時進步黨雖也幾次請其出處，但也歸于無效。當時拉薩爾也很熱心勸誘其參加德意志勞働者協會的設立，求其修改此協

會的綱領，而他也堅辭不應。

羅特比杜斯關於社會問題最初的著作，乃寄給奧克斯堡新聞報被拒絕登載的「勞働階級之要求」(Die Forderungen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這篇論文。這篇論文不僅藏着羅特比杜斯後來思想發展一切的萌芽，便是對於當時德意志社會主義理論，也給與一新鮮空氣。何以呢？因為當時德意志社會主義，一部分多受傅利葉 (Charles Fourier) 社會主義之影響，拜着政治的急進主義之後塵。羅特比杜斯之論文，在其內容，給社會主義理論以一個新面目。這個主要的就是濃厚的歷史哲學的色彩。其次的著作爲「國家經濟狀態之認識」(Zur Erkenntnis unserer staatswirtschaftlichen Zustände 1842)。其內容皆是經濟的理論，決定羅特比杜斯一生學說的形態。這部書，確立了他底最重要的分配理論，貢獻于當時國家經濟缺陷之認識和救濟者很大。其他之著作如下：

「給基西曼的公開狀」(Soziale Briefe an von Kirchmann 1850—51)

「資本論」(Das Kapital)

「地主現在金融困難之說明與救濟」(Zur Erklärung und Abhilfe der heutigen Kreditnot des Grundbesitzes 1868—69)

「標準勞働日」(Normal arbeitstag 1868—69)

他底著作中最重要的部分，皆收集在華克拿 (Adolf Henri Gotthilf Wagner) 及許薩格 (Cosack) 所編輯的全集四卷之中。最近又由羅拜·密斯爾教授發行他給斯烏麥塞之信中關於分配論的一文 (Robertus Neue Briefe über Grundrente, Rentenprinzip, und Soziale Frage an Schumacher 1926)。

### 三

羅特比杜斯和西斯蒙 (Jean Charles Leonard Simondi)，羅拜·歐文 (Robert Owen) 一樣，乃由當時經濟恐慌之現象，而研究社會問題。他也不外是由所謂一切經濟財被勞働所消費而且祇是勞働才能消費的勞働價值說所出發，再把此說和極貧并商業恐慌之現象結合起來。以爲勞働者之不能取得其所製出之價值的全體，就是其貧困的原因，并且以爲在現在國民經濟組織之下，勞働者階級對於國民之全收穫所應得的部分，常常減少。此工銀額減少法則，便是相對的困窮說，而且他底恐慌論的基礎，也就是在這個地方的。資本主義組織中，勞働生產力雖然增加，但勞働階級所應得的工銀額却很減少，從而使其減少了購買能力。這就是說，勞働階級被減少了的工銀額，不能有購買膨脹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力量，所以釀成消費過少的病弊。這一點，羅特比杜斯便是用更精緻的形態而敘述西斯蒙之學說，爲未來的馬克思之先驅。

除工銀之外，他又總括着他種所得，稱之爲賃子。所謂賃子，便是不勞所得或是財產所得之意義，就羅氏自身也以爲不外是「自己未嘗勞働，祇靠財產所收得的一切所得」。這個分爲資本賃子和土地賃子二種。這二個不勞所得，乃靠着二個事實而取得的。第一，是現在經濟組織中之勞働，產出勞働者維持生活上所必要的東西以上的東西，靠此超過的東西而使不勞者得到安逸的生活的事實。第二是法律的性質的東西。什麼呢？因爲國民所得之分配，并非在生產上行之，乃是在分配上行之。至于土地并資本之私有制所行者，則爲其所有者強制無所有者的勞働者，而取得其生產物之大部分。這事實，決不是自然的狀態，這不過是社會的歷史的事實之所產，現存經濟的勢力之活動的自由競爭作用的結果。羅特比杜斯以此事實爲自然法則，而嚴酷地批評經濟的自由主義。土地所有，資本及其他所有，決不是人間由自然狀態所得來的，恰如封建的權利和追放權一樣，乃是社會的歷史的發達而來的。

此種社會的歷史的發達之結果，遂釀成今日工銀額的減少，商業恐慌和極貧的事實。這更因站在私有財產和契約自由之上的現社會組織而使其惡化起來。所以倘要充分解決社會問題，必須根據這一點而着手的。

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必須廢止土地和資本之私有制，實施共有制。因此首先必要一新國家經濟組織。這時候，國民所得的分配，乃從着完全的法的理念而行，不論什麼人，也不能取得等于其生產物

價值之對價的所得。可是至于非物質的勤勞之對價，却必須由此對價中支付之。這時候，勞動工銀既不減少，而恐慌和極貧的現象也被撲滅了。可是羅特比杜斯也很明白此種組織不能急速地使之實現的。

在某場合，他尚說此種制度之實現，必要五百年的光陰。但是他對於當時的社會問題一般，却以爲不必要等待着這麼久的時日，他常常考慮一種應急的方策。這種方策，在他便是依着公權而調節工銀即改良勞働制度。這事情，已詳述在其「標準勞働日論」中了。——第一，在社會全生產物中，分配于勞働者階級之總額，必須較其他分配額爲高。第二，對於勞働者，必須和其他階級一樣，給與文明之成果。在社會勞働生產力增加時，必須以此增加率爲比例，而增加勞働者之工銀。第三，勞働階級不受市況變動的影響。

而應于此要求，第一必須依勞働決定一切價值，第二必須制定適應于此價值之勞働貨幣和其工銀的使用，第三必須設立爲此貨幣和實物相交換的貨物貯藏所。

羅特比杜斯這種主張，完全是一種國家社會主義的主張。他以此國家觀爲基礎，而構成他底社會主義的主張。從來的社會主義，多被視爲追求個人幸福之集產的組織，然在羅特比杜斯，社會主義的組織，乃是爲社會全體的組織，不是爲個人幸福之組織。在這一點，羅特比杜斯之國家觀，多受腓西



特和黑格兒之影響。并且他底國家觀不僅是純粹意義的觀念論的國家觀，還是依于社會發展之必然性的國家之增大的意義。據他，在歷史上，低度的社會狀態得進化于高度的狀態。他說：「國家不論在其廣大方面或在其能率方面，皆得而進化。其行動，得跟着其範圍之擴大而增進。國家由一進化階段移到他階段時，或特種機關的一切機能，在廣大的範圍中，被廢止後，不僅愈增其複雜之程度，還增大其調和之程度。社會諸有機體之特異性愈增大，則因其互相之交涉，依存于某中央機關之程度也愈高。」這個便是社會進化史上國家的地位。他便是立在此地位而主張國家社會主義的。因為他底主張太富于保守的態度的緣故，所以不能受社會主義者之歡迎，惟其經濟的理論方面，頗見有若干影響。如像華克那，尙把他底經濟理論的貢獻比爲「社會主義的李嘉圖」。至于他由經濟和法律二方面說明社會現象的一事，却很使一般受着要嚴切地區別社會現象之形式和內容的新康德學派影響的人們之特別注意。便是現在德意志理論經濟學中有顯著勢力之社會的法的學派尙承認羅特比杜斯爲一先驅者。

#### 四

上面已經說過，進步黨雖然希望勞働者階級的援助，但因其經濟的自由主義之立場，缺乏對於勞

働問題深刻的理解；同時又因其基礎階級的立場，每特殊處置勞働階級。甚至于什切杜烈治，却稱勞働者爲「精神的黨員」或「名譽黨員」，簡直是一種侮辱的稱呼。因此我們可以想像，勞働者對此是多麼不滿的事情了。

勞働者於是便開全勞働者會議，討論對解決勞働問題的對策。這會議的地點在萊府，會議中組織了一個中央委員會，要求拉薩爾對於勞働階級之政治的，物質的，精神的狀態底改良，以及解決什切杜烈治式產業組合之勞働問題，開陳其意見。而拉薩爾對此，如後所述，則給與一篇「公開答覆」以應付之。

拉薩爾何故給與這樣的任務呢？拉薩爾是猶太人，少年時代已富有革命的天才，一八四八年頃，已參加共產主義運動，五十年代，和馬克思交遊，很受馬克思的影響。并且此時已經發表了二三冊關於政治的社會的著作了。一八六二年，他在柏林近郊之阿拉尼恩堡的手工勞働組合支部的柏林機械工部演講「現代史的時代和勞働階級理念之特殊關係」(Über den besonderen Zusammenhang der gegenwertigen Geschichtsperiode mit der Idee des Arbeiterstandes)，後又發行「勞働者綱領」(Das Arbeiterprogramm)。這次的演講，很喚起勞働者階級之注目。如像前記之中央委員會，嘗寄這樣的信給他說：「先生之小冊，一到這裏的時候，很受勞働者之大喝采，本中央委員會，也嘗在報

紙上，表明服從先生精神之意見了。……我們承認上記之小冊所表明的先生之見解有最大的價值。」可是這本小冊的內容是什麼呢？

「勞働者綱領」，我們只依着他演講的「現代史的時代和勞働者階級理念之特殊關係」已略窺見其一般，其終極目的，便是關於勞働階級歷史的使命之歷史哲學的考察。拉薩爾認中世至近世之發展和革命，爲一經濟的，階級鬥爭的發展。在此種歷史觀中，他很受馬克思之影響。他認中世社會爲土地經濟的時代。他說：「在中世紀，土地所有可比玉笏。玉笏這個東西，不外是對於其時代一切制度并全生活施以其特種刻印而已。這個便是中世支配的原理。土地所有之所以爲那時代支配的原理的理由，原來便是極簡單的。這個便是存于中世經濟的特質即其生產狀態的。商業在當時差不多毫無發達，而工業則更甚。其社會主要的富，主要的寧是存于農業生產之中。」

像這樣的中世的社會，遂被生產力之發展所破壞了。他常常從經濟方面求革命（例如法蘭西革命）的原因，在機械的發展上求其終極的原因。他說：「機械底外觀，雖如何樸拙，然其自身，已是一活着的革命。」他由這種見解，主張革命的必然性。他又說：「所謂構造革命者，完全是不理解歷史法則的未成熟的人間愚拙的思考。又者，因爲此故，要抑止已在社會之內臟中完成了的革命，拒絕其法的承認，或非難參加此分娩的社會或個人爲革命者，這同樣是類似未成熟的兒戲。倘如革命於社

會之中，既已存在其事實的狀態，那麼它不論如何，一定必爆發的，所以不得不把它規定在法令大全之中。」

中世社會土地所有之支配，已被代替以近代社會資本之支配即布爾喬亞的支配了。布爾喬亞，在其意義上，雖是革命的階級，但而今已作為社會之支配者，而居于現代的王位了。然而布爾喬亞之存在，必然的必有普羅列塔利亞之存在。就是一大市民不滿足大資產事實上之便宜，還要參加國家的支配，用其所有即資本，作參加國家意志及決定國家目的之條件。這時候，大市民才成為布爾喬亞。這時候，他們把所有的事實，作為政治的支配之法的條件。這時候，他們遂把其特權支配的刻印，施諸一切社會的制度。這類現象，恰如中世貴族底特徵，在握有土地所有的特權，同樣地，而他們的特徵，則在成為國民中一新的特權階級」。

這就是說，布爾喬亞之君臨，便是勞働者階級之負擔中他們自己的利益。布爾喬亞乃在普羅列塔利亞底榨取上建築其特權階級之基礎。然而有此特權的布爾喬亞，祇不過是全國民十分之一以下，而勞働階級，却占其十分之九。現在的國家，不過是此十分之一的布爾喬亞的機關，十分之九的勞働者，不但得不到國家什麼利益，反而受着租稅徵收的政治的方法之榨取。如此狀態，國家祇作着為所有者階級之富底禦防者的工作。所以處在此狀態下的勞働階級，當然必招來全社會的變革的。這個勞

働階級即第四階級，就是社會最終最極的，爲標準的階級，沒有門閥，土地所有，資本所有之差，法律上，事實上之別，形成一新的特權，不許社會諸制度有排他的條件。就是「社會下層階級，雖然得而努力改良其階級之境遇，改良其階級之命運，然而不要使個人利益和歷史的運動對立，以陷于不道德性的命運，應和國民總體之發展，理念之勝利，文化之進步，自由之發展的歷史生活原理完全相一致」。要遂行這樣道德的文化鬥爭，首先必須拋棄從來國家之理念，樹立新的國家理念。拉薩爾嘗使布爾喬亞的國家理念和第四階級的國家理念對立而說：

「布爾喬亞解釋道德的國家之目的如次：國家之目的，專在保護個人之人格的自由和其所有。這一個完全視國家爲一個更夫。何以呢？因爲這樣，國家底整個的職分，祇不外是防守強奪盜竊的更夫而已。這是多麼殘念的事情。可是這種更夫觀，不僅自由主義者爲然，便是幾多所謂民主主義者，因爲缺乏思想的教養，也常常遭逢這種誤謬的。倘如布爾喬亞以爲要徹底的發其最後之言論的時候，那麼他們如從着他們之思想，則在沒有強盜竊盜存在的地方，不得不承認國家爲無用的東西罷。

「第四階級解釋國家之目的，完全如此不同，他們之解釋是真實的解釋：歷史是和自然的鬥爭。就是和窮乏，無知，貧困，無力以及人類自有史以來的種種不自由的鬥爭。這種無力的克服的進行，便是歷史所示的自由的發展。在此鬥爭中，倘如我們爲各自之利益，各自單獨而行，或是打算這樣地

進行，那麼我們決不能前進一步的，或是不能進達今日以上的狀態。

「有使此自由的發展，達到人類自由之發展的職分者便是國家。國家便是在一個道德的全一體中之統一體，使包攝在此結合中之一切個人能力百萬倍的增大，使一切個人之能力成爲此百萬倍增大的一個的統一。所以國家之目的，并非如布爾喬亞之理念，祇在保護個人之人格的自由和其所有。國家之目的，寧是首先依此結合，使各人能達到其個人所不能達到的目的及生存之階段，使他們獲得其個人所不能企圖的教養力及自由之總額。所以國家之目的，在使人間達到積極的展開，達到進步的發展，換言之即現實的形成人間之使命即其文化。國家之目的，便是到自由的人類之教化及發展。這個才是國家真道德的本性，是其真正的更高尙的任務。」

這個就是拉薩爾之「勞働者綱領」的大要。

這個講演的結果，釀成一八六三年萊府勞働者會議中央委員會徵求拉薩爾對於下面之問題的意見。就是要求拉薩爾指示他們援助進步黨而參加其政治的活動或據什切杜烈治之信用組合而改良勞働者之狀態的問題。拉薩爾對此，遂公布了「給萊府一般勞働者會議中央委員會的公開狀」(Offenes Antwortschreiben)。關於政治問題的拉薩爾答覆，第一，勞働者不應不顧政治。勞働者正當之利益，祇依着獲得政治的自由，才能達到。第二，勞働者在其政治運動中，不要參加進步黨中任何部分

的運動。因為勞働者政治的綱領，并不如進步黨所謂預算協贊權這樣單純的東西。并且進步黨靠勞働者之援助而打倒官僚政府後，他們能否獨占政治的利益，或能否分給於勞働者階級，這猶是一個大疑問。而且進步黨對於政府之態度，是極卑屈的，無力的。從而勞働者所應取之道，還是很明確的。這就是，勞働者階級應組織自己之勞働黨，以一般的平等并直接選舉之實現為目的而進行。并且指摘什切杜烈治之信用組合不是站在勞働階級的立場而反對之。他說，什切杜烈治之信用，貸借，原料并消費組合論，素來都不是為勞働者階級自身利益的方策，乃是為中產階級而立論的。對於未嘗獨立執行事業的勞働者而要求信用，貸借，原料的組合，這是很無意義的，并且最能利用組合的中產小企業者之立場，在此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也很沒有利益可言，這個階級，現在還在繼續沒落之中。從而享受此種組合利益者之數很少，即使能得到些少利益，而也不能挽回其沒落的命運。結局信用，貸借及原料之諸種組合，雖採着改造社會的手段，但在普羅列塔利亞也屬無用，而在中產階級，所收穫的效果也甚渺少。

然而消費組合是什麼呢？勞働者雖也作為消費者而生活，但不能說勞働者因是消費者才被榨取的，所以也不能把消費組合看做改良勞働階級生活狀態的手段。甚而在消費組合中，反存在侵犯勞働者階級利益之一種經濟法則。這個就是「工銀鐵則」。勞働者階級之生活，每依着習慣上所必要的生

活費，即依着維特勞働者自身之生活，維持其種族上所必要的費用而限定。在現社會，勞働者雖能作爲一商品而交換買賣，但其結果，決定工銀的則爲勞働之需要和供給。勞働之供給，在增加の場合，工銀必下落，降到必要生活費以下，從而勞働人口遂減少了，于是又成爲勞働供給之不足，而工銀復又高升起來。但是這種工銀因勞働之需要供給的作用而高低，往往受必要生活所牽引。牽引此工銀復歸于當時之必要生活費的作用，便叫做工銀的鐵則。從而勞働者階級靠消費組合所得的利益，祇是他們必要生活費的減少，依着工銀鐵則的工銀，祇是由消費組合所得的利益被減少的結果。因之消費組合不但不能給利益勞働者階級，反而增加雇傭勞働者的資本家階級之利益。所以勞働者階級，倘要改良其生活，則必須避免此工銀鐵則的支配。

然而勞働者怎樣才能避免此工銀鐵則之支配呢？這個除開勞働者脫離其勞働者地位之外，別無方法。這就是，勞働者不被其他事業主雇傭，自己爲事業的主人。「勞働者自己作爲自己的雇主，是廢止那冷酷的工銀鐵則的方法，是其唯一的確實的方法。」這樣，工銀和利潤的區別便歸于消滅，而此二者遂成爲勞働的收益，歸于勞働者自身之所有。因此，勞働者首先必須協力組織生產組合。在勞働者沒有必要財力組織的時候，國家必須援助之。「勞働者自由聯合，即受國家保護獎勵的勞働者自由聯合，實是使勞働者脫離現在荒廢境地的唯一手段。」爲文化國家之國家，對其全人民十分之九的勞



働者階級的援助，這是很其當然的任務。而人民則對於國家，要求無記名的，平等的普通選舉，依多數之力，完成此劃期的事業。從而勞動者階級當面的政治運動，便是組織獨立的政黨，獲得平等的普通選舉。

上面所說，就是拉薩爾「公開狀」之大要。而萊府的勞動者，對於此答覆很為滿足。於是據此編成一個綱領，決議組織「德意志一般勞動者同盟」(Al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要求拉薩爾任總理。於是拉薩爾之宣傳才能，遂成爲梅尼河流域的勞動者所公認，以這些勞動者爲主體，開始其結社的事業。一八六三年五月，在萊府招集漢堡，瑪爾堡，格倫，杜治塞特爾夫，梅尼士，埃爾巴佛爾，巴爾緬，索林堅，勒不士格(萊府)，佛琅克佛爾十都市的代表，組織「德意志一般勞動者同盟」。這運動，在萊茵地方特別繁盛。這同盟的組織頗集中，處在拉薩爾獨裁政治之下。拉薩爾就總理職後，雖然頗顧及勞動者階級之理念，但因爲有時和裁判所鬥爭，有時和進步黨鬥爭，所以結果遂使他接近于卑斯麥了。這個運動，其發展甚形遲慢，他最初預期結合十萬名勞動者，但這祇是一種夢想。他參加此運動的翌年，即一八六四年，爲着一戀愛事件，因決鬥而終結其一生。德意志的勞動者，都認此事件爲他底政敵奸險的手段，從而對於他底死，認爲勞動運動可尊的犧牲，抱着無限感懷。可以說，這一事件，愈使勞動者階級對於社會運動的衝激。



## 第十一章 社會主義運動之發展與其理論的批判者

### 一

拉薩爾底死，結果「德意志一般勞働者同盟」的總理，遂爲壁加所有了。壁加因爲無能且暴慢，勞働者同盟，幾幾乎大失其勢力。虧得 Johann Baptist von Schweitzer 有能的指導，拉薩爾派之社會主義者，才能維持其勢力。這時候，正值馬克思亡命于倫敦，鑑着祖國社會主義運動的不振，遂命其同志威廉·李卜克內西回到德意志，協助 Schweitzer 從事運動。但因政治上意見的相異，遂另組織一團體。這個便是非妥協的馬克思主義的傾向。李卜克內西 (Wilhelm Liebknecht) 回國後，以勒不士格爲中心，廣汎地吸收一般同志，參加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運動。在這時候，得到一個很熱心於勞働者組合之組織的柏伯爾。柏伯爾恃其天性之雄辯和組織的能力，增大了馬克思主義的運動。

這麼一來，德意志社會主義運動的主要潮流，遂生出拉薩爾派和馬克思派之對立。拉薩爾派，已如上述，乃受着德意志古典哲學，尤其是腓西特和黑格兒理想主義的國家觀底影響，其目的在建設以

國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所以要求現在國家之援助，不拒絕和現在國家之妥協。并且其主要手段，乃在改良勞働者階級，要求生產組合的組織。然而馬克思主義，則由唯物史觀之立場，主張現代國家徹底的破壞，至少也不和現在國家相妥協。兩者之立場，尤其是國家觀的差異，雖是如此各走極端，然在社會主義運動的初期，大家皆意識到諸分派互相對立的不利，所以在一八七五年，於二派之間，遂成立了一個妥協，合而形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新團體。這結果，遂編成了「哥達綱領」。

「哥達綱領」乃由如次之原理而出發。「勞働爲一切財富和文化之淵源，一切有用的勞働，祇是依着社會才可能，所以一切勞働生產物，應歸屬於課以一般勞働義務的，保證平等權力的，對於各人保證其合理的欲望的社會，即社會之全員。在今日之社會，勞働的用具，乃屬於資本家的獨占。并且由此事實所生的勞働階級的隸屬，便是一切形態的貧困和隸屬狀態的原因。勞働的解放，便是要求勞働用具爲社會共有，要求勞働的成果爲共同的利益，要求正當的分配和伴此分配所生的全勞働之組合的管理。勞働的解放，必須是勞働階級的事實。而對立于勞働階級之一切他種階級，不過是單純的反抗的集團。」由此原理出發，「德意志社會主義勞働黨，用一切合法的手段，努力建設自由國家和社會主義社會，依着廢止工銀勞働組織而打破工銀鐵則，廢止一切形態的榨取，克服一切社會的，政治的不平等。」

這個就是由馬克思派和拉薩爾派妥協所組織的德意志社會主義勞動黨之立場。據上面所說，我們已很明白，社會主義勞動黨之原理，便是馬克思主義和拉薩爾主義之間不相調和的混合。所以對此的批評，也是必然的現象。馬克思寄給布喇格的信中，開始作「哥達綱領」的批判了。而恩格斯，也採着和馬克思同一的態度。

像這樣由妥協而結合，而成立「哥達綱領」，續而奮起批判，這完全是二派思想混合的形態當然的歸結。

然而德意志社會主義政治的活動，到了一八七〇年，其發達却很躍進，比如一八七一年帝國議會議員選舉的投票總數爲三、八九二、一六〇，而社會主義者所得票則爲一、二四、六六五，選出議員二名；一八七四年之總投票數爲五、一九〇、二五四，而其所得票數則爲三、五一、九五二，選出議員九名；一八七七年總數爲五、四〇一、〇二一，其所得爲四、九三、二八八，選出議員十二名。據此便知道其發達的一班了。

## 二

這種社會主義運動的勃興，很震動了鐵血宰相卑斯麥的腦袋。一八七一年，卑斯麥已提議，要求

列國採同一態度，以取締社會主義運動了。但這種提議，得不得英吉利政府之同意，遂喪于有耶無羅之中去了。於是德意志政府，遂單獨的行動，以言論的壓迫，爲對抗社會主義運動的策略，在一八七四年，制定「帝國出版法」。接着一八七八年發生的黑德爾和諾比林之皇帝狙擊事件，更使卑斯麥制定了鎮壓社會黨的法律，給與一舉而撲滅社會主義運動的機會。自此種法律制定後，德意志社會民主主義運動，遂不得不處在和此酷烈的政府的壓迫政策苦戰之中了。因而希望和現在國家妥協的拉薩爾派之勢，遂漸次衰退了。并且因爲這個緣故，社會黨中，遂也分爲二派。一派主張以言論戰而對抗此壓迫政策，一派則主張以直接行動而逆襲之。前者屬多數派，後者屬約翰·墨詩特（Johann Joseph Most）無政府主義派。但是社會民主黨中的勢力，却歸于馬克思派的勝利。此種法律制定後，社會主義的言論機關，雖然完全被消滅，然社會主義之勢力，和同情于此傾向的人們，却較未制定此法律以前更形增加。此種鎮壓法，不但不能撲滅社會主義之勢力，反而使其增大起來。這樣，鎮壓法既完全沒有效果，遂不得不在一八九〇年的九月中宣告廢止了。對於鎮壓社會主義法律的勝利，便是社會主義中馬克思主義的勝利。這歷一來，德意志社會民主主義之傾向，遂受着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支配了。一八七五年「哥達綱領」成立後，經過十五年的光陰。又制定了「埃爾佛爾綱領」。而此次的綱領，和前次者完全不同，此次的綱領，完全是根據于馬克思主義的原理的。由卡爾·考茨基（Karl Johann Kaut-

(Lasky) 所寫的「埃爾佛爾綱領」之原理，有如下之部分：

「布爾喬亞社會經濟的發展，自然的必使以勞働者生產手段的私有財產爲其基礎的小經營崩壞。這種發達，必使勞働者和其生產手段分離，使勞働者化爲無產的普羅列塔利亞。何以呢？因爲生產手段成爲比較上少數的資本家和大地主之獨占的緣故。生產手段的獨占化，接着非常大的經營，必驅逐小經營，道具進化爲機械，行着人間勞働生產力巨大的發達。然而跟着這些變化所生的一切利益，都被資本家和大地主所獨占。

「這個意義，便是普羅列塔利亞和繼續沒落的中間層即小市民及農民們生活之不安和貧困，壓迫，隸屬，低下，榨取之增加。

「普羅列塔利亞之數愈多，過剩勞働者之軍愈多，則榨取者和被榨取者之對抗也愈烈，而布爾喬亞和普羅列塔利亞間之階級鬥爭，也愈益險惡。而此鬥爭，遂分現代社會爲相對抗的二個陣營。這個是一切產業國中一般的特徵。

「有產者和無產者間之溝渠，因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所釀成的恐慌，愈使其本質增大起來。而此恐慌，愈益廣大地達到猖獗之極點。於是一般的不安，便成爲社會之常態。現代社會之生產力，因太過發達，其結果，生產手段之私有財產，遂自己證明其目的之不能應用，不能適合于充分的發達。以

前對生產者為確保其生產物之所有的手段底生產要具的私有財產，而今遂變為榨取農民，手工業者和小商人，使非勞動者即資本家及大地主所有了勞動者之生產物了。僅是依着轉變那對於生產手段即土地，鑛山，原料，道具，機械，交通機關等等之資本家的所有財產為社會的所有，僅是依着轉換商品生產為由社會經營（這個當然為社會全體利益的）的社會主義的生產，而現在還在繼續被榨取的階級，才能把大經營和社會的勞動常常增加的收益力，作為最大的幸福和一切方面有調和的完成的源泉，以代替貧困和壓迫的源泉。

「這社會的轉換，不僅是解放普羅列塔利亞之意義，還是救濟在現狀態之下繼續苦悶的一切人類的意義。然而這個祇是靠勞動者階級的努力才可能得到。何以呢？因為他的一切階級，在一方面，存在其內部的利益的鬥爭，同時在他方面，又是站在私有生產手段的基礎之上，以維持此社會基礎為其目的之緣故。

「勞動者對資本家榨取的鬥爭，是必然的一政治的鬥爭。勞動者階級，倘沒有政治的權利，則不能遂行其經濟的鬥爭，還不能使其經濟的組織發展。勞動者階級，如沒有政治的權力，則不能實現生產手段之共有化。使勞動者階級這種鬥爭形成一意識的統一的鬥爭，使其了解這個必然的目的，就是社會民主黨之任務。



「有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的一切國家，其勞働者階級之利益，全然相同。因世界交通和世界市場所釀成的生產的擴大，使某一國勞働者之狀態，愈益依存于他國勞働者之狀態。所以勞働階級之解放，便是一切文化國家勞働者所關與的事業。德意志社會民主黨，應和其他一切國家有階級意識的勞働者同樣認識這事情，且宣明之。」

「德意志社會民主黨，并非爲新的階級的特權而鬥爭的，反而是爲着廢止階級支配及階級這個東西，爲着排除一切之性和門閥的差異，樹立平等的權利和平等的義務而戰的。由此種見解出發，德意志社會民主黨，不但向着工銀勞働者之榨取和壓迫而攻擊，還應對於一切種類的榨取并壓迫而鬥爭。」

上面所舉，便是「埃爾佛爾綱領」原理的部分。由這個綱領，一直至于一九一八年喀勒斯新綱領的制定時止，皆被德意志社會民主黨作爲綱領而使用。像這樣的德意志社會民主黨之原理，乃受馬克思主義所支配，自馬克思主義得到勝利的過程中，和勝利以後，皆不見有反抗馬克思主義的事跡。但在未制定「埃爾佛爾綱領」以前，在德意志勞働者中，却有宣傳蒲魯東思想的繆爾伯嘉底活動，有否定馬克思主義而傾向于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杜林克（Eugen Karl Dühring）底理論的運動，并在十九世紀末，又有由康德倫理學的立場而要修正馬克思理論的康德的研究者之運動。

繆爾伯嘉底活動，正如恩格斯之「住宅問題」中所批判一樣，完全是中了蒲魯東買空賣空的積計，其對於黨內的影響甚微。惟杜林克和新康德派對於馬克思主義之批判，却使社會主義運動之陣營中發生了一大的 *Sensation*。恩格斯覺得杜林克的宣傳，為一種可憂的不可悔的勢力，遂著作「歐根杜林克氏科學之變革」(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altung der Wissenschaft* 1878)，以逆襲之，這是人所周知的事情。至于新康德派之哲學的修正論，喚起黨中修正主義的運動，這也是德意志社會主義史上一大事件。我們這裏首先敘述杜林克的思想。

## 三

歐根·杜林克以英吉利古典經濟學派為一個黨派之學派，以歷史學派為沒有理論的學派而排斥之，同時又攻擊馬克思主義和講壇社會主義，這個完全是站在加利之立場的。據杜林克，加利不僅修正了馬爾薩斯和李嘉圖之謬誤，釀成經濟學上之一大變革，而且是市民的經濟學者，富有社會的感情。杜林克則把加利之社會的自由主義轉變為自由的社會主義。至少杜林克是堅持他底社會的體系的。在獲得社會的體系以前并放棄以後，他便是社會改良主義者。

格伯嘗在其論述杜林克的論文中，敘說杜林克社會經濟的思想內容和其變遷。他把杜林克之思想

的變遷分爲四時期。第一期，杜林克是純粹的社會改良主義者。他由批判社會關係的歷史的連鎖，說明社會的要求，指示出實際上實行的途徑。在第二期，他才認識了社會的體系。自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五年之間，他所著作之論文，皆敘述此種體系的構成。其中尤以「經濟學并社會主義批判史」(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e und des Sozialismus 1871) 和「國民經濟學并社會經濟學講義」(Cursus der National-und Socialökonomie einschliesslich der Hauptpunkte der Finanzpolitik 1873) 中說得很詳。這二本書的內容，有互相補充的關係。在第三期，他底學說中主要部分的一部分，則被主張，一部分則被限制，這個乃因爲他對於私有財產的態度并關於經濟的正義之見解變換了的結果。他底全生涯，在此時期，完全是社會改良主義者。因爲在這時，他不但不非難資本和地租，反而在現存社會的秩序之範圍中要求改良的緣故。這時期，他底主要的要求，便是勞働者團結的自由。第四時期的他，因爲世間的經驗和自身的命運，因爲更深刻的研究的不快和刺激，使他非難現代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狀態。因爲對於此時事的憤激，而他已停止了對於社會的體系的研究了。因爲這樣的千變化萬變化，所以他底著作的內容，遂充滿了不少矛盾。

據他之所信，他底社會的體系，較從來的理論的體系，尤更能說明過去和現在，同時對於將來，還很能認識云。生的科學，不但蒐集說明現在或過去的事實，尤須研究根本的合則的關係，所以它才

能認識將來的必然性，判斷此為可能性。據他，全社會的生活并經濟生活，原是從着自然法則的。而經濟的法則之認識，便是經濟學之課題。他說：「經濟科學在其更高的發展上，研究因果關係，而在一般的合則性中，表現此關係，這場合，不僅認識外的事實性，還能認識內的必然性。」

杜林克所用的方法，乃演繹的，嚴密的數量的方法，和杜寧所用的方法相同。

他關於現社會之分析的理論體系，多與羅特比杜斯相一致。在他，土地所有權并資本所有權，是前代之征服并奪收的產物。就是這種所有權，不是勞働的結果，乃是靠權力所成立的。這種權力的財產，其作用使勞働階級將其勞働成果的一部，無償地交給所有者。從而勞働者便是和一種階級的獨占相對立的階級。這樣，所以地租和利潤也便是構成維持現社會中權力的財產之社會的并政治的隸屬物。權力的財產，「從其最深的本質，便是對於人間之人間財產」。倘沒有對於人間之人間支配，則一般上，對於生產手段之財產權，尤其是大土地所有權之成立，是不可能的。沒有地主并資本家，則在其本質上，他們可以作為一定量之勞働力的直接或間接之支配者而取得地租和利潤。

在杜林克，其分配過程，便是一統一的東西。然這過程并非僅依着經濟的法則而行之，便是政治的權力關係，也被列在其中的。在杜林克的價值論中，很現出此種經濟的并政治的二元論的。一切財富的價值，在現存社會的秩序中，乃依着有自然的（純經濟的）并政治的原因的生產抵抗而決定。政

治的原因，乃在乎自然和人間之中間第三者的介入，以參加自然之武力而要求一種貨物之事情中。這一個就是一種社會的障害。

據杜林克，在此場合，經濟的正義被侵犯，行着部分的無價的奪收，以代替相等的勞働量之交換。

不論是依着共產主義，或是依着自由放任的原理，皆不能保證經濟正義之實現。可得而保證的，祇是依着在其自身中結合着自由和經濟平等的社會體系。

社會的體系，便是政治上之事項。因為社會體系的目的，原來就在視從來之各種壓迫形態的權力國家爲歷史的原始的構成形態而廢止之，從新創造一種自由的社會的緣故。以構成自由社會爲目的之社會化的理化，不論在如何之點，皆不得支持主人和奴隸的關係。在經濟的關係中，社會體系之狀態，每齎來資本，土地和生產之社會化，維持交換，貨幣，經濟和自由競爭。這組織，乃依着經濟的共同體之組織而被構成。經濟的共同體，乃是一共同社會，乃是其構成員依着公的權利，在一定的土地面積并一定的生產設施中，爲共同行動并平等地參與其收益所利用的一種結合。如在這樣的狀態，要確立權力的地位，是根本不可能的。在此種結合中，權力財產既沒有存在的餘地，從而利息和地租之類的制度，也自沒有存在的可能。這時候，集積財富的目的，祇是爲的消費的使用。從而此個共同

體中之所有的差別，其性質毫無害處，因為榨取他人的惡習，最早已被消滅了。這場合，財產這個東西，不是被廢止，乃是廢止人間榨取人間那種的財產。

杜林克理想的要求，和生產過程之知識連結，這是其特徵。他為再建築今日所損傷的自然的正義起見，所以要求社會體系的狀態。這個狀態，因為社會發展是一個合則的東西，所以必然的被形成的。「所有這個東西，每由犧牲特種的弱者而增大，并且中流布爾喬亞之創造并維持上所設施的好政治，不能永久維持此努力的結果，因而也被毀滅。」行工銀勞働的社會狀態，便是一過渡的狀態。在工銀勞働以前，既是奴隸制度，在工銀勞働以後，當是接着形成一自由市民社會。然而對於此狀態的社會之變化，祇依着漸進的社會的設施才能實現。

格伯對於杜林克之理論的體系，嘗根據他上述之四種分類，而指摘杜林克為自然法論者，個人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可是據杜林克上述之理論看來，他不但不是社會主義者，不但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且猶不是講壇社會主義者。他是主張自由的人，是在社會體系狀態中主張調和論的人，排斥國家之干涉，因而排斥講壇社會主義。因此，他又排斥當時科學的歷史的現實的經濟學派。他底一生，對於集產主義，行最銳的鬥爭。他認集產主義為最錯誤的社會主義。他非難馬克思主張強制勞働國家，廢除人格的自由。他以為所謂「奪收者之奪收」，原是一種新式的掠奪，也是一種新的不正的

制度。他說：「社會的體系，對於財產的問題，不曉得用新的掠奪來矯正掠奪的事情。社會的體系，并非依着人間事實上財產集積這個東西，乃依着道德之自然法，防止那種掠奪他們的鄰人，使他們的鄰人奴隸化的力量的繼續。」他對於馬克思之攻擊，在其後期，尤爲更甚。他認馬克思爲毫無研究價值的學者。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對他這種攻擊的攻擊，在恩格斯一八七八發行「歐根杜林克氏科學之變革」中，已很充分地表明了。恩格斯這本書的影響是很大的，僅靠這本書，已極充分地抹殺杜林克之科學的功績了。然而如像腓力靈達和黑律加之流，却很受他底影響。在現在，大理論家奧濱海瑪（Franz Oppenheimer），還汲着杜林克的泉流。奧濱海瑪據着杜林克，使其根本思想發展起來，構成「自由的社會主義之體系」。

奧濱海瑪嘗採用杜林克如次之四種理論：

- （一）資本之支配，和土地之支配同時發達。
- （二）從事實上說，資本之運營，不是較土地財產爲先，乃是接續于土地財產之後。
- （三）工銀勞働者，乃對立于一種階級獨占的階級。
- （四）由權力所生的土地財產之種類，是其他一切所有貨子的根源。所以一種變革，到了某程度，倘不達到土地關係，則這變革，決不能達到改造生活原理狀態的根源。

#### 四

其次我們打算敘述德意志社會主義中康德哲學的影響。

德意志社會主義，在其歷史的發展中，和法蘭西社會思想最有密切的關係。而運輸法蘭西社會思想入到德意志者，便是立在黑格兒影響之下的青年黑格兒派。便是德意志社會主義理論的完成者如馬克思，拉薩爾，羅特比杜斯，其哲學的方法論，社會觀，國家觀，尙受着黑格兒的影響。所以我們在德意志古典哲學和社會主義之關係中，首先應舉者爲黑格兒，其次爲腓西特，至于康德，寧是個人主義之哲學者。

然到了一八六〇年，在德意志，遂發生了一種新傾向。這種傾向，便是不滿于社會主義之唯物論，不滿于瑪勒叔（Moleschot）和表西拿等之自然科學的唯物論，要使德意志固有的理想主義復興起來。同時要復興康德主義的運動，也形成了當時哲學界中一種新傾向。此種新傾向，到了一八九〇年，才影響及于德意志社會主義。所以對於康德哲學的研究，最帶有社會主義的傾向的，便是瑪爾堡學派的新康德主義者之一團。

十九世紀後半期德意志理想主義哲學者中，最注意于社會問題的，便是阿爾巴·郎格（Albert L



ng)。阿爾巴·郎格是馬爾堡大學哲學教授，由著作「唯物論之歷史及其現代之意義」(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und Seine Bedeutung für die Gegenwart 1866)一書而有名。據一般所考察，他許是馬爾堡學派之始祖。然而他之由康德倫理學的立場，闡明其對於解決現代社會問題的倫理的理想主義之立場，這一點，他確是樹立倫理的社會主義的最初的哲學者。他底「近代及將來的勞働問題」(Die Arbeiterfrage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Gegenwart und Zukunft beleuchtet 1865)，對於勞働問題，給與一倫理的社會學的研究，這是很應尊重的，但其中關於社會主義的思想和康德哲學之關係的敘述，却很模糊不清，這也是一種遺憾的事情。并且如後面所述，這本書的第三版，反多受布靈達諾之影響，成爲自由主義的作品了。

至于認識康德之倫理學有建設社會主義之根本的重要性者，則爲馬爾堡學派之建設者黑爾曼·哥衍。哥衍在一八七七年發行的「康德倫理學基礎」(Hermann Cohen, Begründung Kants Ethik)中，嘗論康德最高尚的思想爲其政治的觀念。而他在阿爾巴·郎格底「唯物論史」第五版的序論中，對於康德和社會主義之關係的論述尤爲明確。他在這篇序論上說：「社會主義既基于倫理學之理想主義而建設，這是正當的。反之倫理學之理想主義，也應在社會主義之基礎上建設起來。」又說：「康德是德意志社會主義真正的創設者。」

要之，哥衍便是由康德之至上命令而樹起倫理的社會主義的基礎的。

哥衍立在這樣的見地上，樹立社會主義的基礎，從而對於馬克思主義，雖也加以批判，但這種批判，不是爲排擊馬克思主義之批判，乃是要給與這主義以理想主義的基礎。從而他對於社會，爲如次之要求。第一，社會主義必須放棄其基礎之唯物論。第二，社會主義也須同倫理論一樣，有善之力的信仰，實現正義之希望等等之神的觀念。第三，必須站在純現實主義上解釋社會之概念，廢除物質的經濟的結合之觀念，要求理想的法律及國家之權威。因爲沒有法律之存在，則自由不能存在，同時自由的人格，倫理的實在物之真實的團體，也不得成立。第四，我們必須結合人類社會之觀念和國民之觀念。因爲我們最先的努力，乃使國民實現人類社會之觀念。國民之觀念，在一國中，對於特權階級，乃代表人類社會之觀念，人類社會之觀念，乃構成基于精神教化之國民真正的統一。在這樣的意義上，爲實現國民之觀念而努力的，便是理想主義真正的任務。

## 五

關於新康德學派之社會哲學的方法論，在露托夫·斯丹拉（Rudolf Stammler）底「唯物史觀之經濟和律」〔Wirtschaft und Recht nach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1896〕中說得很

詳。斯丹拉底著述，不僅對於社會學之方法論，給與最顯著的影響，同時對於社會主義之理想主義化，還給與重要的基礎。斯丹拉在其社會哲學的根本問題中，嘗提出如次的問題。就是：「在如何形式的條件之下，社會生活，才是我們所認識的適當的對象，才能統一而思維？」而他又解答說：「祇是依着外部拘束之規範規制了人間社會之本質才可能。」外部的規制即法律，便是形成社會的實質即社會經濟之形式的。而社會的經驗，既是統一了一切社會經驗；而因果性，既是整個的東西，那麼我們對於經濟的法律的發達，決沒有不能發見合則性的。這場合，他又說不是唯物史觀之缺點。社會生活，本來是一元的，精神的運動和橫在其根底中的經濟的運動之結合，在根本上，原來便是不可否定的事實。然而以為在此因果性之外，沒有他種合則性的存在，這實為自然科學思想的錯誤。在人間世界，原來不僅存在因果性，除此之外，還有意志的法則，正常行為的法則即理想之問題。在社會現象之因果性之外，還有和因果性不相矛盾的，補充此因果性的目的論之法則的存在。社會現象倫理的判斷，和其生成之發生的說明，完全是異樣的東西。社會的運動，雖常由社會的狀態而發生，但社會的運動，却受人間意志及目的所指導，其最高的標準，祇是窮極目的而已。而此窮極目的因為有普遍妥當性，所以它不必是被經驗所制約的個別的或特殊的目的。它必須是一個的統一的見地。并且據他，這個社會的窮極目的，便不外是「自由地任意所為的人間之共同生活」。于是各個人才可以把他人客

觀上認爲正常的目的爲自己之目的。

這個就是斯丹拉底根本思想。他立在這種見解上，批評馬克思主義說：

「馬克思主義并非以爲無價的，或賠償的收回企業家之生產手段後，才爲共產主義而生產。他們乃主張這種共有原是不論在如何場合也必出現的一種必然的現象。

「社會主義社會對於人類不是適應于有絕對的妥當性之正義底自由的理想狀態。社會主義社會原是近代經濟生活方法用命令所要求的社會。所以我敢斷言，不論何人，決沒有要求馬克思主義的。不論何人，必從着自然科學的樣式及方法，而認識社會過程。這個出發點，既不是一人較他人更握着生活以上的財富之支配權爲不正義的事情，所以當然也不發出友愛的正義所支配的理想的國家狀態之呼聲。馬克思主義，祇冷靜地觀察經濟現象的行程。其觀察的結果，以爲現今的社會秩序已孕着社會主義的社會秩序，自然必然的產出社會主義的社會秩序。所以在社會主義者，以爲除開基于社會變革的必然性，基于未來的所獲得的見識根據而適當地準備自己及他人之外，別無有效的助力。馬克思主義者，不要求社會的秩序，祇是期待社會的秩序，以爲社會的秩序是自然地降臨的。何以呢？因爲他們以爲人們于科學上所認識的，今日的，近的將來社會經濟，原是要此種秩序的緣故。可是此社會經濟的要求，即使會達到不適合于壓迫的人間之狀態的時候，而我們也不能回避一般的合法則性

的。蓋經濟下命令，法律從之，這便是社會生活根本的法則，是人間歷史一般的法則。據唯物史觀之理論，經濟現象在要求生產手段之共有時，自必發生全部的變革。可是我們在飢寒的時候，不能變更人間死亡的事情。人們原來不得不服從自然法則之強制的命令的。

「馬克思主義，對於社會主義之出現，是否合目的者之問題，其根本已經錯誤了。這個是必然的。」

斯丹拉便是解釋馬克思主義爲這樣的自然必然論。就是說，據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社會，就沒有什麼人間目的意識的行動，也可以實現。可是馬克思主義却有實現其目的之政黨，要靠普羅列塔利亞世界的團結而達到其革命目的。「萬國勞働者團結起來」這個口號，不外是對此革命目的之努力的表現。據斯丹拉，像這樣地於一方面則立在自然必然的見地，於他方面又採着目的意識的行動，這簡直是一種矛盾。他說：「現實上，一切社會的思維，判斷及意欲，若是經濟關係的反映，沒有一切獨自性，那麼所謂人間之目的，所謂人們領導那不可避的進行的經濟的諸關係到某種目的之方面云云，這是很無意義的。反之，經濟發展之自然法則的行程，倘如受人間所領導，跟着他們之目的而行，則他們當然拋棄人間的存在之徹底的唯物的根本見解的。」

然而他又承認馬克思除開自然現象之因果性之外，還含有目的之思想。他說：「馬克思很知道社

會的努力之思想。而且在他底學說之理論的構成上，完全不拒絕這種思想。他嘗論目標，嘗論社會的行動。然則雷同于他的人們，務須明白如次之一事。就是依此思想，在因果的考察之外，附加了關於社會運動的新的第二種觀點，即在被因果的所把握的單純的認識之外，附加了意欲的目的之追求。」所以他又說，因為馬克思主義混合了自然科學的因果性和目的論的傾向，故其社會的認識，充滿着矛盾。所以他以為在馬克思主義之社會運動方面，至少必要修正目的論之見地。并且他又以為對於馬克思主義，不但只加以認識論的批判，而且還必要在此主義上附加上倫理的要素。

馬克思主義，畢竟是否如斯丹拉所說，乃處在自然必然論的立場？尤其是馬克思之唯物論的立場，畢竟是否立在如像十八世紀之唯物論的機械論的立場？關於這個疑問，恩格斯在其「反杜林克」及「費巴論」中，已解答得很詳，并且在近時蘇俄共產主義者尤其是列寧等之研究中，已很明瞭地解答了。

斯丹拉這種見解，影響及于哲學者 and 社會主義者之間者甚大。例如那脫魯夫 (Paul Natorp)，斯達天嘉 (Franz Staudinger)，菲靈達 (Karl Vorländer) 等各種著作，極顯著地表現出康德主義的色彩。便是在社會主義者中，尤其是在社會民主黨中，如柏倫斯坦 (Bernstein) 之修正主義運動之一部分的根據，也是處在此斯丹拉的理想主義的哲學之中的。不但是柏倫斯坦，斯密特，華脫曼等德意志近

代修正主義者受此種理想主義的哲學之影響，便是各國的修正主義者，也深受此影響。





## 第十三章 修正主義論爭

### 一

萌芽於恩格斯晚年時代的機會主義的傾向，跟着恩格斯底死，同時也漸漸地抬頭起來，恰如恩格斯自身也改宗於改良主義的樣子，所以一般人，遂乘此機會，大喊其修正的理論。此中尤以柏倫斯坦之提倡「修正主義」(Revisionismus)，爲其最顯著的一例。這個即在恩格斯死後的一年。

自然，「修正派」這個名稱，在一八九四年的時候，布魯諾·商蘭克(Bruno Schönlank)嘗不充分的，不明確的使用過，到了柏倫斯坦，才使其明瞭起來。柏倫斯坦痛感「馬克思學說之完成，必須以批評爲始」，而提倡修正主義。與考茨基同樣地蒙着馬克思和恩格斯最親的眷顧，爲德意志社會民主黨中之重鎮，站在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方面，得到偉大的名譽的柏倫斯坦，忽然變爲修正主義者，這確是他一大的決心，同時也是德意志社會民主黨中一大的波紋。

柏倫斯坦提倡此主義的論調，我們只據其登在「新世界」(Neue Zeit) 上面的「社會主義諸問

題」(Die Probleme des Sozialismus)——一八九六至九八年——及「社會主義諸前提與社會民主黨之任務」(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s Sozialdemokratie, 1899)等三篇論文，便能窺見其一斑，然社會民主黨內，猛烈地非難于此言論的呼聲，這我們也可得而想像的了。一八九八年十月，在斯都德牙爾所開的社會民主黨大會，嘗提出責問柏倫斯坦的議案。而柏倫斯坦對此責問案，反公布其對斯都德牙爾黨大會決議的釋明」的一文，固守自己之所信。這時候，和柏倫斯坦最激烈地論爭者，則為其親友卡爾·考茨基。

上揭「社會主義諸前提與社會民主黨之任務」，為柏倫斯坦宣傳修正主義的傑作。這本書，乃他應着考茨基和威克多·阿脫拉(Viktor Adler)底要求(要求他用單行本的形式發表他統一的見解)，和「決心對於社會民主黨之目的及任務而系統的開陳其意見」的所產。所以這本書之目的，正如他在第一版序文尾端所記，不外是「要依着和社會主義學說中烏托邦之殘存相鬥爭，而對於社會主義運動給與較觀念的要素還更適宜地強固的現實的要素。」

柏倫斯坦底修正，乃由認「共產黨宣言」所示的豫想為錯誤的見解出發。他說：「凡是認為所期待的布爾喬亞社會崩壞已迫在目前的見解，以及主張依着這樣切迫的社會的 *Catastrophe* 而使社會民主黨之戰術關聯依存于這個期待的見解，皆屬於我底反對之列。這個態度，是我始終固持的。這個

Catastrophe 的共鳴者，原來便是立足於「共產黨宣言」之論斷的。試不知道這種論斷，毫無一點妥當。」何以呢？「「共產黨宣言」所預測的近世社會之進化，祇在認此進化爲一般的傾向這一點，才頗正常。然而至于各種特種的推論，尤其是以進化爲必要的時日的預測，却是非常之誤的。這事情，便是「共產黨宣言」的合作者恩格斯，在其「法蘭西階級鬥爭」的序文中，也毫無躊躇地承認的。然而經濟的進化，較預想還要長期間的時日，同時這個進化，在「共產黨宣言」中，也未嘗預想到，反而採着不能預想的事情，說必須被形象所領導。便是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記述的關於社會關係尖銳化的事情，也是我們不能信任的，我們不應隱蔽社會上的現象，我們如隱蔽之，不但無用，而且無意義。有產者之數，不但不減少，而且還增加起來。社會財富的法外的增大，不但不減少資本貴族之數，反而增加一切資本家之數。中產階級雖得變化其特徵，然而他們却不是從社會的階級中消滅的。又者，在產業界，生產的集中，現在還未嘗用同樣的力量同樣的迅速而行。在大多數的生產部門，產業的集中，不得不認批評社會主義者的預言爲正常。但在他之部門，這種集中，今日還較此預言爲遲。農業中集中之過程，其進行尤爲遲慢。產業上之統計，非常示出有階段的經營上之分化。無論怎樣大的經營，未嘗有一個是準備着由此階段上消沈下去的。經營之內部組織的重大的變化及其互相的關係，不能無視這類事實。」

而且他又舉出一個實例，證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時代太過信任暴動革命的事情。他說：「一八七二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新版的序文中，對於「巴黎公社」，提出實際上之證據說：「勞働階級，不能簡單地取得既成國家之機關而自己運用之。」并且恩格斯一八九五年也在其「法蘭西階級鬥爭」的序文中，指摘出「由立在無自覺的大衆先頭的少數自覺者所實現的革命時代，即政治的奇襲時代在今日已經過去的事情；和軍隊的大規模的衝突爲阻止社會民主黨之恆久的發達，使黨于一時不得不退步」。約言之。即是指摘社會民主黨，用非法的手段，較用合法的手段爲妥當，易于發展；并說社會民主黨當面的任務，在「不斷地保持其投票的增加」，或是對於議會中的活動，宜乎「徐徐的宣傳」。像這樣例證的恩格斯之觀點，實在太過輕信進化的速率了。世人嘗對他說：「他對於勞働階級獲得政權的事已經絕望了，因爲他要迴避被政治的 Catastrophe 中斷了由合法的宣傳所確保的社會民主黨之增大。」倘如不這樣說，而承認他底辯論，那麼必代替以社會民主黨將來當更大行破壞的心算，而說明爲「政治的使勞働階級向上起來，組織社會民主黨，并使勞働階級向上起來，能把國家之組織變爲民主的精神，爲國內一切改革戰」。雖然這樣說明，但在道理上，却不能抱着什麼反感。這個我在我底駁論上（指上揭「對斯都德牙爾黨大會決議的釋明」一文而言罷——周已說過，就在今日，猶有充分的意義。這個問題，和恩格斯底命題有同樣的結論。何以呢？所謂民主的，

不論在什麼場合，主要的皆是應于勞働階級之智的成熟和其經濟的發展之程度，有實行的可能性的勞働階級之支配的意義。加之，恩格斯在上揭之書中，還闡明「共產黨宣言」中所謂獲得民主主義爲戰鬥的普羅列塔利亞第一重要的任務之一的宣言。」

柏倫斯坦指摘恩格斯充分地確信以 Catastrophe 爲目的之戰術底勝利的事實後，接着他又說：「由預想 Catastrophe 之永續的成功之大保證基于不斷的前進。」又說：「對於社會民主黨當面的任務，勞働者獲得政權的鬥爭，勞働者爲其自身之利益所企圖的政治運動并勞働者經濟的組織之事業，有非常大的價值。」

嘗受着馬克思主義之影響，尤其是恩格斯之遺言中最信任的人物的柏倫斯坦，而今却拋棄一切個人的理由，而公然指摘馬克思恩格斯學說之誤謬。他在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即初版發行後的十年的上揭書序文中，又如此說：

「我在這裏應申明，這本書乃由如次之見解而執筆的。這就是，勞働階級之大解放鬥爭之歷史的理由及目的，并非依據于什麼已成之形式，乃是由此階級之歷史的存在條件及此條件所生的經濟的，政治的及倫理的要求所決定，是實現勞働階級之理想（但不是什麼教理）的，倘稱此見解爲「修正主義」，那麼是很好的。但不要忘记，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當時修正主義者，是社會主義史上大修正

主義者。修正主義 是一切新的真理，是一切新的認識。加之進化不知道什麼叫做靜止，不論是鬥爭條件，或是其形式，同是受着變化法則所支配，所以不論在理論上，在實際上，也存在修正主義。作成本書以來，對於政治的，勞働組合的，協同組合的勞働者鬥爭之實地的領域中有意義的進步，我在這裏不必要立證其和本書敘述能否一致的事情。這件事，我在他的地方已經詳述過了。關於前述之諸問題。社會民主黨中的意見，在分日縱令多種多樣，然普遍的認識論之確證，較一切議論益見其明瞭，并且我們從現社會組織所得的經驗，較所假定的，尤有更長的生命，有更強的彈力性，我們根據這種考慮，不得不發展我們鬥爭的實際。所以說，這種思想，便是本書之 Alpha, Omega」

柏倫斯坦這種修正主義，倘如正當，那麼這不外是馬克思主義學說之敗北，德意志社會民主黨之進路，不得不脫離馬克思主義。可是這種主張，却受着猛烈的反駁。在此反駁中，猶以考茨基為最有力。

## 二

考茨基在「柏倫斯坦與社會民主黨綱領」(Bernstein und das Sozialdemokratische Programm.

1899)之緒論中，首先規定綱領之意義說：

「實際上，綱領這個東西，與其說以資于 Propaganda，不如說以資於黨之組織。我黨的綱領，不但是確立我們目前的要求，我們承認這個綱領，當能確保黨之統一和黨之鬥爭心，確立那諸種原則。」這個綱領，既有這樣的重要性，當然必須接受各方面之批評，就綱領自身，也必須時時考慮到  
有否和現實相矛盾。但這種考慮，尤必要以最大之良心而爲着手。然而柏倫斯坦怎樣地批判綱領呢？這個問題，我們在下面才詳細地討論它。柏倫斯坦嘗說，一般人，因不滿足綱領，遂由根本上作破壞綱領和綱領基礎的方法論（綱領原來便是從此方法論成立的）的批評，這不但無益，而且有害。他嘗費數十頁的紙數，數星期的光陰，形式的舉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此問題尙有躊躇的態度。可是像他這樣用功夫，其效果祇是等于零。比如喇布利阿拉說（Antonio Labriola）：「柏倫斯坦之著作，像由純形式的立足點出發，這已陷在所謂百科全書式的重大的缺點了。他如要批評，先須寫成一本書。」這真是適切的評論。柏倫斯坦所提出的問題，其數非常繁多，并且缺乏明瞭的敘述，沒有積極的結論，「容易惹起批評他底著作的人不能握持重要的，容易理解的結論。」所以「一般人不喜歡包括的從事於他底著作的批評，因爲這種工作，不但不愉快，而且沒有效果。可是問題是必須解決的，我們爲要解決這個問題，應積極的努力補充其缺陷的內容。」

所以考茨基遂負着整理柏倫斯坦這種茫漠的論說，在上揭書中，分爲三大章而說明攻擊之。即分

第一章爲方法論，第二章爲綱領，第三章爲戰術。并且他又把企圖修改馬克思學說的柏倫斯坦之態度分爲四個階段：

在第一階段，柏倫斯坦尙站在馬克思學說的立足點。他嘗非難多數馬克思主義者不甚注意到馬克思歷史觀之變遷，說這種變遷是很其精確的。并且他又說：「我們并非承認唯物史觀之原始的形態，我們必須承認其完全的形態。」

在第二階段，柏倫斯坦已完全喪失了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知覺了。從此後，他應着此變化的意義，下改革馬克思學說之決心。

到了第三階段，柏倫斯坦已經完全站在反對馬克思的立場了。他說：「事實上之發達，和馬克思之主張是正反對的。」

第四階段，正是柏倫斯坦尙不能滿足於他那最重要而且最決定的階段的第三階段之結果。

第一階段中所討論的問題，便是考茨基特別爲此設置第一章（A）馬克思學說之基礎，「唯物史觀」。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同是提高社會主義達到科學的地位的三大發見中最根本的東西，馬克思主義之生死，全懸于此。這都是很明白的通說。

「唯物史觀，是普羅列塔利亞社會主義的要求的理論。這雖好像非常擴大了唯物史觀之歷史的意



義，但在最近的時代看來，這個至少已很使其科學的發展能力狹小了。『喇布利阿拉這種言論，是很正當的，因為要使這個新學說達到一成熟的學派，所費的時間，勞力和研究，到底不是社會主義者所能的。從而要求理論發展的事情，尤不是忙碌于實際活動的德意志社會民主黨中之理論家所能的。這時候，『使唯物史觀深刻化和更發達的事情，雖然很是有價值的，』然而這個怎樣才能呢？所以可能的研究方法，便成爲問題了。

然而斷定『弟子之職責并非永久反覆師匠之言語』的柏倫斯坦，對於這個問題，祇由馬克思和恩格斯之著述及信札中引用二三辭句，而爲解決之根據。并且主張由最後諸信札之暗示，爲馬克思學說最完全的姿態之代表。可是考茨基却這樣說：

『唯物史觀，乃應就事實而吟味的東西，并非就個個的言論而吟味的東西。即，吟味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立足的諸事實，更檢討其關聯和由此關聯所生之結論，或是邁進于新的領域，討究此種領域，于是再把由討究所得的諸結果和以前已得的諸結果互相爲比較，依此而確證理論，或訂正之，或擴大以至于縮小之。』然柏倫斯坦却以爲『唯物史觀這一章的全體，連一個的歷史的事實尙未言及』，所以在他，怎樣地闡明歷史的發達過程的事，是不成爲問題的，所成爲問題的，祇是哲學上之事件。

據柏倫斯坦，馬克思史觀，原來便是『命運論的』東西。可是柏倫斯坦却把『命運論』作爲『命

運之信仰」而使用。這麼一來，「在柏倫斯坦，歷史的必然性這個東西，不僅是決定人間意志之契機，便是其行動，也是不能自由的，正如強制狀態時代的人間無異。他完全混同了各種哲學上之議論和意志并行動之自由。於是他便把關於唯物史觀之當否的問題，解為歷史的必然性之程度的問題。然而倘理解此必然性為一切歷史現象之必然的，合法則的，因果的關聯之意義，則不消說，這還沒有程度。反之，人間所蒙外界的強制，在其程度上，非常懸隔。」可是柏倫斯坦却以為「可以把歷史的必然性解為此後者之意義」。除此之外他最後的工作，便是更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之歷史觀上，借神人之手，設置必然性。

即使唯物史觀原來就是命運論的，然和其階級鬥爭之關係又是什麼呢？在有名的「共產黨宣言」上，所謂「從來一切歷史，便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又是什麼呢？

關於這個問題，「柏倫斯坦不但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有二個靈魂，而且還說這二個靈魂，各望着其特殊的發達即發達到正反對的方向。甚至傾向于柏倫斯坦之方向而發達。這是多麼奇妙的事情呵！可是一方面之靈魂，却漸次地證明其非命運論的東西了，它漸次地認識了政治的及觀念的力之獨立的自己之運動了。即，「不是現實的關係，乃是使意志成為社會的發達之衝動力。」反之那一個靈魂，正如「馬克思主義與黑格兒辯證法」這一章所說，漸次地縮小了革命上之意志及意特沃羅幾的任務，認

其物質的基礎上漸次地含有重要性。關於此問題，恩格斯已在馬克思底「法蘭西階級鬥爭」的序文中，很明白地示着了。』即，這兩個靈魂，始終悲哀地飄蕩着，不能發見了自己。

既無明瞭的歷史學說，當然沒有明瞭的社會主義研究方法之存在。恩格斯在「反杜林克」中嘗說：

「歷史底唯物論的見解，乃由生產并其生產物之交換爲一切社會秩序之基礎這樣的命題而出發。即就是乃由在於歷史上所出現的各社會中，生產物之分配并由分配所生的階級及身分之社會編制，爲生產什麼，怎樣生產，且生產物怎樣交換所左右這樣的命題而出發。凡一切社會的變化及政治的變革之最後的諸原因，應在這一點求之。即，這原因不是在人間之頭腦，并關於永遠的真理及正義之人間底洞察的增加中求之，乃是在生產及交換方法之諸變化中求之。這些原因，非求于哲學之中，應求于當時經濟之中。所謂現存社會制度是不合理不正，理性是悖性，善行是惡行這種卓見的增加，不外是所謂在生產方法及交換形態中藏伏着諸種變化，以古代經濟條件爲基礎的社會秩序最早已不能一致之證據。同時，撤廢被發見的弊害之手段，同樣地，其意義必須存在變化了的生產關係自體（在發達之程度中雖有多少差異）之中。這些手段，不是由頭腦所發明，與其說是由頭腦，不如說是發見于目前的生產之物質的事實之中。」

上面所述，乃由政治上適用唯物史觀所生的方法，是使社會主義為科學的東西。「在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中，決定的東西便是方法，不是結果。」這個結果，不但可以變化，而且在許多地方，已經變化了，跟着發達的進展，同時更加變化起來。這發達，不僅是新的諸事實，而且是新的研究的手段。我們所謂「共產黨宣言」起草當時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多數方面，為不同的判斷的事情，這是很自明的道理。然而依然愈益放出光彩者，仍是獲得「共產黨宣言」之諸結果的那個方法。

總之，認馬克思之方法為誤謬的人們，結果便不外（一）承認社會進化之必然性，合法性，否定歸因于生產方法之發達。（二）最先否定社會進化之必然性及合法性，或至少是依着一定手段而否定這些認識的可能性。這樣看來，柏倫斯坦，當是必須採此方法中之一者，但「他却完全拒絕採用這種方法，我們相信，他祇是靠着對於唯物論者和必然性之二三誹謗，以及為其窮餘之方策的私信之說明，而斷定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時代的「資本論」及「反杜林克」這種古典的作品之基礎的方法，乃採用他們目前的「哲學之貧乏」及「共產黨宣言」中歷觀的方法。」柏倫斯坦雖然不滿意于這種舊方法，然而又未嘗願及有代之以新方法的必要，甚至無意識地利用這種舊的唯物史觀。

總而言之，柏倫斯坦不是唯物史觀之批判者，乃是唯物史觀之註釋者，但對於（B）辯證法，其態度却變化了。

柏倫斯坦說：「馬克思及恩格斯之學說，已經發生變化了。然而關於其學說之個個部分并前提，在其最後之完成，始終未嘗十分的考慮。……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反作用分爲二部分，一部分主要祇是暗示，一部分關於個個之點祇止於認定，并且又以為所承認的事實之變化，和更善的認識事實，因而學說在其完成和應用上，必須受着此種反作用。所以在後者之場合，他們間原是矛盾的，在理論上的統一，理論和實際間之統一，這種工作，他們却遺下後繼者了。」

於是柏倫斯坦便把他們之矛盾，作爲一個實例，而舉之如次。他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新版（一八七二）的序文中，嘗聲言起草當時革命的綱領已經「處處陳舊」了。并且恩格斯在一八八五年，印刷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綱領和共產主義者同盟執行委員會之傳單時，嘗附言說，今日尚可以模倣這類東西中多數地方，又說在今日，大部分尚可適合。……并且又在「共產黨宣言」新版的序文中說：「『巴黎公社』乃提供「勞働階級不能簡單地取得已成國家之機關而自己運用之」之證據。」可是五年後，在和杜林克論爭的文章中，又公然說：「普羅列塔利亞占領國家權力時，先從生產機關，轉化爲國有財產。」所以柏倫斯坦以為就不說明這二個命題的矛盾，也已自明了。然考茨基

則反對說：「恩格斯雖然說勞働階級不能簡單地占領已成國家機關，但這個并不是說勞働階級始終不能占領國家機關。」接着又希望一般對此懷疑的人，參攷一八九一年發行的「法蘭西階級鬥爭」第三版恩格斯之序文。

據柏倫斯坦，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犯此矛盾，其罪惡完全在乎黑格兒辯證法。所以他以為恩格斯倘如企圖修正其學說，「必須無條件和黑格兒之辯證法絕緣。在馬克思之學說中，辯證法是叛逆者，是妨害事物之一切合理的觀察的罪人。」「黑格兒學說的論理上之顛倒，帶有易變急進性和機敏性。并它像鬼火一樣，于漠然的輪廓中，示着彼岸的眺望。可是我們如信賴它，選擇其道，則我們必陷入沼澤。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遂行其大事業，全恃不靠黑格兒辯證法之力，全恃和它對抗之結果。」

這樣，柏倫斯坦對於辯證法的惡意，當然是達于極點了，所以他便叫出這樣的觀念上之決算說：「一切發達之衝動力，便是對立鬥爭。」可是他對於辯證法之誤謬，未嘗有什麼指示，祇視為：「辯證法這個東西，因為往往被悖理所適用，所以是非常危險的。」然而辯證法如果被背反原則的方法所適用，那麼這個不是黑格兒之誤謬，乃是適用者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之誤謬。所以柏倫斯坦之非難，遂轉向于馬克思的方法并偉大的「資本論」了。

據柏倫斯坦，辯證法這個東西，不是「橫在事物之精確的觀察底道上」的係蹄，乃是「空想論者之解決」。馬克思認窮極目的不是重大的問題，這確是科學的。「何以呢？」因為一般講壇社會主義者，以為「對於解放勞働階級之努力的一般同情，便是科學的性質之障礙的緣故。」然而試不知窮極目的正是重大的問題，馬克思底觀察，正是「不確實的，不精確的」。在馬克思底貢獻中，有繁其生命的價值的，祇是他關於分業，機械制度并貨幣制度之觀察。可是我們倘如要妥當地建築建築物，那麼我們必須先行倒塌間架，即必須倒塌「空想者之解決」和著作之起草以前的「預備妥當的理論」。這個就是柏倫斯坦非難之大要。

考茨基對此答說：

「科學的關係之研究力，不論在什麼場合，也能使社會的關係之研究家，超越于他們自身之階級傳統的立足點之上的力強的東西。比方馬克思和恩格斯便是一個好例子。然而經濟的研究之結果，一定進入那割裂個個對立之諸階級底死命的利害之中，所以研究家潛入于現象之研究者愈深，他把握現實也愈銳，他對真理的衝動也愈是熱情的，則他對於現社會上怒潮般的大鬥爭必愈同情，對於黨的荷担也愈堅決。自然，這事未必和加入任何既成政黨者同一意義。……倘如柏倫斯坦以為社會的研究和社會的鬥爭之合一，在和自然的研究上，為經濟學中固有的不利益之一，那麼我們當然贊成這種言論

的。可是，倘如真的這樣，則他之所謂祇在馬克思學說中才發見這種不利益的話，真是奇妙的事了。經濟學上之著述，便是這個意義，比如亞丹·斯密斯和李嘉圖底著述，也是傾向于此意義之著述。」

考茨基又說：「馬克思之理論既被完成後，他才會知道此中研究二事情是怎樣的一個東西。」所以事實上，在我們成爲問題的，不是一個的研究，必須是二個的研究（就是最初者爲「共產黨宣言」，其後則爲從着革命後新的材料而「從新修改」的）。可是柏倫斯坦則「完全淡薄地抹殺了歷史方面的最初的研究，祇以「資本論」時代的第二的研究爲問題。」所以他爲使此研究達到和最初之研究同一結論計，便說這個結論爲「那個」研究以前所作的公式，爲要支持那個研究才捏造現實事實的。

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實際的要求，原是包括爲占領資本主義的社會之權力手段之目的而組織，訓練普羅列塔利亞這種命題的。在此要求中，那裏有「空想論者之解決」？不錯，他們在研究普羅列塔利亞之生活狀況并布爾喬亞社會之組織所生的目的時，每達到和空想論者之理想一致的結果。又者，他們之言論，原來負于其先輩者甚多，他們之先輩們，不是由辯證法上諸觀念而構成公式，以爲是從現實的研究，和其時代最偉大的人們對於現實所抱懷的諸思想而獲得這個公式。可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斷斷不是把「B成的解決」藏在衣囊裏的。「這個案是他們要獲得那排斥如此B成的解決和努力的結果。」馬克思學說中之「辯證法的，唯物的歷史觀，不是教我們社會爲已成事物，乃是教我們應



觀察必然性爲從于一定諸法則而行之諸種過程之復合體。這個就是指示我們說，應在經濟學中，認定我們新的社會思想之窮極的原因，應在經濟學中，求得我們運動之衝動力，效果的條件并其界限。」考茨基這種言論，正是在燈光之下，照出柏倫斯坦批判辯證法之全個的核心的。

接着便是關於經濟學的論爭。經濟學之範圍，便是價值論。從而柏倫斯坦之批判，也祇是關於（C）價值論的範圍。

柏倫斯坦發見馬克思價值學說中有一大罅隙。這就是以爲馬克思價值學說認決定商品價值之大小者爲生產一商品所消費的社會的必要的勞働時間，是其價值論中一大缺陷。他說，勞働有諸種不同的種類，其各種種類，必須還元於同種類之勞働即簡單勞働。所以某勞働量，必須可以比較于他勞働量。馬克思雖則說，「……異種類之各勞働，被換算爲其尺度單位之單純勞働的種種比例，乃依着生產者背後之社會的行程而決定的，」但却沒有詳細地說明社會的行程是怎樣種類的東西。他在「經濟學批判」中說：「律此還元之諸法則，非這里所應論者。」

馬克思雖理解此法則，但終未嘗使其發展，這實是一件殘念的事。不錯，在此一點，考茨基也同意于馬克思學說爲不完全的柏倫斯坦底指摘。但却不同意于柏倫斯坦要補填此罅隙之方法。

這就是，柏倫斯坦乃探着要完成「馬克思價值學說，巴威爾價值學說，佛夫價值學說之妥協」的

折衷主義的方法。然在考茨基，「柏倫斯坦不但不基於建設者之精神，使價值學說更發展，反而要附加上和學說本質沒有關係的，尤其是數對關係的，雖企圖克服該學說而猶得不到有機關係的諸思想，以補填那個罅隙。」

#### 四

以上所述，乃考茨基對柏倫斯坦方法論上之攻擊。以下所述，乃關於社會民主黨綱領及戰術論爭的展開。考茨基對於這個問題說：

「綱領既由方法論產生，則柏倫斯坦必須先認方法論為正常，然後批評綱領，才算有意義。倘如認方法論為誤謬，那麼綱領開始已是浮動于空中之物，這時候，必須從新努力確立了新的方法論。這樣，然後才能着手建設新的綱領。」然而柏倫斯坦對於這個毫不關心，已跑上批評綱領的第一線，這一個不是無意義嗎？

此外魯克森堡 (Rosa Luxemburg) 又對於柏倫斯坦批評如次。這個完全是擁護考茨基的熱情的表現。

「不崩壞資本主義，則不能掃滅資本家階級。——柏倫斯坦之意見，乃認勞働者運動之目的，為

漸次實施協同性原則，而闡明此種掃滅。可是協同性這個東西，在資本主義生產之內部，始終得不到實施的。——柏倫斯坦于是便闡明生產之社會化，而要求商業的改良，消費組合的組織。

「但是由消費組合（和勞働組合協力）而變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之實際的物質的發展不相符合。——于是柏倫斯坦便捨棄了唯物史觀。

「然他對於經濟發展之進行的見解，與馬克思之剩餘價值方法不相符合。——於是他又棄掉了馬克思之剩餘價值法則及價值法則，棄掉馬克思全個的經濟理論。

「沒有一定終局目的，沒有現社會經濟的基礎，則不能作普羅列塔利亞之階級鬥爭。——于是柏倫斯坦又放棄了階級鬥爭，宣言和布爾喬亞的自由主義妥協。

「在階級社會，階級鬥爭完全是自然的，不可避的現象。可是柏倫斯坦却不承認現社會中階級的存在。據他，勞働階級，不外是政治的，精神的，經濟的孤立的個人之集合。所以布爾喬亞，也不外是由外部之壓迫（非由內在的，經濟的利益。由上而下的壓迫）而為政治的集合。

「然而倘如沒有階級鬥爭之經濟的基礎，結局又沒有階級，則普羅列塔利亞和布爾喬亞將來之鬥爭，不但不可可能，就今日之鬥爭也不可能，就社會民主主義，也得不到好的成果。倘不然，則社會民主主義，僅不過被理解為受政府政治的壓迫之結果（并非作為社會的發展之合法則的結果，乃作為未

トヘツオレルソ家政策偶然的產物，非作為資本主義社會之嫡子，乃作為反動的私生兒。于是柏倫斯坦遂以整然可觀的論理，從唯物史觀方面，傾向于「佛瑯克佛爾報」及「福士報」之見解了。

「柏倫斯坦否認資本主義社會對全社會主義的批評後，他又認定現在德意志的反動，不十分厲害。他說，西歐諸國，幾乎沒有政治的反動。西歐諸國，布爾喬亞對社會主義運動之態度，是堂堂禦防的態度，不是壓迫的態度。勞働階級不但不貧窮，反而愈益進入好境地。至于布爾喬亞，政治方面很進步，道德方面也健全，完全看不見有反動壓迫之現象。倘如他這種觀察不會錯，那麼世界萬事萬物，當能達到最佳之境地了。」

「以他祇認最初之運動，不顧終局之目的。然在實際上，因為不會有沒有社會主義的終局目的之社會民主主義的運動，所以最後他必然連運動這個東西也不顧了。于是他底全社會主義的見解，便是這樣崩壞了。在他，而今馬克思之體系，聳立整然，可驚異的構造，已化為很高的廢物之山，在其中，便是一切大小思想家一切體系之破片的共同的墓地。……」

魯克森堡之言論，雖未免有多少誇張，但其這種見解，極受當時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所容認。

像這樣的柏倫斯坦之修正主義的見解，原是根據他在英國時代各種事業而樹立的，德意志社會黨內，對於這種見解，極其一時之盛，且呼之為「英國式見解」。然魯克森堡則說：「柏倫斯坦底「英

國式見解」，要約起來，這是表示什麼呢？這個解釋方法，便是逆照一切現象的凹面鏡。他所認為社會主義鬥爭最有力的手段，便是對於社會主義真正的障害，他所認為德意志社會民主主義之將來，便是到社會民主主義之發展過程中漸次消沈下去的英國勞働運動之過去。」



## 第十四章 馬克思經濟學之發展

### 一

修正派并哲學的認識論，對於馬克思主義之批評，已如上述，但馬克思主義者，因為忙于禦防這  
種批評的工作，故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的貢獻，甚形鮮寡。此中由馬克思主義之立場，使馬  
克思理論擴張和發展的著作，在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中，最值得注意的，祇是希爾佛庭（Hilferding）之  
「金融資本論」（Das Finanzkapital, 1910）。「金融資本論」，在嚴密的意義上，可說為馬克思  
「資本論」的續卷。馬克思「資本論」的對象，便是馬克思自身革命及其後即一八〇〇年代後半的英  
吉利資本主義之社會。比如「資本論」本質的部分也嘗說過，其中所論述的，乃是英吉利一八〇〇年下  
半季以前的資本主義社會，而且這部分，也是一八六〇年代才完成的，對於其後來經濟發展之樣相，  
則不能論及。到了馬克思死後，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遂一轉而進入帝國主義的獨占資本主義之過  
程。馬克思「資本論」的理論，雖然未嘗誤解資本主義組織本質的傾向，但是這本「資本論」，自然不

能處置近時經濟發展中之現象。而由理論方面處置此現象的，則為希爾佛庭之「金融資本論」。這就是，希爾佛庭處置的方面，主要的乃把「資本論」第二卷及第三卷應處置而不能處置的問題，為其研究的對象。

資本家不僅榨取勞働者之剩餘價值，集積其財富，資本家還把資本家作犧牲，而集積其財富。這就是，一部分資本家，再依着榨取為榨取者的資本家，而集積其巨大的財富，收穫獨占的利益。希爾佛庭便是研究這些資本家中之一部分資本家乃如何獲得利潤之方法，并其原動力即投機利益，發起者利益，獨占利益，而指示我們以這些東西如何形成強大的資本家階級，產業經營如何由個個資本家之隸屬而轉向于股份公司之組織，如何成立了股份公司和此股份公司如何確立產業上銀行之支配權等事情。而這傾向，在他方面，雖如何示着卡德爾(Kartell)和托辣斯(Trust)統一的產業統制；這發展，對於階級對立尖銳化之必然性，雖如何示着新的事實，但希爾佛庭都很巧妙地把其暴露出來。

資本主義之將來，乃屬于金融資本。這是國內階級鬥爭和國際資本鬥爭中最典型的資本之形態。然而金融資本是什麼呢？它跑上怎麼的發展過程呢？希爾佛庭說：

「在資本家的生產之初期，銀行的貨幣，乃由二個源泉而出。一個是非生產的諸階級之貨幣，一個是工業資本家及商業資本家之預備資本。加之，信用的發展，不僅使資本家階級之總資本融通于產



業，便是非生產的諸階級之貨幣之大部分，也被他融通于產業。換言之，今日之產業，乃以較產業資本家所有之總資本尤大的資本而經營。非生產的階級所寄託于銀行的，再由銀行融通于產業資本家之貨幣額，跟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也增大起來。在產業方面所不可缺的此類貨幣之處分權，乃被銀行所把握。跟着資本主義及其信用之發展，而產業受銀行之隸屬也增加。在他方面，銀行之能夠搜集非生產的階級之貨幣，不斷地長期間中融通此增加之基本量，全靠銀行對於這些貨幣，支付一種相當的利息。而銀行之能夠支付此種利息，也全靠這些貨幣尚不多量的時候，以之適用於投機信用和流通信用。然在一方面，此等貨幣增加後，同時在他方面，投機及商業也漸次失其重要性，因而那些貨幣，遂不得不轉化為產業資本。倘如生產信用未嘗不絕地擴大，則儲金的用途，銀行對儲金支付利息的事情，也必大生支障。實際上，這種事情，乃發生于英吉利的，儲金銀行祇是為流通信用的媒介，從而銀行利息也非常之低。所以儲金不絕地流入產業的投資領域，以為收買股票。在產業銀行和儲金銀行結合的場合，則為銀行行之，在某種場合，則為公眾直接行之。由公眾的立場看來，結果不論如何，皆屬同一。因為不論在如何場合，他們沒有得到發起者的利益。這事情，乃是英吉利產業隸屬於銀行資本的事較德意志少的意義。

所以產業之於銀行的隸屬，便是所有關係的結果。產業資本中漸次增加的部分，并不是屬於使用

此部分的產業家。他們原是依靠銀行，才獲得此資本之處分權，銀行代替他們，而代表所有者。在他方面，銀行資本中使產業固定的部分，遂愈益增大起來。從而產業資本家之範圍也愈益增大。所謂金融資本，在實際上，便是依此方法而使轉化為產業資本的銀行資本，即貨幣形態之資本。這個在所有者們，每保持着貨幣形態，在將來貨幣資本之利息的資本形態中，被他們投資，或每被他們用貨幣形態而收回。然在實際上，由銀行所投資的資本的大部分，常轉化為產業資本即生產資本（生產手段及勞働力），這樣，在生產過程之中，才能固定起來。

「金融資本，跟着股份公司之發展而發展，達到獨占產業的頂點。於是產業之收益，愈獲得較以前少於變化的精確的性質。從而銀行資本，投到產業方面的可能性也愈大。但是握着此銀行資本之處分權的原是銀行，握着支配銀行之權者則為銀行股票過半數的所有者。然而所有之集中愈進，則給與銀行以勢力的擬制資本之所有者，和給與產業以勢力的擬制資本之所有者，也必愈益成爲同一的人物。比如今日大銀行愈益繼續地獲得擬制資本之處分權的事情，便是一個例證。

「如上所述，我們已洞悉產業漸次隸屬於銀行資本的事情了，然這種事情，決不是隸屬於產業貴族和銀行貴族之意義。自然，資本貴族的金融資本，恰如資本這個東西。在其最高階級，成爲金融資本一樣，乃用銀行資本支配的形態，而掌握全國民資本之處分權。但是這裏個人的結合也演着重要的

任務。金融資本家，跟着卡德爾化和托辣斯化，同時雖達到其最高權力階段，但在他方面，商業資本却極形零落。於是資本主義之一循環，便告了一段落。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爲高利借資本的，或爲商業資本的貨幣資本，不論是對於資本的蓄積，或是手工業的生產之資本主義的生產化，也都作着顯著的一任務。於是生產資本家即生利潤的資本家，換言之即商業資本家和產業資本家，遂開始反抗靠利息而生活的資本家了。

「高利貸資本原是被隸屬於產業資本的。在貨幣交換資本，倘不這樣，則當是行使商業資本家及產業資本家在其商品轉形時所遂行的貨幣職能。在銀行資本，這個乃爲生產資本家間信用作用的媒介。資本之動員和信用之擴大，乃是漸次地變化貨幣資本家地位的主力。銀行勢力的增大，給銀行取得產業創立者之地位，取得其支配權，取得爲金融資本之產業的利潤。這個恰如從前之高利貸，用利息的形態，取得農民勞働收益及地主之地租。倘是黑格兒派人，對於此事，當用否定之否定的公式說，「銀行資本，是高利資本之否定，但它自身無久也被金融資本所否定。」此金融資本，乃是高利貸資本及銀行資本之綜合，在經濟發展無限高的階段中，把社會生產的成果，作爲自己的東西。」

## 二

金融資本，如此支配生產，果能避免資本主義必然的產物之恐慌嗎？關於此點，希爾佛庭又說：

「卡德爾若也不能防止恐慌之發生，則它自己也不能免恐慌之作用。倘以恐慌和商品過剩生產爲同一物，則對於恐慌的救濟策，當然是單純的。說，「卡德爾化的資本家，因供給大受限制，可以提高物價。從而所謂物價高，利潤低，這不外是販賣減，生產費昂騰的緣故。但是無久，市場吸收了過剩生產物，接着必生出繁榮期。」這種議論，雖是單純，然同時也很謬誤。試不知繁榮期再來的前提條件，必要有如次二種：第一，必要樹立均衡狀態，使沈滯期終熄；第二，擴張生產。何以呢？因爲祇是這個條件，才是繁榮期之意義。可是要靠前述卡德爾政策，是極不易使此條件發生的。

「所以卡德爾不是使恐慌作用終熄的東西。卡德爾不過是靠着轉嫁恐慌的壓迫給與未嘗卡德爾化的諸產業，而變形此恐慌之作用。卡德爾化的產業，和未嘗卡德爾化的產業間之利潤率的相異（此相異點如平均，則卡德爾必愈強固，其獨占必愈確實，愈擴大），在繁榮期則較小，在沈滯期則較大。卡德爾在恐慌及沈滯的初期，較自由的產業，猶可能更久的維持利潤，可能使自由產業恐慌的作用尖銳起來。像這樣的事情，實毫無一點意義。何以呢？因爲在恐慌時期并其以後，產業資本家之地位，很形困難，他們之獨占，也很危險。在這時期，他們即使靠卡德爾政策，使原料及其他之價格跌落，但也不能緩和這樣的狀態。這事情，正是迅速的招來未嘗卡德爾化的產業地位惡化并集中之一重要的

憑證。」

接着希爾佛庭又論及對外貿易政策和金融資本之關係，資本之輸出和經濟領土之競爭，以及帝國主義和普羅列塔利亞的問題。然而這本書卓越的意義，完全屬於理論的範圍。

由馬克思根本概念出發的他，把其方法之支配，結合在廣大的材料之支配，立樹馬克思價值理論之基礎，發表關於貨幣，信用，銀行，交換所，股份制度，卡德爾，恐慌等之透徹的理論的研究。

這一點，希爾佛庭之金融資本論，實可說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劃期的著述了。在關於最近的資本主義發展之理論的研究中，馬克思主義者，無疑的，一定皆從此書而求其出發點。比如列寧底「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便是最顯著的一例。

希爾佛庭之「金融資本論」，在一方面，乃是馬克思學說之發展，同時在他方面，又是對於修正主義經濟學的一論駁。此外又如魯克森堡之「資本之積蓄」(Akknunulation des Kapita's. 1912)，也是論駁修正主義，尤其是關於資本蓄積理論的批判的傑作，是對於馬克思「資本論」中資本蓄積論劃期的研究。

如此對於修正主義之批判，馬克思理論之擴張并新解釋，便是歐洲大戰前德意志社會主義思想界之現象。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尤其是唯物史觀和經濟理論之研究，就是馬克思主義文獻的主

要內容。然而歐洲大戰後之革命，已使一般馬克思主義者，由理論的研究，傾向于戰術的研究，盡全力而研究和戰術者有密切關係的國家理論了。

## 第十五章 大戰後之社會主義

德意志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自然不是純粹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次革命，可說爲德意志布爾喬亞革命的完成。歐洲大戰前，德意志資本主義之發展，雖發展達到可以對抗支配當時世界經濟的英吉利資本主義，然國內封建的殘存物，尙頗有勢力。這個就是已布爾喬亞化或將布爾喬亞化的 Junker 之勢力。

這樣，歐洲大戰前的德意志資本主義，還不能說已達到其發展的頂點。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發達，還未達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成熟期。歐洲大戰，乃依着有計劃的經濟的組織，統制資本主義的無統制。尤其是在和軍需品有關係的產業，特別是這樣的。戰時經濟，一方面則讓少數者集積財富，同時他方面又齎來多數的貧者。德意志革命，從其結果看來，可說爲利用多數者的一個布爾喬亞革命。此革命的指導者，雖是歐洲最大的勞働者政黨的德意志社會民主黨（雖是四五十年間勞働者政黨），但這

個政黨，正如上述，自二十世紀的初葉以來，已拋棄馬克思主義革命的要素，變為以改良勞働者生活之日常鬥爭為其主要目的之漸進的政黨了。所以在德意志革命中，他們祇靠着和政治的民主主義者提攜，要達到建設共和制這樣的政治革命，要求社會革命，缺乏組織的努力，只管醉心和市民的政黨妥協。這一點，便是蘇俄革命和德意志革命重大的差異。

德意志社會主義，雖然被修正派的傾向所支配，但一般皆不滿足于此種傾向，要使社會主義革命的要素更生回來。這傾向，在其實踐上，顯現出二個團體：「德意志獨立社會民主黨」(Unabhä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斯巴達古斯團」(Spartakus Bund)。

斯巴達古斯團乃德意志共產主義勞働黨，其主要的指導者為卡爾·李卜克內西和魯克森堡。斯巴達古斯團之綱領，如其「斯巴達古斯希望什麼」這本小冊中所說，其最後目的，乃在共產主義的完成。所謂共產主義，乃是一切生產及交換之手段，歸于勞働者階級統治，在其獨裁之下運營之，由必要生產代替商品生產這樣的社會狀態的意義。這樣，一切階級，才能廢除，創設一般的勞働義務。在此社會過程，必要勞働階級武裝的支配。在勞働階級支配之下，一切決議并實行權，皆歸于勞働委員會并其執行委員。勞兵委員會之全國總會并執行委員會為其最高權力機關。勞兵委員會之選舉權，祇是勞働的貧者有之。所謂不勞働者不得支配，便是其原則。在勞働階級支配之下，廢除資本家對於生



產并交換手段之財產權。凡是資本家經濟組織之心臟的一切銀行，工業，并交通等經營，皆為勞働階級所有。「這目的，祇是依着武力的勞働者革命之方法，才能達到。」據此傾向的見解，自國家最高機關以至于最小的自治體，凡是布爾喬亞階級所支配者，皆被廢除，代替以勞兵委員會之階級機關。即，以他階級支配，對抗一階級支配。

總之，斯巴達古斯團所主張的，就是勞働階級獨裁政治，所以它對於德意志國民議會之召集，採着斷然反對的態度。他們的要求，在以勞働者獨裁之實現體即勞働委員會，代替國民會議。在此意義上，勞働者獨裁和委員制共和國乃同一意義。

傾向于布爾塞維克的德意志這個斯巴達古斯團，和多數派社會主義者即社會民主黨之間，雖有不可融洽的差異，然和獨立社會民主黨之間，頗存在類似之點。共產黨和獨立社會黨之所以共通，乃因為兩者皆以「挨爾佛綱領」為出發點，為其目的。至于兩者差異，則有三種：（一）關於社會化問題之時期的意見相左；（二）對現存勞働者委員會并此委員會所給與的憲法上地位態度的不同；（三）關於社會主義者國際同盟之價值問題。

劃分獨立社會黨和斯巴達古斯團的界限，便是對於德膜克拉西的態度。獨立社會黨排斥勞働者的獨裁。這二團體的鬥爭中所表現的，正無異于從前修正派和急進派間之對立。而今這個對立，已在國

民經濟社會化的問題中明白地表現着。在急進的團體，完全不顧慮社會經營的特質，并和世界市場之關係，盡所能急速地行社會化。他們排斥如「政府黨社會主義者」所實行的漸進的社會化，主張依着單純的國家之命令和立法，急速地轉變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爲社會主義社會形態。

如此見解的相異，對於德意志政治的勞働者運動，給與一大變化。一九二二年德意志社會民主黨，和獨立社會民主黨再行合併，而由斯巴達古斯團中，也發生出一個共產黨。社會民主黨，一九二二年在格爾列治，一九二五年在海德爾堡，嘗制定新的綱領。海德爾堡的綱領，是現在社會民主黨的綱領，模倣以前綱領一般的性質，努力使黨的行動和事實上的發展相調和。這個新綱領，力說資本主義的大經營顯著的增大，金融資本有愈益增大的勢力，工業對農業顯著的壓迫。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結果，使資本由獨占得到有利的立場，有壓迫勞働者和中產階級之傾向。所以勞働運動的目的，乃在克服此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普羅列塔利亞之數愈大，榨取者和被榨取者之對立愈銳，資本主義經濟的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階級鬥爭愈激烈。」要克服如此狀態，祇是依着轉變對生產手段之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爲社會的財產才可能。

勞働階級對資本主義的榨取的鬥爭，不但是經濟的，而且是政治的。這個鬥爭，就是關於憲法形態的鬥爭。「靠勞働階級之解放鬥爭，而實現社會主義最有利的基礎，便是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勞

備階級，依着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範圍中不斷的結合和作用，而爲其目的的努力。」可是在黨中，也有銳利地批評此綱領的分子。尤其是對於其妥協性質這一點之批評爲更厲害。總之，在新綱領中，階級鬥爭的思想，對於具體的要求實現現在國家這一點，往往被很低的評價。這種現實的傾向，恐怕是黨的指導者，因爲處在政治上有責任的地位，以及從前社會民主黨常常處在反對黨立場的條件的差異所發生的罷。

## 二

由斯巴達古斯團分出的德意志共產黨，其立場完全和上述之黨派不同。德意志共產黨，乃處在一九二四年設立于莫斯科的第三國際勢力之下，和社會民主黨對立。其主要目的，在克服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轉變一切生產手段爲社會所有。而達到此目的之手段，也和社會民主黨之場合不同。德意志共產黨，和各國共產黨差異，乃處在第三國際所組織的實行委員會領導之下，所以很有國際主義的色彩，同時又因受蘇俄政府的指導，其組織也頗有中央集權的色彩。

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之方法，乃共產黨依據恐怖主義之方法即普羅列塔利亞之獨裁。一所謂獨裁，便是鐵般的權力，無容赦其敵人的權力之意義。所謂勞働階級獨裁，便是征服布爾喬亞和地主之勞働

階級國家權力的意義。勞働者之權力，祇是依着創造了破壞布爾喬亞國家及布爾喬亞權力後復在其廢墟上從新設立的權力即保護自己之普羅列塔利亞并貧窮階級之權力的勞働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才能發生的。新的東西，必須依着革命的暴力而創造。靠勞働階級破壞了布爾喬亞國家的蘇俄的實例，未嘗不是其他各國的實例。這就是德意志共產黨的根本思想。

德意志共產黨，已如上述，乃屬於第三國際之管轄，服從第三國際之指導。至關於普羅列塔利亞獨裁之思想，則很明瞭地顯現于列寧一九一七年發行的「國家與革命」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暴力革命之見解，以及列寧關於此種革命理論的發展，在此書中，發揮尤詳。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國際共產黨第一回大會中，由托洛次基朗讀之新共產黨宣言的一節，解說此事更明。說：「世界共產黨，自用無產階級革命最偉大的指導者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寫成的宣言之形態，而發表其綱領以來，而今已七十二年的歲月了。在此七十年間，共產主義的發達，雖是荆棘之道，然在其根本上，其發達則跟着「共產黨宣言」所示之道而行。歐羅巴，亞美利加，亞細亞諸國革命的普羅列塔利亞階級之代表的我們共產主義者，而今都聚會于蘇維埃的莫斯科了，這事情，很使我們感到我們都是七十二年前所宣言的綱領之信奉者，實行者。」如此共產黨，乃廢除和平的議會的手段，主張武力的暴力的革命。便是德意志共產黨，也往往行市街戰，以企圖革命。比如一九一九年之市街戰，便是最顯著的一例。

如此，共產黨在其運動方法中，完全和社會民主黨不能相容。但二者思想之淵源，則皆出於馬克思之思想。從而兩者之間，每互相批判論難。此論戰中主要的人物，在共產黨方面，自然不外是列寧。列寧始終痛擊第二國際之理論家曲歪馬克思主義，使其布爾喬亞的理論化的事情。就是猛烈地攻擊他們抹殺了馬克思革命的要素，使其為單純的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只管用議會主義的運動方法的事情。受此攻擊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家則為考茨基。考茨基最初嘗站在革命的理論家的立場，猛烈攻擊一般修正主義者，而今他却完全降服于他從前之敵人修正主義了；從前是他站在革命的立場，而今站在此立場的，則為列寧了。兩者間理論的鬥爭，在社會主義理論發展上，雖為一劃期的，但這裏沒有介紹其全體議論之餘裕，所以僅能揭出考茨基之反批評的大要。

### 三

考茨基著述「無產階級獨裁政治」(Diktatur der Proletariats. 1918)之用意，乃對於列寧「國家與革命」之批評。

在考茨基，布爾塞維克主張的獨裁，和社會民主主義者主張的民主主義，不是單純的個人嫉視的問題，乃是關於實現社會主義二個根本方法的論爭。他說：「社會主義運動中之二個背反，并非基

于宵小的個人的嫉視。這個背反，原是二個根本的社會主義的方法即德膜克拉克西和獨裁之方法的衝突。兩者之目的，皆屬同一物。即，其目的皆在乎依着社會主義而使普羅列塔利亞得到自由。所以他的底理論，開始便論證在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之間，存在怎樣的關係。

「沒有不是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這句話，最能簡明地表出考茨基之立場。他抽象的理解社會主義爲給與自由和麵包于萬人的主義。所以他又認體現其精神之組織的社會主義，不但是單純的生產之社會的組織，而且是社會之民主的組織。「所以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之區別，不是一方爲目的，他方爲手段。兩者之差異，乃存在別的地方。以解放普羅列塔利亞爲手段的社會主義，沒有不存在德膜克拉克西的意義的。」可是沒有社會主義，而民主主義也可得而成立。比如在小村落中，一切經濟的條件，於其住民之全部，皆是均一的場合，便是一例。但是，如經濟生活發達到高度的場合，倘無社會主義，就無真的民主主義可言，同時倘無民主主義，則也不能與言社會主義。

然而共產主義者，却不贊成採用民主主義的方法，而主張普羅列塔利亞的獨裁。所以考茨基，當然不能服從此種主張。在他，凡是民主的國家，行政部必須據輿論之背趨而行動。在普羅列塔利亞比較少數的農業國，普羅列塔利亞的運動，自然不足以決定輿論的背向。至于普羅列塔利亞比較多數的工業國，普羅列塔利亞政治的勢力很偉大，壓迫民主主義之資本家獨裁的組織，自必成着困難。考

茨基，他也如列寧以馬克思學說為其思想之淵源一樣，每以馬克思主義正統派自任。兩者之根據，實則皆在乎馬克思。考茨基嘗引出馬克思的言論，以證明他自說之正確。這個就是馬克思在一八七二年共產國際大會中演說的結論：

「勞働者，要異日樹立勞働新組織，必須獲得政治的權力。倘如他們對於舊時基督教徒所蔑視的，無視的此世之事物，不絕望的時候，那麼他們必須反對那維持舊制度的舊政策。

「可是我們并非說達此目的之道，在什麼地方皆同一的。

「我們知道必須考量諸國之制度并風俗習慣，并且我們不能否定：在英吉利，亞美利加，荷蘭等，勞働者可以用和平的手段，達到其目的。然而這不能說一切國家都是這樣。」

據此看來，馬克思明明白白否認實現社會主義普遍的方法。所以考茨基也由這立場，努力駁論列寧承認普羅列塔利亞獨裁為普遍的方法的學說。

據考茨基，「所謂社會革命，便是由樹立新生產方法所齎來的全社會組織深刻的變遷。」所以社會主義之實現，必須具備充分的物質的條件和精神的條件。他把此條件分為四項來說，就是，第一為實現社會主義之意志。這個意志，因大工業發達之物質的條件而更加增進。第二為經濟生產的發達，必要徐徐地由生產之個人的性質達到社會化。換言之，即必要資本主義生產力之增進。第三為普羅列

塔利亞勢力和大工業之發達同時愈形增加的要求。第四的要件，便是繼續增進其勢力的普羅列塔利亞，必須有經營社會主義的新生產之力量。這些要件，祇在具備的時候，社會主義社會才有實現之可能性。

所以社會革命的成立，不是簡單的過程。這個必要幾代的長期間和努力，所以它尤必須是組織的。社會主義者，都吡出打倒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口號，然而單純的「資本主義的破壞，非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社會之組織，乃是一建設事業。因為是一建設事業的緣故，所以必要和平的行動和民衆的多數 *Solidarity*。而保證此和平的行動和民衆 *Solidarity* 的，除靠着德膜克拉西之外，別無所求。

「德膜克拉西之意義，乃多數之支配，同時又是少數之保護。」所以必須政治的社會的教養普羅列塔利亞，使社會主義社會之實現的精神條件確實起來。但「德膜克拉西不但不能消滅資本主義社會之階級的背反，而且不能防止其必然的結果的資本主義社會之轉覆。」然而德膜克拉西之效果，在什麼地方可以發見呢？「即使德膜克拉西不能避免革命的爆發，但它尙可以避免那輕率的，時期尙早的革命的計劃，所以每使多數革命運動成爲不必要的東西。」所以說，德膜克拉西，原是和平行動之基礎。



如上所述，社會的革命，必要長的過程。然政治的革命，却和社會的革命不同，政治的革命，是很急速的行動。所以政治的革命成就經過的如何，完全由德膜克拉西成就如何而斷定。「政治革命」之形態，倘如和其所成就的國家憲法狀態之如何有關係的德膜克拉西底支配多，即倘如其不僅是形式的，乃是實際上固定于勞働階級之勢力的，則採着政治革命狀態也多。反之，倘如今日之制度，乃被民衆大多數所支持，倘如國家乃代表支配軍隊的少數者，則政治的革命，必多採着內亂的形式。」

所以說，德膜克拉西，就是社會生活之安全瓣（安全瓣 Safety Valve 爲蒸氣機關中的要具，乃汽鍋頂端所裝置的活門。凡鍋內蒸氣過多的時候，此瓣必上開，氣得逸出，以防汽鍋之破裂——周）。

然而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評」上所說的普羅列塔利亞獨裁，應怎樣解釋呢？

據考茨基，馬克思所用的文義，可以二種解釋。即，可以照原文解釋爲普羅列塔利亞獨裁，也可以解釋爲民主主義之抑壓。所以它包含一個人之獨裁和一階級之獨裁的意義。無疑的，馬克思所用的意義，便是一階級之獨裁。所以馬克思之真義，獨裁這個東西，不是指一政治形態，乃是指普羅列塔利亞掌握政治的權利後的一狀態而言。這個依着馬克思對英美兩國所說的革命之可能性更能明瞭。

列寧所揭的「巴黎公社」之狀態，最能立證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獨裁是一狀態，而不是政治的形態。即，在「巴黎公社」時代，行着普通選舉，從而反對派分子，也被選爲議員，言論結社之自由，也得

到保證。這時候，普羅列塔利亞之勢力，左右了全社會之推移。可是布爾塞維克所做的事又怎樣呢？布爾喬亞階級固不待言，便是同樣為實現社會主義社會而奮鬥的孟塞維克，却如社會革命黨一樣，處在中間階級名目之下，被拘束了自由。如此普羅列塔利亞之獨裁，便是政治形態的獨裁，決不是馬克思之真義。加之，拒絕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參加的普羅列塔利亞之獨裁，決不是真的普羅列塔利亞之獨裁，僅不過是「共產黨之獨裁」。

這麼一來，考茨基遂排斥普羅列塔利亞之獨裁，而認此獨裁為釀成引起反革命之因素的東西了。所以他嘗闡明自己對於社會民主黨之立場，主張自由的尊重。自然，一般共產主義理論家如列寧，托洛次基等，對於考茨基這種議論的猛烈的反對，很是其壯觀了。但也可以說，馬克思主義之國家和革命手段的暴力問題，正因為這類筆戰，才得到充分的討論。

#### 四

在上述社會主義的思想之外，還有最富於革命性質的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有要依暴力革命而達其目的者，也有要依人間之教育及開明即和平的手段而達其目的者。大戰後，德意志無政府主義傾向之一，則為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這一派的主要著作為「社會主義之呼聲」，其雜誌為「社會主

義者」。此思想的支持者，組織「社會主義同盟」，其目的在樹立有根本意義的無政府自由意志的結合。在無政府主義，以爲社會主義，乃是依着理想之力，創造一新的現實。以爲社會主義不是構成我們經濟的并社會的關係之發展史的必然的產物，乃是由我們所創造的。自然，這種新社會狀態，不論在無政府主義，或在社會主義，也有許多共通點。

無政府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之反對者，是對於生產手段尤其是土地之私有財產制的反對者。并且它又承認慾望爲一民族全經濟行爲之動力。這樣，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取同一的理想，這是當然的事。但無政府主義乃從着其個人主義的根本思想，於理想社會狀態之下，廢止集權的權力即一切強制。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是歷史發展的結果，自然必然的實現，但在無政府主義，則作爲理想而實現。即，在無政府主義，新社會形態原來便是一倫理的要求。郎達威爾說：「這個新的民族，不是自己來的。馬克思主義者誤謬的科學，嘗解爲「必然」，可是它決不是必然地來的。但是，它是當然來的。何以呢？因爲我們社會主義所欲求者便是它，在我們之中，已有精神的理想的此種民族了。」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之差異，在前者于新社會狀態之實現上發見必然性，後者則發見倫理性。

此外在兩者之間，尚存在關於國家問題的差異。但二者最後皆主張消滅國家，此點頗相一致。無

政府主義，主張在革命中，即時廢止一切國家，反之馬克思主義，如前面所述，則主張在革命時及革命後，必須建設一過渡期的普羅列塔利亞獨裁的國家。此一點，兩者間頗相懸殊。

德意志無政府主義，當然不能說較其他社會主義爲繁盛。過去的德意志，雖然有如 Max Stirner 一流的卓越的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者，及其後繼者麥介，暴力的無政府主義之主張者墨詩特，但德意志無政府主義，却處在很不發展的狀態。惟到了最近，在一方面，因爲勞働運動中工團主義的勃興，才頗具有無政府主義理論家的活躍。例如被一九一八年革命所暗殺的愛思那 (Kurt Eisner)；藍士，洛加等，皆爲無政府主義最貴重的理論家。

此外又如經濟的民主主義，也屬於社會思想之一，值得我們底注意。德意志勞働運動，內部的變動雖大，但仍能維持其舊態。此中原因，固然不少，然我們可以發見其運動和戰術思想中顯著的變動之徵候。勞働運動之主體，是勞働組合，其勢力，較大戰前尤爲擴大。戰前勞働組合唯一之使命，在使組合員締結能獲得良好的條件的勞働契約。從而接着便發生了經濟的民主主義之思想和要求。經濟的民主主義之主張，雖有許多不明確之點和矛盾，然其中心要求，則在勞働者獲得「經營及管理」之「發言權」，徐徐地實現經濟之社會化。從此意義看來，經濟的民主主義，不外是「廢除經濟爲私事的事情，使其從于全意志，成爲國民經濟」。

今日之經濟，完全屬於私的經營的狀態，雖依着經營委員會之設立，而滿足此要求之一部分，但處在現在這樣純粹的私的經營方法之下，到底得不到充分的滿足。如 Leipart 所說，這個要求，祇是在經濟不是私的事項而是公的事項的時候，才能實現。即，經濟的民主主義，如不根本的變更現在的財產關係，是不能實現的。勞働者充分地參加經營的執行并管理，如不使勞働者負擔經營結果的責任，也是不可能的。這個思想的根本，全在和現在經濟組織之個人主義的基礎相對立，以全體之慾望，代替現代經濟之原動力的營利觀念。比如黑簾伯西 (Hermborg) 所說，經濟的民主主義之理想，正如中世紀所發見者無異，乃在充足慾望上安置國民經濟之基礎。



## 第十六章 舊歷史學派之經濟思想(其一)

### 一

十九世紀中葉德意志社會并經濟思想，被二個對立的思想所著色。這就是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自由主義之思想，已如上面所說，自十九世紀，才開始輸入德意志，對德意志諸邦立法行政，給與不少影響，而今依着布朗士斯密斯主倡的自由貿易主義，構成一大勢力。這個大勢，明白地雖受德意志一部資本主義發展所支持，然此資本主義之發展，形成其主要要素的普羅列塔利亞，必然地使由矯正資本主義害惡之人道的立場，由廢止普羅列塔利亞階級之普羅列塔利亞的立場行着社會主義思想并連動的發生。

從而德意志資本主義，在一方面，於營利的關係上，須和先進資本主義國英法戰，在他方面，又不得不逢着內部階級鬥爭。尤其是一八四〇年後半以後，社會運動之發展，乃對德意志國家最大的威脅。腹背受敵的德意志資本主義，必須採着怎樣的態度呢？全產業之採用自由主義，明白地，對於先

進資本主義國則有利，對於後進國則不利。英吉利資本主義，而今已完成內部產業革命，由國際貿易戰，占着確固的地位。德意志農業，爲要靠着英吉利之自由貿易，價廉地將其穀物輸入英吉利，而參加自由貿易運動。當時之德意志，於一方面，頗有英吉利一大穀倉之觀。德意志產業革命之發展，雖則增加工業的重要性，然而既用自由貿易而對抗英吉利之工業，則自國不但處在競爭上之不利，而且自國之工業，終必歸于敗壞。這事情，只看英德兩國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程度，就能判明。上面已經說過，英吉利產業革命以紡績業爲主，這革命，終熄于一八三〇年，然而德意志之產業革命，到了一八四〇—五〇年代，才開始發生。這事情，給與德意志經濟思想以重大的特徵。

這個首先第一是對於自由主義經濟思想之反對，其次是對於社會主義之反對。這二個傾向，首先產生了反對自由主義經濟學思想之舊歷史學派，其後更產生綜合自由主義經濟學思想之新歷史學派即社會政策學派。我們打算下面首先說明此傾向的思想背景，其後更說明這兩個學派。

古典經濟學之合理的傾向，尊重其經濟法則之普遍性和永遠性的結果，遂忽略了歷史性，釀成世界主義和永久主義的發生，其樸實實在的性質，逸失了全體社會之特質，所以個人總如孤立者一樣，這個完全是原子論的，抽象論的，唯物論的。

上面已說過，對於英吉利經濟學此種傾向，最先有德意志浪漫主義之反對。浪漫主義原來便是對



于十八世紀合理主義之不合理主義的反動。

從而德意志浪漫派對於流入德意志之英吉利古典經濟學底攻擊，當然是極其峻嚴的了。其攻擊的中心點，乃集中於英吉利經濟學之理智的分析和抽象，機械論的因果論，自然法的社會觀，世界主義和唯物主義等。

然而如此浪漫派同樣地對於英吉利經濟學翻起反旗，以冷靜的實證主義，歷史主義，代替于浪漫主義所有的憧憬的陶醉者，則為腓力·里思特。這裏我們才發見歷史學派最初的萌芽。

并且英吉利經濟學，在德意志，也遭着康德實證哲學波濤的反對。英吉利經濟學和康德之思潮的對立，便是一為原子論的社會觀，一為社會有機體的概念；一為社會靜態的概念，一為動的概念；一為絕對主義，一為相對主義；一為孤立的抽象的方法，一為實證的方法，歷史的方法之「比較」方法，「逆演繹」方法：

康德之思想，在英吉利，則使米爾 (John Stuart Mill) 表明對於古典學派之不滿，疑惑和否定，在德意志，也歷來顯著的影響。尤其是康德之思想，差不多對於歷史學派，給與一切思想根本的原理。比如卡爾·克尼士之方法論，其內容之全部，差不多皆負于康德的。

此外對於古典經濟學之理論的反對，又有歷史法學派之方法論。歷史法學派之代表者沙威尼

(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 底根本思想，可分爲經濟主義的歷史觀，進化思想并浪漫主義思想之三種。這個乃由相對主義出發，和十八世紀之合理主義戰，這一點，頗與英吉利經濟學根本思想不一致。

在莎威尼之「立法判例學之現代使命」(Von Berni unserer Zeit fü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 之方法論中，含有多數類似經濟學歷史派主張之點。至于其法律學之方法論，又含有國民經濟學之領域。所以或者可以這樣說：經濟學中歷史派之誕生，使人預想到歷史法學派之誕生。

十九世紀中葉，便是古典經濟學之世界主義和永久主義猛受反對的時期。在德意志，其狀態也一樣。英吉利之經濟學，在德意志，其理論和現實之距離，愈形宏大。這矛盾，祇據二個方法，才得除之。即，提倡一種調和的學說，或據新的學說而說明之。一八七〇年後，明嘉和野本史(William Stanley Jevons)等採用前者之方法，而德意志歷史學派則採用後者之方法。

## 二

最先反對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便是浪漫主義者。而浪漫主義之經濟學體系，乃由亞丹·繆勒所樹立，這已如上述。其次反對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便是歷史派之先驅者里思特。獨學而磨練其思想

的里思特，不是書齋中人，乃是街頭上人。他最初由國家高等試驗合格而任官吏，在杜濱堅大學國家學科設立後，同時他也任國家行政學之教授，但當時他底思想，乃自由主義的，嘗為華堅海姆內閣計畫策術。但到反動的時候，他底立場，便一變為不利了。同時他又受佛琅克佛爾并梅尼士商人們之囑託，起草提出聯邦議會之撤廢內地關稅請願書，并組織一團體，于是遂為反動內閣所忌，而不得不告辭教授之職了。此後，他便被目為政治運動的急進主義者，蒙着破壞安寧秩序的罪名，在一八二二年，被官判禁錮十個月，但他在未逮捕之前，已經逃避，免了這一場的罪禍。于是他在各處流浪浪，於一八二五年，便到來北美的紐約。在紐約，他已拋棄了自由主義的傾向，而採保護主義的傾向。一八三二年，他才歸來德意志，就任巴敦的亞美利加領事。這時候，他才力說德意志鐵道網完成的重要性，為此發行雜誌。以後，為貧窮所迫的他，全靠執筆生活。這中間竟完成了一國民主義經濟學〔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1840〕。里思特之名字，能夠在經濟思想史上不朽的，完全靠這一本書。

里思特在經濟學中所解決的問題，乃是實際問題，不是理論問題。即，在他所成為問題的，便是商業政策之改革——自由貿易主義之修正。里思特雖然富于創造力，然而其性質，却不是分析的理論的，如像形成嚴密的觀念。這樣的事情，原是他所不悅意的。德意志實際問題指導者之任務，使他不

尊重理論家之重要性。可是不能說里思特完全不顧理論。因為他也有他實際問題之基礎的理論。

里思特所以在歷史學派中占着第一地位和有最大意義的，完全因為他主張國民主義的經濟學。

據里思特，經濟學不外是一個經驗科學。是在事物之性質中安置其根據的科學。從而對於經濟問題理論的構成，不但必須適合于現代之要求及特殊國民之特殊狀態，同時尤不應忘掉將來之要求并全人類之要求。然亞丹·斯密斯則完全不顧如此事物之性質。從而亞丹·斯密斯主張「基礎薄弱的世界主義」和「缺乏組織精神的個人主義」，沒却此中存在的國民性。要使歷史傳統不同的諸國民，適用世界主義的經濟原理，這是大誤謬。經濟學，必須是國家本位，國民中心。「國民乃存在于個人和國家之間。有特殊的言語，文字，特殊的血統，歷史，風俗，習慣，法制，領土和國民全體之利益，而和他國民對立，從而以自己之能力和手段而獨立地主張之個人，主要的是依着國民，或作為國民，得到精神的教養，生產力，安寧的秩序，同樣地，人類社會之文明，便是基于國民文明的發達。」

國際主義是一個幻想。國際主義之理論，和實際不一致。理論乃要求絕對的商業之自由，而實際則要求保護貿易。正統學派經濟學，雖在世界主義之下，主張自由貿易政策，然這個不外是反經驗的頭腦之產物。事實却站在國民的立場，指出養成國民產業的必要。在事實上，各國有各國不同的歷史的存在條件，所以商業也不得不因之而異。各國決不能同樣地容許絕對的自由貿易論。這中間，當然

有主張相對性之餘地。

古典經濟學，不顧國民性，採世界主義之立場，明白地是拋棄了現實，走向理想的方面。正統學派如果立足于現實的立場，那麼正統派決不會沒却了國民性的。

據里思特，亞丹·斯密斯之學說，和格尼（Francois Quesney）之經濟學，同為將來國際主義的要求。像國際的商業之絕對自由這樣的東西，恐怕是數世紀後，才會實現罷。他們完全忽略了現在之要求，忽略了民族之性質，在什麼地方，也是國際的，對於民族并民族的幸福，沒有絲毫顧慮。從而里思特要以國際主義之克服，為其主要的任務。

從上述國民主義之主張看來，他當然是站在相對主義之立場的。從着時代的事情，而樹立經濟政策之原則。必須解放某特定條件發展的產物之國民經濟脫出此國際主義之幻想。何以呢？社會事情之力，其必要較幻想尤強，且是由于事物之性質而成立的。

里思特之國民主義，也含有實證主義之要素。李普雪治說：「據里思特，經濟學是基于經驗的科學，是由實際生活之經驗而成立的。可是他所說的實際生活之經驗是什麼呢？據他，乃是認識事物之「自然性質」（Natur der Dinge）。」

據李普雪治，自然的狀態，乃構成歷史。自然和歷史不是各趨極端。乃是互相一致。經驗，自然

以及歷史，不是矛盾，乃是有同等之意義。他以為里思特之歷史觀之認自然和歷史之對立，本不成爲一般的問題。因爲他以爲自然和歷史之間，存在一個調和。因爲「自然就是歷史，歷史就是自然」的緣故。

據里思特，經濟現象，應基經驗而解釋，歷史的敘述經驗的事實，便是經濟學的任務。但「經驗的事實」這個東西，因爲正如前述的一樣，所以其歷史的敘述，也不應混合何等創意，只要作爲自然的事實而敘述，那便夠了。而李普雪治則稱這個方法爲「自然科學的歷史哲學」。

并且里思特還很反對亞丹·斯密斯學說視人間爲孤立的，陷入原子論的見解的事情。

他說，歷史教示我們以社會的并個人的勢力及狀態間之複雜的互相作用，教示我們以孤立者乃由社會的制度并狀態造出其大部分生產力。不在此種互相作用中觀察人間，却單看做原子論的機械的，如此縱令得到怎樣的結論——空想的結論，但其極不正當。

「古典學派之經濟學，把國民經濟和私經濟看做同一物，以後者之說明而類推前者。試不知這兩者，其性質完全不同，個人經濟之集合，并非構成國民經濟的。這兩者矛盾衝突的時候，爲國民經濟計，尚不惜把個人經濟作犧牲。例如在多數場合，私的企業，屢被國家權力所抑制。」

里思特之歷史觀，不是目的論的。乃是自然因果論的。自然法則下之事物原因結果底關係，構成

他底法則。所以他以爲「凡取出精神後之物，皆爲死的物質」，物質沒有獨立性。并且以爲一切材料都不外如此，即使據因果論的見地而處置之，而這中間也沒有矛盾的存在。

然而在一方面，他又偏重於所謂正常的狀態的國民的事情。所謂正常的狀態和不正常的狀態應怎樣判斷呢？要判斷之，當然必要價值判斷。一經達到那地步，最早已不能說乃存乎自然因果論範圍之中了。卽，在此一點，他于不知不覺間，已探入同的概念。從而他所述者，不僅是歷史現象，而且用價值判斷。從而他底歷史觀，不是如其主張的單純的自然因果論，還混淆着目的論。像這樣的他底歷史觀之矛盾，在區別自然和歷史的時候，不能想到，這個矛盾，在調和此二者的時候，才能發見。

自然和歷史，或是自然因果論和目的論，雖如何巧妙地現出表面上之調和，然到底却難于相容。在同時收入此二個本質的矛盾的這一點，里思特的方法論，是很不徹底的。他一方面倡着自然科學的歷史觀，一方面又包含着目的的概念，把自然法則，結合在實際論的歷史觀之上。因此，他并非在一個基礎之上，樹立他的方法論，乃是在二個基礎之上樹立起來的。所以他底方法論，常是在此基礎之上動搖着的。

里思特之方法，和亞丹·斯密斯之方法，其相異點有二。這就是對於歷史的必然性和理想相對性立場的不同。

據里思特，歷史的經濟的過程，就是特定條件結果所生的必然的過程。并以爲這個條件，每從着時間而不同。從而理想的相對性便顯現出來了。理想并非常常不變化的，祇是在特定的經濟條件之基礎上成立的。

此一點，他又陷在與前者同樣的矛盾，使理想主義的目的論，和歷史的自然法則性相併立。他有時力說自然，有時力說歷史，把兩者合爲一物，混亂了他自己之方法論。

最後便是他底「發展階段說」。關於這種學說，他常常也被自己之主張束縛了自己，這也是他最大的缺點。

如上所說，里思特一方面注重經驗的事實，一方面力說抽象的學理之無價值，釀成他底「發展階段說」發生最大的矛盾。這種發展階段說，明白是在他所最厭惡的演繹的方法之下成立的，已被多數學者歸納的反駁了，完全是抽象的產物。

卡爾·第爾說 (Karl Dietl)：「歷史學派所作的事情，存在內部的矛盾。和主張自然法則之學派論爭，每主張相對的解釋，指摘經濟制度之歷史的國民的性質之歷史學派，乃主張自己經濟生活作着一定自然法則的發展。歷史學派主要的代表者，雖存有程度之差，但皆承認國民經濟，喊着必然的發展階段即經濟生活之自然的發展。這個正是對於他們「歷史的方法」的矛盾。」



斯莫拉 (Gustav von Schmoller) 對此嘗作一部分的辯解說：「里思特之階段說，可以用種種的事實而反對之。但這反對，不過是瑣末的事。里思特之說，即使是抽象的產物，然他站在歷史的立場，反對正統學派之絕對的方法，而敘述如此階段說這一點，尙有他階段說之意義。正統學派雖譏笑爲超越時間和場所之抽象的，然尙不失其歷史上的立場。」

便是羅西亞之自然，勞働，資本的國民經濟發展之三階段，希爾德布郎之自然經濟，貨幣經濟，信用經濟之發展階段說，當然也和里思特之發展階段說一樣，均受此種非難。

總之，不論在什麼地方，歷史學派乃主張實踐的方法，否定絕對的法則，敘述抽象的法則。這一點雖然是釀成反對的原因，但歷史學派，他何從不知道祇蒐集材料而記述爲無意義的事情。從而他又利用法則的演繹。所以一般人，都根據這一點，非難他底歷史主義不徹底。

里思特由以上之立場，舉出古典經濟學派三大誤謬：(一)基礎薄弱的世界主義；(二)冷的物質主義——其注意，祇集中于交換價值，忽略了國民之精神的，政治的，現在和未來之利害關係，生產問題；(三)紊亂秩序，陷在缺乏組織精神的個人主義，不顧社會的勞働和協力收穫偉大的效果。

里思特，普通雖被目爲歷史學派之創設者，然這個大約據他主張經驗和必然性之歷史的方法而稱呼吧。可是倘認爲由他完成對抗古典學派之理論的建設，而目他爲歷史學派之創設者，那是極不對

的。與其說他是理論經濟學者，不如說是政策家。

給與歷史學派以理論的基礎，站在歷史學派之立場，而對抗英吉利古典經濟學派者，原是羅西亞和古尼士。

### 三

根據由方法論的立場，有秩序地主張「經濟學歷史的方法」之思想這一點，而認羅西亞為歷史學派之建設者，這大概是適當的。

據羅西亞所說，他原是模倣沙威尼和愛希賀倫在法律學上應用歷史的方法之企圖，而在經濟學上應用歷史的方法。他底方法，雖和李嘉圖之方法完全不同，但頗類似馬爾薩斯及拉烏之方法。他說：「我敢以歷史的進路，看做達到真理之唯一條路。這條路，雖不能看做絕對的捷徑，然尙可以達到多的收穫和地域。我敢相信，凡一旦能使適當地發達後，決不會有被拋棄的事情。」

羅西亞開始發表其歷史的方法的經濟學說的著作爲「歷史的方法之國家經濟學講義要領」(Grundriss zu Vorlesungen über Staatswirtschaft nach geschichtlicher Methode 1843)。這本書，被尊重爲歷史的方法最初科學的敘述。我們因爲要簡單地介紹他底方法論，所以這裏祇得引用他自己所舉

的四個條例如左：

一 國家經濟學，不僅是一個致富術，還是一個政治科學，其重要的問題，是判斷人間，支配人間之事情。我們之目的，在記述諸國民於經濟上思考什麼，意欲什麼，或已知覺否；爲什麼努力，或已成就否；何故努力，或已成就否等問題。這種記述，祇是和國民生活其他諸科學，尤其是法制史，政治史及文化史極密切結合着才可能。

二 然而因爲國民不單是以今日生存之個人的大衆而成的，所以要研究國民經濟，到底不能只以今日之經濟狀態爲滿足。由是觀之，既往的文化階段之研究，當然也有同一的重要性。

三 由諸現象大多數中，發見本質的合法則的東西愈困難，則比較諸民族之必然也愈緊切。已死滅的古代民族，我們已不復見其發展了，所以我們得到無限教益。在近時國民經濟有類似舊者之傾向這一點上，這個比較，爲判斷新舊計，有無限價值。

四 歷史的方法，不容易立即讚賞一個設施，或非難一個設施的。在一切國民，或一切文化階段，有益或有害的設施，常是極少的。比如教小兒步行之引繩，老年人之木杖，這在成年者，皆是無用。經濟學主要任務，學是在乎證明如何或何故漸時地「合理爲背理」，「恩惠爲災厄」。

這個便是羅西亞之歷史主義的立場。

羅西亞在前揭「講義要領」中，使「歷史的方法」和「哲學的方法」相對立，在「國民經濟學原理」(Grundlagen der Nationalökonomie 1834)中，使和「理想的方法」相對立。

就于前者之對立而說，羅西亞將國家學之方法爲二，即「哲學的方法」和「歷史的方法」。所謂「哲學的方法」，便是盡可能抽象地取出時間性中偶然性，而構成概念之方法。所謂歷史的方法，便是不僅敘述事實，還應取出各國民發達路徑中存在的相等的東西，以之統括在發達法則名稱之下。在此意義上，歷史的法則，有某程度客觀的妥當性。

爲國家學之一種的國民經濟學，原是探究關於國民經濟如此發達法則之學問，從而必須採用哲學的，歷史的方法。

對於第二的對立即歷史的方法和理想的方法之對立，羅西亞說之如次。即，羅西亞說，研究經濟學是什麼或已是什麼的生理學的方法或歷史的方法，和究明經濟必須是什麼的理想的方法完全不同，并且他又主張採用前者，認採用理想的方法爲誤謬。又說：「我們在學理上，須拋棄理想的建設。所得代之而採用的，祇是單純地敘述(A)國民經濟的本質及欲望，(B)決定經濟的欲望之充足的諸法則及諸制度，(C)其效果這類事情。即，經濟學可說爲國民經濟的解剖學，也可說爲生理學。」

如上所說，羅西亞在經濟學理上排斥理想的方法，主張以現實之觀察爲基礎而客觀地解剖經濟現

象，羅西亞所認的經濟學，不過是要由歷史的對象，引出那可以漸次地推測的，可以經濟的推移的系列的東西。他關於一般的經濟法則，不認絕對的真理。在他，一般原理，是必然不完全的抽象。國民經濟學，祇是各人民及各時代有其自體特殊的經濟後，才可能成立。國民經濟學是「國民經濟發達法則之學」，是「國民經濟生活之學」。它無異于一切國民生活之科學，在一方面，行個人之考察，在他方面，及于全人類之研究。

羅西亞又站在有機體說之立場，觀察國民經濟。據他，「國民經濟，原來便是一完全的全體，其各種外的表現，在他方面，互有密切關係。從而研究爲其外的表現之一種的經濟生活，必須知道其他各方面。」這裏他所指的各方面，便是「言語，宗教，藝術，科學，法律，國家及經濟等七方面。這樣，各種處置這些人間生活諸區域之科學，當然預定多少餘裕的東西，或給與這類東西的基礎以多少利益。」

「然而在如此普遍的結合之中，法律，國家及經濟，乃分立着，而且容易看出構成密切的家族之事實。這類東西，就是構成狹義的社會科學的。」

接着他又說明歷史的生理的方法。

法律，國家及經濟這三者，原是互助的，同時如不顧及其他，則不能理解他之處置的國民生活之

這三方面之一。

據羅西亞，經驗的現象之互相符合條件，正無已於解剖學所謂人間有機體個個的機能互相符合條件一樣。有機體和組織體不同，不能正確地分別原因和結果。所謂現象之現象，其自身就是原因，同時又是他原因之結果。他又更進一步說，經驗的個個之現象，乃是個個的統一，在根本原因中有互相關係。這個見解，原是關於神學的形而上學的，社會組織之起源的轉向。并且他關於國民經濟現象之成立及發展，又採着經驗的立場。就是在考慮國民經濟之有機的性質時，雖一概考慮國民經濟的狀態，制度之成長及漸時的發達，但這個原是人類中自然發生的產物。這一種思考，顯然是互相矛盾的。

羅西亞又主張實證的方法。他說：「實證的經濟學，乃確實地描寫人間，乃不但由一定國民，國家，時代之人間之經濟的動機所作的行爲，且是由種種動機所作的行爲。偉大的經濟學者，而今還支持抽象，試不知道種抽象法祇不過有爲研究前提的價值。在學理上，在實際上，則沒有重大的價值。真的經濟學，必須從枝梢至深根，有統計的歷史的基礎。特別是德意志經濟學之任務，必須以深刻的理解地球上一切外國民之狀態和博愛而研究之。」（「德意志經濟學史」）

羅西亞又從自然科學上求經濟學之法則。但這個企圖，果能成功嗎？

羅西亞首先接受歷史法學派之國民概念，樹立國民經濟之概念，然他以爲一切科學，皆是自然科學，認歷史家之認識皆在乎發見法則——發達的法則，所以在實際研究上，要構成包攝一切個別的具體的國體的國民之普遍的國民概念，要企圖發見國民經濟之發達法則爲這種普遍的國民發達之自然法則。

所以，一看起來，羅西亞之國民發達法則，好像就是純自然科學的法則。可是現在只追究他用怎麼方法去樹立這種法則，在實際上他期待此法則的什麼時候，便覺得他之所求，決不是純自然科學的自然法則。

卽，羅西亞在一方面，以普遍的國民之發達爲準備個體的生物之發達，依生物學的類化，分國民必然的通過的階段爲隆盛，老衰，滅亡（國民發達法則之演繹的設定）。在他方面，對於個個的具體的國民，經驗的研究事實，要歸納的先構成諸國民發行之平行線，然後更依着詳細地觀察事實，而根據自然法則的見地構成此平行線。

我們根據一般認羅西亞爲經濟學歷史學派理論的樹立者的意義，也可以說他爲歷史學派之建設者。但如嚴密地說來，他尙未嘗脫却古典經濟學之外殼，他尙不能使歷史主義澈底起來。「他不僅說發見國民經濟之自然法則的可能性，還主張研究上必須抽象的認人間本來是不平等的，」因而「他也如

李嘉圖和杜甯所作的一樣，認經濟學預備學派中一個不可缺的階段。」所以「他雖然是在經濟學中推薦歷史方法的第一人，但他底適用，却很不充分，不明確。」（小泉教授）

斯莫拉也說：「羅西亞之目的，在使斯密斯派之學說和歷史的探究之結果之間發生和解，發見經濟法則之自然法則。」

總之，羅西亞雖稍樹立起歷史派的理論，給歷史派經濟學存在的確立之處雖大，然他還未嘗使歷史派的主張澈底起來。

#### 四

接續羅西亞而貢獻于歷史學派經濟學者為希爾德布郎（Bruno Hildebrand）。希爾德布郎於一八四八年發表「現在及將來之國民經濟學」（Nationalökonomie der Gegenwart und Zukunft）的第一卷。這一卷，及其當時以前之經濟學的批判及敘述，據他底計劃，在第二卷，打算敘說自己之體系。但這一卷終不能發表出來。然而我們只在一八六三年「康喇特年報」所揭的「現時經濟學任務」（Die gegenwärtige Aufgabe der Wissenschaft der Nationalökonomie）中，便能看見他底經濟學論。

希爾德布郎也如羅西亞之經濟學方法論受歷史法學派之影響一樣，受歷史的言語學之影響很大。



言語學上歷史的研究之本質，在主張言語之經驗的歷史的觀察，其有機的解釋，國民的精神和言語之關係，關於言語之必要和發展之原理。希爾德布郎負于此言語之歷史的見解者甚大。

如上面所述，希爾德布郎雖不能實現其對於經濟學的論述，但我們只在其第一卷中，他對於其他經濟學之批評中，已能窺見其立場之一般了。例如他論亞丹·斯密斯如次：

「亞丹·斯密斯及其一派，不但有如上所述之功績和真正世界史的地位，而且如其先驅者重商主義者及重農主義者一樣，構成一經濟理論即給一切時代的一切國得到絕對的妥當的法則。由亞丹·斯密斯及其一派以至于盧詩及 Thomas De Quincey 之流，比如盧梭及康德不顧及自然所給與的人間之差異和種種發展階段及民族素質而要構成超越的國家一樣，要從個個民族及其發展的要素之特殊事實歸來一般的妥當法則，復要依此構成該當于當時合理主義的性質之說明的一種世界或人類經濟學。」接着他又說：「他們乃由那種所謂國民經濟學乃在人間物質法則之關係中立基礎，一切國民經濟法則乃超越時間和空間，就在現象變化時也不變動這樣的見解而出發，忘掉了爲社會存在的人間，常是文明的孩子，是歷史的產物；忘掉了對於其欲望教養，物質財及人之關係，決非一定不變，反而跟着地理的差異，歷史的變化，人類全文化之進步。」

斯密斯學說第二特徵，和同時代之國法學及啓蒙文學互相共通。這個乃是由人類社會及市民社會

同一原子的根本思想出發。並且他把個個的個人，看做社會唯一之目的。並且「斯密斯學派，認經濟學為交換中之自然科學，各個人是純粹的利己的勢力。且如自然力一樣，常向同一方向而活動，常在同一事情之下，不絕地得到同一的結果。故不論在德意志，或在英吉利，這些法則，都叫做經濟的自然法則，如其他自然法則一樣，有永久的性質。」接着又對於亞丹·繆勒說：「亞丹·繆勒之學說，乃主觀的，從歷史的發展之過程中，任意抽出某一時期，而使其歷史的合理化起來，所以他底經濟的生活形態，完全失其本質，他既將如此思考，適用到民族和時代，則當然也不能避免和斯密斯同一的非難。」

其次我們要對他底經濟學要領的論文「現時經濟學任務」說幾句話。從希爾德布郎看來，經濟學之成立，乃是第十八世紀中啓蒙哲學之所賜。當時的歐羅巴，專制政治達乎極點，經濟生活之監督制度，站在如否定私的并團體的行爲獨立這樣的狀態，所以遂發生了對此政治當爲反動的革命思想。而成爲其特徵的，便是對於現實的尖銳的批評，而處在此批評之根底中的，便是抽象的原理的人生觀。這個否定一切歷史的，傳統的，民族的東西，構成對全人類之理論的政治的自然狀態之理想。這場合，個人絕對自由，個人之自由，乃是全社會生活之出發點。所以這思想之政治方面的代表者，則爲盧梭，經濟方面的代表者則爲斯密斯。從斯密斯之主張，經濟現象也如自然諸現象一樣，乃受自然法

則所支配。從而經濟學，便是交換經濟之自然法則之科學。其目的，便是研究那種組織社會的個人自然法則之作用。但斯密斯這種經濟學，顯明地含着不少誤謬，從而今日經濟學之課題，不外是在打破自然科學的根本觀，或是在某種範圍中，解決自然法則支配經濟生活的問題。希爾德布郎嘗爲此故提出二個問題。這就是：人類提供經濟上之手段，我們的肉體，也爲此手段盡力，這是無意識的自然，這自然，是否以不變化的法則，給與諸民族經濟上以某種影響；又者，人類的經濟行爲，是否從着純粹自然的法則，關於前者，我們沒有什麼否定此問題的根據。但關於認自然和支配自然之不變法則乃規定各方面之經濟發展限界的後者，我們却以爲，我們經濟的行爲，都不是利己心的表現，寧是通過一切時代，而被道德的動機，即宗教，國民道德力，法律，理性之概念所決定。然而希爾德布郎却以爲這是不足承認的，他反而批判自然法，但是這種批判是簡單的，不是重要的。

希爾德布郎之經濟學研究，乃加上社會的政治的考察，要依着這個精神，而批判自然法則。他贊合着極端的自由主義者之自由競爭論和自然法則之本質而考察，指出二者間之矛盾。並且指出自由競爭和反對自由競爭之政府同是站在自然法則之基礎上，所以不能找得一方是自然法則，他方不是自然法則這樣的結論的事情。

可是他底經濟學研究法之特徵是什麼呢？無意識的世界，雖然可依永久不變之法則而回轉，雖然

存在現象之變化，但在那裏面，却毫無什麼民族的完成和文化。反之精神的人類，則每享受由不絕地進步的，新的精神的內容所生的勞働及自由所增加的文化的發展并完成。他說：「自然生活和人的文化之間，既有差異，則在科學上，也是妥當的。自然科學原是研究那種支配無意識的現實界之法則，處置自然生活變化中永遠不變的現象，而人類文化的科學，則在於人類之自意識的生活上所進步的，即人類之變化及經驗之中，求人類社會的完成。」又說：「所以經濟學并非研究經濟現象多樣性中之不變的，在什麼地方也一樣的，那種法則，乃是示出國民經濟的經驗之變化中的進步，即人類經濟生活中人類的完成。其課題，則在乎階段的研究個個的民族并全人類之經濟的發展過程，在乎依此方法而認識現代經濟文化之基礎，構成，并課題。」希爾德布郎便是由這個立場而區別經濟發展階段說之自然經濟，貨幣經濟，信用經濟的三階段。這個就是希爾德布郎之立場。

總之，在希爾德布郎，最重要的事情，便是經濟關係乃由場所及時間之差異而差異的這一點。這事情，古典學派之經濟學者完全沒有顧慮到。希爾德布郎乃由經濟現象之具體的狀態的多樣性出發，而達到相對主義。從而他用人類之行爲就是自由，道德，進步的理由，反對正統派認經濟學爲自然科學，而認經濟學爲社會科學。可是他底經濟學方法論，也是很充分的。我們爲要宣明舊歷史學派經濟學之意義，必須舉出卡爾·克尼士來說一說。

## 第十七章 舊歷史學派之經濟思想(其二)

### 一

「一八五三年，克尼士發表其『Die politische Oekonomie von Standpunkte der Geschichtlichen Methode』。這本書，乃精密地敘述且辯護經濟學中歷史的方法之應用，至少在理論的部面，是歷史學派最組織的而且最完全的宣言書。」(英格拉姆 John Kells Ingram)克尼士在此書中，指摘英吉利古典經濟學派演繹的抽象的研究之誤謬，盡所能地排斥之，自己則高唱「歷史的方法」，要完成此方法論的理論。

「但是，十九世紀中葉，在德意志，正是自由貿易論着着收穫成功的時候，所以他這本書，差不多沒有人顧及，漸次陷入廢版的危險。然到後來，虧得講壇社會主義的運動漸次高潮，才頗被一般所閱讀。」(麥克斯·華巴)

這樣，這本書，在其初版後三十年即一八八三年，又發行第二版。這回因為著者自身立場有多少

變化，遂改其題名為“Die politische Oekonomie von Standpunkte der Geschichte”。我們在這裏稍詳細地紹介此歷史學派之方法論者克尼士最有理論的所論。

克尼士最初着手研究的問題，便是關於全科學的分類中之經濟學的地位。在克尼士的當時，赫爾姆荷爾慈所謂的精神科學和自然科學之理論的部門的對立，已得一般之承認。前者以觀念的世界為研究對象，後者以訴諸感覺底外界的世界為對象的東西。

克尼士對於把全科學分為二個類別的事情不能滿意。因為國家學和社會學，彼此不能互位隸屬併合的。他以為在這兩者中間的地位得形成第三的科學為適當。如照克尼士的意思，經濟學也為社會學的一部分，所以經濟學也當然屬於此中間第三領域的科學。

克尼士以為「國家學及社會學，是研究營共同生活的多數的個人或國民的行為及依之而生的社會的法律的生活共同體的狀態的歷史科學」。在這等科學的對象內面，不但可以觀察人間內面的思惟或觀念的世界，還可以觀察感覺的能夠知覺的，外界的現象及狀態。從而國家學及社會學乃為訴諸表現在外界的感覺的科學，所以不屬於精神科學。

而且此等科學也不是屬於自然科學的。其研究對象，假使雖屬於感覺的世界，但人類行為的發源，却是人間之內的精神的作用，其發源既是精神的作用，所以惟其表現，才是訴諸感覺的人類行為。

據克尼士說：「我們在經濟學中，并非以人間內部的世界和人間外部的世界的事情爲問題。我們學是以由自然科學的研究而區別的外部世界即依着內部的原因而爲條件的外部世界爲問題。」

從克尼士看來，國民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爲連續的發展的歷史的「國民的經濟生活」。但所謂「國民的經濟生活」，究竟又是什麼呢？

李普雪治說：「克尼士當觀察國民經濟的時候，最初給與二個的思考過程。即，觀察和全歷史的國民生活有統一的（有機的）關係的國民經濟及觀察和人類有關係的國民經濟。」

關於第一點，即他所謂國民經濟學的有機的觀察方法。他的意思是：「國民的經濟的狀態及發展，便是和全生活有機體結着密切的輪環。國民經濟，事實上決不是孤立的，自立的東西，它只不過是一國民生活底經濟的方面。祇是經濟的活動，才是關於國民的。其活動底樣式特性，和其國民其他外部的活動有關係，在其關係上發展。」

「解釋社會的成員及有國家的秩序底國民經濟爲一種有機的組織的事情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古典經濟學派之個個的「經濟人」不是經濟的現象的支柱，却是在其經濟的領域內才表現出他底特性的。」

「國民經濟，決不是由于個人的利害底連結的二次的存在，却是由個個的構造及個性所成的有機的全體。所以要提示出有機體的觀念，必須作爲表示在個人之上的最便利而且最容易一般化的觀念而

提示之。」

這麼一來，若從經濟的觀點而觀察社會生活的時候，則經濟生活便是表現于其視野上面的社會生活的一面。經濟生活，和其他的諸生活，即和法律生活，宗教生活，藝術生活等，為渾然統一的一體，即形成社會的東西。經濟生活有這樣的關係，和其他的社會生活有密接關係。所以以這樣經濟生活為對象的經濟學，和其他的法律學，政治學，哲學等，立在不即不離的關係上。所以這個經濟學，決不是孤立的科學，乃是和其他的科學互相影響着，不絕地發展的科學。

所以經濟學之充分的研究敘述，祇是不絕地闡明和其他諸科學之關係，才能達到其目的。因而「當解決經濟問題時，必須認識非經濟的要素及非經濟財之重要的所以然。」從而「人們把實際生活的經濟的事實，當做國民經濟的理論的根本的事情愈加確實，同時他為避免達到現實和矛盾的結果而在估料中不能不齟來沒有純粹的經濟的本性的要素的事情也越加確實。」

又說：「把國民經濟的生活，看做不斷發展的歷史的國民的經濟的生活的一階段。國民經濟生活，在其國民經濟底歷史的表明上，只不過是繼續循環的一連鎖。」

「經濟生活的狀態，經濟學的理論，同是歷史底發達的產物。假令無論它採取怎樣的形態，或怎樣的理論和達到怎樣的結論，他不外是歷史底發達的產物。它是人間底國民歷史的或時代的整個的



有機體和生命的結合，它是依那個時代，那個場所，相伴着那個國民的諸條件，且從其中發育而成的，和它們共同存在，越加發達的東西。它在歷史的生活內面，獲得其議論的資料，其結論，則存有歷史的解決的性質。它雖稱爲國民經濟學的「一般法則」，然而它也不過成爲經濟學的真理的歷史的敘述，和繼續進步的表現。無論在那個階級中，也不過發達到一定點了的場合而被認爲一般化的真理。無論在其量上或其形式上，也并非沒有進步的餘地。在某歷史的發展的階段上，所謂適當的絕對的真理，畢竟也不過是時代的產物，不過是表現出一定時代的經濟學的歷史的發達的東西。」

如上面所說，克尼士以爲國民底經濟生活，在其發展上，沒有瞬間的停歇。所以經濟生活的靜態的考察，只在那個程度止，他就不以爲已達到何等真理的地方。經濟生活，一定要從歷史的立場觀察。

如上面所說，克尼士的相對主義，乃從歷史主義的立場而生的。

## 二

克尼士分析絕對主義的古典經濟學派爲在二個的主要的前提之下構成的。所謂兩個前提，即私有財產制度和利己心。在古典學派，這雖超越時間的空間的制限爲絕對的概念的觀察，然而也已經發生

變化，且在將來是能變化的「歷史的範疇」，歷史的現象。「它們并非普遍在一切地方，條件的變遷，倘給與它們以大變化的時候，則否定它們的事情，同前也就發生出來。」

克尼士如此非難古典學派以私有財產和利己心為絕對概念，非難由其前提而演繹絕對法則，而主張概念的相對性。

據他說：「從來的經濟學，環一切場所，皆採着承認妥當的自然法則的絕對的態度。然而這樣的空間的世界主義和時間的永久主義，到底不能真確地說明經濟現象的。」「在絕對主義之下，在根據科學而遂行經濟學的任務的時候，對於一切時間，場所，國民性，皆知道存有無條件的同樣的要求有價值的東西。即當為努力或請求經濟學的任務，也同樣地依這個要求為嚮導。」然而，有經濟的生活為基礎的一切的學說真理，畢竟乃從具體的假設的上面得來的。但這種假設，在一切的時間和一切的場所，既非常常同一的，也非不絕地發生的。所以，學說的結論或判斷沒有相對的効力的事情，寧是必然的。

所以，經濟學「于歷史的生活中，有其立論的基礎，其歸結，不能不附加解決歷史的性質。國民經濟的一般法則，不外是敘述真理的歷史的說明及進步的表明，在各階段上，也不過是表明發展到某點的被知悉的真理的一般化，在全量上，或在法式化上，也不能無條件的宣言為完成的東西。學說的

絕對主義，它底歷史的發達在某階段得着權威的場合，其自體，也僅當做這個時代底所產的而存在，不過是表示出經濟學之歷史的發達中一定的時期。」「看一個人無論有怎麼樣超卓的特殊的意義，然他畢竟也是時代的產兒，他底呼吸的地方是他底周圍的空氣。」

如此每個國民的經濟生活，彼此均有特殊性和類似性。

最初所謂有國民經濟生活底特殊性的事情，依其下的二原因，附着其各個底條件。即：

第一，自然的條件。

第二，文化的條件。

在前者，即在自然的條件中，最大的東西是地域。地域無論在什麼地方均有具體的特性。一定的國民，因為乃在地域中居住，所以他們成爲經濟的關係之一定的基礎。

地域底多樣性的事情，常常產生多數的重大的條件。

其次，由經濟的能力及經濟的收益上看來，它們雖如像由外部的自然所給與的力，目的和人間的能力之間的不同步調及其共同作用的結果，但在常常所謂正當的意義上看來，又被視爲自然的條件的特殊性而尊重之。

給與國民經濟生活以特殊性的第二的條件便是文化的條件。

就由國家立法的行政的能力，宗教教會，及主要思想的潮流底影響方面看來，國民經濟，也有極複雜的多樣性的。從這一點看來，經濟學也和其他的學問有密接關係，在其影響之下進行發展。

然在一方面，只要在各國民底經濟生活之間，存在人間的要素和自然的要素之共通性，在那裏，就有共通發達的現象。

但雖謂之「共通發達的現象」，然據克尼士看來，那并非自然法則的因果的法則。我們所能說的東西，祇能限于依着種種國民之發達所作的一定之類似而已。至於經濟的現象，到底不能得有自然法則的正確因果的法則。

「在種種的土地和時代的國民經濟的關係及事實的比較上，若處置類似和相異是同等考察的現象及現象底法則的時候，則成爲問題的，并非同一的經濟現象，僅是「類似」而已。而其所獲得的也非因果的法則，僅是類似的法則。」

那末，所謂「類似」是什麼呢？這就是一種類似概念，不看見差別相，僅能從類似中抽出如同同一底部分來互相比較。又者，類似不僅爲個個的事物之比較，在一定的時間現象的比較上，還可以適用，同時又不僅限于其現象，即其原因力，也能適用。而且當爲經濟學知識的基礎的歷史的生活的研究的時候，要集積許多材料，而從中探求類似的東西。倘不從古代敘述到現代的國家的歷史的生活，

那經濟學決不能得到滿足的東西。

類似在這個意義上，有其輕薄的法則性。而且經濟學者的任務，最先必須究明其在經濟的現象之間所發生的正規的類似，然後才探求類似底法則。

如上面所說，在諸國民底經濟生活的發達之間雖存着「特殊的東西」和「類似的東西」，但却不是由這一面使他方面沒却的。特殊性是和類似相并存在的。

然而克尼士因為太過於主張經濟生活的特殊性，所以在事實上，即有些過火之感。他主張經濟學最初可從特殊性出發，因為它是經濟學的基礎。他懷疑普遍的抽象的價值，而澈底的敘述特殊性的重要。

如此，克尼士的經濟學，以「特殊的」「個別的東西」為最初底研究的基礎，所以探求「發展的法則」應從那裏出發。因為這樣，所以當然要採取「實證的方法」。

### 三

克尼士列舉出經濟生活中歷史的發展的兩個相異的要素：第一是物質的要素(Reale Factor)。第二是人格的要素(Personale Factor)。「經濟現象便是由這兩個相異的要素結合的結果」，前者是必

然的東西，後者是自由的東西。前者屬於物質的外部世界的現象，後者屬於人間底內部的精神生活。

自然現象乃在這個現實的要素的範圍內發生的。所以，「在自然科學中，被認為一般的自然法則，只要關於為獲得物質的感覺的知覺而研究本質的現象，它就一定被承認的。」然而經濟現象除現實的要素之外，更含有人格的要素。所以說明一切經濟現象的東西，決不是自然法則。

由經濟的事實所給與的研究對象中，除現實的要素之外，還包含着非物質的，感覺上不能把握的人格要素即人間底精神活動。所以自然法則，決不能說明關於此等現象的事情。

「經濟的現象底事實上的出現，乃依人間的能力乃表現在關聯于外部的自然的對象物，生產物，構成物上這樣的事情所限制。的確，它底發生，它底運動，皆必須受自然法則所規律，人間的能力決不能變動它，只不過能把它處理或領導。氣候及土地的生產力，流動的動力，蒸汽的爆發力等，它們各依自然法則以表現，如此，人間底有效力的事物，依自然所決定了的性質，永久的結合着，給人間使用。」但這並不是自然法則說明經濟現象，祇是經濟學的前提。

此個前提，從克尼士看來，便是所謂「經濟的事實的自然法則的要素」。在事實經濟現象之中，雖也有如此單純地從自然現象而成立的東西。只要人類有自由意志，則經濟行為，其結局，就必呈現出由這個自由意志導引出頗豐富的不規則性的變化無常的現象。自然法則對這種事情，決不能給與

什麼的說明。

所以，在這裏成爲問題的，便是自然法則這個東西，特別不是經濟學上的法則，它只不過是到處隨意行動的（所以即在人間底經濟的活動上也有同樣的作用）自然法則而已。經濟生活并非爲自然法則所支配，不過在經濟的活動上表現出的自然的法則而已。

又者，在經濟現象上關於其他的自然法則底妥當的場合，克尼士又這樣解說：「他們想以自然科學的方法，移到研究精神科學和歷史科學上去，其實屬於一切的科學的研究，并非自然科學中獨自的東西。」

事實上，所謂物質的要素的自然法則的因果關係，無論在什麼場所，什麼時候，於這原因的力量本質上，因爲不生出什麼變化，所以雖常是成爲同一的東西底存在，但精神的人格要素，雖到處都被人間底意思所作用，但常是從着時間及場所，而飽嘗變化的。所以其結果，自然必由它生出種種相異的原因的作用，生出差異的經濟的事實。經濟現象既已包含着這樣的自由的人格要素，所以自然法則決不能說明經濟現象。

那末，如經濟生活的諸現象一樣，所謂包含着物質的要素和人格的要素的妥當法則這個東西，又是什麼東西呢？從克尼士看來，這個便是同時說明內的精神作用和外的表現的法則，即是經濟法則，

這種「經濟法則，乃受人類歷史的經驗所領導的「發展的法則」」。

所謂發展的法則又是什麼呢？怎樣才能得到呢？克尼士說：「我們把國民科學當做一種科學看時，無疑的，那裏便有關於現象法則的事情。科學不僅是知識的集積。它是喚起事實和現象底原因之間的因果關係底認識的結合的東西，努力在研究底領域內所表現的現象內部確立法則。事實上，為確立法則計，即為樹立在經濟現象中可以看出的，可以承認的法則計，幾多的經濟學者，必須飽嘗一番的煩惱。」于是他主張依着歷史的實證的方法獲得他所說的「發展的法則」。

同一原因的結果，同一現象每現出反覆的事情，這在自然科學的領域內，不單是作為理論的研究，而且作為實際的現象而極被重要的。

然如在于經濟學的歷史的現象的科學裏面，理論上雖不反對，但實際上完全同一的現象並沒有反覆的事情，而且也不能預期那樣的事情。何以呢？因為惹起經濟現象底協動的因子的精神的人格的要素，并非如關於實在的物質而存在的恆常的原因力。

但同時在人間一切的生活和行動上，則可以立證有永久的且同一的某種東西的存在。何以呢？個個的人們，所以成爲人類之一員的，就是倚賴于這樣的東西，才得和其他的個人共同的結合。然而共同體因爲個人底特性爲其基礎，所以這樣永久的東西和同一的東西也在共同體中顯現出來。



這永久的和同一的東西，就在人們的經濟的行爲上，自然也被承認的。因爲只要它是精神的東西，人間的精神是其出處，如他底行動這樣的經濟的行動，也就依它而決定。

而且個個的人間，從出生以至死亡，無論肉體的，精神的，也和進步發展的一樣，人間的共同生活的有機體，也不斷的運動和發展。惟其所差異之點，在後者的場合，與其說數年後，不如說數十年後，數百年後，才可認識其變遷。并且，特定的國民和國家，其所不同的地方，就是不能規定着難于避免的死期。在這樣的國民生活的進化中，因爲也包含着經濟現象的領域，所以不能不認後者也是進步發達的東西。

然而如照我們所說的可以立證經濟的事實的合法則性，進步的法則，即，不能不變化爲狀態前提的法則，它不能不完成其他之任務。

此外還有一件事情。即，如前述的關於一切人間之人格的生活而存在的永久的東西之同一的東西，同時也不拒絕人間之人格的生活表現出特殊的差異。在內面的和外面的生活的領域內，所能認識種種現象的，就是存在這樣差別的結果。

但這個差別，在各國民經濟生活的領域內，雖也能被認識，然而對於全體之發達的行程，關於同一階級中各國民之發達，關於不同的場所的同一種類的現象，也可以認識的。

并且這樣的差異，即依如下之理由，也能表現出來的。即，經濟的現象，乃站在和國民性并國民之特殊的歷史的經驗大大可以影響及他們底生活基礎條件及發達有密切關係之間的。

據上述看來，如比較相異的國家，時代中國民經濟的狀態和行程時，這因為是研究一致和差異同時存在的現象和現象之法則，所以不能認為「同一的經濟現象」。僅可以認為「類似的經濟現象」。所以不能知道絕對同一的因果關係的法則，惟能認識類似的法則。

而且把這個類似之點從時間之經過看來，在那裏必發見「發展的法則」。

克尼士所說的「發展的法則」，正如上面所說的一樣，所以這個「發展的法則」，只有據歷史的，實證的研究方法才能把握之。而且如此法則的妥協性，也是相對的東西。即使它超越了它所依存的時間和空間之限制，它當然必遭逢着相異性。

如上面所說，據克尼士之意思，以為探求經濟學的法則，就是「發展的法則」，那個妥協性是相對的東西，不是不變的自然法則。他嚴密地解釋自然法則，認它為經濟學上求之不得的。

歷史學派的諸學者，彼此均不能明確地區別經濟學和經濟史，克尼士也莫不如此。

克尼士在他底經濟學第二版緒言中又這樣說：「解釋真實的方法論的意義為「經濟學的歷史的方法」，不外是無條件的認歷史的研究為這個學問唯一的任務。我們參攷歷史，雖急切地欲在其部分的

考慮的方法上建設立腳點，但我們決不能因之而使入忽略了經濟史和經濟學之差異，歷史家和經濟學者之差異。」他在某地方又說：「在經濟學者看來，歷史的觀察并非是從屬的東西，也不是單補助他底著作的補助的東西，却是他底最緊切的任務。」又說：「經濟學并非以概念的連結為學問的主要任務，也不是以普遍的公理為基礎，它底使命，乃在乎研究表現在外界的日常生活的對象的敘述。」總之，無論根據那一種的言論，對於克尼士的經濟史之立場，皆不容易決定的。

總之，克尼士原是要從經濟學的範圍，而區別經濟學史的。經濟學本身雖以「敘述事實」為目的，但在那個事實的背面，却暗裏希望有何種的體系。我們不能認經濟史之研究乃屬於經濟學理論之內容的。

歷史學派，自到斯莫拉止，極顯著地帶着倫理的色彩，人們對於這個學派，雖稱之為「歷史的倫理的學派」，但這樣的倫理的色彩的萌芽，在克尼士時候，已經確實地表現出來了。

克尼士以為經濟學也可以充當倫理的政治的科學。他說：「站在歷史的立場上的精緻的洞察的經濟學，必要提高經濟學達到倫理的經濟學，政治的科學。經濟學有人間底心理的研究和國民生活的歷史的探求，直接地認識如下之事情。即，經濟的生活和創造，有決定實際國民的全體的生活的密切關係。其結果，前者無論什麼地方，常常占着它底應有的部分的地位，為協助全體之最高的職責，并

且如不是倫理的東西，那它就不能夠長久的存在。要努力完成倫理的及政治的事情，就是規定國民的存在和國民之發達的一切的職能的各個生活力。自然，在整個的生活的領域中，隨應着經濟的行爲的部分的地位，是因為時代的不同，所以個個的人間，和對於整個的國民，也互不相同。然而這件事，在經濟的理論上，乃成爲立證倫理的政治的要素底重要的東西。」

「人們關於決定自由意志的實際的範圍，心中有精神的自覺的事情，這縱令是不可爭的事情，但結果也是難于阻止的。我們對於歷史生活的發展，除人間之自由的行爲之外，雖不能不認識必然的發展，但是，反之在經濟生活之現象的領域內，除自然法則的行程底因果關係之外，還有依存于倫理的人間，自由的目的底因果關係，這是不能否認的。」

## 第十八章 講壇社會主義

### 一

如上面所說，浪漫主義，社會主義，里思特之經濟學，舊歷史派的羅西亞，希爾德布郎，克尼士等，都是批評古典經濟學之自由主義的。但吸收古典學派底唾涎的自由主義，跟着產業的發達，愈益確立了鞏固的基礎。然而和自由主義底正反對的社會主義，同時也漸次增大其思想的和實際的勢力。但如前面所說，德意志負擔着和先進資本主義國互相競爭的重甌。

舊歷史學派痛感自己國家和先進資本主義國間之競爭的不利，所以由各國的經濟生活的發展有其特殊性的歷史的認識這方面，而否定自由競爭，因而否定自由貿易主義的普遍性。但因為國內大工業發達的結果，在一方面，資本遂被集積，在他方面，普羅列塔利亞也愈增加。在這兩者對立鬥爭中，德意志已經看見英吉利，法蘭西兩國的先例了。何以呢，因為「產業比較發達的國家，對於產業比較幼稚的國家，只不過是預示着將來的狀態」(馬克思)。所以德意志勞資的對立，其進行比較急速。

助長德意志和各先進資本主義國的競爭以及內部深刻的勞資的抗爭的，便是一八六六年的普奧戰爭及一八七〇—七一年的普法戰爭（特別是後者）。恩格斯說：「當一八七二年那時恰恰有數十億法蘭西價金，如雨水般流入德意志。償還國家的債務，建設要塞和兵營，新製武器和現存的軍用品。得自由使用的資本，無異于突然流通貨幣額一樣，也顯著的增加起來。那時候，這種事情，不但使德意志成爲「統一國」，而且使其成爲一個大工業國，使其躋入世界的舞台當中。這數十億的金圓，對於新興的工業，得着一個巨大的長足的發展。然而同時這些金圓，最後還釀成那充滿着一八七三年至七四年的短期幻想底繁榮時期中的大恐慌。德意志由這次的恐慌，已證明自身能夠在世界市場中活躍的工業國。」

前面已經說過，德意志之所以能達到這個情狀，自然不是突然的事情。這個事情，照上面所說，雖已明白，但我們還要總括着再舉一例即交通的發達這件事情來解說之。

在一八三五年的時候，被敷設的鐵路，只不過六啓羅米突，但到了一八七〇年，已經達到一八五六〇啓羅米突了。這個交通機關的變化，乃促進他的交通機關底發達。即改良陸道和水路，以蒸汽船替代帆船和小艇，應用在三十年代尚未實用的電信，改良郵政制度，增大日刊新聞。如此，交通和電信的發達，成爲產業發達的基礎，並且刺激其發達。

在這種種的基礎的事實之下，而接受一八七〇年至七一年的戰爭和價金。改革貨幣制度爲金本位制度；軍備的擴張，信用的增大，釀成流通貨幣額的膨脹；物價底騰貴，招來好景氣。我們現在由股份公司設立的狀況而表示出當時的經濟狀態來。當時的德意志因爲經濟狀態的變化，股份公司的設立，或改組爲股份公司的組織，也非常旺盛。單在柏林一市，于一八七二年，設立一六七間股份公司，其資本金總額爲二一一，四四七，〇〇〇圓。據格拉考的報告，在一八七〇年至七三年間，德意志全國已經設立了約有一三〇〇間股份公司了。一七九〇年至一八六七年間，在布羅伊森，設立了二二五間股份公司，一八六七至七〇年，又設立了五四間，一八七〇年六月十一日的法律通過後，又設立了三四間，一八七一年爲二五九間，一八七二年則爲五〇四間。在一八七二年，股份公司的資本金，已經達一，五二一，三五四，五二七馬克。我們只看表現在以上的外面的數字，就可以想像當時德意志的經濟生活，是如何飛躍的發展了。

所以我們不能不說這個經濟思想爲適應當時底狀態的，自然發生的思想。所以這個當然底歸結的新經濟思想，乃關於當時得到經濟發展的効果極少的勞働者階級的狀態，這也是自然的現象。但這個新思想，一面反對自由主義，一面又反對社會主義。我想，只要我們研究這種新思想反對這兩者的言論，便可以知道這種新思想發生的由來。這個新思想，就是代表德意志國家底統一的經濟的方面的思

想。換句話說，即為德意志資本主義底健全的發展的思想。這件事，由下面敘述這個新思想底內容的時候就能明瞭。

## 二

由經濟生活的發展，而生出經濟思想的新發展。新經濟思想，漸漸由書齋和研究室中生長茂盛起來，經濟上的發展，已經不能再幽閉這思想於研究室內了。而新思想家們，遂出現於街頭之上，而從事于理論的鬥爭了。他們第一着的鬥爭，就是實行和經濟的自由主義的鬥爭。

這時候，他們已解決了一般人對於自由競爭原理廣大範圍的適用能否增進國民經濟全體的幸福之疑問，已經否定了這個適用不能增進全體的幸福了。大多數的年青的經濟學者，為宣佈這個思想，都跑到街頭來。在一八七一年出版的布靈達諾底「現時勞働者組合」（*Die Arbeitergilden der Gegenwart. I Bde 1871—1872*）的第一卷，斯莫拉的「十九世紀德意志工業史論」（*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leingewerbe im 19. Jahrhundert. 1870*），已經喚起世間的注意。在接到「巴黎公社」暴動報告的時候，布靈達諾又發表了他的演講「勞銀理論」，一週間後，遜堡（*Gustav Schonberg*）教授又發表其關於設置勞働局的就任當時演講稿。他們的意旨，皆被當時目為社會主義的。



爲拉薩爾底朋友的遜堡，他在就任演講 (Schönberg, *Arbeitsamter, eine Aufgabe des deutschen Reichs*. 1871) 中，嘗這樣說：社會主義者乃指摘出整個的經濟及社會生活底背面的暗影，反抗自由主義者。並且說：我們不但主張分配生產，而且還要達到分配生產物的問題。闡明國民經濟共同的原理和對於社會全體道德義務而提高社會主義的價值的遜堡，則以爲社會主義的實際政策沒有價值，以爲這個政策乃由幻想而出發的自由主義，雖能影響于經濟生活，但倘固執這個主義，恐怕必引起不能補救的社會革命。然無論如何，那一定沒有萬能快樂的存在。所以我們對於這件事，不能不調查其特殊的狀態。可是倘如我們沒有國家的援助，是決不能排除一部分的社會弊害的。這件事情，祇要國家的援助，社會的扶助，個人的自助，才能互相補救。但國家的政策關於制定實際的及社會的狀態却非常之少，一方面多數有智識者，又忽略勞働組合運動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異同，而挑撥兩者間的鬥爭。所以遜堡乃提倡設立勞働局，研究真實的狀態，研究排除惡劣的策略。且並他還力說改良租稅制度，制定標準勞働日，分配利潤等多數的事項。并主張在實行的時候，有和國際底協調的必要。

這個演講遂成爲世人注意之的了。特別是自由黨的支持者，對於這個演講，異常怒恨。並且於一八七一年阿托夫·華克拿 (Adolf Wagner) 更在柏林的「卡爾尼遜教會」演講的時候，便公然開始鬥爭起來了。

華克拿在其演講「社會問題」(Adolf Wagner, Rede über die Soziale Frage, Separatabdruck aus den Verhandlungen Kirchlichen Oktoberversammlung in Berlin. 1873)中，反對單考慮最大生產的可能性的，委任其他事情於自然法則的調和的，如人們所希望的一樣，以為一切之所以不成功皆因為自由底實現不完全的曼切斯達學派樂觀的利己主義。華克拿憤激地說：社會的罪惡，決不是自然法則上必然的不變的，我為矯正這個弊端起見，才喚起諸君之義務感，喚起諸君底良心。倘如諸君能早日實行諸君的責務，就是倘如諸君能在那裏看出諸君底利益，不滿足對於勞働行為支給僅少的報酬，顧慮到勞働者得到人間性的生活，那末，社會民主主義即不至於發達罷。即不至於有憎惡階級的概念罷。在勞働和資本之間，富者和貧者之間，也不至於有情感的對立吧。新經濟學這個東西，同時就是倫理學。新經濟學不單處置事實，而且處置理想。新經濟學者，給與勝利的援助。社會民主主義雖越過幾多的空想和憎惡，而和要求的程度相結合。但其中發見出深刻的社會的害惡，而使英吉利派學者的樂觀主義的雲霧消失，所以我們不能不承認那喚起義務感情上的貢獻者的功積。在這點，新經濟學原是和社會民主主義一致的。新經濟學以為經濟的過程就是人間理解。並且以為財富只是一種信託財，不單為自己底幸福，同時還須為同胞底幸福而管理之。這件事雖被曼切斯達學派所忘掉了，但新經濟學則教給人們。所以諸君不應盲目地追隨曼切斯達的旗幟，不應服從社會主義的領導。

華克拿這個演講，也可以說是自由主義對社會改良主義底理論鬥爭的最初的砲火。兩者對立，自此以後，愈益激烈起來了。

十二月十七日之 *Nationalzeitung* 遂揭出奧屏漢 (Oppenheim) 所草成的一曼切斯達學派和講壇社會主義 (Manchester Schule und Kathedersozialismus) 的一文。奧屏漢乃屬於國民自由黨的自由主義者。這篇論文，是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上，而批評新經濟學的。他在這裏所以使用「講壇社會主義」的述語，乃為表現出在經濟學上的新傾向，所以惹起人們的注意。在奧屏漢，他之使用這個名稱，原來是作為講壇學者迂遠的意思，如下面所說，雖然一般人對於這件事有多少的抗議，但一般年青的經濟學者，却受接了這個嘲笑的表现，而成爲普通的名稱。所謂講壇社會主義，乃因爲在解決社會問題的時候，主張要求國家援助的組織者爲社會主義者——如此見解，支配着大學的講壇，所以便名之爲講壇社會主義。

奧屏漢這篇論文的主張，雖然不如他們之絕對否定國家干涉經濟生活，但他們在某場合，關於社會的貧困的問題，也並不一定要國家權力的發動。例如斯莫拉說：對於手工業底沒落，若需要國家底政策的保護，就可以使國家來援助它。然而在那場合，我們即不能不考慮人格的自由和財產的範圍了。就是國家的救濟手段，不能不和這個根本原理相調和。但青年的教授們，對於什麼是實際的

最善的政策這件事，沒有根本的研究，只以為國家的救濟，社會的救濟，是當然的事情。如斯莫拉，也以為協同組合，原是慢性底發展的東西，所以他對於此，幻想國家的援助。又如遜堡完全沒有根據的，却禮讚罷工和勞働組合。尤其是要依着遜堡之通商條約或類似這條約的外交條約而國際的規定勞働者的工銀及生活條件的一派，正無異于一般創設世界貨幣的這種平凡之思考的幻想。這個就是奧屏漢的立場。

在奧屏漢底文章未發表的前數日，「布列斯拉報」即揭載一篇「大學與國民經濟」[Die Universitäten und Volkswirtschaft]的論文，攻擊這班青年教授。這篇文章的大意是：這些教授們，為社會主義的思想所感染，要煽動將來的行政官和教師的青年。甚至要求以自由主義者，齊比亞，什切杜列治，歐根·利希塔等有能者來替代他們。

世間一般新聞報紙的立場，大約皆類似這樣的論調。所以他們要把自己的意見，在報紙上發表，是極困難的。例如布靈達諾，對於遜堡及華克拿底攻擊，非常憤慨，雖寫成一抽象的現實的經濟學者」(Abstnackte und realistische Volkswirte)的一文，但皆被柏林各報館拒絕登載。最後他只依賴「漢堡通信」(Hamburger Correspondenten)的編輯埃加爾特博士(Dr. Julius Eckardt)為他發表。因此，「漢堡通信」于數年之間，便成為講壇社會主義的機關報了。

布靈達諾在這篇論文中，非難攻擊他們的反對者，根據「講壇社會主義」的一語，認他們為放火的主犯，認他們為反對私有財產的，企圖革命現在社會的夢想的社會主義者，把對於社會主義的憎惡而加諸他們的態度。從布靈達諾看來，德意志自由貿易主義者的政治思想和曼切斯達學派沒有區別。然而奧屏漢和布靈達諾等思想差異的地方，就是這個方法。其初在第二的意義上，乃由這個方法歸結的國家使命的思想不同。奧屏漢及其他同志，雖然完全誤解斯密斯，但如布靈達諾一派的實現的經濟學者，却學習斯密斯，而且承認斯密斯的學說。斯密斯對於當時的英吉利的狀態所說的話，正是真理。而且斯密斯學派者，更使他底學說普遍化起來，當作永遠的真理。斯密斯未嘗不顧國民全體狀態關係的國民生活經濟的要素。現實的經濟學者，皆復歸到斯密斯的方法，即要求研究現實的狀態。而且恰如斯密斯在百年前所行的一樣，努力由經驗中抽出結論，由實際生活的要求而設立其要求的基礎。就其他的關係中，我們也是斯密斯的子孫。我們由現代的國家觀出發。並且這個國家觀更顧慮到經濟問題的倫理方面的要求。第十八世紀末葉假定人間的自然的平等的行為，也是由斯密斯的思想中抽出來的東西。但自由主義者却把這思想為自己的東西，拒絕無條件的在實際生活上應用這思想，反對講壇社會主義者的意見。我們對於一切國家的援助，毫無躊躇的贊成。惟這種策略，並不如自由主義底自助的唯一的根本原理。我們對於這件事，必須依其時間性質如何而決定。自由主義者，尙未理

解我們的策略。我們所研究的，倘和他們之理論相一致，那末，我們就沒有研究他們底理論的必要了罷。如他們的理論，和我們的研究不同的話，那是說明他們底誤謬的了。

這就是布靈達諾對奧屏漢的反駁。奧屏漢對於這反駁，立即從自由主義的立場，和布靈達諾論戰。關於勞働問題和勞働組合的兩者的立場，在「漢堡通信」上，經過幾回的混戰。這種論戰，尙繼續着。奧屏漢膏和一切社會改良主義者筆戰。而反對者對於他底小冊「講壇社會主義」(Der Kathedersozialismus 1872)的批評，更爲猛烈。但如前所說，在這論爭的過程上，自由主義者和「德意志經濟學者會議」互相結合，聚集新經濟學者于一堂，而互相論議的機會更加成熟了。

### 三

新經濟思想和自由主義者之理論鬥爭，使其感到必要有一新的結合，而對抗自由主義者有「德意志經濟學者會議」的集團。團結就是力量。他們底目的，乃在乎組織強力的結合，以對抗「德意志經濟學者會議」，而且要在理論上實際上，使信仰的講壇社會主義的思想，高登支配的地位。他們計劃由柏林的華克拿教授及漢堡的埃加爾特博士提議組織這個結合，由挨挪的希爾德布郎和哈勒的康喇召集會議。這次的會議，乃於一八七二年七月在哈勒舉行。參加者有羅西亞，燕格爾(Engel)，希爾德

布郎，華克拿，康喇 (Johannesconrad)，古挪夫 (Georg Friedrich Knopp)，布靈達諾，挨加爾特，斯莫拉，密賀夫，梅亞 (Mayer)，曼西子，特倫堡，非庭克，(H. Fitting)，赫爾德夫等，而議長則爲希爾德布郎。并議決每年招集社會問題討論會一次。這一年十月的第一次集會，乃特別會議，由委員會招集之。這個會議，乃負有爲人類幸福底社會政策的使命，所以當時參加者皆慎重地顧慮到這一點。而且多數的報紙，也被邀參加會議。

一八七三年十月六日在伊牙納圭開第一次會議。出席者百五十九名，其大部份均是熱心贊助社會政策者。最先由斯莫拉致開會辭。斯莫拉這次的演講，可看做講壇社會主義底原理的宣言。如下面所說，講壇社會主義對於社會改良的實際的策略，雖沒有一致的理論，但講壇社會主義的原理，在斯莫拉的開會辭中，已經簡單明瞭地說出了。我們現在譯出其重要部分如次：

「他們(大學中的經濟，歷史，法律科學的教授，而且是屬於這次會議的委員者)，一致信奉一個國家觀。這個不但和讚美個人及其意慾的自然法則不同，同時還和蠶食一切的國家權力之絕對主義的理論不同。他們把國家置在歷史的生成的潮流之中，認國家的使命乃隨着文化狀態的程度如何而變化，有時狹小，有時廣大。他們雖如自然法論及曼切斯達學派一般，看國家爲必然的，但却不認國家爲務須加以限制的東西。他們以爲國家是教育人類的偉大的道義的制度。而且他們不喜歡把立憲制

度，委給種種互相鬥爭的經濟階級所轉變的階級的支配。他們歡喜那種超越利己的階級的利益，行公正的法律和行政，保護弱者，使下層階級向上起來的鞏固的國家權力。我們在布羅伊森的宣傳與國王爲法律的和平，爲克服上層階級的一切的特權，爲下層階級的解放和向上而戰的，得到勝利的二百年的鬥爭中，發見了我們決不信仰德意志國家的最良的相續物。

「我們對於判斷經濟狀態，決不如他們之否定技術和生產，商業和交通上的現代的光輝的空前的進步。然而他們却公然認爲深刻的弊害的東西。這個就是所得及財產繼續增加的不平等，不適當的行動，商業上各個部分底共同的缺乏，粗野和放肆。並且這粗野和放肆，是作爲一般的原因的結果，而遞增的表現在下層階級的一部分中。他們認爲這件事的主要原因是由下面的事情生出來的。即，近代的人們，在一切的分勞進步的場合，新設一切的經營，設施實業，訂立勞働契約，及關於這諸種事情底立法的新設施的場合，對於成爲問題的即如靠這些事情而瞬間能否增加生產？這些新組織，能對於沒有這個而不能成立的社會給與道德要素作用的要點？這個能否充分的教育青年們？能否使成年者跟着勤勉，節儉，名譽，家族生活中所作用的，經濟的進步而進步等等的問題，却置諸不顧。他們所確言的，乃是忽略了經濟組織形態和一民族全道德的狀態間之心理的關係爲惡害的中心點，并改良的基點乃這關係之認識。



「他們關於勞働者問題的判斷，也是以這個見解爲基礎的。他們認爲勞働者所穿的衣服，當然較現在爲好，所得的食物，當然更佳，在今日恐怕已不如過去數世紀勞働者餓死的不勝其數。然而這事，在他們，決不是重大的慰藉。他們底最重要的問題，還是現在多數的勞働者生活的生活條件，能否促進他們底道德的及經濟的進步。可是他們却以爲大多數勞働者計，必須否定那個事情。他們以爲大多數的勞働者和所有階級，智識階級之激烈的對立，並非是經濟狀態的對立，却是情感，教養，思想及理想上的罅隙，是危險的東西。他們每追憶歷史上的陳迹即有如希臘，羅馬，及其他諸國民高尚的文化的國家間之類似的對立，并因社會階級鬥爭及革命也不能調和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間的衝突而自行崩壞瓦解等事情。例如（雖然是將來的事情），他們對於我們底文化每認爲是同樣的危險。倘如在現代所努力的法律的平等，普通教育及兵役義務的基礎並一切改良的基礎之上，可以使廣大的下層階級向上起來，受教育起來，和睦起來，使他們成爲調和，平和的社會並國家的有機體的一員，那麼，對於我們的文化，當然可以說有危險的。

「在社會主義意義的標準化，不是我們底社會的理想。我們以爲有種種生活底階段的等級，並且以爲容易由一階級移到他階級的社會是很正常的，是很健全的。然而現在的社會，正無異于上下各趨極端的，而中段又被破壞了的，祇存在上段和下段的腳板的一條危險的梯子。

「我們雖然不滿意于現社會的諸關係，痛感着有改良的必要，但我們不能說變革一切科學，打破一切現存的諸關係。我們反對一切社會主義的實驗。我們知道歷史的進步是涉及數世紀底勞作的結果。我們更知道現存的東西，對於新的東西有一種幾乎不能戰勝的強烈的抵抗力。何以呢？因為現存的東西，在大眾的確信和習慣上，有其基礎。我們在一切的方面，承認現存的東西，即改革經濟的立法，現生產形態，種種社會階級現存的教養并心理的狀態的基礎，為我們活動的出發點。我們不但只有這個認識，而且毫無躊躇地要把它來改良。我們決不躊躇為改善狀態而戰。我們雖不以為應該廢止自由營業和貨銀制度，但我們却默認它有最大的弊害，我們也不喜歡以空論的原理使之增大。我們慎重地，確實地要求施行工場的立法。我們要求不釀成搾取勞動者的勞働契約。我們要求當締結勞働契約的時候給與勞動者完全的自由。自然，在這個場合應該提出類似舊時組合制度的要求，但我們要求「自由」無論在什麼地方，應該受公眾所統制。並且在事實上公眾不存在的場合，要求宣佈研究國家，並非陷在企業中的結果。我們從這個立場而要求工場監督官，銀行及保險監督局。我們從這個見地而要求調查關於社會問題。但我們並非因為國家實驗的錯誤而要求供給金錢與下層階級。我們只求國家不應效法既往，應為下層階級之教育及教養而努力。我們要求國家必須顧慮到勞働者階級是否仍然處在壓迫的狀態及勞働條件之下生活的事情。

「我們不但否定財產和所謂分配極端的不平等，否定深刻激烈的階級鬥爭，還否定自由政治的制度。并且我們相信，怕會再齋來絕對主義的政府的危險。所以我們又相信，國家同時並不能跟着這樣的發展而發展。」

「我們要求國家，要求社會，要求為時代底使命努力的個人，應有這個大思想。這個理想，除開使我國大部分的國民，參加高價的文化財，參加教養和幸福之外，別沒有什麼。若在最善底術語的意義上說，那就是世界一般大目的，就是我們的，發展的，民主主義的使命。」

以上就是斯莫拉底演講的主要部分。在這篇演講中，我們已經明瞭講壇社會主義的目的及其階級的基礎了。講壇社會主義在一方面和自由主義對立，他方面又和社會主義對立。這件事，表示出經濟落後的德意志的社會的基礎。這個演講終了後，接着公推克奈斯為議長，進而討論各種提案。這個第一回會議，所討論的問題有三種。第一為工場法，第二為罷工和勞働組合，第三為住宅的問題。在關於這三個問題的報告終了後，接着便是普通討論和特別討論。但照這個會議的性質上看來，根本沒有關於這些問題決議的可能，所以最後只照會議中的報告及討論的記錄，宣佈出來。這次伊牙納圭的會議，捲起巨大的反響。這個會議對於政府，報界及公衆的影響更利害。現在「自反對派以至民主主義的極左翼」，均認識講壇社會主義之存在，有的更公然拍掌以歡送之。普魯士政府對於這會議所表現

的思想，完全表示贊成，便是公衆對於德意志勞働者狀態的關懷，也是被這個會議喚醒的。伊牙納圭的「社會政策協會」(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 爲第一回大會，收穫空前的大成功。以後「社會政策協會」在德意志思想界中遂占着鞏固的地位。它底主要的活動，乃在調查研究和討論，年青而活潑的教授們，其研究尤爲可觀。在今日，雖然處在稍形衰退的狀態；過去數百冊多的各種經濟問題，其主要的雖然是研究勞働問題，但在調查精密的這一點，已是很有價值的學問了。

## 第十九章 新歷史學派之方法論

### 一

講壇社會主義的主張者，也可以說是羅西亞，希爾德布郎，克尼士的後繼者。舊歷史學派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對於古典經濟學以利己心為中心的絕對主義，給與痛烈的批評，極力指摘經濟生活中歷史的及倫理的要素的重要性。如前章所說，講壇社會主義者，也由這個見地，而觀察社會問題。但他們和舊歷史學派不同，因為他們所觀察的中心點，係偏重於社會問題。這其間的事情，在前節已經說過，乃由于德意志底經濟的發展和因此而生的社會的運動。講壇社會主義者，在觀察社會問題的時侯，也不會忽略了其歷史性和倫理的重要。他們的立場，在歷史主義這一點，雖好像當時的社會主義的，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但馬克思主義乃觀察整個的生產關係，反之，他們在認識社會現象的互相作用，特別是在社會現象中的倫理的重要性這一點，却和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完全不同。

在經濟上，他們的立場，也是歷史的相對主義，偏重於倫理方面。舊歷史學派，和他們雖處在同

一的立場即歷史的相對主義的立場，但其研究態度，則有多少相異。舊歷史學派的意義，是高唱經濟學中歷史的方法，由歷史的方法，觀察經濟現象，但他們還未嘗獲得高深的經濟史的知識。自然，屬於舊歷史學派的人們，雖然從事于歷史的研究。比如他們關於經濟原理的著作，也包含着豐富的歷史的知識。然而那不過是某程度的歷史的考察，決不能稱為專門的研究。而且他們研究歷史，主要的多是現出學說史的研究。比如希爾德布郎的「現在及將來的經濟學」，羅西亞底「十六七兩世紀英吉利經濟學史論」(Zur Geschichte der englischen Volkswirtschaftslehre im sechzehnten und siebzehnten Jahrhundert. 1815)與「德意志經濟學史」(Geschichte der National-Oekonomie in Deutschland 1847)，即在現在，也應尊重的經濟學史書。這些著作，大概因為他們乃提倡新經濟學的人，要批評前代的經濟學，必須發表意見，所以才編述出來的。如把這樣的學史的研究，做比較的批判，則可以說，他們底經濟的研究，很是幼稚的。

新歷史學派的領袖莫拉，在這一點，嘗發見新舊兩歷史學派的差異。據他看來，舊歷史學派的缺陷，在急進地理論的利用歷史的研究的結果。要經濟的，社會政治的理解歷史，充分地經驗的建設經濟學理論，必須用非常的努力，特別的研究經濟史。所以特別的研究經濟史，便是經濟學歷史的基礎不可缺少的前提，必要這樣，才能形成經濟學的新時代。這雖是莫拉的主張，但新歷史學派外觀的

特徵，則在乎發表此經濟史的特殊研究。現在舉出新歷史學派經濟特殊研究的主著如下：

Schmoller, Zur Geschichte der Kleinen Gewerbe im 19. Jahrhundert. 1870.

Schmoller, Strassburger Tucher- und Weberzunft. 1878.

Brentano, Arbeitergilden der Gegenwart. 2 Bde 1871—72.

W. Stieda, Entstehung des deutschen Zunftwesens. 1872.

G. Schanz, Englische Handelspolitik im Mittelalter 1881.

G. Schönberg, Finanzverhältnis der Stadt Basel im 14. und 15. Jahrhundert. 1879.

K. Bücher, Bevölkerung von Fran Kfurt am Main im 14. und 15. Jahrhundert. 1886.

G. Knapp, Bauernbefreiung und Ursprung der Landarbeiter. 1887.

E. Gothein,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Schwarzwaldes. 1892.

新歷史學派的態度，在乎歷史的研究經濟現象，即以真的歷史的態度，對付經驗的現實的史料，而且要把由這樣所得的歷史的材料，應用到經濟學上去。這就是他們的態度。但如批評家所指摘，他們這種態度，祇是以經濟史的研究，而作為經濟學的研究的場合居多。

## 二

斯莫拉爲新歷史學派的領袖，所以新歷史學派底經濟學的根本概念，也可說是由他而規定的。但斯莫拉在種種的場合，也公佈他的經濟學論。其發表最早的，恐怕是批評脫勒士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於一八七四年在「布羅伊森年報」上揭載的「社會主義與其反對者」〔Der Socialismus und seine Gegner〕中關於社會問題，社會民主主義，并振撼當時德意志經濟學的科學，實際的論爭底見解的那本書吧。脫勒士克最初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爲政治活動的大學講師，但自普法戰爭後，遂改變宗旨，成爲一個熱心國家主義者，成爲布羅伊森國家的忠僕。批評脫勒士克的這本書，是非常冗長的。這本書名，就叫做「關於法律及經濟的幾個根本問題而給與脫勒士克的公開狀」（Über einige Grundfragen des Rechts und der Volkswirtschaft Ein offenes Sendschreiben an Herrn Professor Dr. Heinrich von Treitschke. 1874—75.）。

斯莫拉之最強調的地方，便是對於倫理見解的重要性。從來普通所謂國民經濟，是指爲其經濟在國土這個自然的地理的制限之下所經營的東西。特別是舊歷史學派以爲經濟和國家是最密切不離的東西。然而在事實上，一經濟的範圍，有時却超越國家的境界，通過數個國家，而經營同一性質底經營



的場合，有時就在同一的國家內，而因地方的情形，生出其經濟的特殊性。所以經濟現象所表現的主要底特殊性的原因，決不能叫做領土的自然現象。其真正的原因是依着言語，歷史，倫理，道德，情感及其他的成爲觀念的共通性。如此，文化現象的特異性，又使其發生出經濟的特異性。而且稱爲文化現象的特異性即叫做倫理的見解。這倫理的見解就在顧客，同業者，勞働者等等的場合也是同一的，這種種的關係並非係單純經濟的關係，在那裏面還存有倫理的見解的大作用。並且斯莫拉乃深信進步，因而乃由倫理的自由概念出發，達到正當的分配的原理，即改良社會并社會政策，以之作爲經濟學最重要的部分。

斯莫拉的經濟學方法論，在如次之三種著作中，表現出它底發展過程。第一是他就任柏林大學校長時的演講「國家學及社會科學範圍中所轉變的理論和確固的真理及現在德意志經濟學」(Wechselnde Theorien und feststehende Wahrheiten im Gebiete der Staats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die heutig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slehre. 1897)。第二是投稿於康喇的「國家學辭典」的「國民經濟，國民經濟學及其方法」(Die Volkswirtschaft, die Volkswirtschaftslehre und ihre Methode. 1893)第三是他底「經濟學原論」(Grundriss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1908)。可是這裏沒有一般敘述的必要，所以，我們現在只略觀察比較上屬於後期的作品。寄給康喇之「國家學辭典」之論文，是一八九三年寫

的，在第三版，斯莫拉自身嘗做過最後的修改。所以這篇論文極能完全地表現出他的立場。

若要正當地理解斯莫拉的方法，我們即不能不由他底國民經濟概念而出發。「我們在國民經濟中，就能認識一國民的經濟；爲的全體和一國民的經濟的社會的設施制度的統一的組織。我們不管這個組織是否一個部分的獨立性，只要它被統一的中心的及物質的原因所支配，就可看做統一的實體的全體。即，只要全體的部分乃立在極密切的交互作用上，及其中中央機關把那些得而證明的作用，送達於一切部分，這個我們就看做統一的實體的全體。在我們的觀念中，部分不絕的變化，在本質上雖是永久不變化，但只要我們在同一制度的發展之下，理解同一國民經濟的一切變化，則那個組織，就如一切他的個人的存在一樣，可以看做一切國民經濟的全現象。」但據斯莫拉，國民經濟學，在一方面，則處在應用的自然科學，工學，機械學，森林學，人類學，土俗學，氣象學，一般及特殊植物學，動物地理學之中間，在他方面，則處在最重要的精神科學，心理學，倫理學，國家學，法學，社會學之中間，何以呢？因爲國民經濟是人間一個自然的構成物，同時又是繼續感覺，思惟，行爲，被組織成的社會文化的構成物。

斯莫拉把國民經濟學分爲一般經濟學及特殊經濟學二部門。「現在一般經濟學，在我所理解的，只是一個哲學的社會學性質的東西，它是由社會的本質和經濟生活並經濟行爲的一般的原因出發

而靜的並動的敘述典型的機關，運動，並最重要的設施。經濟學乃由我們認識不完全的斷片方面，體系原理的構成爲一個全體。經濟學乃由一般的東西進達特殊的東西，以特殊的東西當做真理的說明。而且經濟學要在與其窮極的社會的原因之關聯上觀察全經濟的現象這一點，頗接近於倫理的及歷史哲學的研究。

據斯莫拉，乃從着經濟學的個個的部分而考察種種的方法。第一就是歷史及歷史的方法的意義。歷史的研究對經濟學有什麼意義呢？斯莫拉自己答說：「歷史的經驗材料，如一切妥當的觀察與記述一樣，確實證明理論的命題，指示特定的真理的妥當的界限，而且歸納的獲得新的真理之上，是很有効用的。同時在國民經濟學複雜的範圍內，祇是在歷史研究之基礎上，才能進步。例如關於機械使用底貨幣的作用，貴金屬生產底貨幣價值的作用，都是抽象的議論，所以沒有價值。這件事，如是關於國民經濟的設施和理論的發展，而且是關於一般的經濟進步的問題，那是妥當的。」如此，經濟學的研究對於歷史的意義雖然重大，但非唯一的研究方法。加之，斯莫拉還高唱歷史對經濟學只是補助手段的論調。歷史對於國民經濟學一般理論的關係并合法則性，實給與廣大而且嚴密的基礎。在這一點，歷史學派是很錯誤的。因爲他們太過於急速地，普遍地突進了。

歷史的觀察法，特別是要使利己的交換經濟之自然觀念終絕起來。「歷史的方法原是要使經濟學

的研究和道德，法律，國家，並文化發展一般原因發生正確的關係。即指示出由個人及利己心發出的結論之外，復教人們研究集團現象。並且於分析之外，復教人們把正確綜合問題。由指示人們處置孤立的抽象的結果作為再相關係的全體的部分的內容，才正當的補充孤立的抽象。於是乎蒼白的抽象和枯死的形式的東西，才再有鮮血和生命。」

為達到一般的理論，除歸納的方法之外，復有演繹法的必要。然而經濟學在其演繹法中，更不可為古典經濟學的衝動，即不可由利己心出發而陷於淺薄的理論。可是這又不能不有多數根本的心理的基礎。但在經濟學中應用演繹法之程度底如何的問題，祇是由受心理學底援助的範圍如何而決定。而且在這裏成為問題的，乃是在一方，把經濟生活的物理的及有機的原因，當做二個獨立的集團看，首先觀察各個原因底本身，其次觀察兩者底互相作用。前者是機械的作用，後者是隨着心的動機底法則而作用，但在二個的場合，我們即不能不嚴密地想定其因果性。斯莫拉所視為最重要的是經濟學的心理學的基礎，他常常強調經濟學底心理學的研究法的重要性。斯莫拉以全經濟學生活歸于一定的人間的衝動。而且他為要知道什麼是一般的經濟行為的原動力，而研究心理及歷史。他和混特（Wilhelm Wundt 1832—1920）及第爾曼（Wilhelm Dilthey 1833—1911）一樣，指示出對經濟學底進步的記述，及分析心理學的必要。

「我們一定要明白地分析在社會中心理的過程，即一定範圍內底一致的情感，觀念，行爲的傾向，使有成立精神的集團的可能性的言語，著作，及其他的心理的手段的作用。而且集團力的研究，能誘導理解社會的集團現象。何以呢？因爲由個個的人類，民族，階級，及在社會成員底內部的情感，衝動，努力意見的一致，而成立社會的及國家的制度。」自然，爲這個目的的原故，更不能不深刻的研究個人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

斯莫拉主張經濟學，不止是心理學的科學，而且是倫理學的科學。所以，斯莫拉稱自己所傾向的經濟學爲「歷史的倫理的學派」(die historisch-ethische Schule)。斯莫拉在如次之一點中求新舊兩歷史學派底對立的特徵。即，舊歷史學派乃研究經濟現象的自然的技術，新歷史學派則探究由一民族底心理的道德生活所發生的原因。這是目的論觀察方法，自然的研究者完全缺乏了它，但在其他的科學，特別是精神科學中，它雖然尚屬於未發達的狀態，然而它却占着一重要的地位。就中如善，真，正義底道德的理念，皆是屬於它的。它是由世界全體並正確的世界指導者的觀念，和正確的慾望感情並被非難排斥的情感的結合而長成的，到了今日，已成爲我們底個人的和社會的行動的規制者了。進步和完成的理念，雖是個人的自由，氏族，民族，自治體及國家底向上的前提，但它正如道德並一切法律的規走，一切道德並政治的體系一樣，是事物關係廣大的見解，是不能分離的人間理性統一衝動

複雜的結果。

在這個場合，斯莫拉，嘗假定了一切人們統一的倫理的根柢的確信。支配這個過程的人間的統一的性質和統一的心理的法則，常常惹起解決世界之謎或類似的東西，使數百萬的人類，得到同一或類似的道德的根本思想。種種的世界觀，如宗教一樣，爲統一的人間性及統一的心理的原因，在高度的發展過程中，向着統一的方面推移。斯莫拉對支配倫理的體系和世界觀底統一化的過程說：「繼續進步的心的認識，繼續進步的自然及社會的本質的認識，至少是在其實際的歸結，在其最重要的目的設定及價值判斷的方面，嘗和倫理的體系接近。」

以上是斯莫拉經濟學研究法大體的要領。斯莫拉研究法底特徵，我們只據他取出一個的理論來，復如何地處置這理論的這一點，就可明瞭。我們現在試選貨銀理論來說。經濟學底自然法學的，自然法則的傾向，原是很簡單地處置這個問題的。其中心理論，就是貨銀鐵則。即，貨銀的額數，原是吸引生存必要上的基礎這樣的支配全貨銀運動的事實。斯莫拉說這個理論，只不過含有部分的事實之觀察的基礎上之部分的真理，是不妥當的，錯誤的，一般化的。他對此，要以爲祇是在和勞働組合，工場法，及其他社會的設施正當的評價相關連的，更廣大的，歷史的統計的觀察之基礎上，才能得到貨銀運動正確的判斷。這樣觀察的他，乃從如次之點出發而論述其貨銀論。即，需要和供給之大的關

係，作着一定的任務，但這場合，在需要和供給之背後，應顧慮到商品市場上有感情，道德和關係的人間的集團的存在，他們社會的地位和組織，權力和無力，既是決定他們一舉一動的爲社會的設施和法律的秩序，那麼，貨幣和其他變化，當然必受其影響，當然必受其支配。「在貨幣的高率上，表示出社會階級底權力關係。確固的表示出國民的意識，表現出生活的維持，惟徐徐他而且困難地變化的階級的懸隔，如像在分配全所得中反映着一樣，特別是在貨幣總體的高率上，在種種勞働者集團底階級的貨幣上反映着。」他特別是在其貨幣理論中之一連的個別的觀察如次。

A. 斯莫拉乃由貨幣的高度，勞働者的生活，其經濟的技術的勞働能力的關係出發。他根據多數的歷史的實例，指示出一定的關係，是如何地成立的，又指示出這個關係，是依着種種的文化的時代及種種的勞働者的種類而完全不同。

B. 這樣，他又轉過來研究需要和供給，討論勞働力的供給了。于是他個別地指示出全國裏面各州各縣的人口動態是如何作用，指示出這一切原因（這個應加入內部移動的關係）於時間的和場所的如何喚起種種的不同的供給。并且他更指摘出各職業間關係的不同，指示出因勞働組合制度及一般勞働介紹而生出如何的不同的種類，指示出勞働的供給在市場上有如何的作用。

C. 其次他論述勞働力的需要。他說，勞働力的需要，乃從着關於官吏人格的執行職務或貨幣勞働

者之如何而生出區別的。他普遍地指示出決定勞働底需要的各個多數的原因，又指示出勞働的需要在一切國家中，一般地如何地和商品及職務的需要相關係。所以，從他看來，一國的福祉，其消費力，其所得分配，其輸出入，其商業和殖民政策，乃依國民底商業的精神而決定。他的總括的結論，更指示出賃銀的高低之最多樣的歷史，地理的和職業的可能性。

這就是斯莫拉底經濟學方法論的立場。

### 三

總之，在斯莫拉，國民經濟，便是被統一的民族的精神並統一的物質的原因所支配的一民族之經濟的社會的過程的組織，理解國民經濟為社會生活的部分的内容。所以，在和其他的社會現象之關係中，而理解國民經濟，這尤是重要的任務。而且經濟學，乃是研究這種種關係中的經濟現象的學問，而其預備的任務，則在觀察記述，定義和分類經濟現象。而其根本的目的，在求多數國民經濟的現象底共通的東西，即求其共通的法則。可是斯莫拉所特別注意的，祇是經濟現象之觀察，記述，定義和分類。探求多數的現象中底共通點的要求這一件事，即在新經濟學派中，也有種種的立場。在這學派中，最高唱經濟現象法則性者，便是卡爾·比西亞和伏拿·宋巴（Werner Sombart）。比西亞所著



的「國民經濟之成立」(Karl Bücher, Di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和宋巴所著的「近代資本主義」(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1. Aufl. 2 Bde. 2 Bde 1902, 2. Aufl. 4 Bde 1923)裏面皆闡明着他們的立場。

比西亞和斯莫拉之立場及其見解均不同。斯莫拉以經濟學當做一種倫理的科學，但比西亞則離開倫理的主張。而且斯莫拉之方法論，雖主張歸納演繹兩方法的併用，但他之重點倒是在乎演繹法。然比西亞則同時採用歷史的歸納的方法和演繹的方法。即，他看這兩個方法為同價值的東西。他解釋交換經濟的理論為如次之意義。即為研究如現在一種的交換過程底複雜的原因，除採用孤立化的抽象和理論的演繹以外，別沒有其他研究方法。只研究現實，或只依歷史的研究法，這決不能達到一般的理論和體系。經濟學者所應該研究的，乃是經濟論，不是經濟史。比西亞雖從事歷史的研究，但在其為理論化的一點上，則脫離斯莫拉的立場。

宋巴雖係斯莫拉的門生，但其立場則顯著的各異。宋巴在其「近代資本主義」初版的序文中，有如次的意義的述說：倘如說我底研究法就是斯莫拉底意思的歷史的方法，那無疑的，斯莫拉一定是吃驚的。斯莫拉和我底方法所區別的地方，就是在整理歷史的材料方面，我則努力理論化。即，我乃主張從現象之窮極的原因方面說明現象。我以為一切歷史的現象乃構成一個社會的體系。這就是我的理

論。在這點上，指教于我最多的學者，便是卡爾·馬克思。他有他的歷史的方法。這一點，歷史學派沒有和馬克思學派互相憎惡的必要。兩者的綜合，是我所極願望的事情。宋巴之「近代資本主義」初版對於兩者的綜合，好似做着一種動議的嘗試。

即在新歷史學派中，也有批評斯莫拉底方法的態度的表現。倘把這個批判的態度，和下面所說的卡爾·明嘉（Karl Menger）對於斯莫拉底方法論的批判相對照的時候，即能理解斯莫拉的方法論的特徵。斯莫拉的方法論，完全趨向于現實的，具體的方面。斯莫拉雖則很理解記述的科學只不過是對一般的理論的一般的準備，但他的著作，記述的方面居多，甚缺乏理論的方面。他祇是舉出很多的現實的要素來做例證，並不是做理論的研究。這即是他底方法論的結果。所以，斯比托夫（Spiethoff）對他說：「他底精神的特徵，乃是不同情于概念的構成和抽象，並且和其互相對立。」赫克挪（Heckner）也說：「斯莫拉是經驗的並歸納的人，全不曉得嚴密的概念的決定。斯莫拉是社會學者，心理學者。與其說他是理論者並體系的學者，不如說他是政治家，歷史家。」

斯莫拉自身對於這一點好像也自覺似的。他預期將來的批評向着他的時候，他雖不成爲歷史家，同時也必須是經濟學者，如不成爲經濟學者，同時必須是歷史家。可是他自己對於他的評價，認自己曾在歷史家，經濟學者的立場上，完成了最善的任務。

#### 四

能比匹于斯莫拉的新歷史學派的代表者，便是布靈達諾（Judwig Joseph Brentano）。布靈達諾很包括的考察國民經濟學的本質，和經濟學的任務。他是新歷史學派的一員，在康德影響之下，雖固執其歷史的方法，但在經濟政策的見地上，和此派的代表者斯莫拉不同，很有自由主義的傾向。他解釋國民經濟在一定經濟領域內結合的民族的經濟者的集合，以爲依此集合，使一種文化，技術，道德，法律，國家，發生起來，使這些東西發展起來，改造起來，同時因此受了影響，對於他民族的經濟者，形成一個全體的東西。而且認國民經濟自身沒有一個統一中心，乃由個別的經濟學者的活動而形成一個中心點。

布靈達諾一生的研究，態度頗爲一貫，所以獲得了改良社會，特別是解決勞働問題的經濟學的基礎。其第一的表現，便是他底「現代勞働組合」〔Die Arbeitergilden der Gegenwart 2 Bde, 1 71—1872〕。其中第一卷爲「英吉利勞働組合史」，乃根據以英吉利勞働組合尤其是機械勞働組合爲中心的根本的資料而做歷史的敘述，這一卷，很引起英吉利本國的注意。第二卷爲「英吉利勞働組合批評」，乃敘述勞働組合的實際的戰術和他自身對於貨幣理論的根本思想。

一八七七年，他又發表「現代法律的勞働關係」(Das Arbeitsverhältnis gemäss dem heutigen Recht)。但這本書，不過是上揭「現代勞働組合」的改訂本，而其基礎，仍站在「英吉利勞働組合批評」之上。他底根本思想如次：

現在的勞働，是被當爲商品而處置。自然，勞働與商品，當然應依着根本的重要的要素而區別。何以呢？因爲勞働力和人間力是不能分離的，所以，它不能如其他的商品一樣，可以在市場上販賣，也不是等待着好景氣到來的東西。勞働者和企業家一樣，不能保留其商品。他們恐怕陷于飢餓，所以不能不出賣。所以布靈達諾以爲勞働組合第一的使命，乃在解放勞働者這種不利的地位，在提高賃銀水準達到生活的最低度以上。布靈達諾依着考察商品在現代經濟的交換過程上的勞働的特殊地位，而對於特別勞働法的規定及勞働法學的建設，給與決定的刺激。從經濟學方面說來，則必要有批評的論難支配當時的賃銀基金說。據此說，每個勞働者的賃銀，必須依着國民經濟中企業家所預備支給於勞働者的賃銀的基金和分割此基金的勞働者之數而確定的決定。布靈達諾和遜墩 (William Thomas Thornton)，米爾 (James Mill) 黑爾曼一樣，也排斥這個學說。賃銀基金有增大的彈性性，就中，尤其是企業家可以增大享樂財的基金。但普通不能把企業家的流動資本看做賃銀的本來的源泉，消費者的購買力乃其真的源泉。所以賃銀並不能由賃銀基金而增加國家的富。

這個便是布靈達諾改良社會的原理的最初的出發點。他底改良社會的根本的原理是要求勞働者團結的自由。他在英吉利的勞働中看見勞働者自由的團結。而且以爲勞働者祇是靠此團結的自由而組成勞働組合，在勞働市場中，才能行真正的「自由競爭」。這個思想，在他底改訂版的「現代法律的勞働關係」中，開始發現，到了「勞働工銀及勞働時間的關係」(Über das Verhältnis von Arbeit und Arbeitszeit Zur Arbeitsleitung 1893) 出版了後，便益形發展起來了。每個勞働的給付的價格，何以雖在貨銀額的增加，勞働時間的縮短的時候，也不見其騰貴呢？這不外是因爲受這些設施的影響，所以祇對於每個時間的給付，只有這一定的增加的原故。這個就是布靈達諾利用包括的經濟的材料而證明的，于經濟上，技術上，最進步的思想。高的貨銀和八時間勞働日，使勞働者生活向上起來，使其把增加的勞働的強度，而從事勞働。這件事，企業家爲賠償其昂貴的貨銀的原故，常常強制採用更多的機械，其結果，最高價的貨銀勞働成爲最低廉的勞働。然而一旦實行縮短勞働時間，則勞働者對於維持習慣的標準生活，必有極大的注意，所以，縮短勞働時間的結果，勞働者害怕被所得減少所威脅，于是便想由增加勞働的給付來補救。

布靈達諾對於社會政策最後的理論，便是一八七九年發行的「現代經濟組織與勞働者保險」(Die Arbeiterversicherung der heutigen Wirtschaftsordnung. 1879)。據布勒塔挪，即使勞働者也組織勞

働組合，但在景氣底變動以前，也不能保護他們，所以，爲補救這件事，必須有勞働者保險的設立。除養老，傷害，疾病，保險，埋葬費，子女教育資金保險之外，特別還必要失業保險。但是布靈達諾反對當時社會政策的方法的強制保險的計畫，因爲這個義務的人，仍以勞働組合爲適當。布靈達諾反對當時社會政策的方法的強制保險的計畫，因爲這個緣故，他在一八八一年的時候，又出版一本小冊。據布靈達諾所信，這樣的強制，因爲其收入，對於不絕地變動的社會階級，不能支付正規的保險費，所以不能實行。經營如此保險的人，必須是勞働組合。何以呢？因爲倘不這樣，則勞働者階級的手段，必爲官僚所支配。這一點，足以表現出布靈達諾底自由主義的社會改良主義了。這一點，也就是其他社會政策論者和他底立場不同的所在。他以爲勞働者由組織勞働組合所得的自助，正是解放勞働階級最重大的手段。

他底自由主義的傾向，即在他底商業政策和農業政策中，也已表現出來了。前述關於貨幣和能率的理論，以及用這個理論爲基礎的自由主義的社會改良的思想，很惹起當時學界的注目。比如到了極顯著的傾向於社會主義的哲學者阿爾巴·郎格底「勞働者問題」(Albert Langer, Die Arbeiterfrage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Gegenwart und Zukunft beleuchtet, 1865)的第三版(一八七五年)，其社會主義的色彩，已經幾分和緩，而現出濃厚的自由主義的社會改良的色彩，這個就可看出布靈達諾影響之大了。布靈達諾不但只關心於這樣的實際問題，他在大學教授時代，已編述關於經濟史的講義了。如最

近所發表的浩博的「英吉利經濟史」既刊三卷和「古代經濟生活」等書，祇是此講義的一部分。

## 五

所謂「新歷史學派」，乃一般學者對於其所屬學者消極的一致的稱呼。前面已經說過，即在新歷史學派自體的內部，也有批評其方法論者的存在。比如斯莫拉主張由澈底的國家改良社會，即主張由上層改良社會，並以爲社會將來的危險，不外是國王及官僚代表國家的思想，爲救濟社會階級鬥爭的唯一的中立的要素，必須行偉大的社會改良的方法。無疑的，這就是國家主義的思想，是社會的保守主義的思想。像這樣的思想，并非他們獨創的新思想，便是斯帝因在他底「法蘭西社會運動史」的第三卷（Lorenz von Stein, Geschichte der sozialen Bewegung im Frankreich von 1789 bis auf unsere Tage 1850 III. Bd. Das Königtum, Republik und Souveränität der französischen Gesellschaft）中，對於這種思想，已做過大體的敘述了。便是處在保守主義的基督教的立場的胡巴（A. Huber），其傾向也和其同時代的斯莫拉相同。如華克拿從方法論看來，和歷史學派一致之點雖很少，但他也不外受羅特比杜斯的影響，主張國家社會主義。便是士夫勒（Albert Schäffle），也不外是屬於同一系統者。一言以蔽之，這都是保守的社會政策，而其實踐的代表者，則爲鐵血宰相卑斯麥。

與保守的社會政策相對抗者，乃爲前述之布靈達諾及其一派，他們之自由主義的社會政策，乃由米爾的思想出發。其特徵，在認廣汎的文化的進步并個人能力發達的根本條件的經濟組織之下，或依法律的設施，或由自助的活動，制強者對弱者濫用權力，在經濟利害的鬥爭中，使弱者結合起來，以實現真實的經濟自由和法律平等。他們不希望依賴於國家多數的設施，祇靠組合的組織，而舉出社會改良之實。比如勞働組合和消費組合，就爲他們所最推賞的。赫爾克那(Heinrich Herkner, Die Arbeiterfrage)和舒爾澤-加夫尼茨(Zum Sozialen Frieden)都是屬於此傾向最顯著的人。

此外對於經濟政策，也如對於社會政策一樣，學者間的立場，也多不一致。其最顯著的，便是關於農業政策和工業政策。這兩個立場，乃在於農立國和工立國的標語(Slogan)之下互相對立。布靈達諾在這場合，也主張自由貿易及工業立國。在這一點上，布靈達諾的立場，頗接近古典經濟學。所以他好像站在經濟的自由主義的立場一樣，對於社會的和政治的要素一樣，而強調經濟的要素。便是華克拿和頗列(Pohle)也可以看做屬於工業立國論的傾向者。

農業立國論和工業立國論正相反對，農業立國論，多受浪漫主義的影響。例如：亞爾登堡，在他所著的「爲工業立國的德意志」(Ardenberg, Deutschland als Industriestaat 1897)中嘗這樣說：一切國民經濟，便是一個的有機體。而且這有機體的重心，乃在其自身之中探求之。然而重心則依國民經



濟的各部分是否有一定的平衡而決定之。他雖從國民經濟的平衡論而提出應該保護獎勵其主要產業的農業，但布靈達諾和德察爾(Heinrich Dielgel)則反駁說：國民經濟中之全勞働，不得不趨向于如預期其勞働獲得最大可能的效果的產業部門。

便是關於土地所有問題也表現出這二者立場的異點來。這二個異點就是一方則將土地所有權的處分歸于個人的自由，一方則主將對於此處分權，應規定某種拘束。布靈達諾在他的「相續法政策」(Erbrechtspolitik, alte und neue Feudalität 1899)中，反對布羅伊森的農業改革(其代表者為麥沙 J. Moser)，為土地所有權的自由而戰。土地所有權的自由，自十九世紀初葉以來，在文明諸國中，已成爲一般的傾向。他主張關於土地的法制，一定要除掉土地耕作者的一切的強制的限制。

但對這主張的反對者却非常之多。如塞林克(Sellin)則強調土地和其他的當時的性質的差異，反對關於土地自由主義的立法。這個土地的特殊性，嘗經浪漫主義及羅特比杜斯所指摘，他們是受其影響的。此外又如基爾格(Cotto Gierke)，尤極力主張這個特殊性。據他說，土地不應看做商品，應該看做一個社會的地位。土地是個人經濟勞働的根據，是爲國家，而犧牲其心身的故鄉。個人可以永久利用的，可以承繼的土地，原是國家的一片地，決不許個人任意的處分。關於商工業立國論和農業立國論的對立，關於土地所有權問題的自由和束縛對立，更是德意志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的進步主

義對保守主義的對立。

德意志歷史學派的人們，與其說是偏重于經濟論，不如說是偏重于經濟政策的問題。這個傾向是適應十九世紀的事情。無視此中間約事情，即不能知道歷史學派的問題。前面已經說過，歷史學派的經濟學，由整個的方面來說，乃帶着倫理的色彩。這種色彩，在一方面則反映着德意志·曼切斯達學派所代表的新興布爾喬亞和馬克思主義所代表的普羅列塔利亞的階級鬥爭日趨于激烈的現象，反映着國家呈出居中調停的中立的外觀。不錯，這種布爾喬亞和普羅列塔利亞底調和（那不過是外觀的），當然可以使德意志資本主義向着世界發展的。在一方面，對國外行保護貿易主義，對國內則行社會政策主義，這自然也是當時新興的資本主義的德意志所應採取的政策。就在理論方面，如那所謂經濟發展階段說，原是示出統一國家的德意志國民經濟，即示出近代資本主義國處在經濟發展的最高階段，這明白是適應於支配階級底要求的。

以這政策論為中心的經濟學，在其認識上，不消說是有黨派的關係的了。但德意志的經濟學者，却不受這種偏重于政策的經濟學所惑，而要求理論的建設。如此傾向的發生，乃始於對歷史學派經濟學論的批評，這個傾向，也可看做對於歷史學派的一種反對。

## 第二十章 奧地利學派之經濟學

### 一

新歷史學派，對於經濟學，懷着一種新見解，在一八七〇年代，出現于德意志的思想界。歷史學派的成功，真是偉大了。十九世紀末葉德意志經濟思想界，完全為新歷史學派所占領。然而市民的經濟者中新歷史學派的霸權，却為他有力的競爭者出現所威脅。新歷史學派出現德意志思想界的時候，同時以維也納為中心的理論經濟學，也開始再行建設。在理論的內容，則和正統學派對立，在研究方法的批評，則和新歷史學派對立。而且這一派，因為有力的理論家，相續輩出，所以遂形成了一學派。這一派就叫做奧地利學派或維也納學派。

新歷史學派和奧地利學派雖都屬於市民的經濟學的範疇的東西，但其研究態度，則處在對立的狀態。前而已經說過，新歷史學派，乃以歷史的研究為經濟學本來的目的，但奧地利學派則做理論的抽象的研究。理論的和歷史的形成此兩派最大的特徵，由此見地的不同，做着激烈的論爭。然而不思議

的運命，正在等待着這兩個學派的降臨。現在在教科書中，這二種經濟學，仍被折衷利用。關於歷史學派的根本概念，國民經濟學的要件或發達的議論，併用了以奧地利學派的理論為中心的價值論和分配論。這一點，兩者同是市民經濟學的典型。

奧地利學派之學的貢獻，乃在其理論的研究，特別是在價值論方面。其價值論，正和斯密斯和李嘉圖之勞働中心，生產費中心的價值論相反，乃以主觀的要素即慾望為中心的價值論。然這種主觀的價值論，並不一定以奧地利學派為其最初的主唱者或體系的建設者。一八七〇年代的初頭，英吉利的斯丹勒·日雲士 (Stanley Jevons)，瑞士的勒翁·華爾拉斯 (Leon Walras) 和奧地利學派的首領加爾·明嘉 (Carl Menger) 雖已各自獨立地構成主觀的價值理論，但日雲士和華爾拉斯的周圍及其以後，沒有其有力的理論的發展者，迨明嘉和巴伏爾克及腓力·威沙構成其理論後，各國經濟學界，才知道主觀價值論的存在和其意義，所以一般人，才以為主觀價值理論，為奧地利學派所獨創。

本來主觀的價值論和客觀的(勞働或生產費)價值論同樣是舊的東西。特別是在英吉利和法蘭西兩國之中，已經有客觀價值論的存在了，客觀價值論的支配地位，永不認識主觀價值論的存在。

在德意志，指摘出價值中的心理的要素者，雖是雅古夫，洛治 (Johann Freiderich Eusebius Lotz)，胡佛蘭，亞丹·繆勒，黑爾曼，但是對於主觀價值論的構成給與多大的貢獻者，却是久經埋

沒在古書堆裏面的「關於人間交通的諸法則的發展及人間行爲的規準」(Entwicklung der Gesetze des Menschlichen Verkehrs, und der daraus fließenden Regeln für Menschliches Handeln 1854) 著者葛森(Hermann Heinrich Gossen)。葛森這本書，是其二十年間，沈思默考的結果，他很自信其中所描寫的理論，可與哥比爾尼克斯所發見的相比匹。此書中所描寫的，是關於欲望底數量的觀察。即，考察關於人間欲望和爲充足其欲望的財的數量之間所存在的關係。

葛森把「人類希望其生活的快樂，其生活的目的，在乎盡所能增高生涯底享樂」爲快樂主義的前提，而構成其「享樂學」。他認經濟學爲「助補人們得到人生享樂的最大量」，于是便名之爲享樂學。即，從他看來，人們不單爲瞬間的享樂，而且必要做着增大其全生涯的享樂量的工作。他關於應如何行享樂的問題的答案是：「同一的享樂之大度，在不絕地增大其大度的時候，必漸減少起來，最後祇能達到其飽實之點爲止。」威沙(Friedrich von Wieser)對於這個命題，則名之爲「葛森法則」。他由這個法則，更得到關於一切人類行爲的命題：「多數享樂雖然并存，但在時間不許的時候，祇是一部份能夠得到增大其所受的享樂量，其後各享樂間才漸漸得到均衡。」這法則，正是後面所說的界限效用均等的法則，勒基斯稱之爲「葛森的第二法則」。

如此，葛森便達到價值的觀念了。他說，「有益于我們生活目的之完成的祇是外界的狀態，所以

外界對於我們是很有價值的。」而且他們以爲同一的享樂資料的各原子有極不同的價值，在各人看來，祇是這價值底一定量，才有價值。他說：「凡在一般能有價值的東西中，只是一定量才有價值，此外不絕地增量的，常常無價值。這無價值點，一旦增大其量數，則在最近的將來，祇是最初之量有最高的價值，新加的各量祇有較少量的價值，漸次遂達到無價值。」隨着享樂資料的各單位的効用之大，而其價值之大也不同，這一點雖是葛森之價值論和奧地利學派趣旨的差異，然其理論的內容總可當爲奧地利學派價值論的先驅。然如前面所說，他底著作，數十年間，却被置在冬眠的狀態，這個我們不能不爲他發出不平之鳴。

## 二

明嘉爲奧地利學派之領袖，嘗在其所著「經濟學原理」(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1871)裏面，展開其價值論，但爲便利計，這裏先從他底經濟學方法論說起。他底方法論，在其「社會科學並經濟學的方法研究」(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insbesondere 1883)和「德意志經濟學歷史主義的誤謬」(Die Irrtümer der Historismus in der deutschen Nationalökonomie 1884)這二本書中說得很長。

明嘉不滿意古典經濟學中的主要的理論，和承認經濟學中必然的改革這一點，正與歷史學派相一致。據他說，經濟學的改革，應從經濟學自身出發，并非如歷史學派，把經濟學以外的要素，拉攏到經濟學中來。所以在明嘉看來，歷史學派，無異于外國的征服者，對於經濟學，強制了他們的言語和習慣，即強制了他們的術語和方法。在經濟學上採用歷史主義，結果必混亂了關於經濟學的本質和其課題，即混亂了關於經濟學的各個的部分和其互相關係，混亂了關於經濟學的補助科學等等之理解。這就是，歷史主義者離開經濟學上真正的意義的領域，這就是，祇沒頭於他種範圍的議論。據明嘉說，斯莫拉的工作，祇是拉攏理論經濟學到經濟史的範圍內去，拉攏實際經濟學到理論的科學的範圍內去。明嘉并不是非難歷史學派把經濟學當為補助科學而利用，祇是攻擊他們因為沒頭研究經濟史而忽略了經濟學，特別是忽略了理論經濟學。所以明嘉乃排斥斯莫拉祇是顯微鏡的研究歷史，主張理論的經濟學底新構成。從明嘉看來，解放經濟學脫離為障害的一面的歷史主義的絆羈，才是經濟學者第一的任務。所以經濟學者首先第一必須研究經濟學方法。

據明嘉說，同一的現象可以從種種的觀察點考察。即國民經濟的現象，可以從歷史的見地，理論的見地，實際的見地來觀察。然由嚴密地區別這種種的觀察的見地，而區別獨立的科學即（1）經濟史，（2）理論經濟學，（3）實際的經濟學。

而明嘉對於這種種見地的差別，則說明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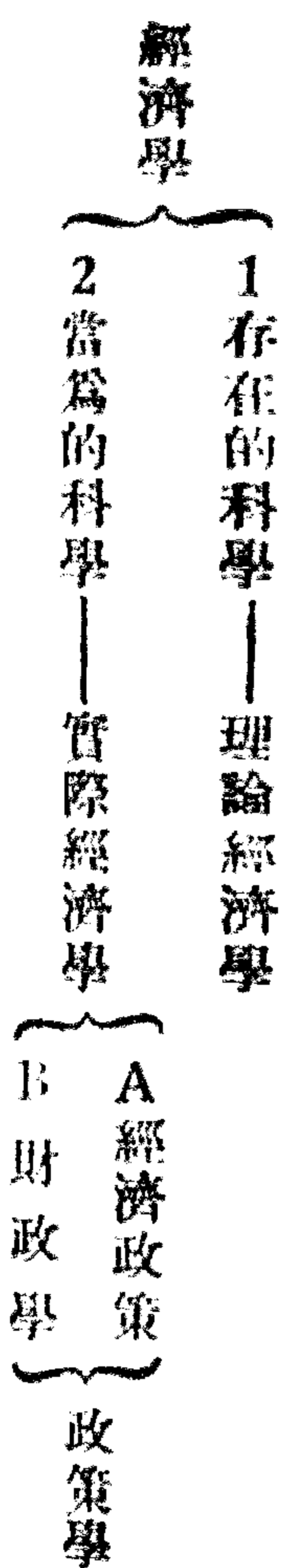
不但一般歷史家由所謂發展這樣的觀察而研究敘述特定的國家并民族之事實，制度，發展的方法等，便是一般統計學者，也由靜態性之觀點而做這種研究和敘述。然而在國家的及社會的諸現象範圍內的理論家，並不是以具體的現象及具體的發展為研究的對象，乃是認識這種種的人間的現象的形態和法則。但實際的國家學和社會學的研究家，則研究適合于國家的并社會的狀態的原理。這就是研究如何才能實現國民經濟國家財政行政的原理。

經濟史和經濟理論，給與我們以國民經濟現象的理解和認識。但這場合，理論的理解和歷史的理解，在其方法上，却互不相同。即，所謂理論的理解某具體的現象，便是把此現象作為一定的合則性中特殊的場合而理解。反之，我們在特殊的歷史的方法上理解具體的現象，便是研究這個現象的個別的生過程。這就是研究這個現象如何成立，其特殊的性質現在怎樣等等的具體的狀態。就是，經濟史這個東西乃研究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場所的個別的具體的現象并個別的關係之經濟現象，反之，理論經濟學是認識國民經濟的現象之現象形態與法則即類型和類型的關係。即，理論的經濟學是以反覆無常的現象為研究的對象。比如研究交換，價格，需要供給的本質和這種現象間的類型的關係，研究需要供給的增加影響於價格的關係，便是一例。然而國民經濟中歷史的科學的任務，則為敘述個別的需要供給的增加影響於價格的關係，便是一例。然而國民經濟中歷史的科學的任務，則為敘述個別的需要供給的增加影響於價格的關係，便是一例。



特定的國民經濟現象的本質及其發展。比如敘述特定民族的經濟的狀態或經濟的發展，特定的經濟的制度的狀態（如特定的經濟的範圍的價格的發展等）或發展，便是一例。

所以在明嘉看來，經濟史與理論經濟學是存在的科學，實際的經濟學是當爲（理想）的科學，政策學。實際經濟學是隨着國民經濟而形成的原理的科學。所以實際經濟學的認識，並非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民族而有同一的價值的東西。何以呢？因爲實際經濟學的認識不能不考慮當時的狀態。而且明嘉還在經濟學中包括着理論經濟學和實際經濟學，即經濟政策和財政學。歷史和統計對經濟學只不過負擔補助科學的作用。這類東西既非經濟學的一部，所以經濟學不能因此而變其性質。茲用表示之如次。



經濟學的補助科學

- 1 歷史的研究
- 2 統計的研究

理論經濟學爲德意志的科學，其發達的時期較經濟政策和財政學爲遲。可是記述理論經濟學的任务的國民經濟的現象的本質并一般的關係的事情，乃爲實際的經濟學的任务。理論經濟學，由時事問

題和政策的理論方面，也發達起來。所以即在今日，理論經濟學和實際經濟學仍然是混合的存在着。

主張經濟學各部門的嚴密的規定和歷史的研究，是補助經濟學的科學，決不應代替于理論的認識的這一點，就是歷史的研究，對經濟學單不過提供材料的這種見解，確是明嘉之經濟學方法論的大貢獻。明嘉依這個主張，對經濟學的發展，不能不說是一件重大的勞役。在這意味上，他是批評經濟學派的第一人。

明嘉在理論經濟學的領域中，主張二個傾向的研究方法。第一為經驗的現實的方法。第二為嚴密的方法。研究理論的經驗的現實的方法，是研究現實現象類型和類型關係。所以這方法，乃指教我們以現實現象的形態和反覆無常的關係即經驗的法則。嚴密的方法，是使現實的現象成為最簡單，嚴密地考慮分析類型的要素，即嚴密地研究要素的自然法則的類型的關係。明嘉便是在其理論經濟上適用這嚴密的方法的。從他看來，這方法雖僅為觀察人間生活的一方面，然正因為這個緣故，孤立的經驗是極有益的。而且在如次的前提之下也可以適用這個方法。

- 1 一切經濟主體完全認識其經濟的利益。
- 2 經濟主體對經濟利益的手段沒有錯誤。
- 3 經濟主體得洞悉經濟狀態。

4 在這種種的關係上沒有何等外的強制的存在。

在如此的狀態之下，研究經濟現象的時候，才能達到有自然法則的性質的法則。然而經驗的現實的方法不能達到如上面底意義的法則。僅能知道經濟現實的現象中或種程度的合則性。何以呢？因為這個現實的現象，還包含上述各前提以外的要素，所以，不能看做純粹的經濟現象。

### 三

明嘉依着上述的經濟學方法，從着理論經濟學的研究，對於經濟學的中心理論的價值論，提倡一種新學說。

明嘉底價值論的要點，在其「經濟學原理」上面，說得極其帖切。他以經濟現象為成立因果的關係，以人間的欲望為經濟學上最根本的東西。便是把這個人間的欲望為他底價值論的基本的。充足人間慾望的能力便叫做效用。我們評定價值，便是對於這個效用的評定。所以價值的差異，乃因為人們對於財的慾望充足力為差異的評價所致。所以，「所謂價值，就是依着我們認識我們慾望的充足乃從屬於財富的而處分一種財富或財的集團的重要的程度。」所以一財富或財的集團的價值，對於可以由處分財富的人，無異于有最小重要之欲望充足的，所有的重要性。即，這個和給與其所有者的界限

効用的重要性相等。明嘉便是固執了這樣的主觀的價值論的。他以為在生產上所投的勞働或資本，和價值沒有直接的必然的關係，主張價值僅由主觀的評價而發生的。

在奧地利學派的價值論中，除明嘉的著作之外，還有腓力·威沙(Friedrich von Wieser)的「經濟價值的起源與主要法則」(Ursprung und Hauptgesetze des wirtschaftlichen Werthes. 1884)的重要著述。他在這書中，使明嘉所展開的理論更加發展起來，使其心理的解剖更加深刻起來。而且使用「界限効用」(Grenznutzen)的一語。這一語已被一般所承認。比如日雲士則代以「最終効用」(Final utility)的一語，英文也使用「界限効用」(Marginal utility)的一語，其後，在一八八九年的時候，他又著「自然價值」(Der Natürlich Werth)的一書。其內容說明一般的價值理論和在分配論上應用價值論，這一點頗有其特徵。

接續明嘉和威沙之後，使奧地利學派的價值論達於大成之域者則為伯姆·巴伏爾克(Eugen von Böhm-Bawerk)。伯姆·巴伏爾克在一八八四年的時候，發行其研究經濟學史的傑作「資本和利息」(Kapital und Kapitalzins)。一八八八年發表在康喇教授主編「經濟學年報」(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上的「經濟價值論原理」(Grundzüge der Theorie des Wirtschaftlichen Güterwertes)，更發展其價值理論。在一八八八年，又出版「資本論」(Positive Theorie des Kapi-

tales)，公布着他對於資本論和利息論的研究，和對於價值理論的正確簡明的敘述。

伯姆·巴伏爾克不僅在其思想的獨創這一點上著名，而且那簡潔明快的敘述，更使人佩服。他依據于紐曼 (Franz Xavier von Neumann-Spallert) 的意思，把價值現象分為主觀的價值和客觀的價值二種。而以為經濟學主要的任務便是處置主觀的價值。他假定對財富的主觀的價值說：如沒有財富，即不能不拋棄從財富所得的幸福。由承認財富為幸福的條件，這財富才是所得的重要的程度。所以這價值必須依着得充足財富之欲望中重要程度最少的欲望而決定。即依其財富的界限效用而決定財富的價值。然而在客觀的價值中，却存在經濟學為研究對象的一種。這個就是交換價值。例如，我們有一磅的金，較同量的鉄交換價值為高的時候，則這兩者的關係，全然是客觀的。這客觀的交換價值，在其交換上，不過是一財富支配其他的財富的能力。這就是一種社會現象。而且是僅能存在乎社會底內面的現象。伯姆巴伏爾克嘗在個人的評價上探求現象的根據。他說明這現象，乃由單純（一買主，一賣主）的混合，波及于賣主或買主的一方面行競爭的場合，或是賣主買主的兩方面行競爭的場合。他的結論是：把那可以參加實際交易的買主中最低評價者并不得參加賣主中最低評價者之評價為價格之最高限度，把那可以參加實際交易的賣主中最高評價者并不得參加買主中最高評價者之評價為價格之最低限度，而決定此兩限度間之一點。他又舉出買主和賣主評價的標準有如下四個事情。從欲

財方面——需要財方面來說，則有：

- 1 希望購買者的數。
- 2 希望財富的分量。
- 3 買主對於財富的主觀的評價。
- 4 買主對代價物件（即貨幣）的主觀的評價。

從供給財富方面來說，則有：

- 1 希望販賣者的數。
- 2 希望販賣的財富的分量。
- 3 賣主對其財富的主觀的評價。
- 4 賣主對代價物件（即貨幣）的主觀的評價。

如此，要依着個人評價的原理適用於價格的現象，和視社會現象的價格同是價值現象的基礎而所決交換價值，這實在是伯姆·巴伏爾克的功績。

上述明嘉，威沙和伯姆·巴伏爾克，誠是奧地利學派中的三塊基石。由他們的努力，形成奧地利學派的學說，才被認為一種學派。這學說，得到後代學者的承繼，或容納其一部分。我們現在試舉出

數個有名的奧地利學派的信徒如次：

如羅拜·梅亞 (Robert Meyer *Principien der gerichten Besteuerung*, 1884) 達威森 (Eugen von Philippovich, *Aufgabe und Methode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1887)，菲利波威治 (Emile Sax, *Grundlegung der theoretischen Staatswirtschaft*, 1887) 則加幹特爾 (Robert Zuckerkandl, *Theorie des Preises*, 1889) 等便是。我們現在從着伯姆·巴伏爾克而敘述奧地利學派的價值學說的大要如次。

#### 四

奧地利學派的價值論於大體上，由批評舊派的費用說爲始。這個首先又由分類價值爲始。亞丹·斯密斯把價值分爲交換和使用二種，經濟學的對象乃屬於交換價值。斯密斯以後的價值論者，如李嘉圖，米爾，馬克思等，皆基於斯密斯的價值的分類，僅以交換價值，爲經濟學的對象。然而奧地利學派則不採這個分類法。他們把價值分爲主觀的價值和客觀的價值。其理論的根據如下。

價值的言語，無論被用於什麼樣的意義上，它也沒有物的固定的性質。然而價值沒有想定物的固有的性質，即不能夠思考。所謂價值，就是物底固有的性質和人間的關係。換句話說，即評價主義和

客體主義的關係。即所謂價值係「目的」對「手段」的關係。所以依彼想定目的之如何，而價值也採取種種的形態。而且還目的是否直接爲人類的最高善，個人人格的實現，或個人的充望的種種形態上的人類的幸福，或和入間的安甯沒有直接的關係，或至少應看做一時的僅是客觀的，或中間的效果的機械的，或技術的效果。由這兩種類的目的，所以把價值分主觀的或個人的價值和客觀的價值。

所謂主觀的價值就是一種財富有關於個人的幸福的個人程度。在這個意義上，我的幸福的條件爲我所有的財富，若依照這樣來思考的時候，即財富對於我的幸福作爲有用的而思考的時候，那末，財富對於我，就是有意義的東西。

所謂客觀的價值，就是一種財富和其在客觀的效果之間有能力的關係。在這意義上，一種財富和某客觀的效果發生能力的場合，才有價值。所以只有客觀的效果的數，才有客觀的價值。如此，我對於煤的主觀的價值是我從火中獲得幸福的量，所謂客觀的價值，就是室中得保持着溫度，在汽管中得發生的蒸汽的量，或我賣掉煤而獲得的貨幣的額。

所以據他們的主張，研究經濟學的對象是主觀的價值，非是客觀的價值。何以呢？因爲在經濟中不能作爲煤的熱價值，鐵的抵抗力或油糟的肥料的價值而論。因爲這種事情僅是純粹自然的或技術的事項。然而在這種客觀的價值中，特別爲研究經濟學的對象的，便是物的交換能力或購買力。所謂交



換能力，即就是在交換的時候，一財富獲得他財富底能力的意思。只有這購買力，在客觀的價值中，才能為研究經濟學的對象。然而他們說，便是客觀的價值，畢竟也是由於集合在市場的經濟單位的財富所給與的能力，其背後潛伏着主觀的價值。

如此，主觀的價值者，由通常的評價過程，而推論出三個的價值的性質如下。

1 價值對於人間，有直接或間接關係。即價值物為有益於人的生活。

2 所謂有益於生活的意思，就是能充足人所欲望底意思。即人由於有東西能充足其欲望，那個東西即被認為有價值。所以在有益於生活，在充足欲望底內面，沒有倫理的意義。

3 價值的評定，雖說是稀少性的事情，然實有重大的任務。

充足欲望的東西就是財富。據嘉說，財富的構成，有如下的四件必要的事項。

1 缺乏人間之感。

2 某物中能存有充足人間底缺乏的一定的性質的東西。

3 物能的認識。

4 在為充足缺乏的上面，要有處分那東西的力。

財富因為是充足人間的欲望，所以那是有效用的東西。所以一切的財富，均為有效用的東西。所

以一切的價植物，雖爲有效用的東西，但有效用的東西，非一定有價植物。價值祇是在于一定的效用的界限點上，才能表現出來。所以價值雖被置在特殊限制的效用的基礎上，也仍然有效用。

所以價值比效用狹小的概念，在未加限制于效用時，則不發生價值。例如水雖是止渴的東西，但有一定量的有用的水，在不完成爲充足欲望的不可缺的條件的時候，則不發生何等的價值。

所以如在價值和效用之間，設置區別的界限，則效用就是有益于人間底幸福的一般的能力，價值對效用乃成爲附加人間底幸福的必要的不可缺的條件。即，效用這個東西，祇由於認識財富爲有益于一般人的幸福，認識價值乃處在財富爲有益于人間底幸福，沒有財富就不能獲得其幸福的條件之下的事情而才獲得財富的重要的程度。所以效用和價值之間的關係，是分量的。同一物也因事情的不同而有價值，或無價值，它們的差異原是處在和觀點互相比較的一點。效用和價值的不同，也就是自由財富和經濟的不同。

其次的問題，是價值評定底過程的問題。前面已經說過，價值爲受效用的一定的限制的時候而發生的。即欲望對財富底分量被限定的時候，才發生價值。例如水和空氣，在一般的場合沒有價值。它對於欲望差不多存有無限的分量。

現在假定二個的場合，而說明價值評定的過程。第一場合，一個欲望僅僅存在一個財富的場合。

第二，同一種類的財富得充足多數的欲求的場合。例如米雖為食料，但也能用為釀酒的場合。

第一場合的價值評定極為單純，即一種財富所提供的財富的効用的全部，為其價值評定的標準。即財富對我人底全部効用，成為價值。

第二場合比第一場合較為複雜。例如以米來說，假設米能用為煮飯，釀酒和飼養家畜，且假設其所用的分量為同品質的米各一石。即是，一石食用的米的効用為一百，釀酒的効用為八十，家畜的米提供六十的効用的場合，那末，應以何種効用而決定米的價值呢？現在假定三石米中失掉了一石；但這三石米同一性質，無論供為食用，釀酒或家畜，均能互相補助。在這場合，二石米僅用於効用多數的食用和釀酒，失掉了家畜用的東西。即在這場合，如有米就能充足其欲求，沒有米就不能夠滿足，所以既沒有飼養家畜的米，當然也沒有充足家畜的欲求。所以欲求是界限的欲求。這一來，為三石米中的界限點而被注意的祇是第三場合的家畜用米。所以，評價三石米的標準，應依着提供家畜用的米底効用而決定。

即，由三石米所提供的効用為一百，八十和六十，合計為二百四十（即全部効用）。但這不能決定三石米的價值，反由充足界限欲求底界限効用的家畜用米的一石的効用而決定價值。所以，米三石的價值是六十的三倍，換句話說，以存在財富底位數乘界限効用的効用而決定價值。

這就是奧地利學派的價值論的基本的理論。

這價值論如何地被適用於價格現象上呢？我們爲容易明白起計，先從最單純的場合說起。再慢慢地進到複雜的場合。

第一的場合（孤立的交換）。農夫甲（買主）買一匹馬。他處在一匹馬的所有和六十鎊金的同一評價的狀態。他底隣人丁（賣主）有他評價二十鎊的一匹馬。於是，交易的行爲，大概是四十鎊的價格吧。所以在希望交易的他倆之間，存在二十鎊之差，這種相差點，就是價格存在的地方。可是如交易者以爲「交易雖然獲得少數的利益，然較不交易還要勝一着」，那麼，根據這個原則而行動的時候，價格當是決定二十鎊以上六十鎊以下罷。而且實際的數目是依「市場的機變」而決定的。所以在這場合價值是在賣主的主觀的評價的最小限度和買主的主觀的評價的最大限度之間。

第二的場合（買主或賣主的一方面作競爭的場合）。第一，買主在競爭的場合。現在假定以甲，乙，丙三人代替一個農夫，想買一匹馬。甲評價六十鎊，乙五十鎊，丙四十鎊。可是他們之中，祇是一個人，能得到這匹馬的。然而丁僅評價其馬爲二十鎊，則這三位買主都同處在可以購馬的地位。所以他們遂彼此競爭起來，提高馬的價格比原價多四十鎊。這時候，丙遂退出競爭者的範圍了。如在五十鎊以上，則乙也不買，這時所殘的唯一的競爭者祇是甲一人。倘如這樣，則如前場合一樣，價格乃

在買主主觀的評價六十鎊和被除開之外的最有力的競爭者主觀的評價五十鎊之間決定的。換句話說，就是依着參加交易的買主的主觀的評價和不參加的買主中處在第一位的人的主觀的評價而決定。

在競爭的場合，在賣主方面，正和上述者相反。第三的場合，即所謂完全行競爭的普通的場合，即同一種的商品的買主和賣主共有數人的場合。現在想像有六人的買主，每人要購一籃的蘋果，比方五人的賣主，每人要賣一籃的蘋果。而且假定同時所提供的蘋果均屬同一品質，則兩方的競爭者，必彼此追究其利益。茲以圖示之如左：

第一的買主	（把一籃的蘋果，如下面的評價，倘在 這評價的價格以下，隨時可以購買）	十六先六片
第二的買主	.....	十八先
第三的買主	.....	十七先六片
第四的買主	.....	十七先
第五的買主	.....	十六先
第六的買主	.....	十五先
第一的賣主	（把一籃的蘋果，如下面的評價，倘在 這評價的價格以上，隨時可以出賣）	十二先
第二的賣主	.....	十四先

- 第三的賣主.....十五先
- 第四的賣主.....十六先
- 第五的賣主.....十七先

這樣，最初三個買主對蘋果的主觀的評價十分昂貴，他們以為這樣的價格，無論從怎樣的賣主，在經濟的計算上，均能買得到的。但是，本來他們並非支付必要以上的東西，而且交易常在買主方面開始作廉價的評價。但賣主方面在這時候，却不願意出賣。現在附錄出打價的順次經過如下：

價格	買主的數	賣主的數
十三先六片.....	六人.....	一人
十四先.....	六人.....	一人
十四先六片.....	六人.....	二人
十五先.....	五人.....	二人
十五先六片.....	五人.....	三人
十六先.....	四人.....	三人
十六先一片.....	四人.....	四人

十六先六片……四人……四人  
 十六先十一片……四人……四人  
 十七先……三人……四人

如表所記，由十六先一片到十六先十一片的價格之中間，有同數的買主和賣主。於是乎市場的條件，因交易的發生，遂進入價格被決定的狀態。何以呢？因為這四個買主和四個賣主用同一的價格互相交易而得到利益的原故。第四的買主，價格如在十七先以下，多少都願意支付。第四的賣主，價格如在十六先以上，多少都願意出賣。如此，價格倘如在十六先和十七先之間，則兩者均得到利益。而且較他們處在更良好的條件之下的三組的賣主和買主，從其比量，也得到許多利益。在這樣的價格上，其他的競爭者的評價，無論他們是多數或少數，均不能影響交易。十六先一片的價格，原是不適於第五的買主及第六的買主，因為他們不願意支付十五先十一片及十四先十一片以上的價格的。又者十六先十一片的價格，也不適于要求最小限度的十七先一片的賣主。

又如在十六先十一片以上的價格，則第四的買主，必不參加交易，在十六先一片以下的價格，則第四的賣主，也必退出交易的範圍。所以價格是依最後的買主及最後的賣主（我們也可叫他們做「界限的交易者」）底主觀的評價之間而決定的。我們只依着最有力的交易者，他們對於他們所欲的商品

（蘋果或貨幣），給與最高的評價，對於他們所有的商品（貨幣或蘋果），給與最低的評價這件事情，即可以知道價格的真義了。

那末，主觀的價值論與生產費價值的關係怎麼樣呢？

我們要知道這件事情，我們不能不把主觀的價值的法則和多數的英國經濟學的主張的價值的法則來比較。在大規模生產商品（即能自由生產或得隨意再生產的商品）的場合，其價格常和其生產費有一致底傾向的事情，這是普通一般經驗的事實。如所謂財富的價值乃依其費用而決定的這種普通的議論，就是在此經驗上安置其基礎的。概言之，所謂生產費，便是製造生產物所消費的一切的生產物即原料，補助材料，機械，動力和勞働。更正確地說，我們雖能把這句術語來代替生產的消費，雖得依被支出的貨幣而秤量之，但我們也必須表示出本來不能秤量的努力和節儉。如準據這個學說，則財富的價值，不外是由過去的辰光中發生出來的。

這樣，主觀的價值論內面，因果的關係，不能不表示出由生產物而至費用的傾向。已經明白的，我們在價值論中，第一應該考察的便是人間底欲望。對於各人各種欲望的資料關係，決定欲望各階級中那一種為充足最後的欲望，從而決定界限的効用和其主觀的價值。買主及賣主各自對於財富所給與的數目，最先決定競爭者，其次決定界限交易者或最後的買主，從而又決定價格。由價格的關係，主



觀的評價，還波及生產手段。代表的勞働者及農夫，依其產出的生產物而評定其勞働的價值。又者，如像依其所得的增加分的收穫而評量他們工具的價值一樣，一切價值均反映到由財富所製造的東西上來。如此，價值并非由過去的財富發生，它是從未來發生的。即價值是從充足欲求底消費方面生出來的。財富立於生產和消費中間。舊派主張使生出價值的是生產，新派主張是消費。

在未詳細敘述這件事之前，有嚴密地確定生產財富和消費財富之關係的必要。

一切財富的目的，均為充足人間的欲望。所以消費就是財富的目的。它底作用雖為充足人間的欲望，但我們之所以變動一切產業的機關，也不外是這種作用所使然。從經濟的立場看來，土壤，鑛山以及各種生產用具，均為消費財富的東西。從明嘉看來，財富已成為古典的術語。他叫消費財富為第一財富或最低位的財富，叫直接幫助生產此類財富的財富（即在生產的最底階段上使用的一切的生產用具），為第二位的財富。第二位財富的要素便是第三位財富。如此，一塊的麵包便是消費財富或第一位財富，麥粉，釜，烤麵包的勞働便是構成第二位的財富。小麥，水車小屋，勞働，製造釜的材料便是構成第三位的財富，土地，農具，水車的材料等，便是構成第四位的財富。

這樣，我們便能知道，消費財乃由某欲望依賴于其財富方面得到其價值，換句話說，即由成為某充足條件方面得到其價值。這裏把一塊麵包這個財富做一例言。麵包店的麵包的價值原是依着對其

消費者之界限效用而決定的。所以（基于此界限效用）賣主的評價，乃決定市場上面的市場價格。如從生產財及消費財之連續這方面看來，則製成麵包的生產財富的最後的一圈，不外是製造中的麵包。倘如烤麵包的人，沒有其一圈的生產財，則他們就不能製造麵包，并且我們的界限效用，即不能不失落欲望的滿足。

那末，第二級財富的得失，是因什麼呢？自然，這個不外是既成財富底界限效用。我們一旦跟着漸次脫離麵包底等級的財富而行，則依存于這些東西的，便是既成的消費財的界限效用（時間相異的時候）。即，從經濟的立場說，這種財富，就是處在達到麵包的途上的東西。總之，價值便是依着被充足欲望所表現的人們幸福關係如何而決定的東西。生產財富只有由消費財才能和人間的幸福相接觸。無論任何人，也不能承認鐵鑛或粗鐵塊的本身的價值。比如機械固然是精工了，但無論什麼人，也不能因為看見機械工的熟練，或是看見機械力的作用，而精巧地裝置車輪，滑車，轆車等東西。軟滑而且纖細的絲，在他自身，並沒有什麼充足人間底欲望的事情。它底用處，只是可製成爲布匹或其他的消費財，才是財富。我們評價這類東西，並非根據一方面因為製造機械而用鐵，在他方面因為費用人間勞働，我們應預想，這類東西，對於人們的身體，對於人們的欲望，都是補益的。

所以價值的轉嫁乃是由生產物而至於生產手段的。倘如人們觀察各生產物和直接多數的生產手段

之交涉則自必承認這種事情罷。現在舉出葡萄酒釀造者的例來說，葡萄酒的價值由葡萄酒得來，葡萄酒的價值則得自葡萄，這是極明白的事情。所以讓渡他底土地於第三者的價格，或是經濟上的為援助他的，他所雇的勞働者的數，乃依其平均生產力而決定。又者，我們把某種財富，主觀的假定為一百鎊的評價。這裏我們必須考慮到為什麼對出產原料的勞働為五十鎊，製造費為四十鎊，支給搬運費為十鎊的理由是很充分的。可是在近世分業的產業中，許多中間的生產者，對於界限的效用，或對於完成物品的價格，他們完全不知道。一週間被支給二十先令的木匠的勞働者，他們當然不能集積他們勞働的窮極的目的精巧的衣櫃的價格和其工銀。又如在一概木材商，因為他們已知道木材底最終的到着點，所以對於其木材，不計算支付的價格。然而在一切的生產的部分，如像有窮極的生物一樣，有其直接的生產物。所以在中間生產物的界限效用和價格上，它發見其價值和價格。

如此，由被豫想的窮極的生產物到中間生產物的價值的轉嫁，並由窮極的生產物到最初的生產物的價值的轉嫁，在各生產者中，雖不明瞭，但在實際上，產業的組織，正是認這件事情為由一階級到他階級的。職工看見絲的市場價值，以這價值為標準，而為他底勞働和為他請求給與原料的價值。但他所織的布匹，都是為次之中間生產物的生產手段。而這個布匹，則由這中間生產物獲得其價值。這交涉的連鎖，一直繼續達到最終的消費財的階段為止。

我們不難求出價值轉嫁的證據。我們可以在平時賣剩的物品的現象中發見這種證據。被商品消費的費用，無論如何的大，倘如人們不喜歡那東西，則無論投下多少費用，人們對於這些東西，也是不能給與價值的。倘如物質財不能繼續出賣，則其財富，必被其他的用途所使用，倘如除去由他之生產物獲得他之價值的場合，則其財富所出來的一切機械及建築物，必失掉其價值。便是勞働者，在這場合，也必蒙着災害。即使勞働者用了許多費用，得到練習的機會，得到特殊的才能，但勞働者也不能給與價值於其勞働，又如勞働者倘不能將其熟練適用於其他之職業，則連自己之工銀，也必失掉的。

假定在倉庫中存積某種物品，但已變成舊式的東西了，所以其價值和價格，立即降落得很低。直接的製造者第一應該做的就是自問能否減少其新價格上的費用。倘如他不能夠的話，他就應拋棄其製造業。於是，這種專業，遂讓給可以廉價地生產的人所經營，或由減少工銀或薪俸，或由新方法，或由使用複雜的機械，或由把女工代替男工的方法而完成之。然而無論在怎麼樣的場合，費用不能不從於價值的。

我們在銀的場合，便能看出這事情的顯著的證據。許多人都憫然的以爲銀是貴金屬之一，有先天的價值。然自一千八百七十年以三後，許多鑛山和鑛石，雖極豐富，鑛脈也連綿不絕，但都停止開

拓，或是不再從新開拓了。這原因是什麼呢？這個不外是因爲祇有銀的諸國，銀不能被公認爲通幣的原故。這就是因爲銀之於諸社會的評價的低落，結果影響於未精練銀鑄的銀底價格，銀價格不敷採鑄的費用的原故。

最終生產物和高級生產物一團價值的一致，自然不是絕對的。倘如這是絕對的，那末，這便是不思議的了。一切等級的生產物，乃由最終的生產物得到其價值。而這最終的生產物，則由人間欲望這樣不定的東西，由人間所有資料這樣伸縮的東西中獲得其價值。所以轉嫁價值的計算，常常是有誤謬的。造船業者，有時也有急迫的需要，爲一時的運費的昂貴，而企圖造船的。但這時候，也必須預想到在未竣工之前，好景氣一旦終熄了，船價不能賠償工銀和先支的諸價格的事情。這麼一來，在不合法則化的變動之外，却存在雇主（和資本主不同）獲得利潤，或大受損失的一個機會。生產財富的價值，和最終生產物的價值之間，常有一種差異。這種差異，就是利息。但關於這個事情，我們沒有在這裏討論的必要。這即是奧地利學派底價值論的大要。



## 第二十一章 對歷史學派之批判

### 一

德意志歷史學派之影響非常重大。然而歷史學派之任務，也如多數學問體系上所作的一樣，其解決的問題，就是應於當時德意志經濟生活的要求的。前面已經說過，歷史學派唯一的目的，在乎德意志資本主義之健全的發展。所以它底經濟學體系，也和他們的主張一樣，有多數適應於德意志資本主義的內容，它底主要的內容，就是經濟生活上各個的制度的史的研究和爲經濟生活底發展的，對國家倫理設施的要求。所以他們對於經濟生活，行他們的「倫理的批評」，爲倫理化的經濟學。然而對於經濟學的倫理化的傾向，對於政治化的傾向的批評，在歷史學派支配的時代，已經發生過了。那時代，一般之觀察經濟生活，並非由倫理的政治的立場，乃是觀察經濟生活的固有姿態，並不是對它給與何等的價值批評，却是表現出要由現實的經濟生活方向導出爲理論之理論的傾向。這傾向，正是反對前述奧地利學派的立場和歷史學派的一種傾向。我們現在試略述其重要的如次。

第治爾(Heinrich Dietzel)在德意志，所用的方法，和明嘉一樣，是要重建理論經濟學的理論家。第治爾對古典學派，有多大的同情。第治爾認古典學派的主張，是鞏固不拔的東西。惟古典學派的學說，才認有再補植基礎的必要，他不把經濟學上之現實主義者，倫理主義者，界限效用論者看做正統學派的反對者，却認爲補充正統學派底主張的東西。他的立場在「理論經濟學」(Theoretische Sozialökonomik Leipzig 1895)上已說得十分明白。從他看來，一般人對於現實主義者孤立的方法的攻擊，正是誤認的。但以爲主張歷史方法的經濟生活的科學底存在，這又是他們的正確。經濟理論之依舊不變，雖無不可，但必須以經濟學而補充之。倫理學的錯誤，在努力進行倫理化經濟學論。倘如他們除經濟理論外，不着什麼理論的色彩，在倫理的基礎上，重建起經濟政策的話，那是正當的。界限效用論者對勞働價值學說和使用價值說的批評，並沒有適中。但倘如他們主張把這些學說和效用學說並用的時候，那他們也是正確的。舊時代的學說體系並非由新主張而被顛覆，却是被擴張。如此，第治爾便下一大決心，來負起綜合經濟學的舊來的傾向和新傾向的任務了。

據第治爾說，社會經濟學(Sozialwirtschaftslehre oder Sozialökonomik)是社會生活的部分的內容，是研究經濟的社會現象。所謂經濟的現象，是適應於經濟的欲望而發生的東西。而經濟的欲望，乃是爲對物質的財富的欲望的意義，經濟行爲是隨着欲望的刺激而發生的行爲，依這行爲的經濟主



體，雖爲對物質底財富的充足欲望的東西，但這行爲的全體則謂之經濟。依他的主張，社會經濟學可分爲理論的部分和實際的部分。理論的社會經濟學是一種記述的科學，實際的社會經濟學是一種當爲的科學。所謂理論的社會經濟學就是記述經濟的社會現象的狀態，其目的在乎說明那個狀態的因果。所以，這科學所說明的，便是經濟現象是什麼，何故要這樣的問題。

這場合的研究方法，可以應用歷史方法和孤立的方法。歷史的方法適合於在與社會生活之關係上觀察經濟現象，孤立的方法，適合於研究現象本身的性質。

實際的社會經濟學是理想的科學。所以此實際經濟學，遂設定爲人間行動規準的命題。這個科學，可分爲經濟學的倫理學和經濟政策二種。經濟學倫理的目的在成爲規模的科學，經濟政策的目的在成爲批評技術的科學。橫在實際社會經濟學的根底的理想，有二個根本相反的原則。這就是個人的原則和社會原則。

這兩個原則，是決定經濟理想基礎的信念。據第治爾，這兩個原則，並非科學所能立證的。那正如我們的無神論者，或和有神論者一樣。有神論信仰神的存在，無神論不相信神的存在。這兩個原則，和這種神論相同，不外是對於社會的當爲的一種信念。所謂「個人的原則」(Individualismus oder Individualistisches System)，即是在社會生活——個人和整個的社會間之關係中，個人爲主，

社會爲從。即家族，階級，組合，國家，或如社會全體的高級或下級的社會的構成體，不過是爲達到形成這個構成體的個人目的之手段。所謂「社會的原理」(Sozialprinzip. Organisches System oder Sozialismus) 即是在個人和社會的關係中，個人是達成社會全體目的的手段。即主張社會全體是最高級的存在，個人則處在社會的奉仕的地位。第治爾以爲依着這兩個原則可以分類社會思想體系中的當爲的問題。

經濟政策是應用經濟學的倫理學，不是應用理論經濟學。而經濟理論的見地，因爲可能採取種種的立場，所以第治爾否定經濟政策的普遍妥當性。他說，在同樣的理論的基礎上，即，在一樣的科學的觀察上，即使事情完全相等的場合，但仍可以重建起完全不同的實際經濟學。何以呢？因爲理論的原理在經濟學中，有決定的支配。理論的社會經濟學，雖則企圖剖解社會現象本身的因果，但對於某場合或某結果之於人間是否有用的問題，却不必顧慮。然而科學者不僅以記述現實的現象爲滿足，他們對當爲的問題，有闡明某態度的權利和義務。他們所應當爲的重要的理由，因爲從理論的中立地帶得以實行的原故，他們和其他的爲利己心所支配的人們恰恰相反。

據第治爾，經濟理論(理論經濟學)是由經驗得來的東西，或依思惟而決定詳細地研究多數的經濟的現象，和這種種現象關係的個人，要當作經濟人而從事行動才能探求得因果規定。在這場合的個人

的心理的前題是：

- 1 他要成爲一個經濟人。
- 2 依最少費用的原則行動。
- 3 充分明瞭經濟的狀態。

第治爾以爲人們當爲經濟的行動的時候，有了此等心理的前提。即，他以爲這場合的人間，只受經濟的動機的支配，忽略了在現實上他們也受隣人的愛，虛榮心等等影響的事情。第治爾雖以爲人們乃依着如以上之心理的前提而活動，但在這個場合，他又以爲人們仍是處在什麼倫理的色彩的，沒有善惡之別的彼岸的，有某種性質的東西。並且他除開以上三個心理的前提之外，又加上社會的前提即有一定的經濟組織的前提。所以他說，經濟理論並非研究一切歷史的經濟組織，祇是研究競爭組織和集產組織或團體組織的二個對立的種類。所以爲研究經濟理論的基礎，便是由抽象獲得的假定的基礎。這就是，第治爾乃以爲研究經濟理論方法，就是孤立的方法 (Isoliermethode)。他以爲依孤立的方法底研究所獲得的結果，並非是法則，乃是一種學說。這個學說因爲乃在假定的方法中獲得的，所以在現實的現象上，必要檢討之，補充之。

第治爾也和明嘉一樣，要求獨立的經濟理論。在明嘉，經濟理論是關於國民經濟的現象和關於典

型的關係的一般的本質的科學，但在第治爾，經濟學則爲對於經濟的動機的特殊作用方法的科學。明嘉和第治爾，都是反抗新歷史派而主張理論的經濟學的正當性和必然性的。這場合，他們均係反對歷史學派的講壇社會主義，即如頗列所說的理論經濟學的政治化的方法（*Politisierende Methode*）。此種爭論，即到今日，還繼續在理論經濟學的部門中行之。

伏爾夫（*Julius Wolf*）也爲反對新歷史派之一。他站在德意志大學經濟學教授的地位而攻擊講壇社會主義。從他看來，德意志理論經濟學之所以沒落，完全是缺乏對於理論根本的意識的理解的歷史學派所釀成的。伏爾夫也和明嘉及第治爾一樣，其攻擊並非向着方法論的方面，乃是向着多數歷史學派的講壇社會主義方面。他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社會組織」（*Sozialismus und Kapitalistische Gesellschaftsordnung 1892*）中，嘗批評馬克思主義。

他以爲不足採取馬克思主義的困窮說。而且伏爾夫還主張普羅列塔利亞，特別是中間階級的物質的狀態已經向上了。他認這個物質的狀態的向上乃屬於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自然的发展，不是社會改良的結果。據他說，所謂社會問題，不是關於正當的財富的分配的問題，乃是生產的問題。所以，勞動的生產力沒有增高的場合，社會改良是沒有何等意義的。在這點上，伏爾夫的義論接近德意志曼切斯達學派的代表者的議論，然而他這個傾向是不正當的。因爲他自己以爲他的傾向是「倫理的個人主義

的傾向」(Ethisch-individualistische Richtung)。此外，他雖又發表他自己著述的「嚴密科學的經濟學」(Nationalökonomie als exakte Wissenschaft 1908)。和「現在及將來的國民經濟」(Volkswirtschaft der Gegenwart und Zukunft 1912)的理論經濟學，但對於德意志經濟學的發展，沒有絲毫影響。

埃靈堡 (Richard Ehrenberg) 也是反對歷史學派而主張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者。他主張現在的經濟學不忠實於本來的目的，他想根據于古着德意志經濟學史上特殊地位的杜雷的方法，而重新建設經濟學。埃靈堡以為能夠迴避歷史學派在經濟上所謂政治化的方法的唯一嚴密地剖解實際生活的經驗的方法。

以古典學派或歷史學派的經濟學研究方法不能嚴密地確實地把握着經濟的事實和其原因。埃靈堡雖不反對一般的演繹法，但却反對急進的演繹法。據他說，古典學派的誤謬，因為他們把基礎安置在不充分的歸納法之上。即他們把不充分的方法處理不充分事實的材料。歷史學派的學問的結果對演繹也不十分充足。因為他不滿意演繹法，所以要求確實的歸納的方法的構成。在他，經濟學唯一的歸納的研究方法，就是比較的研究法。所以他要使比較的研究法發展到嚴密的研究方法。只要是在經濟學史上極其巧妙地使歸納的方法，而到達正確的學問的結果的時候，那就不外是杜雷的方法。杜雷乃由孤立的研究經濟學現象，即經濟現象的因果關係，再生構成全體的經濟生活的統一體上，從事研究這

個現象，以比較作爲嚴密的研究方法。

杜甯對經濟現象依這樣記帳式的研究，而埃靈堡也依這個方法研究經濟的企業，且想把它適用到社會科學的問題。埃靈堡以這記帳式的方法，爲他對經濟的事實獲得充分的材料的最重要的手段。以這經濟單位中正確的經濟事實的記帳法，使比較的方法形成嚴密的研究方法。埃靈堡自己出版「杜甯年報」以研究這嚴密的比較研究法的記述和構成。這雜誌後來改稱「嚴密經濟研究法」(Archiv für exakte Wirtschaftsforschung)。埃靈堡的目的，在乎除掉經濟學上一切前題，他的經濟學的客觀的研究，只要在這點範圍之內，他的主張就是正確的。然而不幸得很，他所計劃的方法（即依着嚴密的方法而蒐集經濟的材料而研究之，而形成一科學），終歸不能成功了。杜甯的孤立的方法，只要有充分的歸納的材料的存在，即可以進行研究，但由經濟單位，特別是由企業的記帳式，不能提供出豐富的材料。我們在這個方法內面，雖能做極詳細的研究，但不能達到理論的經濟學。在埃靈堡主張復活杜甯的孤立的方法，且依之以建設理論的經濟學の場合，于德意志經濟學者之間，始終未嘗喚起何等反響，這由上述之點看來，不能不說是當然的事情。

極力反對科學中提出判斷價值的人，就在歷史學派的內部，也已存在。麥克斯·華巴（Max Weber）雖是最著名的經濟方法學者，但在他底著名的論文「社會科學的并社會政策的認識的客觀性」（Die Objektivität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Sozialpolitischer Erkenntnis）中，仍然混同了從來經濟學上事實的科學的說明和其價值批評的議論。因此，德意志經濟學遂蒙着極大的損害了。從他看來，爲要給與對實踐的指導，而給與規範和理想的事情，這不是經驗科學的任務。因爲科學不能證明理想，所以科學和信仰不能不有嚴密的區別。一九〇九年五月在維也納召集的「社會政策協會」大會，雖然曾經討論關於生產力的概念的場合，但他現在科學的問題上以理想爲問題是和惡魔的行爲一樣。他更繼續地說，當研究一個原理或其他的原理的場合，不能不明白地考慮這問題應採如何手段和如何的結果，只有這樣，才能以科學的方法討論實際問題。這場合，問題便從純經驗的或純理論的思索而開始作混合的批評主觀的實際的價值。

宋巴在討論這問題的時候，也曾說過，在科學的觀察價值判斷，既演着一個角色，則關於存在的客觀的理解，當然是不可能的。何以呢？因爲一切價值判斷在穹極上乃依據個人的世界觀的。行價值判斷，不能排除整個的人格。而且實際的結論，也不能當爲科學的認識而推論。例如科學在科學的名義之下，也不能主張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這樣的相對立的二個東西，倘如主張之，那是很笑話的。

所以，不能不嚴密地區別經濟學上的理想的問題和存在的問題。

明嘉和第治爾乃在理論經濟學上研究存在的問題，在實際經濟學上研究理論的問題，要求兩者間嚴密的區別，而麥克斯·華巴和宋巴則排斥經濟學的全領域中用科學的名義而判斷價值。而且要贊成這兩者底意見的便是阿托爾夫·鳩巴的「爲科學的經濟學的使命」和（Adolf Verber, *Die Aufgaben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als Wissenschaft*, 1909）和頗列的「現在的德意志經濟學的危機」（Pohle, *Die gegenwärtige Krisis in der deutschen Volkswirtschaftslehre Betrachtungen über das Verhältniss zwischen und Nationalökonomischer Wissenschaft*, 1911）。這兩者對從來的經濟學，更進一步的檢討它底本質和使命。鳩巴說德意志經濟學乃站在十字路口，這就是，他們不能不選擇一般對於非科學的一方的感情的政治學及真理和認識而努力的科學中之一。頗列則以爲德意志經濟學必須離開政治的道德的見地（講壇社會主義多採用這樣的見地），或是必須離開無前提的科學的範圍。爲科學的勞作和科學的權威計，或爲日常政治計，科學必須排除關於判斷和要求即理想和世界觀之間問題的判斷。

除這樣實際問題之外，鳩巴又從認識論的根據，主張我們必然地能夠證明的東西和我們希望的，信仰的，所欲的東西之間，必須必然地有嚴密的區別。他完全沒有意思使道德和倫理離開實際經濟學。而且他又并非否定倫理爲政策學的社會經濟學的本質的部分。然而他却排除實際的和在政治的生



活中之關於給與普遍妥當的判斷的倫理的社會經濟學。在他，實際的經濟政策，并非如實際的政治學，它只是一種的技術。而且力說我們必須明白地認識它一進入政治範圍中，而它已經是超越了科學和政策學的境界了。經濟學者不能當作科學者來解決實際的政治的問題。

經濟學者對時事問題的嚴密的科學的研究，在實際家，當然必作為不充分的東西，消極的東西，太理性化的東西而表現。然而經濟學者并非以研究為無用。經濟學者構成明確的概念，表示出什麼是特定現象的原因，什麼是特定設施的作用的事情。像這樣的嚴密的非黨派的研究，對於實際家，能提供其設施的基礎。但是從他看來，理論和實踐的對立常常存在。何以呢？因為當事者的希望和科學的理論的對立永不能夠消滅的緣故。

在這一點，顏列比鳩巴更前進一步。何以呢？因為他的著作比較上澈底的論難講壇社會主義。

顏列在講壇社會主義中看見科學的混迷。講壇社會主義是一切科學的憎惡的淵源，經濟學底不毛狀態的原因，講壇社會主義使經濟學成為政治的侍女。照他的意見，以為現在多數大學教授，對於經濟學教育的主要目的，不是在乎擴大國民經濟關係的理解，乃是在乎喚醒一般難信現在的國民經濟組織的缺陷和改良的必要。他們不是敘述國民經濟現象的自體，乃是和理想同時併論。這樣，存在於不知不覺之間，遂移轉到理想方面去了。例如他們在所得分配的敘述中，叫出改良事實的批判和國家干

涉的呼聲。為要求國家干涉經濟政策計，又證明古典學派所主張的經濟生活的自然法則的誤謬，因而攻擊歷史學派和講壇社會主義之演繹的方法。

從他看來，整個的方法的論爭，并非對於方法自身，乃是對於結果。「非似理論」并非為說明經濟現象而設立的，乃為恢復一定以經濟的并社會政策的要求，即為給與一種科學的基礎而設立的。講壇社會主義，把經濟學為傾向的科學的一個實例，但在這樣的「教授政治的全盛時代」，却沒有正當的意義的經濟學者的存在。并且他又以廢棄「政治化的方法」及恢復演繹的方法為經濟學最必要的問題。政治化的經濟學這個東西，普通沒有存在，惟有政治化的經濟學者的存在。而且他又為科學的客觀性起見，忠告他們離開政治。他說，經濟學必須為認識而行動，不應為援助勞動者，企業家，社會政策，或其他的經濟政策的要求而行動。

鳩巴和頗列，至今日止，雖未示出理論的經濟學的體系，但鳩巴却以為這個體系原是站在古典學派的基礎之上的，這個體系不是克服的，乃是完成的。經濟學的使命，不是把經濟現象還元于其動機的，乃是發見這種現象底因果關係。他為這目的起見，力說必要排除其妨害的副次的原因，即適用孤立的方法。但他也未嘗忽略由此中間所生的危險。他說：「我們并非否定孤立的方法自身包藏着危險，并非否定研究者隱潛於概念的世界中，并非否定我們失掉了依據于經濟學而更能理解的和實際生

活之交涉的危險。」

但是攻擊新歷史學派和講壇社會主義的也被他人的批評。特別是新歷史學派的指導者，社會政策協會的代表者斯莫拉對於反對者的非難。他排斥明嘉的方法論，同時又排斥宋巴和麥克斯·華巴的要求。他在「國家學辭典」的第三版中，改訂其「國民經濟，國民經濟學及其方法」，強調其所以不可缺少道德的價值判斷的原因。赫克挪在他底論文「關於國民經濟學之道德的價值判斷之論爭」(Herkenner, Der Kampf um das Sittliche Werturteil in der Nationalökonomie in Schmollers Jahrbuch 1912)中，回答頗列之攻擊講壇社會主義和鳩巴的攻擊。赫克挪那本冊子，乃關於他自身的立場的辯論，雖不是為講壇社會主義底公佈的刊行物或研究社會政策協會的立場，但他以為，如要根據科學而說明一種領域的，那不但採取對這種事象的價值判斷，而且必須表示出那目的和對目的的手段。

赫司所著的「經濟學之價值判斷」(Hesse, Die Werturteile in der Nationalökonomie in Jahrbüchern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 Statistik 43.Bd)內面，主張觀察社會科學的範圍的原因的研究，涉及廣大的範圍，主張經濟問題的科學的議論不能除却價值判斷。他區別有普遍妥當性之技術的，論理的，和道德的價值判斷。技術的價值判斷，其基礎乃置在自然法則的認識之上。論理的價值判斷乃用思惟的法則，道德的價值判斷乃用經驗的主觀，並依存于生存在同一條件之下的人間的客觀的標準。

而道德的判斷，則形成統一的意識範圍，個個的根本觀念，雖然不同，但內容則生出相等的價值判斷及固定的價值標準。赫司提出我們缺乏價值判斷的時候怎樣地從多數的現象中選出研究的對象，觀察那一方面，要怎樣地決定等等的問題。他從新以在此因果的認識中觀察依這樣的價值判斷而選出的事實能否受限制或研究者對於發見因果的關係底資料能否再用為價值判斷的標準這樣的事情為問題。赫司雖深信價值判斷為必要不可缺的事情，但他却從着關於經濟及國民經濟的概念的見解來說明這件事情。在經濟概念中，有價值要素即費用和其結果之間的關係。而國民經濟的全體，便是向着一定目的之組織即目的構成體。所以經濟學對象的特性，只有在價值判斷中，才能把握。

### 三

如上所述的關於國民經濟上認識之價值關係的論爭，雖很震動德意志經濟學界，但在兩者對立以外，仍有要綜合這二個傾向的立場。宋巴在他底「近代資本主義」(Werner Sombart,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1. Aufl. 1902, 3. Aufl. 1919)中，嘗以理論的認識，要整理由歷史學派的研究所集積的材料。他在第一卷中，研究由加羅璉嘉王朝時代到現代的歐羅巴諸國的經濟的全發展。一、歐羅巴的經濟史，雖係歐羅巴的和國民的本質的產物，但他却從中間選擇出歐羅巴的本質，追求其本來的形態。

他的目的乃在乎解答近代資本主義的成立所釀成的怎樣的經濟現象對於一切歐羅巴民族是否共通這個問題。他在著述中綜合個個斷片的現象，表示出對於近代資本主義的構成會參與多數的力量。

據他說，要說明近代資本主義的全機構，只有受理論訓練了的經濟學者才能擔任這件工做。何以呢？因為能夠發見現象的最普遍的關係的東西，只有追求全知識的材料根本的理論。宋巴爲整理材料的原故，利用了「經濟組織」和「經濟時期」這二個概念。

所謂「經濟組織」，即一定的經濟方法，支配一定的經濟觀，所以用一定的技術，即有經濟生活的一定的組織。在經濟組織的概念中，能整理爲概念的統一的經濟生活的歷史的特性的事情。據他說，自紀元八〇〇年到一九〇〇的一一〇〇年間，實行過三個的經濟組織。即

- 1 自己經濟。即在農民的自己經濟及領主的自己經濟的二個的形態中。
- 2 手工業。
- 3 資本主義。

在這三個經濟組織中，各自適應於各的狀態，成爲特定的經濟的時期的存在。所謂經濟的時期，就是照經濟的方法行特定的經濟組織的歷史的時期。他的「近代資本主義」的本來的目的，乃在乎敘述這三個的時期中經濟生活的現實的構成。

「百姓和領主，手工業者和商人，他們想什麼呢？他們願意什麼呢？他們幹了什麼呢？而且他們的個人的行動又怎樣地寄與于一般社會的經濟的可驚的構成呢？這本書即想把這類事情活動地描寫出來。」宋巴爲達到這個目的，故採取下面的方法。

他最先純概念的把握一切現象和其關係，理想模型的敘述經濟組織。他因爲這個原故，所以主張採取孤立化和抽象化，所以強調歷史的特徵所限定的經濟組織的範圍的敘述的方法是有意義的。其次他借着理論的認識的幫助，確定了經濟生活事實的構成和時底經過中其構成的變遷。最後他在理想中，又整理了一切的現象，判斷實現此理想的手段。

如此，宋巴便結合着抽象的演繹的方法和實驗的歸納的方法了。在個個的問題的研究上，分別理論的見地和經驗的見地，即分別單是抽象化的孤立論者呢？抑單是集積事實的部分的研究者？他以爲只有兩者的結合，才能遂行科學的經濟學的全任務。他排斥以經濟理論和經濟史當做二個獨立的部門的事情。在德意志經濟學中，存在二個學派：一爲反對理論的傾向之歷史派，一爲由縮小理論的概念而固守古典學派的孤立的方法的傾向。這兩個方法，都是經濟學中的舊方法，正如五十年前之時事問題的經濟學者德意志·曼切斯學派一樣，又如歷史學派中否定經濟上之理論的構成一樣，都不能助經濟理論的發達。他把經濟學當做經濟組織的學問，把歷史的社會科學當做經濟學，把那個概念當做

有歷史的範疇的性質的東西。所以他用經濟史的研究和理論的研究的綜合而構成經濟學的認識。





## 第二十二章 最近的德意志經濟學

### 一

德意志理論的經濟學的必然性和正常性被說明後，理論經濟學才得着確固的基礎。理論的勞作底發表也已經不需要什麼的辯明而被刊行，而且也已經非形成什麼的例外了。自二十世紀初頭以來，在德意志語的領域之內，同時發表了數種的理論經濟學的體系和理論的特種研究。

上面已經說過卡爾·明嘉，在一八七一年的時候，著述「經濟學原理」一書，對理論經濟學的新體系給與大要的討論。他底思想是依辛碧達和腓力·芬·威沙的體系而補充擴張完成的。辛碧達一九〇八年著「理論的經濟學之本質和其主要内容」(Wesen und Hauptinhalt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一九一二年寫成「經濟的發展的理論」(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辛碧達在前者乃觀察靜物狀態的國民經濟。即，一個經濟的數量的變動便是其他一切變動的方法，一切經濟的數量便是處在相互關連依存的關係的靜的狀態。即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有「一定的依存關係或

函數關係」。被給與特定底事實的時候，那內面即存着理解其數量和其大的一切的要素。

如此，經濟的數量并非任意增大的，須在某意義上表示出必然的決定的事情。在如此的基礎之上，而研究價格及分配的現象。「經濟的發展的理論」，為趨向於經濟動態的研究。即研究爲什麼發生經濟上變動的問題。這場合成爲問題的發動，是從經濟自身發生的變動。辛碧達對這件事，以爲使經濟如此運動的作用的有二種力量。其一之力量，乃存在企業家和企業的機能內面。在這裏，「不但

是經濟的繼續的再組織化的刺馬釘，而且是形成社會上層的要素的不斷變化的刺馬釘。」第二的力量是信用，對經濟的發展演着決定的任務的東西。何以呢？因爲關於從一個人到他人的購買力的移轉，及關於新購買力的創造，存在沒有存在對其信用充足的東西的信用，而其信用，最初沒有和何等新的財富對立的原故。如此，信用乃依勞働和土地及其他的使用，得在經濟學上形成爲新組織的作用。

辛碧達在這裏看見經濟的發展的本質的東西。一般對辛碧達的批評，約從二個見地出發。即

1. 在他底二著述之間有不能超越底溝梁的存在。
2. 在「理論的經濟學之本質和主要內容」中，其前提非常狹小，不足以依賴而得到理解經濟的關係。

辛碧達在這場合，對於一切均以數量來表現，對於一部分，則用數學的方式。然而在「經濟的發

展的理論」中，却和這個不同，雖傾向于一切理論，但全然有現實的性質。關於經濟中企業者，信用的役務和景氣的問題，他和斯比托夫均出於舊見解以上。

腓力·芬·威沙 (Friedrich von Wieser) 貢獻於奧地利學派的價值理論的事情在前面已經說過，但在一九一四年的「社會經濟學的理論」(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Wirtschaft 1914) 內面，却採取稍異的立場。他的「自然價值論」和其他的舊著中雖採和明嘉及巴伏爾同樣的方法，但在「社會經濟的理論」中則採和這個不同的方法。他嘗說：「明嘉認大衆參加貨幣的構成完全沒有價值，那是根據他底個人主義的根本思想的。他認貨幣爲無異于經濟中一切社會的構成一樣，乃個人的目的的努力的偶然的結果。」從威沙看來，社會的要素極濃厚地表現着；個人主義乃認個人在其內部完全依着自己而獨立，從自己之意志而行動，這是其根本的誤謬。威沙的後期的著作，却越出純經濟的範疇的研究以上，論及一般社會學的問題。其「權力法則」(Das Gesetz der Macht 1926)，即其代表的作品。

這樣的社會的見解，已經在「社會經濟的理論」中濃厚地表現出來了。他在這方面，對於經濟生活中的社會的範疇，表示出極多的理解，同時在方法上，也和這個互相關連。他最初研究單純經濟。在單純經濟中，那爲單純化了的前提是妥當的。而且他一方面雖又研究國民經濟和世界經濟

的理論，但其方法和單純經濟的場合相去甚遠。從他看來，因為由單純經濟形態進到複雜經濟形態，所以社會的勢力，遂和演出多大的角色的現象發生關係。

威沙說：「理論家雖不能夠認識現實的完全的姿態，但他們可以由把握着現實純粹的要素的最大抽象的孤立化的和理想化的假定而開始。若理論家要始終遂行他底任務，那他決不可停止這最大的抽象。何以呢？因為如不這樣，他即不能理解現象。但他寧不能不一步一步地減少抽象的組織，而講成更具體的更多的假定。」威沙所說的減少抽象，就是慢慢的，要以社會的勢力為經濟的現象底協同作用，如此，才可以到達列基斯所謂的現實的理論的嘗試。威沙底新見地的貢獻即存在這裏。

威沙的研究的對象，就是特定的經濟關係的說明。他在現代的效用說中，嘗說要把這個說明作為那不用特定實際的適用為目的之經驗的理論。而且威沙更捨掉了經濟政策的見地的舊自由主義的見解。他說：「認識國家之職分是保護，這實是現在經濟政策的重要的理論的基礎。發見這件事情，并且打破古典學派的獨斷論，這正是使德意志的科學有名的主力。」威沙自身的結論雖不明瞭，但關於商業政策的問題，腓力·里思特却認為是偉大的貢獻。總之，他底「社會經濟的理論」，不為奧地利學派抽象的孤立方法所囚，這實是一本應注目的著作。

除這種種的經濟學體系之外，一九一〇年奧濱海馬所著的「純粹及政治經濟學之理論」(FRANZ

Oppenheimer, Theorie der reinen und politischen Oekonomie)中，曾樹立了自由的社會主義的體系。一九一六年的時候，第爾開始發表其「社會的法的體系」(Karl Diehl, Theoretische Nationalökonomie)的第一卷，同時李普曼也開始發表其「心理的現象的體系」(Robert Liefmann, Grundsätze Volkswirtschaftslehre)的第一卷。第爾的理論經濟學，雖為全四卷的著作，但到今日，只出版其中的三卷。李普曼的經濟學原理，乃由浩翰的二冊集合而成的。在一九一八年，葛塞爾的「理論的社會經濟學」及西班的「經濟學的基礎」(Othmar Spann, Fundament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均繼續地出版。

## 二

我們現在在古典經濟學底學問的體系被排斥了的德意志中，發見了互相否定其他科學的性質鬥爭的幾種體系。在德意志，主張理論的經濟學之再生後，我們不能不從下面二個理由而說明古典學派理論之體系。即

1. 不得無視歷史學派的業績。
2. 古典學派，特別是李嘉圖的完成，必然地引起馬克思主義的出現。

所以，我們在馬克思主義中，看見古典學派經濟學的完成，古典學派原是和馬克思主義互相關聯的。莫斯拉的學派，乃依經濟史而換置經濟理論而否定了這個結果。但在德意志的理論經濟學底再活以來，這件事已經屬於不可能了。自然，一切理論家，倘他們不肯定馬克思的場合，他們即不能不被論難。特別是新體系的創造者，他們的義務必須證明經濟學應有的使命，決不能靠馬克思的體系得到滿足的事情。他們應以下面的諸點論難馬克思主義。攻擊靜態經濟學的有奧地利學派，有葛塞爾及李普曼；攻擊動態經濟學的有奧濱海馬；攻擊唯物史觀的有第爾和西班。這班學者，不但攻擊馬克思體系的<sup>一方面</sup>，他們之多數，還從一切方面，同樣地批評攻擊馬克思。但以上所列舉的不過是在其批評中最本質最重要的部分。被列舉出的學者，在拒絕馬克思底體系的這一點，雖略見一致，但其批評的見地，則略有不同，而其附植的基礎，也有各種各樣。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種種見地，對他們自身的體系的建設也受影響。何以呢？因為其結果，理論的經濟課題，對象，方法，本質的不同，所以解決現存的問題也各異，所以體系也即不能不差異。

靜態經濟學的批評，其焦點均集中到馬克思的價值論。一方面以其價值論代替馬克思的價值論，他方面則決定馬克思整個價值論。古典學派及其後繼者，或是馬克思，他們以為價值祇是一個客觀的要素即費用。這場合，對於費用的費用概念的見解，自然是不同的，一者則認生產或再生產費，對土

地勞働資本全體的費用或剛剛投下的勞働，乃形成決定價值的東西，反之，奧地利學派的支持者，則認價值爲効用，所以歸諸主觀的要素。如照奧地利學派的意思，則一種財富不是因爲其費用的消費才有價值，財富是一種充足欲望的東西，即因爲付與効用，所以才有價值。價值的標準是一定量的費用，它依欲望的程度及等級之如何而決定。至于其標準採用界限効用的概念的事情，已如前面所說，茲不贅述。

### 三

奧地利學派雖要由主觀的價值學說而代替客觀的價值學說，以爲解決問題，然現在否定價值論全體的價值否定論者已經發生了。價值無用論，對於經濟現象的說明，從來于其窮極的目的上，雖屬於價值論，但現在，却由所謂其價值論的說明，對經濟現象不給與什麼理論的說明這一點，而達到主張價值論對於經濟學無用了。其主要的論者爲瑞典的經濟學者葛塞爾（Gustaf Cassel. Theoretische Sozialökonomik 1918）。他以爲費用說和効用說之間沒有什麼的矛盾，便是提倡兩說之折衷說的第治爾現在也贊成這種學說了。

從葛塞爾看來，「以特別的價值論爲研究經濟學的開始，這毫無理由」，所以他主張放棄價值

論全體。他說：「爲科學進步起見，必須放棄一切已經失掉本質的重要性的陳腐的問題或舊來的論爭，而開拓新研究的餘地。」

自他決意研究經濟學以來，即確信那種以糾紛爲事的用語上底論爭，即由毫無實益的空理空論所成的陳腐的所謂價值論，畢竟不過是負着要除去理論經濟學的重荷。即就是放棄經濟學上一切舊價值論，而重新地建設經濟學底價值論，是很可能的，同時也可以說得而脫却事實上含有煩瑣哲學的不必要的價值論爭。

葛塞爾在一九〇三年所著的「利息本質和必然性」之第二章第一節中書說：

「『價值』是頗漠然的概念。關於經濟學的著作者，每要附與較此明確的意義，例如定義價值爲『使用上的價值』及『交換上的價值』的形形色色的種類。然而此等定義却給一般人煩惱於嚴密和的確之缺如，苦於不能理解此類用語的意義。其結果，到了今日，徒然爲這類價值的本質和其支配的原因的無用的議論及論爭費了多大的勞作。」

「這是不能不如此的。『價值』是價格以外的什麼東西？在這個意義上，它每和心理的過程有關係，每和感情或意思底強度有關係。然而此等諸力，雖然極是實現的東西，但却不受客觀所測定，從而價值的概念，原是處置量的一種科學的基礎，爲有用的概念必不可缺的，雖然它始終不能到達數學



一樣明確的地步。不錯，「價值」這用語的渾然不清，使人們關於經濟理論的一般的諸問題，認爲最不用意的言論。像這樣惹起的混亂，這個學問，當然必蒙着多大的損失。」

除掉這個弊害，在積極的方面企圖經濟學的進步的學說，就是葛塞爾的價值無用論。他說：「對這弊害的最根本的有效的救濟手段，自然是放棄整個的價值理論。可慶幸的，此事情有充分的可能性。實際上，說我們必須以特別的價值論爲研究經濟學之開始，這完全無理由的。我們只以多大的利益，以價值和支配價值的諸原因之說明，爲出發點已很夠了。因爲這樣，關於價格有什麼意義的事情，完全沒有何等曖昧的原故。這是無論任何人，也都熟知的。加之，在價格底自身，如經濟學一樣，必要爲如數量的科學，一純數學的概念。事實上貨幣在各人是一種的尺度，各人以這尺度依自己底種種的欲望分類各個重要性，又到某程度止，也能計量它底重要性。這尺度也有極不完全的場合。然而它是統制個人的經濟活動的東西。而且依貨幣評價各個人的種種的欲望，在現實上，爲構成價值設定的基礎。所以，經濟學者如從個人的貨幣評價出發已經充分了。我們經濟學者對於潛伏在此等評價背後的心理的過程，沒有干與之必要。」

同時葛塞爾又說價值概念原爲廣義的價值概念所包含的原因。他說：「我們也須注意，「價值」畢竟也不過是假設的一價格即常常在某條件之下被協定的一價格。例如商人廣告要把他底存貨在「價值

以下」拍賣的場合，這就是他宣告想在市場的正常條件之下收回價值以下的貨幣而賣却的一種作用。又如理倫經濟學者之所謂「使用價值」如有某種明確的意義的場合，這個意義便是指着一個人對一貨物，用便宜的價錢不能購買的場合，因而提供最高價格而言。我們如把經濟學上所有價值概念來考研起來，則我們一定看出，這個概念，除開在某事情之下所達到的價值的意義之外，別沒有什麼意義的事情。然而這種事情極少有充分嚴密的定義，所以關於這言語的意義存着幾多的曖昧的事情並不是奇怪。」

如此，葛塞爾達到如此的結果。即「由以上所述而達到不能有為一般價格理論所不能包含的合理的價值論的結論。而且不能有在經濟學的範圍內由預先研究價值而較被價格之說明所制限的研究還更能詳細說明的問題。」

葛塞爾在他底「理論的社會經濟學」中，也同樣地敘述價值無用論，而他論述從價格出發的交換經濟的原理和構成價格的理論尤更詳。在他底價格構成機構論中，占着最主要地位的東西便是基于「稀少性的原則」(Prinzip der Knappheit)的平衡價格的說明。所謂「稀少性的原則」，便是充足欲望的手段，在事實上稀少的意思。據葛塞爾說，經濟的活動，乃在限制欲望充足底可能性的前提之下所做的行爲。所以，一切的經濟均處在這個「稀少性的原則」的支配之下了。價格構成底機構也便是

基于這個原則的。

李普曼對於經濟技術的或物質的數量之見解使其和心理的現實的見解對立。依他這個見解，經濟學不是論財富底數量的東西，而是研究費用及効用底評價。這麼一來，財富的價值論遂被排斥了。在他底後來展開了的開始敘述的根本思想的就是他底「純主觀的價值論之基礎的收益和所得」這篇論文。在他的「經濟原理」和一九二四年的「一般經濟學」中，價值論完全被克服了。他底體系的中心概念不是價值概念，乃是收益概念。收益底原因並非歸於土地勞働及資本，乃歸於効用和費用評價。何以呢？因為在這個評價中，効用的餘剩即發生收益的原故。而且從他看來，經濟理論中心問題便是價格問題。而「所得」這個東西，也是依着價格之形成而被說明的。這場合，照他底意見，由他自身的全洞察，依價格理論，替換古典學派並界限効用論者之不完滿的經濟的說明。排斥古典學派也就是排斥馬克思。何以呢？因為馬克思承繼古典學派的根本的誤謬的原故。

#### 四

反對奧地利學派的代表者，反對葛塞爾及李普曼的奧濱海馬，乃固持客觀的價值論。奧濱海馬如馬克思「並肩而立」，馬克思的「學徒」及「擴張者」，都採取勞働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然而關於剩餘

價值的源泉說，奧濱海馬和馬克思却不相同，奧濱海馬書使馬克思底「複雜的論理的錯誤的」剩餘價值論和他底「極簡單而正確的」剩餘價值論互相對立起來。奧濱海馬對於剩餘價值之說明，多藉獨占概念的幫助。剩餘價值乃地主階級及資本階級從勞働階級奪取的獨占利益。這場合，獨占利益，在消極上，乃當爲獨占貢物，當爲從勞働貨銀之控除而表現。這個獨占利益，祇是依獨占土地即封鎖土地才可能，這土地的獨占，把榨取勞働者的可能性給與資本的所有者。

上面所述，可說爲奧濱海馬對馬克思的擴張或修正。奧濱海馬反對動態經濟學，特別是在資本家集積的法則上攻擊馬克思學說的體系。這個法則雖爲馬克思經濟學主要的支柱，但奧濱海馬在他底多數著作中，均認原始的蓄積法則爲錯誤。

依這個法則，馬克思不能斷來由資本家的社會組織到集產主義的發展的證明。從奧濱海馬看來，代替于資本家的社會組織的東西，并非集產主義的社會組織，乃是自由的社會主義的組織。即自由人和平等人的社會，其中雖有市場和自由競爭的存在，然尙不能成立剩餘價值。

第爾及西班牙相信由排斥唯物史觀可以克服馬克思學說的體系。在這場合，第爾于事實上代表社會立法的立場，依據於以認識論爲基礎的斯丹拉。社會的立法的學派，排斥以經濟法則爲普遍妥當的法則的一切立場。何以呢？因爲他們不是從經濟界的不變的衝動說明經濟現象，乃是從一定的法的

秩序說明的原故。而且因爲這法的秩序，在相異的時代，或在相異的民族，完全是相異的原故。從第爾看來，經濟學祇是敘述個個的社會形態內部之經濟現象的合則性及一定發展傾向。如此，社會的法的體系，便是嚴密地限制一般對於這個問題有疑問的解答，排斥一般關於社會發展的發言。現社會組織爲有法律的東西，關於社會組織底變化，本沒有論爭的餘地，在經濟的合則性的發展上，法律爲其基礎。

西班牙依着繆勒而使普遍主義的經濟學和山斯密斯之自然法所建設的個人主義的經濟學對立。從西班牙看來，個人主義和普通主義之差異，不是世界觀，乃是思惟形態。他在「經濟學的基礎」上，想從普遍主義的思惟形態決定經濟學的對象及方法論。他說：「這裏所追求的思想，是比經濟的個人主義及啓蒙主義的思想更高的真實的東西，宣傳物質的機械的自然法則性和經濟的萬能，還較那無恥的以自己爲定「唯物的」名稱的馬克思的經濟學及歷史觀更高深一籌。」西班牙認史的唯物論爲野蠻的東西。

他在「經濟學的主要理論」中嘗說：「唯物史觀實有包含社會一切部分的歷史過程的有機的全關係的莊嚴的黑格爾的思想。這件事情，使這個史觀偉大起來，使其方法論的意義偉大起來。然而包含在史觀底內面的內容和精神，却是十九世紀的最悲慘的真理。」

在西班牙，現存的經濟形態，便是被自由所規制了的經濟或中庸的資本主義，乃屬于一種歷史的範疇，表現出一種過渡形態。那不是共產主義的形態，是對於被結合了的階級的經濟形態的過渡形態。中庸的資本主義依結合的經濟的解體而成立，且推移到一種新結合。西班牙又把經濟分爲四種形態：（1）交換經濟；（2）被社會政策的及類似的結合所中庸化的資本主義；（3）依組合方法的部分組織而構成的經濟或階級經濟；（4）組織的或共產主義的經濟。據西班牙，其中交換經濟和共產主義經濟是烏托邦，只有爲階級的結合的經濟形態，才適合於真善的全體構成的法則。

## 五

這麼一來，對於理論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反對，遂科學的克服了馬克思主義，同時又造成許多經濟學體系。所以對馬克思主義如此的對立的傾向，在一方面，乃再吟味那把握着馬克思經濟學的資本主義理論的說明，同時在他方面，又成爲德意志階級鬥爭的理論的反映。然上面所說，在馬克思主義自身中，也有要修正這主義或要發展這主義的份子底存在，這事實，原是要使馬克思經濟學的認識更能適應於現在的社會的狀態的一種努力。

德意志的理論經濟學（不問其爲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或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示出極複

雜的狀態，比如一九一八年的德意志革命，其結果極不澈底，從而德意志社會勢力的狀態，也複雜得不堪。前面已經說過，馬克思主義雖好像已被諸學者「克服」了似的，但「批評克服」馬克思主義的是在前世紀的八九十年代的市民的經濟學者。因為這個事情，乃以近世資本主義社會中對立的二個階級的中心而行經濟理論的鬥爭。然而一個的社會組織，已如尼古拉·列寧在其「實物稅論」中關於蘇俄所摘指的一樣，除其最本質的部分之外，保存未來社會組織的諸要素。

這件事情，在一社會裏面，反映出特沃羅幾的關係。德意志社會之社會的和經濟的思想底多樣性，乃反映着這種狀態的東西，乃完成自國底資本主義，同時清算其封建的要素，并且其將來便是向着社會主義社會更進幾步的狀態的結果。像這樣的社會的情勢，在社會的和經濟的思想所反映之地方，就能發見德意志思想複雜性的原因。

然而德意志經濟學的一般的傾向，愈使其社會學的色彩漸次地濃厚起來。這事情，原是受着那最能認識那反對古典學派之非歷史的抽象的孤立的傾向的歷史學派和經濟現象乃屬于一種歷史的範疇的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立場的影響所使然。已經說過，歷史學派的人們多數受着庫德的影響，解釋經濟現象為社會現象的一部分，羅列了以經濟現象為影響底要素的其他的社會的要素。他們的態度雖缺乏統一的理論的態度，但仍是古典學派之所不能理解的社會的見地。然而馬克思經濟學却是建設於社會學

的基礎之上的，所以充分地以社會學的見地而說明為社會現象的經濟現象，同時又尊重拉薩爾和羅特比杜斯之法的秩序，理解為歷史的範疇的經濟現象。

所以，現代德意志的市民，以為經濟學者如單在理論的體系上不能夠歸復于古典學派的立場，則奧地利學派，也不能採取孤立的經驗的立場。于是乎便不能不作為方法論的立場的助者而要求社會學了。德意志的社會學，從來均陷于極不振的狀態。特別是歷史的研究的興盛的德意志，給與社會學底存在的餘地非常之少。而歐羅巴大戰，愈使德意志社會混亂起來。社會的變革期，從來均是社會學興隆的時代。在德意志，因為對於社會的根本法則的說明甚形踴躍，所以社會學也頗見勃興。

這樣的情勢，使德意志經濟學愈富于社會學的色彩。然而德意志市民經濟學，如前所述，乃處在和馬克思經濟學對立的狀態。他們不在馬克思社會學上求其基礎，却在他方面求之，那是極當然的事。但要求經濟學的社會學的基礎，也應依經濟學的實踐的目的如何而決定，這也已如前面所說了。

在這意義上，德意志經濟學的研究，在其經濟學的形態的多樣性這一點，甚有興趣，且不能不說為教訓的。自然，馬克思經濟學在現代經濟學中有最完成的體系，這是不消說了，但我們必須更加理解它，更加使它達到發展的時期。而且為促進這個研究起見，必須以德意志經濟學做材料，而研究德意志經濟學的意義，也就在乎此。

——德意志經濟思想史終——



# 德意志經濟思想史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出版

著者	加田哲二
譯者	周承福
出版者	曾獻聲
發行者	上海河南路六十號 神州國光社 電話一三三九八號
印刷者	上海新開路福康路 神州國光社印刷所 電話三一〇九〇號
分售處	各省縣神州國光社 各大書局
實價	一元三角

15  
1215